

# 中国古代史讲义

(试用稿)

上 册

北京大学历史系  
中国古代史教研组

1973年5月



# 毛主席语录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 毛主席语录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古为今用



# 说 明

为适应教学急需，一九七二年底到一九七三年初，我们编写了这部《中国古代史讲义》（试用稿），很不成熟，仅供本校同学学习中国古代史时参考用。由于时间仓促，更由于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很低，因此，在许多方面，例如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对古代文化思想的分析等方面，一定会存在缺点和错误。我们热切希望同学们在使用时提出批评，通过师生的集体努力，共同讨论，在教育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在深入学科领域的革命大批判中，使这部讲义得到进一步的修改。

中国古代史教研组

1973年5月





# 目 录

<b>第一章 原始社会</b> .....	( 1 )
<b>第一节 原始群时期</b> .....	( 1 )
一、原始人羣的出现 .....	( 1 )
二、原始人羣向母系氏族公社过渡 .....	( 4 )
<b>第二节 母系氏族公社时期</b> .....	( 5 )
一、母系氏族公社的形成 .....	( 5 )
二、母系氏族公社的发展 .....	( 6 )
<b>第三节 父系氏族公社时期</b> .....	( 10 )
一、父系氏族公社的确立 .....	( 10 )
二、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经济 .....	( 12 )
三、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原始社会的传说 .....	( 14 )
<b>第二章 奴隶社会</b> .....	( 16 )
<b>第一节 夏、商 奴隶制国家的产生和发展</b> .....	( 16 )
一、文献记载中的夏代 .....	( 16 )
二、商王朝的建立 .....	( 18 )
三、商代的阶级状况 .....	( 18 )
四、商代的经济 .....	( 20 )
五、商代的文化艺术 .....	( 22 )
六、商王朝的灭亡 .....	( 23 )
<b>第二节 西周 奴隶制社会的兴盛</b> .....	( 25 )
一、西周的建立和分封诸侯 .....	( 25 )
二、西周的社会经济 .....	( 27 )
三、西周和周围各族的关系 .....	( 29 )

四、阶级矛盾的尖锐和周室东迁 .....	(31)
<b>第三节 春秋 奴隶社会瓦解和封建制度产生</b> .....	(32)
一、春秋时期的政治形势 .....	(32)
二、封建地主经济的发生 .....	(34)
三、奴隶和平民的革命斗争 .....	(36)
四、封建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 .....	(38)
五、春秋时期的思想和文化 .....	(39)
<b>第三章 战国、秦 封建制度的确立 陈胜、吴广</b>	
<b>领导的第一次农民大起义</b> .....	(44)
<b>第一节 战国 封建制度的确立</b> .....	(44)
一、封建地主阶级的变法运动 .....	(44)
二、社会经济的发展 .....	(50)
三、政治制度的变化 .....	(59)
四、兼并战争的扩大和秦统一中国 .....	(62)
<b>第二节 秦 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b>	
<b>家的建立</b> .....	(67)
一、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 .....	(67)
二、镇压、防范旧贵族的复辟 .....	(68)
三、发展地主经济、文化的政策 .....	(70)
四、秦与周围各民族的关系 .....	(72)
五、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 .....	(77)
<b>第三节 陈胜、吴广领导的第一次农民大起义</b> .....	(80)
一、起义的爆发 .....	(80)
二、秦的灭亡 .....	(83)
三、秦末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 .....	(87)
<b>第四节 战国、秦的文化</b> .....	(90)
一、百家争鸣 .....	(90)
二、史学 文学 绘画 .....	(96)

三、科学技术 .....	( 97 )
<b>第四章 两汉 地主经济的发展</b>	
<b>黄巾大起义</b> .....	( 100 )
<b>第一节 西汉 地主经济的发展 专制主义中央</b>	
<b>集权的加强</b> .....	( 100 )
一、西汉初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 .....	( 100 )
二、巩固地主统治和恢复地主经济的措施 .....	( 102 )
三、社会经济的发展 .....	( 105 )
四、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 .....	( 111 )
五、边疆各民族 .....	( 119 )
<b>第二节 西汉阶级矛盾的尖锐 绿林、赤眉大起</b>	
<b>义</b> .....	( 128 )
一、土地兼并的加剧 劳动人民反对西汉王朝的斗争 .....	( 128 )
二、绿林、赤眉大起义 .....	( 136 )
<b>第三节 东汉的政治和经济 黄巾大起义</b> .....	( 143 )
一、东汉初年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 .....	( 143 )
二、封建统治机构的加强 .....	( 145 )
三、社会经济的发展 豪强地主的大田庄 .....	( 148 )
四、边疆各民族 .....	( 153 )
五、东汉中后期的腐朽统治 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	( 161 )
六、黄巾大起义 .....	( 166 )
<b>第五节 两汉时期的文化</b> .....	( 172 )
一、哲学 .....	( 172 )
二、宗教 .....	( 175 )
三、经学 .....	( 177 )
四、史学 .....	( 180 )
五、文学 艺术 .....	( 182 )

六、科学技术 .....	(185)
<b>第五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 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发展和南方经济的上升 .....</b>	<b>(189)</b>
<b>第一节 魏、蜀、吴三国分立和西晋的短期统一 ...</b>	<b>(189)</b>
一、黄巾起义失败后地主阶级重建封建统治 .....	(189)
二、西晋的腐朽统治和各族人民的起义斗争 .....	(195)
<b>第二节 东晋、南朝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 南方         的农民起义 .....</b>	<b>(202)</b>
一、北方胡族统治者的南侵和南方人民的自卫战争 .....	(202)
二、东晋末年的南方农民起义 .....	(206)
三、士族地主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 南朝政权的更替 .....	(214)
四、南方的社会经济和阶级状况 .....	(220)
<b>第三节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 六镇、关陇、河北人民起义 .....</b>	<b>(228)</b>
一、北方各族统治者的封建割据和北魏统一北方 .....	(228)
二、北魏迁洛以后北方的社会经济 .....	(238)
三、六镇、关陇、河北各族人民的起义斗争 .....	(241)
<b>第四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各民族 .....</b>	<b>(252)</b>
一、北方边境各民族 .....	(252)
二、南方各民族 .....	(257)
<b>第五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文化 .....</b>	<b>(259)</b>
一、哲学和宗教 .....	(259)
二、史学、文学和艺术 .....	(265)
三、科学技术 .....	(269)

# 第一章

## 原始社会

### 第一节 原始群时期

#### 一、原始人群的出现

人类是从古猿演化而来。大约五、六十万年前，在我国已有原始人类，劳动、生息、繁殖在这辽阔的土地上。目前我国境内发现的当时人类化石有：北京西南周口店的北京猿人化石、陕西兰田的兰田猿人化石、云南元谋的元谋猿人化石，其中以北京猿人遗址发现的资料最丰富。

北京猿人遗址，是1927年开始系统发掘的。先后发现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六具，还有一些头盖骨残片以及股骨、胫骨、下颚骨、牙齿等。全部化石资料，可鉴别出属于四十个男女老幼不同的个体。此外还发现了十万多件石器和石片以及丰富的动物化石。

北京猿人已能直立行走，能制造工具从事劳动，并且有了简单的语言和原始的社会组织。

北京猿人身体各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头骨比较落后，保存的原始性较多，例如：头盖骨低平，头骨较厚，脑容量小（北京猿人脑量平均1075毫升，现代人脑量平均1350毫升，类人猿脑量平均415毫升），眉骨隆起，吻部突出，缺乏

下颚，牙齿粗大等。四肢发展得比较进步，尤其是手，发展得最进步，其灵活程度和现代人没有多大差别，这是因为，手是劳动的器官，它和劳动的关系最密切、最直接，因此发展的速度快。

北京猿人在体质形态上这种发展不平衡的现象，科学地证明了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伟大真理，从而粉碎了资产阶级学者所散布的“心灵是人类演化的根源”的谬论，也粉碎了刘少奇一类骗子所散布的“天才论”的唯心史观。

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劳动。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恩格斯说：“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北京猿人已经大量地制造和使用工具了。当时的工具主要是石器。制造石器的原料以脉石英为最多，其次是绿色砂岩、石灰岩、燧石等。石器的形状有砍伐器、尖状器、刮削器等。打制石器的方法有直接打击法、碰砧法、垂直打击法等。打击出石片后，再简单地进行修整（也叫第二步加工）即成可用的石器。北京猿人就用这种比较粗糙的石器砍伐木棒、刮割兽皮。考古学上称使用这种打制石器的时代为“旧石器时代”。北京猿人属于旧石器时代初期。

在北京猿人居住过的洞穴中，发现有用火的痕迹，有黑色的灰烬和木炭，还有被火烧过的兽骨和石块。兽骨因燃烧而变成黑、灰、兰、绿等颜色，有的骨头甚至被烧裂或变形。被烧过的砾石，表面都有不规则的裂纹。在洞穴中，灰烬层不是普遍地散布在整个地层中，而是一堆一堆地限于一定的地区，显然这不是野火留下的痕迹，这种现象证明，北京猿

人虽然是使用天然火，但已能有意识地对火进行控制使用了。火的使用，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件大事。火对于人类有很重要的作用，不仅能照明、取暖，而且还可利用火作为与野兽斗争的武器。有了火，人类可以熟食，熟食能缩短消化过程，这对人体更好地吸收食物的养分，促进人类体质的发展，特别是对脑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火的使用，是人类向自然界进行斗争过程中，经验积累的结果，也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北京猿人还不会建筑房屋，只是住在天然的洞穴中，主要依靠采集和狩猎以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由于生产力极端低下，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很弱，再加上经常有凶猛的野兽和各种自然灾害威胁着人们的生存，因此，人类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几十人结成一团，互相协助，才能战胜各种困难，抵御猛兽侵袭，进行改造自然的斗争，否则是不能生存下去的。这种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的早期人类组织就叫做原始群，这是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当时人们的两性关系，还处在原始的杂乱性交状态。

原始群时期，人类生活很艰苦，寿命比较短。根据发现的人骨化石资料统计，当时死亡于十四岁左右的儿童占40%。这说明原始的人类社会，并不是什么人类的“黄金时代”，当时人类是在极困难的条件下，以极艰苦的劳动，创造了原始的文化，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

兰田猿人化石，是1963年在陕西兰田发现的，经过大面积的调查和发掘，共发现猿人头骨一个、下颞骨一个，研究结果表明，其头骨壁极厚，头骨高度很小，脑量很小，明显表示出是比北京猿人更为原始的人类，其时代约为六十万年

前。

## 二、原始人群向母系氏族公社过渡

大约一、二十万年前，原始人群逐渐向母系氏族公社过渡。这时期的人类，被称作“古人”。在我国境内发现的“古人”阶段的人类化石有马坝人、长阳人、丁村人。其中以丁村人的资料发现较多。

丁村遗址，是1953年在山西省襄汾县的丁村发现的，共发现三枚人类的牙齿化石，二千多件石器和许多动物化石。丁村人的牙齿比北京猿人细小，臼齿咬合面的纹理，比北京猿人简单但比现代人复杂，这都是丁村人比北京猿人进步的地方。丁村人的门齿舌面呈铲形，这和北京猿人相同，北京猿人门齿的舌面也是铲形，铲形牙齿是蒙古人种的特征。

丁村人打制石器的技术，比北京猿人进步。北京猿人石器的类型不甚固定，可以一器多用，丁村人的石器有显著的类型分化，除有砍伐器、刮削器外，最突出的有厚三棱尖状器和石球，这是丁村人具有代表性的石器。石球可以作为狩猎时投掷用的武器，厚三棱尖状器可能是作为挖掘使用的工具。丁村人生存的时代，在考古学上称为旧石器时代中期。

马坝人是1958年在广东韶关马坝圩发现的，当时发现的人骨化石有顶骨、额骨、右眼眶和鼻骨的大部分，还发现一些动物化石，但没有发现石器。马坝人顶骨比北京猿人薄，前额比北京猿人高但又比现代人低平。马坝人属于古人阶段早期的人类。

长阳人是1956年在湖北长阳的一个洞穴中发现的，发现的人类化石有一件残破的上颌骨（带有两枚牙齿）和一枚



单独的牙齿，此外尚有不少动物化石，长阳人生存的年代，比丁村人稍早一些。

这时人们的婚姻关系，可能已摆脱了原始乱婚状态。父母和子女之间不得婚配。婚姻关系只能在同辈间进行，这是群婚的早期阶段。

由于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社会发展速度缓慢，大约经历了几十万年的时间，才由原始群逐渐过渡到母系氏族公社。

## 第二节 母系氏族公社时期

### 一、母系氏族公社的形成

母系氏族公社是“一个确定的、彼此不能结婚的女系血缘亲属集团”（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生活来源有了一定保证。在这基础上，才能产生比较稳定的社会组织——母系氏族公社。母系氏族公社的形成，与一定的婚姻形式相联系。恩格斯说：自一切兄弟和姊妹间，甚至母方最远的旁系亲属间的性交关系的禁例一经确立，上述的集团便转化为氏族了”（同上）。大约距今二万年前，我国原始社会开始进入了母系族公社时期。

我国境内发现的母系氏族公社形成时期的人类化石有：柳江人、资阳人、河套人、山顶洞人等。山顶洞人是1930年发现在北京西南周口店龙骨山的山顶洞中因而得名。共发现完整的人类头骨化石三件，还有一些头骨残片和牙齿等。全部化石资料，可鉴别出是代表八个男女老少不同的个体。此

外还发现很多动物化石和人类文化遗物。

山顶洞人的体质特征比北京猿人、丁村人都有很大进步而和现代人没有多大差别。人类体质形态发展的这一阶段，被称为新人（现代人）阶段。

在山顶洞人的资料中，最能代表当时新的技术水平的，是骨针和装饰品的制造。在遗址中，发现一根磨制的骨针，针长82毫米，一端挖有穿线用的针孔。从骨针的制作和应用，可以推知，山顶洞人已能用兽皮缝制衣服了。

山顶洞人的装饰品很丰富，有穿孔的小石珠、海蚶壳、兽类的牙齿、刻道的鸟骨管、钻孔的礞石等。由装饰品和骨针可以看出，山顶洞人已掌握了磨制、钻孔、刮挖等技术，这是人类制作技术的一大进步。

在山顶洞遗址中，有人类用火的遗迹。发现有很厚的灰层和烧过的骨头和石块，虽然还没有发现人工取火的工具，但根据制作技术水平、参照人类发展进程，推测这时大概已经能够人工取火了。

在山顶洞中发现屍骨周围散布有赤铁矿的粉粒和随葬的装饰品，这种现象说明，可能当时已产生了原始的宗教观念。

1922—23年发现了河套人的文化遗址，共发现一枚人类牙齿化石和顶骨、股骨化石，还发现了不少石器和动物化石；1951年在四川资阳发现资阳人头骨化石；1958年在广西柳江的一个岩洞中发现柳江人的头骨化石，这些也都属于母系氏族公社形成时期的人类遗迹。

## 二、母系氏族公社的发展

大约六、七千年前，母系氏族公社逐渐发展起来。目

前发现的当时人类遗迹，几乎遍于全国，显示出这时人类逐渐增多，人的活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考古发掘中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就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情况。

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生产资料公有，氏族是当时社会的基本单位。几个氏族组成胞族，几个胞族组成部落，几个部落组成部落联盟。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首领，重大事情由氏族议事会决定。当时人们已过定居生活，氏族都有一定的名字，有共同的墓地，以氏族（或部落）为单位，一个村落一个村落地聚居在一起。在西安半坡、宝鸡百首岭、华县泉护村、洛阳王湾等地，都发现了当时聚居的原始村落遗址。村落内有一定的布局，有居住区，有公共墓地，有制陶器的公共窑场，这样一个原始村落，可能是一个氏族（或部落）的居住点。村落内的房屋建筑有大有小，大的面积达120平方米左右。这种大房子一个村落只有一个，它可能是氏族（或部落）酋长的住室和氏族（或部落）议事集会的场所。

母系氏族公社实行的族外婚是维系氏族的根本原则。同一氏族内的男女不能通婚，只能和另一氏族的男女发生群婚关系，所生子女也归于母亲所属氏族。氏族成员死后，必须埋葬在本氏族（自己出生的氏族）的墓地内，墓地的埋葬有一定形式。由于氏族内的同辈男女只是兄弟姐妹关系不是夫妻关系，因此，不能合葬在一起。在考古发掘中，目前沒有发现这一时期的成年男女（夫妻）合葬的现象，在宝鸡百首岭却发现男子和男子埋在一个地区，女子和女子埋在一个地区的现象。在群婚形式下，当时的人们，只能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血统只有按母系计算。一氏族的成员，都是出自一

个共同的女祖先。在华县元君庙的墓葬中，发现有以女性为中心的迁移合葬墓，其中一具女性骨架为一次葬，其他十余具骨架为二次迁葬，埋在她的两侧。在半坡、元君庙的墓葬中，女性的随葬品都比较丰富。这些都反映在母系氏族公社中，妇女有较高的地位。

族外婚的不断发展，逐渐出现了对偶婚。对偶婚是由群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的一种婚姻形态。

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在经济方面也有很大发展，出现了农业、家畜饲养、制陶、纺织等经济部门，说明当时人类，不仅仅只是采取现成的天然产物，而是能够利用各种自然条件从事社会生产了。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人类发展到这一时期，是“已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了。

这时所出现的农业，还处在“锄耕农业”阶段，耕作方式很原始，使用的工具主要是石器，有石斧、石铲、石刀等。石斧可用作砍伐，石铲可用作掘土，石刀和陶刀可作为收割谷物之用。当时的农作物据现在所知的有粟（小米）。在西安半坡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有这类作物的谷壳，在华县元君庙墓葬中，也有用粟随葬的现象，可知粟是当时主要粮食作物。谷物加工的工具具有石磨盘、石磨棒，这在甘肃临洮马家窑和宝鸡百首岭等遗址中，均有发现。

这时蔬菜种植已经出现了，在半坡遗址的一个陶罐中，发现有储存的菜籽（已炭化），经鉴定，属于白菜和芥菜之类的菜籽。

人类在长期的劳动实践过程中，认识到饲养家畜，能够给人提供比狩猎更有保障的生活来源。经过经验的积累，在

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家畜饲养也就逐渐发展起来了。这时所饲养的种类还不多，主要是猪和狗。

农业和家畜饲养的出现，还不能代替捕鱼和狩猎，因此，渔猎经济在当时还占很大比重。捕鱼工具发现的有：骨制的鱼钩、鱼叉和石网墜等；狩猎工具发现的有：骨镞、石镞、石矛头等。狩猎的对象主要是斑鹿、野兔、野鸡等。此外，采集经济还是当时人们生活的一项来源，主要采集一些榛子、松子、栗子、朴树子等，作为补充食物。

农业的出现，为原始手工业提供了发展的基础。这时，原始手工业主要有制陶、制造石器、骨器、纺织、编织、木作等。当时制造陶器的方法均用手制，普遍采用泥条盘筑法，小型陶器则直接用手捏成。陶器的质料，根据器物的用途不同，有细泥和夹沙两种，前者主要是用于饮食器、水器、储盛器；后者主要是炊器。陶坯制成后，在烧制以前，画上黑色、红色等各种形状的花纹，如：漩涡纹、波浪纹、三角纹、花瓣纹、鱼纹、鹿纹、人头形纹等，这种绘彩的陶器，就是所谓的彩陶。陶器的器形有：瓮、罐、瓶、盆、钵、鼎等形式。器形中，以小口尖底瓶在仰韶文化的陶器中，最具有特征性。

石器制作以磨制为主，打制的石器还占有相当数量。器形有：石斧、石磷、石刀、石镞等。骨器制作，发现有骨针、骨锥、骨制鱼钩、鱼叉等。在纺织、编织、木作等方面，发现了当时的石凿、骨凿、石磷、陶纺轮、石纺轮等工具。在半坡、庙底沟和泉护村出土的陶器上，还发现有麻布遗留的痕迹，有的陶器底部还保存有席子一类编织物的印痕。据此可知，当时在纺织、编织、木作等工艺制作方面，

已有一定的发展。

母系氏族公社时期，虽然在生产、生活方面比以前有所提高，但是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还相当低下，劳动条件还相当艰苦。根据对华县元君庙遗址中150付成人骨骼的研究，发现牙齿都有严重磨损，这反映当时人们的食物非常粗糙。很多骨架出现有压缩性骨刺病，这说明当时人们劳动时负担过重，对身体的压力过大。

仰韶文化发现后，帝国主义者曾竭力散布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谬论。目前，现代修正主义者又重弹帝国主义的老调，胡说什么仰韶文化是从欧洲、中亚一带传入中国的，这完全是捏造。仰韶文化的陶器，在其形状和花纹上，与西方同一时期的陶器并不相同。在中国境内，较边远的甘肃、青海地区的仰韶文化，也比中原地区的陕西、河南一带的仰韶文化晚得多。这说明，仰韶文化是在中原地区发展起来的，后来才影响到四周各地。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捏造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谬论，毫无科学根据，完全是为其侵略和扩张的目的服务的。

### 第三节 父系氏族公社时期

#### 一、父系氏族公社的确立

在父系氏族公社确立之前，社会分工已存在于两性之间，男子外出狩猎捕鱼，妇女从事家中工作，他们各为自己活动领域内的主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男子在生产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恩格斯在描述这种变化过程时说：“妇

女的家务劳动现在同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较起来已经失掉了意义；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生产中男女地位的变化，便把以前存在的家庭关系颠倒过来了，世系按父系计算，财产按父系继承，确立了男子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妇女被排挤在第二位了。

在考古发掘中，发现反映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社会情况的文化遗址很多，在黄河流域有龙山文化、齐家文化；在长江流域有青莲岗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在东方沿海地区有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

在甘肃临夏秦魏家和武威皇娘娘台等齐家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夫妻合葬墓，都是一个男性仰身直肢，一个女性侧身曲肢面向男性。这种葬式，反映了在当时社会上，女子屈服于男子的情况，反映了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出现的，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态。这种情况，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是见不到的。

在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已经出现了贫富分化。山东大汶口文化中，发现很多墓葬，这些墓葬的大小不同，随葬品有很大差别。个别的大墓，随葬品多达100多件，其中有玉器、石器、雕花象牙器和精美的白陶、彩陶等，而其他许多墓，则仅有几件或十几件普通的生产工具和陶器等。另外，在山东大汶口文化和甘肃齐家文化的墓葬中，发现有用猪头和猪下颌骨随葬的现象，少者一、二个或者根本没有，多者十几个或几十个。甘肃临夏秦魏家的一个墓中，随葬猪下颌骨有68块之多。根据民族学的材料分析，这些随葬的家畜骨骼，可能是作为财产的象征，因为家畜是早期的私有财产之一，家畜骨骼的多少，反映了当时私有财产的悬殊情况。

私有财产的出现，是父系氏族公社与母系氏族公社的重要区别。私有财产是与原始公有制相对抗的一种所有制形态，这种所有制一经出现，就对原始社会起着破坏和瓦解的作用。恩格斯说：“母权制已让位给父权制，与此同时，正在产生的私有财富在氏族制度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私有制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原始社会逐步解体的过程。

## 二、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经济

父系氏族公社时期，无论在农业、原始手工业、家畜饲养等方面，都比以前有所发展。在农业生产方向，虽然仍是处在锄耕农业阶段，但是，由于积累了经验，改进了工具，扩大了作物品种，从而使农产品的产量有所增加。

这时期的农业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仰韶文化时期的石斧、石铲、石刀，还继续沿用，但石斧比以前大而厚重，利于砍伐；石铲比以前薄而扁平，利于启土。此外，还出现了石镰、蚌镰、骨铲、双齿木耒，带孔半月形石刀等新出现的生产工具。石镰和蚌镰，都是安柄使用，其收割谷物的效率，要比手握的石刀和陶刀高出许多倍。收割工具的改进，自然是适应产量提高的需要而产生的。

农作物在北方仍然以粟为主。长江流域，出现了水稻栽培。湖北京山在距今约四、五千年左右的屈家岭文化中，在一片约200立方米的烧土里发现了密结成层的稻壳，经鉴定，这是一种比较大粒的粳稻品种。

在河南龙山文化的各遗址中，发现大批家畜骨骼，有猪、狗、牛、羊等，其中以猪为最多。这说明在农业生产发



展的基础上，家畜饲养比较普遍，数量和种类都增多了。

渔猎和采集，在当时仍占有一定地位，有的遗址，出现大量的渔猎工具，为石镞、骨镞和骨制鱼钩等。

在制陶方面，出现了用快轮制陶的技术，这种轮制陶器，可以使器壁薄厚均匀，器形整体浑匀称。但轮制陶器还不能完全代替手制，陶罐一类器皿有的可用轮制，三足器，如鬲、斝、鬻等则仍须手制。这时制陶技术的提高很显著，如著名的山东龙山文化的黑陶，表面黑而光亮，陶胎极薄，仅0.1—0.2厘米，被称为蛋壳陶，这是山东龙山文化中最有特征的陶器，也是一种较高的工艺品。这时陶器出现了新的器形，如：鬲、甗、鬻、甗、甗、甗等。陶器类别的增多，反映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甘肃齐家文化中，发现了红铜器，种类有刀、匕、锥、凿和指环等。经化验，含铜量高达99.6%。因红铜的硬度小，质软，仅能作些装饰品和手工工具，在生产上，仍是以石器为主。

在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中，还发现有卜骨，以羊肩胛骨为最多，其次为猪骨和牛骨，大部分卜骨有灼痕，有的也发现有钻的痕迹，这证明当时已有了占卜的迷信活动了。同时，在遗址中还发现了“陶祖”和“石祖”，是当时人们对于男性祖先崇拜的反映。

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原始社会逐渐向阶级社会过渡。在这一历史阶段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日益增加，交换有了发展，私有财产产生，家长奴隶制出现，最后导致了原始社会的解体，人类的第一个阶级社会——奴隶制社会产生了。此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

### 三、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原始社会的传说

我国古代文献中保存着丰富的关于原始社会的传说，有的传说反映了相当于旧石器时代的情况。《礼记·礼运》说“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丝麻，衣其羽皮。”这是关于原始人类在极端低下的生产力的状况下，过着极端简陋生活的描述。《吕氏春秋·恃君览》说：“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这是关于在极端低下的生产力的状况下，必然出现的以群婚为基础的社会组织现象。在传说中还把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按照其文明程度或文化特征划分为若干个阶段，例如有巢氏“构木为巢，以避群害”，燧人氏“钻木取火，以化腥臊”（《韩非子·五蠹篇》）。至伏羲氏“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鱼”，神农氏斲木为耜揉木为耒”（《易·系辞》）。

我国古代文献中关于氏族公社时期的传说也很多。传说那时黄河流域分布着很多部落，在今陕西一带，有姬姓黄帝部落和姜姓炎帝部落；在今晋、冀、豫交界一带有九黎部落，酋长名蚩尤；风姓的太昊氏在陈（今河南省淮阳县），以龙为图腾；嬴姓的少昊氏在奄（今山东省曲阜县），以鸟为图腾。传说太昊氏发明网罟，作八卦；炎帝（又称神农氏），发明耒耜和医药；黄帝发明衣服，舟、车，他的妃子嫫祖发明养蚕；蚩尤用铜作兵器。这些传说不能解释为少数“圣人”创造了历史，而是说明了当时各部落的人民在长期向大自然进

行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古书上关于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争的传说很多。炎帝和黄帝两个部落联盟曾“战于阪泉（今河北省涿鹿东南）之野”（《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取得胜利。黄帝部和九黎“战于涿鹿（今河北省涿鹿南）之野”（《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又取得胜利，蚩尤被杀。黄帝部成为中原地区最强大的部落联盟。

传说黄帝以后是唐、虞时代，有名的尧、舜禅让的故事就是关于这时期的传说。尧、舜是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领，还主持祭祀。部落联盟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四岳十二牧会议，也就是部落酋长会议，军事首领必须服从并执行这个会议的决定，这就是军事民主制度。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都是得到四岳十二牧的一致同意后通过选举实现的。恩格斯在论述军事民主制的出现时说：“掠夺战争加强了最高军事首长以及下级军事首长的权力，习惯地由同一家庭选出他们的后继者的办法，特别是从父权制确立以来，就逐渐转变为世袭制，人们最初是容忍，后来是要求，最后便僭取这种世袭制了；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基础奠定下来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尧舜禅让的传说，就反映了这种历史情况。

## 第二章

# 奴隶社会

### 第一节 夏、商 奴隶制国家的 产生和发展

#### 一、文献记载中的夏代

约在公元前二千一百年左右，中国的历史进入了文献记载中所说的夏代。<sup>①</sup>夏原来是由夏后氏、有扈氏等十余个氏族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的名称，禹时，这个名称已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的称号。据说禹建都于阳城（今河南省登封县）。黄河中游南北两岸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最繁荣的地区之一，夏文化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由禅让制转变为世袭制经过了激烈的斗争。《史记·夏本纪》记载，夏禹按照旧的传统制度传位给东夷的益，有些诸侯反对益而拥护禹的儿子启，启联合拥护他的势力，杀掉益而夺得王位，接着又镇压了守旧的氏族有扈氏的叛乱，王位世袭制度从此确立。

王位世袭制的确立，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变革，它是家

---

<sup>①</sup> 夏代的历史有一些文献的记载，但是至今还没有得到考古材料的确切印证。

庭、私有制、阶级和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已经存在的标志。《礼记·礼运》说：在氏族公社的唐虞时代，“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这就是所谓“大同之世”，也就是氏族社会。《礼运》又说：夏禹以后，“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这就是所谓“小康之世”，也就是阶级社会。传说禹设官分职，作赎刑；又说“夏后氏五十而贡”（《孟子·滕文公上》），就是国家以五十亩为单位向农民（奴隶）征收一定的贡赋。刑法和贡赋的产生是国家出现的重要标志。

夏代以农业生产为主。传说禹在舜时，即曾领导人民治理洪水，疏通河道，引导入海。夏人已制订出适合于农业需要的夏历，保存至今的《夏小正》是战国时纂集成书的一本农历，其中可能保存有夏代的历法知识。传说夏代用铜铸鼎，这反映了夏代可能是铜器时代的开始阶段。

夏朝最后一个国王叫夏桀。夏桀统治时期，政治黑暗，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日益加重。《史记·夏本纪》说：“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当时人民咒骂夏桀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这些记载说明当时阶级矛盾的尖锐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这时，商部落兴起，商汤一再讨伐夏桀。夏桀曾征调东

方诸部落的武装，以抵御商人，引起有緡部的反抗。夏桀镇压了有緡部，可是国力更加衰弱，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公元前十七世纪，商灭夏。

## 二、商王朝的建立

商族是黄河中下游的一个古老的氏族，传说商的始祖名契，契母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诗·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的就是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反映了商族以燕为图腾，也反映了商族在契的时候，才由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商人的活动范围主要以今河南，山东为中心，西到陕西，北到河北，南到湖南。传说还在“海外”打过胜仗。但商在灭夏之前，一直臣服于夏。夏朝末年，政治黑暗，阶级矛盾尖锐，商汤乘机灭掉了夏的许多属国，最后在鸣条（今河南省开封附近）打败了夏桀，夏亡。汤建都于亳（今山东省曹县），国号商，时间约在公元前十七世纪。文献记载，从汤至盘庚五次迁都，盘庚自奄（今山东省曲阜）迁于殷（今河南省安阳小屯一带），此后二百七十三年，未再迁都。

盘庚迁殷后，政治，经济都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武丁统治的五十多年中，是商王朝最强盛的时期，西北伐鬼方，西南伐荆楚，都取得胜利。《诗·商颂·殷武》说武丁时，“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说明了这时商王朝的疆域是很大的。

## 三、商代的阶级状况

奴隶和奴隶主是商代社会中的两个基本阶级。农业奴隶




叫做众或众人，家内奴隶叫做妾、奚、仆。大量的奴隶来自对外战争的俘虏，也有的是本族“犯罪”或破产平民转化来的。奴隶是生产劳动的主要担当者，但却毫无政治权力。奴隶主把他们作为自己的财产，随意处理或杀害。例如用奴隶做“人祭”，祭祖祭鬼神。卜辞中的“燬妾”就是用火把女奴烧死以求雨，“沉妾”就是把女奴投入水中以祭神，“伐羌”就是杀死羌人奴隶以祭祖。用奴隶做“人殉”的情况也极严重，一般奴隶主贵族都用人殉葬，一个墓葬少则用一、二个，多则用二百至三、四百个，极其残酷。

奴隶主是商王的戚属、官僚或归附于商的方国、部落、氏族的首领，他们从商王那里领受田地或奴隶，对奴隶进行残酷的剥削，过着奢侈腐朽的生活。

平民是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一个阶层，史书上叫做“小人”，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们也受奴隶主的剥削和压迫，社会身分比奴隶高一些，生活也是很低下的，

奴隶与奴隶主之间，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奴隶主贵族为了镇压奴隶和平民的反抗，设立了一套以商王为首的奴隶主专制政权，有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卜辞和铜器铭文中的小臣、小藉臣、小众人臣、卜、史、作册、御史、宰、尹等都是官吏的名称。商王还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卜辞记载商王一次出兵三千或五千人，有时多达一万三千人。士兵主要由平民组成，有时也有奴隶在内。

商代的刑法是极其残酷的。卜辞中常见的幸字<sup>①</sup>，象刑具。又“执”字，象一人双手带上刑具。在殷墟曾发现带有

① 甲骨文：幸作，执作，𠄎作。

手枷的男女陶俑。又有圜字，象带上刑具的人被关在牢内，就是囹圄（监狱）。古文献说商有“刑三百”，有醢、炮烙等酷刑，还有监狱。商奴隶主贵族依靠由军队、刑法、监狱组成的庞大的国家机器，残酷地镇压奴隶和平民的反抗。

#### 四、商代的经济

在奴隶制度下，奴隶主贵族用野蛮的、几乎是野兽般的手段剥削奴隶。可是，在当时人的劳动生产率非常低，劳动者除了必需的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微少的剩余的情况下，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我国商代高度发展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艺术就是在奴隶制度下发展起来的。

〔农业〕 商代土地属于商王所有，商王把土地和奴隶分赐给各级贵族，用井田方式从事农业生产。卜辞中的田字作田、田、田等形，每一个方块表示一个耕作单位，这反映了当时的“井田”形式。卜辞中有“王往，以众黍于囿”、“贞维小臣令众黍”的记载，说明种田的事主要由奴隶们负担。还有“王大令众人曰畷田！其受年。”的记载，“畷田”是指许多人在一起耕作，奴隶们集体劳动是在“小藉臣”、“小众人臣”的管理和监督下进行的，在安阳小屯的一个窖穴中发现的四百多件石镰和七十多件蚌器，应当是王室贵族分发给集体生产的奴隶们使用的。也有广大的村社农民每家领受土地自己耕种，为奴隶主服劳役，这就是所谓“殷人七十而助”。

商代的农具主要是用木、石、兽骨、蚌壳制成，青铜农具极少，掘土主要是用木耒和骨铲、石铲。甲骨文中的藉




字<sup>①</sup>，表示一人双手扶耒柄，用足踏耒而耕。骨铲和石铲都装有木柄，这种铲可能就是古文献上的耜。当时的水利也有发展，主要谷物有禾（小米）、黍、麦、稻等。

〔手工业和商业〕 商代的手工业，最重要的是青铜铸造业。商代早期就已掌握了铸造青铜的技术，至后期，这一技术更有进步。

青铜铸造技术是奴隶们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发明，青铜器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历史由野蛮时期进入了文明时期。奴隶们铸造青铜器时，首先用质细的泥土制成器范，再用木炭为燃料，用陶制坩锅冶炼铜锡，最后将铜锡炼液注入范中而成铜器。青铜器的品种很多，其中主要的是礼器，有鼎、殷（音规）、壶、盘、鬲（音离）、爵、斝（音甲）、盃（音禾）、觚（音孤）、觶（音支）、卣（音酉）、彝（音壘）、彝（音夷）、觥（音宫）等，制作精致，上面有各种花纹。商代晚期的礼器上还有铭文，都是水平很高的工艺品。武器有戈、矛、镞、斧、戍、刀等，工具则有刀、锥、斧、铤、铲、凿、钻、针、鱼钩等，大多质坚刃利。此外，还有车马器和乐器等。青铜作坊都有相当的规模，在郑州南关外发现的商代早期的铸铜遗址，总面积在一千平方公尺左右，在安阳小屯附近发现的铸铜遗址，面积在一万平方公尺以上。在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仅礼器一项就有数千件之多，其中司母戊鼎通耳高133厘米，重875公斤。铸造这样的大器，如果没有丰富的冶铸经验和相当的设备是不成的。青铜是红铜加锡的合

---

① 耜字甲骨文作 。

金，硬度比红铜高。根据化验的结果，知道安阳出土的铜制容器，铜约占70%，锡约占30%。硬度高的工具和武器，锡的比例较容器大一些，显然商代对于铜、锡合金的知识已相当丰富了。









商代陶器生产的规模也相当大，用高岭土（瓷土）制成的白陶，质地坚硬，色泽皎洁，刻镂精美，工艺水平极高。釉陶也是用高岭土烧制的，质地坚硬，是瓷器的前身。纺织方面，除麻布外，还有丝织物。

商业已有初步发展，商代遗址中常有海贝出土。海贝用作装饰品，也可能用作货币。商代已有铜贝，但发现数量很少，可能作为装饰品或货币使用。当时的交通工具具有舟和车，甲骨文中已有舟字和车字。

## 五、商代的文化艺术

〔文字〕 商代已有文字，目前所见的商代文字资料都是商代后期的。文字主要保存在龟甲、牛肩胛骨、铜器和其他器物上，其中以甲骨上的为最多。保存在甲骨上的文字称之为甲骨文，因是占卜用的，也称为卜辞，这是我国现在所知的最古老的文字，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之一。

甲骨文已发现的约有单字三千多个，文字构造以象形（如鱼、月<sup>①</sup>）为主，还有指事（如上、下）、会意（如明、涉）、

① 甲骨文：鱼作，月作，上、下作，  
明作，涉作，翌作，  
河作，鸡作。

假借（如羽借为翌日之翌）、形声（如河、鸡）等几种类型。甲骨文长的一般约有四、五十字、最长的在百字左右，殷代铜器铭文，长的也在四、五十字左右。周人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应是可信的。

〔天文和历法〕 从甲骨文中看出，商人非常注意天象变化，在文字中已有日蚀、月蚀的纪录，还有关于乌星、商星、火星以及风、雨、云、雷的记载，说明当时的人们已有了一定的天文和气象知识。

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商代已有较完善的历法。商人将一年分为十二个月，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每逢闰年在年终加一个月，在武丁卜辞中有“十三月”的记载。

〔艺术〕 商代的艺术已经相当发展，最主要的成就是造型艺术。雕刻在铜器、陶器以及石器、玉器、骨器、角器、牙器、木器上的花纹，有浓厚神秘意味的饕餮纹，还有夔纹、鹿头纹、牛头纹、虎纹、鸱纹、鸟纹、蝉纹以及人面饰等，造型庄严匀称、且富于变化，就其技法来说，或阳刻、或复线雕刻。多用细密的云雷纹衬地，往往形成富丽堂皇的三层花纹。塑象方面，除牛头、鸱形的泥塑外，有些铜器如鸟兽尊、觥、异形卣等，都是仿效动物形象铸造的。这些艺术品刻镂工整，造型生动逼真。

## 六、商王朝的灭亡

商代后期，奴隶主贵族为了虏掠奴隶和财物，不断地对外进行战争，武丁曾连续三年伐鬼方，还一再征伐舌方、土方、马方、羌方等。商代末年，主要的征伐对象是东南的夷方（人方）。帝乙曾亲征夷方达二年之久，商纣王（帝辛）

对夷方用兵的规模更大。《尚书·大誓》记载周武王的话说：“纣有几兆夷人，亦（大）有离德”。所谓“亿兆夷人”，就是纣王对夷方战争捕获的数量极大的俘虏。

商王朝的对外战争，给国内的奴隶和平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剥削和征发日益严重，奴隶主贵族生活腐朽，“不知稼穡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尚书·无逸》）商朝末年，情况更严重，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在邯郸以南，朝歌以此，修建了许多离宫别馆。又作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大小官僚无不沉湎于酒色。平民与贵族、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起来，成批的奴隶逃亡，大量的平民到处流浪，有些奴隶或平民结合起来，抢劫奴隶主的财物，甚至抢夺供神用的牺牲，打击奴隶主贵族。《尚书·微子》说：“小民方兴，并为敌讎”，说明了当时奴隶和平民的反抗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尽管纣王用“炮烙之法”，以图镇压奴隶革命，可是当时的社会正如《诗·大雅·荡》所形容的那样，“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奴隶革命的形势已经到来。

这时，周族兴起于渭水流域，势力日益强大，据说在商代末年，周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了。至周武王时，乘商正在对夷方用兵，就大举征伐商王朝。纣王征发了大批奴隶迎击周人，可是这些奴隶兵“前徒倒戈”，与周人合作，打败了纣王，纣王自杀，商建国六百余年至此灭亡，时间约在公元前十一世纪。

## 第二节 西周 奴隶制社会的兴盛

### 一、西周的建立和分封诸侯

〔西周的建立〕 周族是渭水中游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古老部落，传说周的始祖后稷，名弃，其母姜嫄践巨人迹而生弃。这个传说反应了周族在弃的时候，才由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约在商的后期，周族在公亶父的率领下，迁居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省岐山县），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有一定的发展，贫富分化显著，剥削奴隶的制度发生。奴隶主贵族开始筑城郭，建室屋，设置统治机构，把各部落的人民以邑为单位编制起来，这时周族的国家已在形成中。

周居岐山时，臣服于商，接受商的封号，但由于势力日益强盛，和商也有矛盾。公亶父死，子季历立，后被商王文丁所杀。季历子昌立，是为周文王，周文王也曾被商纣王囚禁过。

周文王时，商正全力征伐东夷，文王在国内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划一赋税制度，制定“有亡荒阅”和“罪人不孥”的法令，以巩固他的奴隶制统治。对外又发动了一系列战争，吞并了泾、渭间许多氏族和部落，在渭水以南，又灭了商的重要方国崇，迁都于丰（今陕西省户县东），把势力伸展到今山西省境内，文王死，武王立，迁都于镐（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大举伐商，武王出动的军队有戎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还有同盟者庸、蜀、羌、

鬻、微、卢、彭、濮等氏族或部落的军队，顺利渡过黄河，一直打到商都朝歌郊外的牧野（今河南省汲县北），纣王自焚而死，商亡，周王朝建立。

〔武庚反叛和周初分封诸侯〕 周王朝建立后，仍以镐为都城、封纣子武庚于商都，利用他统治商的遗民，又分商的王畿为邶、鄘、卫三个封区，封武王弟管叔、蔡叔、霍叔，分别统治这三个地方，以监视武庚，谓之三监。不久，武王死，成王年少，武王弟周公旦掌权，武庚勾结管、蔡，发动武装叛乱，妄图推翻周王朝，恢复商王朝的统治，周公东征，经过三年的残酷战争，才把这次叛乱平定下去。

周公为了加强对于东方的统治，在洛水北岸建造了一个东都，叫成周（今洛阳东三十里）。成周是周人控制东方的政治军事中心，周把商的部分“顽民”迁到成周，就近统治。周公又大封诸侯，受封者大多数是同姓子弟，也有一些异姓诸侯，有的是周贵族的亲戚、功臣，有的是归附周王朝的小国首领。周公把商的王畿地区和“殷民七族”即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饥氏、终葵氏，赐给康叔建立卫国，把原奄国的地区和“殷民六族”即条氏、徐氏、蒲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赐给伯禽，建立鲁国，把原夏的统治中心地区和“怀姓九宗，职官五正”赐给唐叔，建立唐国（即后来的晋国），把原蒲姑国地区封给姜姓氏族首领吕尚，建立齐国。这所谓“殷民六族”、“殷民七族”及“怀姓九宗”，都是殷之遗民或原属于殷人的种族奴隶，现在又转为周贵族的种族奴隶了。

西周的统治者封子弟功臣为诸侯，制定封区，把当地的居民赐给受封者，这就叫做“授民授疆土”。诸侯对周天子

要承担镇守疆土，捍卫王室，缴纳贡税、朝觐述职等义务。诸侯在封区之内，有权把土地和人民分赐给自己的亲属和亲信，这些亲属和亲信都是“世卿世祿”，但对于诸侯同样负有纳贡和充做军事扈从的义务。

西周王朝名义上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由于当时的社会经济落后，交通不便，诸侯国之间，彼此的经济联系，政治联系很少，所以实际是奴隶主诸侯割据的状态。

周王室有军队，周六师、殷八师，由周贵族作将帅。这些军队主要用来镇压奴隶起义和征伐外族之用。还有虎贲，是王室的禁卫军。周的刑罚极其野蛮残酷，有墨、劓、剕、宫、大辟五刑，处刑名目有三千多种。诸侯有自己的军队，法律和王室的差不多，刑罚主要是用来镇压奴隶的，《礼记·王制》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个记载充分反映了西周的刑法的阶级性。

## 二、西周的社会经济

〔井田制度和农业〕 西周时期，继续推行井田制度，土地属于周天子，土地买卖的现象没有发生，《诗·大雅，北山》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当时奴隶主贵族为颂扬奴隶占有制度而编造的诗歌。天子把田地和农夫（奴隶）分赐给诸侯和百官，诸侯又把分得的田地和农夫分赐给卿大夫、士。大、小奴隶主贵族都对奴隶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奴役。

关于井田制度，说法不一。《孟子·滕文公》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百亩约今31.2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奴隶主对于

这些农夫的剥削，是征取约为十分之一的收获物，另外还有其他的劳役和实物剥削，这按当时非常低下的生产力说来，已是十分沉重的剥削了。奴隶们集体耕作，有时多至两千人（“千耦其耘”）或两万人（“十千维耦”）有人监督劳动。

西周的农业比商代进一步发展。农具主要是耒、耜、钱、镈、铎等，都是用木、石、骨和蚌壳制成的。双齿的耒和铲状的耜是最主要的农具。青铜农具极少，铁农具还没有出现。周代已采用休耕制度，就是把一块田地分为三个部分，每年耕种其中的两分，另一分休耕，每分三年休耕一次。这比以前的抛荒是一大进步。农夫们长期耕种，积累了许多农业知识，例如选育良种，除草育苗，除虫，人工灌溉，都受到重视，农作物的品种也很多，重要的谷物有黍、稷、稻、粱、菽、麦等，其中黍、稷种植最多。

由于手工业的发展，桑、麻和染料植物的种植也很多，蔬菜、瓜、果的种植也比较普遍，对土地的利用更加精细。

〔手工业和商业〕西周实行“工商食官”制度，工匠和商人都是官府的奴隶，主要是为奴隶主贵族生活需要服务的。

周在灭商以前，手工业很落后。灭商以后，继承了商的文化技术并进一步发展了。官府手工业工匠称为“百工”，工匠掌握着冶铸青铜、制陶、攻玉、制革以及制造各种竹木器的专门技术，创造了西周的奴隶制兴盛时期的文化。

青铜器主要是侈奢品，如礼器、日用器和车马饰物，还有兵器和手工工具等。铸造虽是继承了商代技术，但器形和数量都比商代多，河南、山东、山西、河北、辽宁、江苏、



安徽、湖北等省，都发现了属于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西周初期的大盂鼎，高约一米，重153.5公斤，铭文291字，记载周康王二十三年策命其臣盂，并赏赐给他奴隶和其他器物的情况。大盂鼎是西周青铜艺术的代表作品。

西周后期，铜器数量大增。各诸侯国的青铜器在西周前期极少，这时出现较多。许多铜器上刻铸着铭文，长的将近五百字。这些铭文记载着当时的奴隶主贵族赏赐、赠送、交换、赔偿土地、奴隶和其他物品的情况，以及重要战争、社会政治制度、生活习俗等情况。

釉陶已大量使用，这种釉陶的烧制温度在1200度左右，陶质结构紧密，吸水性很小。这时已经有了建筑用瓦，瓦的发明是我国房屋建筑史上的一个大事。古文献中关于西周舟船记载很多，有柏舟、杨舟、松舟、桧楫等，河南省信阳出山店水库发现了西周时的船浆。

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妇女们用麻、葛织絺、绤、纁、纁、用丝织锦，还把织物染成各种各样的颜色。较好的丝、麻织物都被奴隶主贵族剥削去了。

商业比商代发展，主要为贵族服务。商品有奴隶、牛马、兵器和珍宝等。奴隶的价格非常低，五名奴隶可换得“匹马束丝”。也有少数小商人。《诗·卫风·氓》说：“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就是描写小商人的活动情况。

当时的主要货币仍然是贝，以朋为单位。铜贝以孑为单位，还有金（铜），也以孑为单位。

### 三、西周和周围各族的关系

〔周和东夷、淮夷的关系〕 东夷和淮夷是我国古老的

民族，分布在今山东半岛和淮河流域一带，这一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已有居民。他们从事农业、狩猎和制造陶器，长期以来，就和中原地区的各族，有经济文化交往。其中有的部落，在商代以前，就产生了贫富分化，进入原始社会晚期。

西周初年，齐、鲁两国的统治者来到山东半岛之后，企图把东夷和淮夷置于自己的军事控制和政治支配之下，但东夷、淮夷人民并没有屈服，《尚书》等古文献记载鲁国伯禽初到东方时，淮夷、徐夷人民坚决抵抗，使鲁国受到威胁很大，以至不敢打开鲁国的东门。

西周时代，周王朝和东夷、淮夷不断发生战争。《后汉书·东夷传》说：厉王时“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虢仲盃》铭文亦载：“王南征，伐南淮夷”。一直到宣王时，也还不断发生战争。

根据铜器铭文记载，西周统治者，称被征服的淮夷为“帛晦人”或“帛晦臣”，意思就是贡纳之臣。《兮甲盘》铭文说：“淮夷旧我帛晦人，毋敢不出帛，其积。其进人、其貯……。”又说：“敢不用命，则即刑扑伐”。这就是说，淮夷要向周王朝交纳布帛和其他财物，还要提供劳动力，否则就要受到讨伐。

〔周和西北、东北各族的关系〕 分布在周的北面和西北方面是一些游牧部落，其中比较强大的是严允。严允在殷代也称为鬼方，甲骨文中有关于鬼方的记载。西周时期，周人和严允发生多次战争。《小孟鼎》铭文记载，康王二十五年，周人和严允发生一次很大的战争，俘获严允一万三千多人，还俘获车、马、牛、羊很多。《虢季子白盘》和《诗·小雅·采芣》也有类似记载。

西周末年，由于申、缙诸国联合西北方的夷戎、犬戎攻杀幽王于骊山下，周王室被迫东迁。

周人和居住在东北的肃慎早有往来。《尚书序》载：“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国语·鲁语》也载，武王克商“肃慎氏贡楛矢石砮”。

〔周和江汉流域各族的关系〕 江汉流域，很早就有居民，在这里曾发现很多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文化遗址。武王伐商时，曾有庸、蜀、羌、鬲、微、卢、彭、濮等国参加，这些小国，有的在江汉流域。楚国是江汉流域较大的国家。周昭王曾亲自率师远征楚人，打了败仗，“丧六师于汉”，昭王自己也溺死在汉水中。此后，夷王、厉王时，曾用兵南征。

西周中期，楚国逐渐强大，楚子熊渠“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并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这时正是周夷王统治时期。

长江下游很早就有居民。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吴、越，就是后来在长江下游发展起来的两个大国。这里的居民有断发文身的习俗。《史记·吴太伯世家》曾记载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逃奔荆蛮建立吴国的传说，反映了在殷末时，周人即和这里的各族发生了联系。

关于周人和其他各族的关系，在现存的古代文献和铜器铭文中，大都是一些战争的记录，但隐藏在战争背后的，则是各族人民之间友好往来。在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过程中，各族人民用辛勤的劳动，共同缔造了祖国的历史。

#### 四、阶级矛盾的尖锐和周室东迁

西周后期，奴隶主贵族日益腐朽，周天子又不断对外进

行战争，奴隶和平民的负担有增无已，阶级矛盾愈来愈尖锐。周厉王时，用荣夷公为卿士，垄断山林川泽之利，残酷地剥削人民，“下民胥怨，财力单竭，手足靡措”。公元前841年，爆发了国人暴动，厉王逃到彘（今山西省霍县），国人推共伯和管理政事，史称共和行政。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子宣王立。宣王虽在政治上进行了一些改革，可是社会仍然动荡不安。这时宣王又对严允、西戎和徐戎、荆楚发动了一系列战争，有些战争胜利了，但也遭到多次失败。

宣王死，幽王立，政治更加黑暗，《诗·大雅·瞻卬》说：“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复夺之”。可见奴隶主贵族对奴隶和平民的剥削压迫多么严重，阶级斗争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

西北的戎族不断东侵，占据周的土地。这时周王室内部发生了王位继承的斗争。幽王宠爱褒姒，废申后和太子宜臼，立褒姒为后，立褒姒所生之子伯服为太子，引起申后之父申侯不满。申侯联合犬戎等部，进攻周都城，幽王在骊山被犬戎杀死。宜臼立，是为平王。平王势力孤弱，被迫放弃了镐京，于公元前770年东迁雒邑（今洛阳），史称东周。

### 第三节 春秋 奴隶社会瓦解 和封建制度产生

#### 一、春秋时期的政治形势

〔王室衰微与诸侯强大〕 平王东迁以后，势力很弱，

大大小小的封国不再听从天子的命令，也不再定期向天子纳贡、述职。天子本来还有直辖地区方约六百里，后来有些土地赐给了诸侯，有些被郑、晋、楚、秦等大国或戎族侵夺了去。春秋中期以后，天子实际拥有的土地和人口很少，势力更弱，和一个弱小的诸侯差不多，政治、经济都依附于强大的诸侯。诸侯强凌弱，众暴寡，“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这样就出现了大国争霸的局面。

〔大国争霸〕春秋前期，首先成为诸侯盟主的是齐桓公。齐桓公以管仲为相，国力富强。前664年，山戎侵燕，不久，狄人攻邢、卫，齐桓公北伐山戎，击退狄人，救了燕、邢、卫等国。前656年，楚国联合蔡国伐郑，威胁中原。齐桓公率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国之师，破蔡伐楚，阻止了楚军北进。齐桓公威信大增，于前651年，大会诸侯于葵丘（今河南省考城），订立盟约，同盟之内互不侵伐，一致对外，齐桓公成为霸主。

晋在文公时，国势强盛，齐桓公已死，齐国日衰。公元前632年，楚军北上侵宋，宋向晋告急。晋文公联合齐、宋、秦，以四国之师与楚、陈、蔡之师大战于城濮（今河南省濮城），楚师大败。这就是著名的城濮之战。这次战役使楚国北进的锋芒再次受到打击。晋文公会诸侯于践土（今河南省广武县），周襄王也参加了这次会盟。晋文公又成为中原的霸主。

楚在春秋前期，灭掉了许多小国，国力强盛。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北至雒邑，“观兵于周疆”，“问鼎之大小轻重”，这表明楚有灭周的野心，并与晋展开争霸的斗争。公元前598年，楚围郑，晋救郑，晋、楚两军战于郟（今河

南省郑州)，晋军大败。从此，中原各国背晋向楚，楚庄王成为中原的霸主。

在边疆地区，吴、越争霸于东南，秦霸西戎，对于中原都有相当的影响。

吴都于吴（今江苏省苏州）。公元前506年，吴王阖庐用伍员伐楚，大败楚国。前494年，吴王夫差伐越，围越王勾践于会稽（今浙江省绍兴），越请为属国，前487年，吴开邗沟，联结江、淮，通粮运兵，大败齐兵于艾陵（今山东省泰安）。前482年，又北引邗沟至商、鲁等地，与沂、济通联。吴与晋、鲁的国君和周天子的代表会盟于黄池（今河南省封丘附近）争得了霸权。

越属百越，都于会稽。在夫差北上争霸时，勾践乘虚入吴，连破吴守军，杀吴太子。后四年，再伐吴，夫差战败自杀，吴亡。勾践率师北上，与齐、晋等诸侯会于徐（今山东省滕县），成为诸侯的霸主。

秦是戎族的一支，春秋前期就逐渐强大，秦穆公时（前659—621年），疆土向东扩展，为晋所阻，屡与晋发生战争，但由于晋一直比较强大，秦不得不改向西戎地区发展，遂霸西戎。

## 二、封建地主经济的发生

封建地主经济，是随着井田制的瓦解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井田制是土地王有制，全部土地归国王所有，称为“公田”，各级奴隶主只能占有，没有私人的土地所有权。土地不准买卖，即《礼记·王制》所说：“田里不鬻”。随着生

产力的发展，奴隶主利用奴隶劳动，在“公田”范围之外，大量垦辟土地，这种新垦辟出来的土地，归各级奴隶主所有，称为“私田”，可以交换买卖。“私田”出现之后，逐步出现了私有土地的地主阶级。根据铜器铭文的资料，这种私有土地的地主阶级，最早是在西周后期出现的。《格伯殷》铭文记载，贵族格伯与佃生之间，发生了马和田的交换关系；《召鼎》与《矢人盘》记载了用“田”作为赔偿的情况；《鬲从盨》和《鬲攸从鼎》也记载了田邑交换和田地纠纷的情况。这些铭文中所记载的有关田邑的问题，都是在贵族之间发生的，说明当时贵族已经有了自己的私有土地了。

到了春秋时代，占有私田的地主，其经济有了很大发展，这是当时社会生产力提高的结果。

在中国历史上，铁器的使用约在春秋时代。恩格斯在论述铁器出现的重要作用时说：“铁已在为人类服务，它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所谓最后的，是指直到马铃薯的出现为止。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固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铁器的出现，确实是对开辟土地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不少关于春秋时代开辟荒地的资料，例如春秋初年，郑国原是一片荒野，“蓬蒿藜藿”丛生（《左传》昭公十六年），晋国的“南鄙之田”也是“狐狸所居，豺狼所嗥”之地（《左传》襄公十四年），这些荒地，在春秋末年也都开发出来了。

新开辟的私田无税无赋，私田不断增多，壮大了地主阶

级的经济力量，私家逐渐富庶，公家逐渐衰落，产生了“私肥于公”的现象。地主阶级的经济力量壮大后，就要求政治上的统治权。在西周时期还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春秋时期，就出现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甚而出现“陪臣执国命”的现象。这些经济政治上的变化，使新兴的地主阶级与旧奴隶主贵族之间，产生了越来越激烈的矛盾。旧奴隶主贵族，为了挽救自己的衰落，在政策上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十五年），鲁国的“初税亩”，就是这种矛盾斗争的表现。

所谓“初税亩”，就是承认私有土田的合法性，不论“公田”、“私田”一律按亩取税，这就使得“井田制”逐渐走向崩溃。实行税亩制的目的，是要征收私田的赋税，这对公家有利对私家不利，公私之间势必引起斗争。因此，公元前562年，鲁国出现了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联合起来，展开了大规模的私家对公室的反抗斗争，最后是三家把公室瓜分了。这样，地主阶级开始控制了鲁国的政权。

像鲁国这样的社会变革，在春秋列国中是比较早的，其他国家较迟，如楚国在公元前548年开始“书土田”，“量入修赋”；郑国在公元前538年“作丘赋”，最迟的是秦国，直到公元前350年（秦孝公十二年）才“废井田，开阡陌”，实行社会制度的改革。

### 三、奴隶和平民的革命斗争

春秋时期，逐渐走向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为了满足他们腐化的生活，就加紧对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各国贵族间又连年不断地进行战争，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因此，奴隶、



平民和奴隶主之间的阶级矛盾就日益紧张尖锐。

晋国在晋灵公时“厚歛以彫墙”，在晋平公时，更是“怨讟并作”（《左传》昭公八年），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以致“民间公命，如逃寇讎”（《左传》昭公二年）。

齐国也是如此，齐景公时，对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剝削，当时“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餒”。奴隶主对人民又进行残酷的镇压，以致出现了“国之诸市，屨贱而踊贵”的悲惨景象。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逃亡是进行反抗斗争的一种形式。公元前641年，梁国人民为反抗奴隶主贵族的剝削和压迫而进行大规模的集体逃亡。公元前563年，郑国也出现了“臣妾多逃”（《左传》襄公十年）的情况。奴隶和平民还聚集起来，进行武装的反抗斗争。在郑国，不少人聚集于“萑苻之泽”，当时统治者“兴徒兵”前去镇压，才把这次斗争镇压下去。晋国的国都也是“盜賊充斥”，“盜賊公行”，客馆都需要“高其閤閼，厚其墻垣”，才能“无扰客使”（《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又如，楚国的云梦之泽，也是当时人民反抗统治者所聚集的地方。公元前506年，吳攻楚，楚昭王逃入云梦泽中，遇见“盜攻之，以戈击王”，楚昭王不得不逃奔到郢（《左传》宣公四年）。当时鲁国也是“多盜”，负责镇压“盜賊”的司寇也无法制止（《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论语·颜渊》篇记载，鲁“季康子患盜，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规模最大的是“盜跖”起义。《庄子·“盜跖”篇》中记载，“盜跖”是与孔子同时人，他曾率领九千起义军，“横行天下，侵暴诸侯”。“所过之邑，

大国守城，小国入保”。《荀子·不苟篇》也说他“名声若日月”。这些关于“盗跖”的记载，虽有不少是属于传说、寓言性的，但有些内容是有所依据的。这个故事，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的激烈，反映了奴隶们的反抗斗争，给予奴隶主以沉重的打击。

在奴隶制社会中，奴隶和平民的革命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正是由于这些斗争，摧毁了奴隶占有制的统治基础，使封建制度逐步代替奴隶制度。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奴隶的身分在发生变化。《左传》哀公二年记载，春秋末年晋国赵鞅督师辞中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土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庶人工商”是生产奴隶，“人臣隶圉”是家内奴隶。“遂”即遂其自由，“免”即免为奴隶。社会的主要生产者由奴隶身分解放出来，这就意味着奴隶制度的崩溃。

#### 四、封建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

地主阶级是依靠残酷剥削农民的剩余劳动起家的。当他们的力量壮大后，和奴隶主阶级的矛盾，就日益尖锐化。春秋时，各国爆发的奴隶和平民的反抗斗争，给奴隶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地主阶级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就利用各种手段，企图把人民群众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作为他们向奴隶主阶级进行斗争的工具。

齐国大夫田氏，就是长期利用拉拢民众的手法，壮大势力，最后夺得政权的。《左传》昭公三年记载齐国情况说：“……齐其为陈氏（即田氏）矣！公（齐景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器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

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家量大公量小，贷出用大量收入用小量）。……民人痛疾而或煖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避之”。

田氏采取这种大斗出小斗入的办法拉拢民众，处在奴隶主阶级残酷剥削下的民众，有不少人归附到田氏门下。田氏的力量逐渐壮大，先后发动几次武装政变，消灭了栾氏、高氏、国氏等十余家贵族，到公元前481年，杀齐简公，另立一个傀儡齐平公，田常完全控制了齐国政权。这时齐国实际上已变成由田氏控制的封建国家了。公元前386年田和受周安王命，成为齐国国君。

晋国情况也与齐国类似，政权落在韩、赵、魏、范氏、知氏、中行氏六家大贵族手中，贵族火拼结果，剩下韩、赵、魏、知四家。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联合起来灭掉知氏，瓜分了晋国，次年赶走了晋出公。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正式建立了三个封建国家。

鲁国的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与公室的斗争，楚国白公胜的政变，情况和晋、齐两国相似。秦、楚、燕等国也发生激烈的变化，地主阶级的政治势力迅速扩大，向奴隶主阶级展开了夺权斗争。

## 五、春秋时期的思想和文化

〔天道观的演变〕 商周两代奴隶主阶级所尊崇的“天”，是在人们幻想中的一个主宰一切、号令一切、有意志的至上神。这个至上神的名称，在商代甲骨文中称为“帝”或“上帝”，在西周的铜器铭文中称为“天”。“帝”或

“天”名称不同，实际作用是一样的。

商周两代国王，都以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自居，上帝的权威至高无上，国王的权威也就不可动摇，奴隶主阶级，就以此作为巩固统治、麻痹人民的思想武器。到了春秋时代，由于奴隶主统治的动摇和地主阶级的不断壮大，怀疑天的思想得到发展。郑国子产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这明确提出了相信“天道”，不如相信“人道”的观念。类似的思想在其他国家也有。这种思想的特点，集中起来，就是轻视天的作用，重视人的作用。这种“天道”观，是新兴地主阶级向旧奴隶主阶级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

〔孔子〕 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公元前551—前479年），其祖先是宋国贵族，因在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中斗争失败，逃到鲁国，定居于鲁。孔子生于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其父叔梁纥为陬邑大夫。孔子早年，曾任管仓库的小官，后来，曾任司空、司寇等职。

孔子处在两种社会制度交替时期，他站在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立场上，对当时出现的新的社会变革，抱着敌对的态度。公元前481年，齐国陈恒把国君齐简公杀死，控制了齐国政权，这是新兴地主阶级向奴隶主贵族的夺权斗争。孔子对这一事件坚决反对，要求鲁哀公出兵讨伐陈恒，为此，他专门朝见鲁哀公，对鲁哀公说：“陈恒弑其君，请讨之”（《论语·宪向》）。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鼎公布刑书。成文法的公布，是社会发展中的进步现象，孔子表示反对。他认为，这样作就是失去了奴隶制的法度，又说，铸了刑鼎则“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他认为，这

是“晋国之乱制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鲁国“初税亩”之后，季康子于公元前484年又欲行“田赋”，这是一个新的变革，孔子对此也深为不满。

孔子所保护、尊崇和响往的，就是殷周以来的奴隶制及其一套礼乐制度。他经常强调的东西，就是“礼”和“乐”。当时所谓的“礼”，包括政治制度、道德规范，以及贵族所奉行的各种复杂的典礼仪式等。礼的作用，就是为了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特权等级地位。

自春秋以来，由于社会的激烈变革，所谓“违礼”，“逾制”的现象很多，因此，奴隶制沿袭下来的各种礼制，也逐渐名存实亡了。为了挽救旧礼制的崩溃，孔子提出了“正名”的办法。所谓“正名”，就是要把奴隶制所规定的各种礼法、等级制度，切实地实行起来。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论语·子路》）。正名的主要内容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就是要君、臣、父、子各守其道，才合乎“礼”。否则，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在孔子看来，是违“礼”的反常现象。

孔子强调“礼”，也强调“仁”。“仁”和“礼”，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谓“礼”，是从社会制度方面讲的；所谓“仁”，是从贵族间伦理关系方面讲的，着重点在于个人的道德修养。所以孔子的弟子颜渊问他什么叫“仁”时，他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所谓“克己复礼”，就是克制自己，使自己的一切行为都合乎礼，这样才算达到了“仁”。因此，孔子所讲的“仁”，实际上是为体现“礼”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巩固奴隶主的

统治。

孔子站在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为剥削阶级总结了一套进行统治的经验，如：“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等等。孔子提倡的这套统治经验，成为后来统治者欺骗人民的所谓“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

孔子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都是维护奴隶制度的。主要教育内容有礼、乐、射、御、书、数，是为了培养维护奴隶制度的官僚。

相传孔子曾删定六经，保存了中国古代文献，这未必属实。现存五经，多是经孔门的后学纂集成书的，其中《诗经》一书，可能与孔子有些关系，《论语·子罕》记载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诗经〕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集，现存三〇五篇，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风包括十五国风共一六〇篇；雅分大雅、小雅共一〇五篇；颂分周颂、鲁颂、商颂共四〇篇。各篇的创作年代，大部已不可确知，根据部分诗篇考查，最早的约在西周初年，最晚的约在春秋中叶。全书是经过五、六百年时间的积累并经过搜集者的加工和润色而成的。

《诗经》的内容很丰富。国风主要是搜集的民间歌谣，雅颂主要是宗庙朝廷的贵族文学。价值最高的还是民间歌谣部分，它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反映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是全书的精华。作为社会史料和文学史料来看，《诗经》都有很高的价值，是我国一部重要的文化遗产。

〔春秋〕 《春秋》是一部为巩固奴隶制服务的编年体

史书，以鲁国历史为主，简略地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前后共二四二年的历史情况。

## 第三章

# 战国、秦 封建制度的确立 陈胜、吴广领导的第一次农民大起义

### 第一节 战国 封建制度的确立

从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史称战国时期。至此时，春秋以来的一百多个诸侯国在激烈地兼并中只剩下二十多个国家，其中秦、楚、齐、魏、赵、韩、燕七国最强大。七国不断进行战争，当时的人称这七国为“战国”，西汉以后，“战国”一词就成为这一历史阶段的专用名称。

周王室在战国前期就已降为诸侯的地位，战国中期，掌权的西周公和东周公分裂了王室的辖区，周天子在西周，居王城（在洛阳西三十里），东周治洛阳。东、西周很弱小，大国经常侵伐他们，或向他们征甲征粟。前249年，秦灭东、西周。

#### 一、封建地主阶级的变法运动

战国时期，封建生产关系刚刚取得统治的地位，农民（农奴）和地主阶级之间，奴隶和奴隶主之间，新兴地主和奴隶主阶级之间，矛盾复杂，阶级斗争尖锐，各国之间的侵



伐战争也很激烈。封建地主阶级为了建立和巩固他们的统治，为了“富国强兵”，先后在各国进行了政治和社会改革，其中秦国的改革比较彻底。

〔魏 李悝的改革〕 在七国中最早进行改革的是魏国，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主持改革。

李悝，魏国人，是新兴地主阶级政治家，我国古代法家的创始人。他的改革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削弱世卿世禄制度，选贤任能。他主张“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又主张“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说苑·政理篇》）这些主张基本上得到推行，魏国的奴隶主贵族势力进一步削弱，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进一步发展。此后魏国的贵族虽仍有封君制度，可是封君都要遵守魏国的法令，也没有任意役使人民的权利，和据守一方的地方官吏差不多。

二、“尽地力”和“善平糴”。李悝说：“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这都不利于“富国强兵”。因此他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提出了“尽地力”和“善平糴”两项政策。

尽地力就是要农民“治田勤谨”。他说“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治田勤谨与否，粮食的损益悬殊很大，收成不好，农民生活贫困，粮价太贵，城市人口则离散，这都关系到地主阶级的统治。

善平糴是分年成好坏为六等，逢上中下孰（熟），按照规定由官府征糴粮食，“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征糴来的粮食归国家经管储存。“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

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赈之。”这样，“虽遭饥馑水旱，粟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汉书·食货志》上）

尽地力和善平糴推行于魏国，魏国得以富强。

三、著《法经》。为了镇压农民的反抗，李悝还参阅各国刑法，著《法经》六篇，即《盗》、《贼》、《网》、《捕》、《杂》、《具》六律。《晋书·刑法志》曰：李悝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为《杂律》一篇；……”《具律》是根据情况决定从轻或从重处罚的法律。这部法典是为保护地主阶级的私有制度，巩固对农民的阶级统治而制定的。

〔楚 吴起的改革〕 战国初年，楚的国力很弱，三晋连年伐楚，秦对楚也是一个威胁。正在此时，吴起由魏至楚，楚悼王任用他为相，进行政治改革。

吴起，卫人，是一个有名的军事家和地主阶级的政治家。魏文侯时，为魏西河守。后因见疑于武侯，逃至楚国。他的改革，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逐步废除奴隶主贵族的特权，推行封建制度。吴起认为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重。若此，则上偏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韩非子·和氏》）。他主张“废公族疏远者。”（《史记·吴起列传》）“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祿。”（《韩非子·和氏》）把节约下来的钱，用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还“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苦之。”（《吕氏春秋·贵卒篇》）进一步打

击贵族势力。

二、申明法令，裁汰冗员，整顿政治统治机构。

楚经过改革之后，国势富强，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成为战国前期继魏之后出现的第二个强国。

楚的许多贵族反对吴起的改革，前381年，楚悼王死，楚的宗室大臣发动了叛乱，围攻吴起，吴起伏在悼王的尸体上，被叛乱者射死，新法亦被废除。但坐“丽兵于王尸”而死者有七十余家，这也削弱了楚国的奴隶主势力。

〔赵韩齐燕的改革〕 赵在烈侯时（前408—400年），任公仲连为相国，“选练举贤，任官使能。”“节财俭用，察度功德”，削弱了奴隶占有制度，促进了封建制度的发展。

韩自立为诸侯，新旧制度并存，弊病极多。韩昭侯时（前358—333年），任用法家申不害为相。申不害教昭侯以“术”驾驭群臣，“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韩非子·定法》）韩的国力逐渐富强。

齐在威王时（前378—343年），任邹忌为相，慎选官吏，“修法律而督奸吏。”提倡节俭，广开言路。“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战国策·齐》一）威王死，子宣王喜文学，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等学者数百千人，集于齐之稷下讲学，这是齐国最强盛的时期。

燕僻处东北，在七国中比较弱小。战国中期，燕王噲也想进行改革，任用子之为相，后又让位给子之，削弱了奴隶主贵族的特权。

子之三年，太子平和将军市被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拘难数月，死者数万。”（《史记·燕召公世家》）子之杀死平和市被，齐兵乘机攻入蓟，子之与王噲被杀。

这时燕公子职质于韩，赵武灵王迎之，立为燕王，送回燕国，是为昭王。昭王“卑身厚币，以招贤者。”魏、齐、赵之贤士如乐毅、邹衍、剧辛等多来投效，对于燕国的政治、经济有所兴革，燕国逐渐富强。

〔秦 商鞅变法〕 战国初年，秦是一个奴隶制国家，卿大夫都是大奴隶主贵族，权力很大，干预君位的继承，争权夺利，国君权力较小，国力也很弱。前408年，魏攻占了秦的河西之地，前387年，蜀攻占了秦的南郑，此时楚也控制了黔中、汉中、巴等地。《史记·秦本纪》说：当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

献公即位（前384年），第二年迁都栎阳（今陕西省高陵县），废除了殉葬制度，“初行为市”，“为户籍相伍”。促进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国力开始强盛。

献公死，子孝公立（前362年），下令国中曰：“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史记·秦本纪》）商鞅自魏入秦，以“强国之术”说秦孝公，孝公大悦，“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史记·商君列传》）

商鞅姓公孙，名鞅，是卫国的“诸庶孽公子”，在秦以功封于商，所以后人称之为商鞅。少好刑名之学，曾事魏相公叔痤，为中庶子。

商鞅变法是分两次推行的。第一次开始于公元前356年。主要内容如下：

一、编制户口，定“相收司连坐”之法，不告姦者腰斩，告姦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姦者与降敌同罚。这是残酷地统治农民的法令。

二、确立小家庭制度，凡一户有两个以上儿子到能独立生活的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赋。

三、凡努力于耕织，生产多的，免除徭役；凡从事工商活动及因怠惰而贫穷的，连同他们的妻子一并没为官奴婢。

四、凡立有军功的，各按功劳大小授予爵位；为私斗的，各以情节轻重处以刑罚。在战争中斩敌首一个，授爵一级，欲为官，可为五十石之官；斩敌首两个，授爵二级，欲为官，可为百石之官。“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五、重定爵秩等次为二十级，<sup>①</sup>重定各等级占有的田宅、臣妾数量及衣服制度。有功的才得显荣，无功的虽富也不得铺张。

四、五两项是剥夺奴隶主贵族的特权，树立地主阶级的政治权力的重要措施。

前350年，秦迁都于咸阳，再下变法之令。主要内容如下：

一、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

二、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划分若干都乡邑聚为县，县设令丞以掌管全县政事。

三、废井田，“开阡陌封疆”，承认土地私有制度，准许买卖土地。

---

<sup>①</sup> 《汉书·百官公卿表》曰：秦“爵一级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

四、统一斗桶、权衡、丈尺，颁布标准度量衡器。

商鞅为推行新法，曾引起奴隶主贵族的激烈反对。在他刚提出变法主张时，就遇到大臣甘龙、杜挚的反对。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又遭到以太子为首的保守势力的对抗。商鞅坚决推行新法，“刑其（太子）傅公子虔，燔诗书而明法令”。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新法得到逐步推行，封建秩序稳定，生产发展。

商鞅于变法的第五年即开始东伐，连破魏军，收复河西之地。孝公以商十五邑封鞅，号为商君。前338年孝公死，太子立为惠王，公子虔等以“谋反”之罪名逮捕了商鞅，把商鞅车裂。

商鞅在秦推行新法十九年，比较彻底地废除了奴隶占有制度，沉重地打击了贵族奴隶主势力，为在秦发展地主经济、建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奠定了基础。商鞅死后，秦惠王仍奉行商鞅的新法，所以秦很快成为当时最强大国家，成为战国后期进行统一战争的力量。

## 二、社会经济的发展

〔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战国中期以前，各国的阶级斗争，经济、政治改革以及长期的兼并战争，都对奴隶占有制度，起着破坏的作用，促进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当时的地主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由贵族奴隶主转化来的贵族地主，这种地主主要在关东六国，经济、政治势力最大，保存的奴隶制残余也最多；第二种是官僚地主，是官吏将卒以功得到封赏而成为地主的；第三种是商人地主，

是商人兼并农民而成为地主的。后两种属新兴地主阶级，这种地主在秦国自商鞅变法后，一直处于统治的地位，在关东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势力。

《吕氏春秋·审分》说：“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可见在战国时期，地主阶级已认识到以榨取实物为主要地租形态的封建剥削方式比奴隶制度优越。他们把土地出租给农民耕种，收取实物地租，地租率约为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当然，佃农为地主服劳役的情况还是存在的。地主和富裕农民还以雇佣方式剥削贫苦农民。《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夫卖庸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畦畴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这段记载反映了封建初期的地主剥削雇农的情况。

土地所有者要向封建国家缴纳相当于产量十分之一的田租。可是地主阶级往往凭借他们的政治特权，逃避租税。地方官吏就把沉重的租税转嫁到农民的头上。《韩非子·诡使》说：“士卒之逃事伏匿，附託有威之门，以避徭赋，而上不得者万数。”可见在战国后期，随着阶级分化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破产农民变成了豪强地主的依附农民。

〔铁器的推广和水利、农业的发展〕 战国时期，铁器的使用逐渐推广。解放以来，在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辽宁、四川、湖南等省都有战国的铁器出土，其中有犁铧、锄、耜、镰、斧等农具。在河南辉县固围村的魏墓中出土了铁器 160 多件，其中有铁农具 58 件。在其他地方也有大量的铁农具出土。从铁农具的种类和数量来看，当时农

业生产的主要过程，如犁田、中耕、耘锄、收割都已使用铁器，铁器的数量相当多。

铁器的使用也为发展水利灌溉事业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各国人民的辛勤劳动下，很多水利工程兴修起来。各国的统治者都把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看作是富国之道，因而多设司空等官专管水利灌溉。《荀子·王制》说：“修隄梁，通沟洫，行水潦，安水臧，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地方官吏如郡守县令也有兴建管理水利灌溉之责，魏鄴令西门豹征发农民开渠十二条，引河水灌田。后来鄴令史起又修复旧渠，引漳水以溉鄴，使斥卤之地变为良田。

战国后期，关东各国的水利相当发展。据《史记·河渠书》记载：自黄河经鸿沟可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等水相会，西通汉水、云梦，东通菑、济，南通三江、五湖，许多渠道既可行舟，又可引水溉田。

秦国的水利也很发展。秦昭王时，蜀守李冰在今四川灌县主持开凿了两条渠以分岷江水势，修成了著名的都江堰，解除了岷江水害，灌田三百余万亩。大约也在这时，韩的水工郑国至秦，为秦开渠，“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渠成，“用注填阨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史记·河渠书》）这就是有名的郑国渠。从此，关中为沃野，为秦进行统一中国的战争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

在封建制度下，农民有属于自己的经济，虽然这点经济是很少的，但有较多的自由以安排自己的劳动，这就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墨子·非命》（下）说：“今也，农夫



之所以早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菽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农民的生产积极提高了，又有较多的铁农具，不断改进生产，推动了生产迅速发展。

战国时期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深耕熟耨 铁器的使用为深耕熟耨提供了方便条件。战国时期，深耕熟耨已成为黄河流域各国的重要耕作方法。《吕氏春秋·任地》说：“五耕五耨，必审必尽，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蟊。”对深耕熟耨的好处有比较明确的认识。耕地用的犁铧与耨草用的锄都有一定的规格，一般为五、六寸宽，便于翻土、间稼，留苗要“长其兄而去其弟，树肥无使扶疏，树境不欲专生而族居，肥而扶疏则多秕，境而专居则多死。”（《吕氏春秋·辨土》）

二、辨土施肥 战国时期，人们已有相当丰富的辨土知识。成书于此时的《禹贡》曾简要记述了九州土壤的性质<sup>①</sup>，并依其肥瘠，分为九等。《管子·地员》分土壤为上中下三级，每级又细分为三十小级。什么土壤适于种植什么作物，叫做“土宜”，当时关于“土宜”的记载很多，反映了辨土与栽培知识的丰富。

战国时期已有相当丰富的施肥知识。主要肥料是粪肥，其次是绿肥、草木灰等。《荀子·富国篇》曰：“刺草殖谷，多粪肥田。”可见绿肥、粪肥对农作物的生长多么重要。农民除用施肥的方法恢复地力之外，还懂得用轮作法利

<sup>①</sup> 《尚书·禹贡》曰：冀州白壤、兖州黑坟、青州白坟、徐州赤埴坟、扬州涂泥、荊州涂泥、豫州壤、坟垆、梁州青黎、雍州黄壤。

用地力。《吕氏春秋·任地》说：“今兹美禾，来兹美麦。”就是说明禾与麦轮作。

大量的施肥和有计划的轮作，只有地主和富裕农民才能办到，因而产量也较高；贫苦农民地少力弱，施肥轮作都有困难，因而田地瘠薄，产量也很低。《荀子·富国篇》曰：“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

三、注意农时 人们对时令与作物生长的关系的知识也较以前丰富。对禾、黍、稻、麻、菽、麦等作物的“得时”、“先时”、“后时”三种情况都很注意。《吕氏春秋·辨土》说：“所谓今之耕也，营而无获者，其早者先时，晚者不及时，寒暑不节，稼乃多菑实。”

四、疏密得宜 作物的疏密对于水肥的吸收、通气和成长都有极为重要的关系。为了使作物的疏密得宜，必须使作物排列成行。使不同的作物有不同的株距、行距。

战国时期由于铁器的使用，水利灌溉的发展，生产技术的进步，特别是由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产量也较前有了提高，一般约为亩产粟一石半，合今三斗。

〔手工业的发展〕 战国时期的手工业进一步发展，业类增多，生产规模扩大，技术也较前进步。各国的官府手工业，主要制作礼器、兵器、车具、马饰、货币及宫廷、官府用品。民间手工业有新的发展，大者断山刊木，冶炼铸造，小者自设坊肆，生产和销售产品。官府作坊的工人多是工奴、刑徒，亦有征调和雇佣的农民。民间作坊中的工人多是僮仆和佣保。

冶铁业是一项重要的手工业，从已发现的冶铁遗址来看，冶铁规模相当大，产品种类和数量很多，质量也很好。在北方发现的铁器，以农具和手工工具为最多。1953年在河北省兴隆县的燕国遗址中，共出铁范四十付、八十七件，有镢范、锄范、镰范、斧范、凿范和车具范。这些范的外形和铸件的形状相似，范壁厚度均匀，经久耐用。《荀子·强国》说：“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这个记载和上述这批铁范所反映的情况是一致的。在楚地区发现的铁器中兵器居多。解放后在长沙和衡阳发掘的铁兵器中，有戈、矛、剑、刀和匕首等。《荀子·议兵》说：“宛鉅、铁铍，惨如螽蚤。”说明了楚国兵器的质量是很高的。

战国时期的青铜业仍在发展，解放以来，几乎每个省份都有战国时期的铜器出土，冶铜规模比前代扩大很多，产品主要有礼器、兵器、车具、马饰、货币，还有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具。

铜器的制作技术也有进步，复杂的器物已使用焊接技术。有些铜器制作精细，有的表面鍍金，有的刻以花纹或错以金银，工艺水平很高。

铜器商鞅量、相邦吕戈、上郡戈、鄂君启节等都刻有最高监铸官、管理官吏和铸工的名字。一般分为三级，即工师、丞、工或倕、故、工。管理官吏和工人在产品上共同具名，说明了官府作坊的组织相当严密。

漆器业也相当发展。在长沙、江陵、信阳和成都等地发现的大批漆器中有妆奁、漆弓、戟、羽觥、漆棺、漆瑟等家具和丧葬用具，制作都很讲究。其中使用薄板胎和夹紵胎制作的漆盒、漆奁尤为轻巧精致。

战国后期已有釳器，这是在小件漆器的口沿上加鍍金属釳的器具，不仅使胎质菲薄的漆器得以加固，而且增加了美观。

制陶业也有发展。近年来在山西侯马晋魏城、河南洛阳王城、河北武安赵城都发现了战国时期的窑场，陶窑的分布很密，一个陶窑的面积约有3—10平方米，比西周陶窑面积（2平方米左右）大得多，窑的内部结构也较进步。这样的陶窑生产能力较高，出土的陶器种类很多，有些陶器是仿铜器的，制作技术很进步。战国时期已有砖瓦，陶瓷也较前代进步。

随着铁工具的进步和交通发展的需要，车船制造业进一步发展。文献记载战国时期车的名称有数十种之多。主要供贵族官僚乘坐、运载和战争使用。1950年在河南辉县琉璃阁发掘的一座魏国车马坑中，剝剔出19辆木车遗迹，结构精细而复杂。

船用于运载，亦用于战争。《战国策·燕》（二）说：“乘夏木，浮轻舟，强弩在前，鋌戈在后。”就是把船用于战争的说明。张仪说：秦自巴蜀伐楚，舫船载卒，一条船可以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顺流而下，一日可行三百余里。航海事业也很发展，《慎子》逸文说：“行海者，坐而至越，有舟也”。

文献中关于战国时期锦、绣的记载很多，锦、绣有各种花色。长沙楚墓出土的一块麻织物，经鉴定，经纱每10厘米为280根，纬纱每10厘米为240根，略高于现在的棉布，可见当时的纺织技术相当进步。

建筑业也有很大的进步。宫殿建筑集中的表现了当时建

筑技术的成就。燕之黄金台、齐之大室、楚之章华台，都是饰有精致的雕刻和绘画的著名建筑。

战国时期的官府手工业主要是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军事和生活需要而生产的。民间的手工业则以制造商品为主，如邯郸郭纵、赵之卓氏、梁之孔氏都以铁冶致富。农民主要过着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的生活，只有很少的生产或生活用品依靠市场供给。

〔商业的发展〕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交换也有新的发展，商业交换的发展，又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分工，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孟子说：“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孟子·滕文公》上）农夫和手工业者都可依靠市场换取自己的某些必需品。

《荀子》一书中记载了许多商品，例如北方的马、犬，南方的羽翩、齿、革、曾青、丹干，东方的紫紵、鱼、盐，西方的皮革、文旄，都成为中原地区的重要商品。由于商业交换的发展，“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剷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

适应商业交换迅速发展的需要，各国大量的铸造金属货币，货币的形状不同，往往铸有造币的地名或币值。

韩、赵、魏三国的货币主要是铲形的“布”。已发现的有空首布和平首布两种，不同时间或不同地区的布也有形制上的差别。空首布和实用的金属铲非常接近，保留了比较原始的货币形式。布上的铭文有“𠄎”、“梁半𠄎”、“梁一𠄎”、“梁正向金尙𠄎”、“梁充𠄎金尙𠄎”“离石布”“安阳”等。

齐、燕两国主要用刀形币，赵国也有刀币。齐国的刀币较大，面文有“节(即)墨之法化”、“安易(阳)之法化”、“齐之法化”等。燕国的刀币较小，带有“明”字，人们称之为“明刀”。赵国的刀币也较小，铸有“甘丹”(邯郸)等铭文。

秦和周使用圆钱，中间有圆孔或方孔。秦钱铭文有“重一两十二朱”、“重一两十三朱”、“半爰”等。周钱铭文有“西周”、“东周”等。

楚的主币为一种带有印文的小方块金饼，印文有“郢爰”、“陈爰”，人们称之为“饼金”。一块大金饼为十到二十小块不等，辅币为一种略似海贝的铜质币，俗名“蚁鼻钱”。

各国的统治阶级为了商业交换和征收赋税的方便，都重视度量衡的整顿。秦在商鞅变法时，统一了度量衡，并制作了标准器。周、齐等国都有官制量器。《孟子·滕文公》(下)说：“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度量衡的整顿统一为商业交换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扩大了城市的规模，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城市。赵奢曰：“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战国策·赵策三》)当时最大的城市有燕的涿、蓟，赵的邯郸，魏的温、軹，韩的滎阳，齐的临淄，楚的宛、陈，郑的阳翟，周的三川。仅临淄一城就有七万户，《战国策·齐》(一)说：“临淄之途，车击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每个城市都有专

为工商业者从事交换活动的地区，称为市或市井。有些市“朝则满，夕则虚”。官府设有市吏，管理市肆，征收市税。大城市与大城市之间都有方便的交通联系，主要交通工具是车马。这些大城市都是国家或地区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中心。由于这些城市“居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商贾错于路，诸侯交于道。”所以“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

战国时期的商人很多，有的坐列贩卖，囤积居奇。如白圭就“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史记·货殖列传》）专门从事谷物丝帛的投机活动。如吕不韦就“往来贩贱卖贵”。这些商人多家累千金，交结诸侯，干预政治。

### 三、政治制度的变化

〔中央的官制制度〕 战国时期，各国在改革之后，世卿世禄制度进一步削弱，中央政权机构都在向着官僚制度的方向发展，秦在商鞅变法以后，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代之以官僚制度，铨选官僚之权归于国君。

国君是最高的统治者，一国的政治与军事大权都集中他手。国君以相、将分掌政治、军事。相是百官之长，亦称相邦、相国、丞相，在楚国称令尹。《荀子·王霸》说：“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相的权力很大。

中央机构的设置情况，文献记载极不完整，就现有的材料来看，各国大同小异。齐在相下设有“五官”：大田掌农田、垦殖、艺粟之事；大行掌礼仪、宾客；大谏职进谏；大

司马掌军旅、征伐；大理掌狱讼。此外还有掌书、谒者、郎中、士师、右师、博士等官。

秦和韩、赵、魏四国的中央机构，相下有御史、执法、司徒、司空、廷尉、少府等官。御史相当于国君的秘书，可代国君接受别国使臣的国书。张仪为秦说赵王，就是将国书献给赵的御史。各国国君相与会盟，御史亦随从国君，书录大事。御史又与执法同掌纠察之职，国君宴会群臣，“执法在傍，御史在后”，纠察官吏失礼之处。此外还有郎官、主书、博士等官。

楚国的相称令尹，令尹以下，主要有左徒、大夫、左尹、右尹、司败、莫敖、谒者、廷理、太卜、郎中等官。

战国时期军权与政权分开，将军（楚称柱国）是最高的武职，职位仅次于相，将军以下的武职，各国的名称不同，见于记载的有国尉、都尉、中尉、左右中司等。

相、将及其他官吏由国君任免，庶人有功亦可提升为官吏。最能反映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见解的法家主张，“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秦基本上按照这个原则选用将吏，许多将吏出身于布衣（无贵族身份的人）。关东六国虽也废除了世官世职制度，高级将吏仍由贵族充当。实际的军政大权仍操在贵族手中。

〔郡县制度〕 战国前期，郡多设于边地，兼有行政和守边两种性质，最高官吏称“守”。内地设县。战国中期以后，战争频繁，大国的疆域不断扩大，新拓地区往往设郡，内地也逐渐设郡，于是郡县成为两级地方行政区划，县隶于郡，郡直隶中央。



战国中期以前的郡，魏有西河、上郡，赵有云中、雁门、代郡，韩有上党、三川，燕有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秦有陇西、北地，楚有巫郡、黔中等。齐不见有郡的名称，却有类似郡的“都”，共有“五都”。郡在郡守之外，设有尉、监御史，分掌军事和纠察等职。

一郡之内，有县十余个到三十余个，如魏之上郡有县十五，赵之上党有县二十四，代郡有县三十六，秦取赵之榆次、新城等三十七城，设置太原郡。县设令以主县事，令下有丞，掌政事，有尉，掌军事。

县下设乡、里等基层组织，乡有三老、廷掾，里有里正，一里之中，又以什伍之制编制户口，五家为伍，设有伍长，十家为什，设有什长。

郡守、县令等重要地方官吏均由国君任免，佐吏、三老等则由郡县推择地主或“缙绅”充当。这样就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套以地主豪绅为基础的封建统治机构。

〔军权的集中〕 战国时期，各国都行征兵制度，应征年龄一般为十五岁到六十岁。秦、楚两国各有常备士卒百万，齐、赵、韩、魏、燕均有数十万。各国都重视训练士卒，对训练合格的士卒给以奖赏。

各国的军权集中于国君，由国君任命军事统帅。国家铸有铜虎符，左半虎符归统帅士卒的将军收执，右半虎符由国君收藏。征调士卒时，必须以右符为凭信，会符无误，方得兴发。魏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就反映了这样的事实。

虎符上铸有铭文，秦“新郢虎符”的错金铭文说：“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郢。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燔燧事，虽无会符，行殿。”就是

说：凡用兵五十人以上的，必须会符，然后才能行动，但如敌人入侵，边塞有烽火之警，虽未会符，也得行动。

#### 四、兼并战争的扩大和秦统一中国

〔马陵之战和徐州会盟〕 战国初年，魏自李悝改革后，势力强大。文侯、武侯两代连年对外用兵，西拒秦，南伐楚，屡获胜利。惠王即位，秦亦日益强大，不断向东发展，侵夺魏地。惠王为了经营中原，就于前361年自安邑迁都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在西边采取守势，于西河筑长城以御秦，在中原把宋、卫、鲁、郑等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国势更加强盛。

公元前354年，魏伐赵，围赵都邯郸。赵请教于齐，齐以田忌为将、孙臧为师。孙臧与田忌谋曰：“今梁（魏）、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老弱罢于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史记·孙子列传》）田忌听从了孙臧的计谋，举兵西攻魏国。当时魏虽已攻下邯郸，但国内空虚，不得不急以主力回师本国，行至桂陵（今山东省菏泽县东北），遭到齐军的截击，魏国大败。这就是以“围魏救赵”的战法而著名的“桂陵之战”。

前342年，魏又攻韩，韩请教于齐。齐再以田忌、田婴为将，孙臧为师，举兵直趋大梁。魏将庞涓闻之，引兵去韩而归。魏以太子申为上将军，与庞涓以十万众迎击齐军。齐军用孙臧之计诈败，魏以轻锐紧紧相追，至马陵（今河北省大名东北），天黑道狭，旁多阻隘，入齐伏兵包围之中，“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庞涓自杀，太子申被虏。这

就是著名的“马陵之战”。

第二年，秦以商鞅乘机伐魏，大破魏军，虏魏将公子卬，占魏河西之地。

魏“军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史记·魏世家》）这时秦已成为魏的严重威胁。前334年，魏襄王立，与齐威王会于徐州（今山东省滕县东南），魏尊齐为王，齐亦承认魏之王号，缓和了两国的矛盾。魏又与赵、燕、中山会盟，关东各国之间的战争减少了，各国与秦的关系日益紧张起来。

〔合纵与连横的斗争〕 关东各国为了抗拒强秦，组成军事联盟，称为“合纵”。秦为了拆散各国的联合，破坏“合纵”，以便各个击破，就积极在关东争取与国，称为“连横”。

魏齐徐州会盟以后，关东各国逐渐形成了合纵的形势，这对秦的东侵很不利。秦惠王听从了张仪的建议，争取魏为与国，于前322年，派张仪至魏，魏以张仪为相，张仪劝魏背纵约，西事秦，魏起初不肯听，秦又加强军事压力，连夺魏的曲沃、平周，又大破韩军，斩首八万，诸侯震恐，魏迫于压力，背纵约而与秦连横。

秦、魏连横，关东各国惶恐不安。前319年，齐、楚、赵、韩、燕五国支持魏国逐走张仪，改用公孙衍为相。公孙衍合魏、楚、燕、韩、赵五国之兵以伐秦，推楚怀王为纵长。兵至函谷，即为秦军所败。合纵又瓦解。秦又连年对魏、韩用兵，魏、韩又屈从于秦。

这时秦、魏、韩三国连横，齐与楚两国“从亲”。秦为了孤立齐国，派张仪至楚，说楚怀王，如楚“闭关而绝齐”，

秦愿归还楚“商于之地方六百里”。怀王信以为真，派人北辱齐王，与秦和解，楚反孤立。楚派人至秦索地，张仪说原许之地，“广袤六里”。怀王大怒，发兵与秦战于丹阳（今河南淅川附近），楚军大败，甲士八万战死，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十余人被虏，汉中亦为秦所占。楚又“悉国兵复袭秦”，战于蓝田，又大败。

前301年齐相孟尝君田文又以齐、韩、魏、燕、赵、楚为合纵，以齐湣王为纵长。后楚背纵约，与秦“合亲”，齐、韩、魏三国遂合兵伐楚，大败楚军，斩楚将唐昧，攻占宛、叶以北之地。前298年，三国又合赵、中山之兵西击秦，攻入函谷关，秦被迫归还侵夺魏、韩之封陵、武遂等地，五国才退兵。齐成为关东各国的盟主。

此后，秦又采取了“远交近攻”之策，一面拉拢齐国，破坏合纵，一面积极对外用兵，扩大疆土。前293年，秦将白起大破韩、魏联军于伊阙（今河南洛阳市南），斩首二十四万，虏韩将公孙喜，拔五城。前288年，秦昭王自称西帝，尊齐湣王为东帝。几个月后，虽因秦欲伐赵，齐欲伐宋，意图不一，各去掉了帝号，恢复王号，可是关东的合纵已彻底破坏了。

〔乐毅伐齐〕 宋是一个中等国家。前286年，齐灭宋，一时威势很盛，诸侯恐惧，于是由秦主谋，联合燕、楚、韩、赵、魏共六国之兵伐齐。

燕在王噲时，曾遭齐的入侵。此时六国伐齐，燕昭王欲乘机报仇，即以乐毅为上将军，率兵伐齐。联军在济西（今山东省聊城南）大败齐军后，其他五国皆罢兵，乐毅将燕兵继续进击，攻破临淄，乐毅以功封昌国君。齐湣王逃至莒，为

楚将所杀。乐毅在齐五年，下七十余城，都划为燕的郡县。只有莒和即墨两个城未攻下。

前277年，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疑忌乐毅，以骑劫代乐毅为将，乐毅逃往赵国。

燕士卒纪律松弛，到处抢劫，齐国人民纷起反抗。齐将田单在人民的支持下，利用燕国统治集团内部的不和，设计大破燕军于即墨，燕军溃退，齐军收复了全部失地。

〔秦统一中国〕 战国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很快，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残存的奴隶制度和割据混战的局面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进一步消除奴隶制度的残余势力，结束割据混战的局面，实现全国统一，已成为历史发展的要求。秦自商鞅变法后，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量能而授官，“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处理事务的效率较高，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比较巩固，废除奴隶占有制度，解放了生产力，社会经济相当发展。秦昭王时，秦的疆域南到江南，北邻胡貉，西有巴戎，东踰常山，乃有临虑，在魏者，乃据圉津。又实行“奖励攻战”的政策，士卒的纪律比较严明，打胜仗则赏其功，打败仗则罚有罪，人自为战，立功者众。所以“齐之击技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荀子·议兵》）关东各国由于改革不彻底，政治比较混乱落后，武力也不强，各国的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旱时抢水，涝时放水，“以邻为壑”。“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是一个典型例子。统治者的这种恶劣作法，给人民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威胁。又由于奴隶制度残余浓厚，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如关梁太多，课税繁苛，度量衡、货币极不统一，造成商业交换的极大困难。特

别是战火连年不断，“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介冑生虮蝨，民无所告愬。”（《史记·主父偃列传》）关东的人民普遍厌恶各国贵族的混战，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如楚国经常发生农民和奴隶的反抗斗争，魏、韩、赵三国的人民成批地逃到秦国开荒种地，因此，关东六国比较软弱。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在商鞅变法以后，由于社会经济的不平衡，和新的阶级关系的变化就逐渐变成了以秦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六国贵族割据势力和奴隶制残余势力的统一战争了。

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省江陵县北），楚迁都陈（今河南淮阳县），秦夺得巫郡和黔中郡。前262年，秦将白起攻韩，又与赵争夺韩之上党郡，秦将白起围赵兵于长平（今山西省高平县），大破之，杀赵统帅赵括，全坑赵的士卒四十余万人。从此关东各国无力与秦抗衡。

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即位，在国内，坚决镇压奴隶制复辟势力，对外继续进行统一战争。前230年灭韩，前225年，秦将王贲攻魏，引河水灌大梁，灭魏。前224年，秦将王翦以六十万大军伐楚，次年，虏楚王负刍，楚亡。前222年，灭燕、赵。前221年，灭齐，统一了六国。从此，中国就由一个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变成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毛主席教导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人心向背，在秦的统一战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然，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条件以及主观指挥的能力，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 第二节 秦 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建立

### 一、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

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后，在与继续镇压六国残余贵族，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强大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

〔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战国中期以后，各国的最高统治者都称王。灭六国后，秦王改王号称“皇帝”，神化皇权，以欺骗人民，从此，皇帝就是地主阶级的最高政治代表，是封建统治的象征。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官吏，都由皇帝任免，都按照皇帝的意志办事，只有皇帝才有征调军队的权力，一切重大事件都由皇帝裁决。他还想让他子子孙孙永远保持皇位，就自称“始皇帝”，规定他的子、孙称二世、三世……无穷地传下去。

神化皇权，使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是地主阶级用来控制人民的重要精神武器，也是地主阶级统一意志，统一力量，为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全力镇压人民反抗的重要工具。

〔建立各级官厅机构〕 以秦始皇为首的新兴地主阶级为了保护他们的封建制度，并巩固他们的统治，参照战国以来各国的政治、军事制度，制定了一套完整系统的新的封建

官僚制度。

中央的统治机构由三公、九卿组成。三公是丞相（相国）、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辅佐皇帝，处理全国政务，太尉掌全国军事，御史大夫辅佐丞相，掌监察。九卿有奉常掌宗庙礼仪，郎中令掌宫殿掖门户，卫尉掌宫门卫屯兵，太仆掌车马，廷尉掌刑辟，典客掌少数民族事务，宗正掌皇族事务，治粟内史掌谷、货，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还有前、后、左、右将军，掌征伐。博士数十人，备顾问。

地方统治机构采用郡、县制度。初灭六国时，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后增至四十郡。郡设守，掌政事，尉辅佐守并掌军事，监御史掌监郡，直属御史大夫。县，万户以上的设令，不满万户的设长，掌政事，下有丞、尉等，分掌兵、刑、钱、谷等事。县以下的统治机构，一般为“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循禁贼盗。”<sup>①</sup>乡属于县。乡、亭官吏不由皇帝任命，但规定要推择当地的地主或比较富裕的人充当。从这一制度可以看出的封建国家是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

## 二、镇压、防范旧贵族的复辟

秦始皇为了巩固和加强统一的封建国家，对六国旧贵族复辟势力进行了坚决的镇压，还采取了许多防范他们进行阴谋活动的措施。这些措施也用于对广大农民的统治与镇压。

---

<sup>①</sup>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迁徙豪富 销毁兵器〕 秦灭六国，迁徙各国的旧贵族和豪富十二万户于咸阳以及南阳、巴、蜀等地，削弱他们的政治、经济势力，有些旧贵族被关被杀或四处逃亡。为了进一步消除反秦的可能，又下令各郡、县，强收民间的兵器集中到咸阳，加以销毁，铸成了十二个大铜人，各重二十四万斤，以炫耀胜利。

〔决通川防 修治驰道〕 为了消除反秦势力可能利用的地势凭借，秦始皇在灭六国之初，即下令拆除各国的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又为了兴发士卒、征调粮饷的方便，在全国范围大修驰道。驰道以咸阳为中心，东至今河北、山东，南至今江、浙、湖北，西至今甘肃中部。驰道广五十步，每隔三丈植树一株，用铁椎夯打，路基坚实。又为了防御匈奴，北修直道，直通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凿山堙谷，约一千八百里。始皇在十一年中，五次巡游旧赵、燕、齐、楚各地，在邹峄山（在今山东省邹县东南）、泰山、之罘（在山东省荣成县）、琅邪（在今山东省诸城县）、碣石（在今河北省昌黎县）、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附近）等处刻石碑，谴责六国旧贵族的反动统治，歌颂始皇的统一事业，申张秦法，宣扬威德。驰道的修筑对巩固统一起了重要的作用。

〔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对六国复辟势力的一次沉重的打击。秦灭六国之初，收用了大批士人儒生，可是许多思想顽固的士人儒生向往旧制度，对秦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不满，以古非今。秦统治者对于这些士人儒生日益产生戒心。公元前213年（始皇34年），博士淳于越在朝廷上公开反对现行制度，他攻击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

者，非所闻也。”丞相李斯当场进行反击，他指斥淳于越为“愚儒”，指斥淳于越和许多儒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他揭露这一群儒生是危险势力，要求始皇坚决制止他们的非法活动，并提出了焚书的建议：

(1) 史书除《秦纪》以外，六国史书一律烧掉；

(2) 诗、书、百家语除博士官收藏的以外，其他人藏书，都集中到郡，由郡守、尉监督烧掉；

(3) 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四岁刑）；

(4) 不烧医药卜筮种树等书；

(5) 若有学法令者，以吏为师。

始皇采纳了这个建议，全国各地顿时燃起了焚书的烈火，这对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镇压反动势力的复辟行为起了重大的作用。

继焚书事件之后，第二年又发生了坑儒的事件，这是镇压反动势力的继续。事件的起因是由于儒生詆谤秦始皇专制独裁引起的。秦始皇认为他们“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逮捕了他们，严加拷问，把四百六十余个儒生全部坑杀在咸阳。坑儒对当时的反动势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也对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起了重大的作用。

### 三、发展地主经济、文化的政策

秦统一后，在全国范围内明令废除奴隶制度，推行发展地主经济、文化的政策，对促进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

展有很大的意义，对进一步消除封建割据的因素，巩固发展统一的国家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经济政策〕 公元前221年（始皇二十六年），下令废除六国的旧币制和旧度量衡制度，以原秦制为基础，制定并推行统一的新币制和新度量衡制度。新币分为二等，黄金为上币，以镒（重二十四两）为名；铜钱为下币，文曰“半两”，重如其文。度量衡器都由国家监制，标准严格。历代出土的大量的秦权和量，都铸有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书，<sup>①</sup>这说明统一度量衡在当时是一个重大事件。秦还统一车轨，宽六尺，便于交通运输。这些措施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公元前216年，（始皇三十一年），又下诏“使黔首自实田”。就是要人民向政府据实登记所有的田地，按亩征税。这是秦王朝在全国范围推行统一的土地私有制的法令。这意味着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进一步废除了曾是奴隶占有制的经济基础的土地国有制度，大力促进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文化政策〕 始皇下令统一文字。战国时期各国的字体不统一，同字异形，严重妨碍文化交流。秦统一六国，废除各国原有字体，由李斯等人以秦国字体为基础，参照其他字体，制定了笔画简省，书写方便的“秦篆”（也叫做“小篆”），作为规范化的字体，推行全国。狱吏程邈又根据民间已行用的新体，造隶书，笔画省便，字体方正，便于书

---

<sup>①</sup> 诏书文曰：“二十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歆聚者，皆明壹之。”

写。到汉代，隶书广泛行用，逐渐成为通行的文字。文字的规范化对于巩固国家的统一，促进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秦在“焚书坑儒”以后，严禁私学，国家直接掌管学校，以法令为教材，以官僚为师傅，加强思想统治。

#### 四、秦与周围各民族的关系

秦统一中国以后，消除了长期的封建割据混战的局面，促进了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互相交流，为我国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伟大祖国疆域的开发，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北防匈奴 修筑长城〕 匈奴是我国北方草原上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商、周时期称为严允、荤粥，是胡族的一支；战国时期始称匈奴。约在公元前八世纪，开始使用铜器，前三世纪，已使用铁器，并由父系家长制往奴隶制过渡。以畜牧为生，逐水草而居，没有文字。《史记·匈奴列传》说：“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

战国中期，匈奴南侵赵、燕、秦三国。赵武灵王为了抵御匈奴，下令国中，变胡服，习骑射，军力增强。后来打败了匈奴及其所属的林胡、楼烦等部，赵国的北疆扩展到阴山，置代、雁门、云中三郡，自代沿阴山而西，至高阙（今河套西北狼山附近），筑长城以拒匈奴。稍后，燕将秦开破东胡，辟地千余里，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郡。秦在昭王时，灭义渠戎，置

陇西、北地，上郡，亦筑长城以拒匈奴。自此以后，赵、燕、秦三国一直派重兵驻守长城，在兼并战争激烈之时，也不肯轻易动用驻守长城的将、卒。战国末年，赵名将李牧以战车千三百乘，战马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杀者十万人，与匈奴会战，大破匈奴十余万骑，灭襜褕部，破东胡，降林胡，匈奴势力削弱，此后十余年间，不敢南侵。

秦灭六国之际，匈奴乘赵、燕的北部边防松弛，进占河南（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公元前215年，（始皇三十二年）秦将军蒙恬率士卒三十万北击匈奴，收复河南，置三十四县。又征发大量的徭役，修缮旧秦、赵、燕长城，并连接起来，这就是有名的万里长城，长城的修筑对保卫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经略南越 开通灵渠〕 越人是生活在我国东南沿海到广西、云南的古老民族，在今浙江境内的为东越，在今福建境内的为闽越，在今广东东部和南部的为南越，在广东西部、广西南部 and 云南东南部的为雒越、西瓯、西瓯骆。“被发文身，错臂左衽。”以农业为主，喜居水边，食稻。

战国时期，越人大部在楚的统治区域。从考古资料来看，这一时期的文化已相当进步。具有特征性的器物有几何形印纹硬陶，这种陶器火候高，胎多为灰色，有方格纹、回字纹、编织纹、云雷纹和米字纹等。器物有罐、甗、尊、簋、豆、盘、杯和盂等。生产工具有研磨精细的石器如有段石磷、斧、刀、凿、镞、戈等。出土的青铜器有镞、矛、刀、斧等，但数量不多。

秦灭楚，设会稽郡（治今江苏省苏州市），统辖东越，设闽中郡（治今福建省福州市），统辖闽越，又以五十万人

戍守南越，在南越地区设置桂林、南海、象三个郡，统辖南越和雒越的一部。

在伐南越时，为了转运粮饷，监御史禄率卒在今广西兴安县凿灵渠，分湘水，七分入湘，三分入漓。从此，湘、漓通航，为江、汉和岭南的船只直接往来开辟了通道，灵渠是用一犁头样的石堤分水，又在渠中设有若干个斗门，以保持水量，使往来船只逐斗上下，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一个伟大创造。对于我国南北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经略巴蜀 通西南夷 开五尺道〕 巴人和蜀人同属于蛮族，很早就生活在今四川地区。甲骨文中有“正（征）蜀”，“至蜀”等记载，武王伐纣，巴人和蜀人都参加了这场战争。“巴师勇锐，歌舞以凌”（《华阳国志·巴蜀》）。

巴人分布在今四川省的东部。春秋时期，巴已成为长江上游的重要国家，与楚、申、邓、庸、秦等国都有政治、经济关系。战国中期，巴君称王。

巴地宜五谷，亦宜畜牧。解放以来，在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宝轮院发掘了数十座巴人墓葬，都是以约五米长的独木舟为葬具，随葬品有柳叶形剑、空首钺等。近年在涪陵地区发现的一批属于巴人的土坑墓，有棺槨遗迹，随葬品铜器有戈、矛、剑、钺、弩机、箭镞、凿、斤、釜、甑、壶、罍和乐器等。其中一件铜壶，通身饰有错银云、水纹图案。另一件双龙纹方铜镜，镜面与镂空纹饰的背面两层鑲合而成，工艺水平很高。还有成套的编钟大小十四个，编钟通身以浇铸和金错技法，饰以饕餮蟠夔、几何纹图案。这些铜器都富丽美观。

蜀人分布在今四川省的西部。战国中期，已为“戎翟之长”，以农业为主，都于成都（今成都市），国君杜宇，号曰望帝。秦人司马错曾说：“共（蜀）国富饶，得共布、帛、金、银，足给军用。”又说：“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华阳国志·蜀志》）。可见蜀的物产丰富，在战略上也极重要。

蜀在商周时，已进入铜、石并用时期。石器有斧、磷、凿、刮削器等，大半是打制的。陶器有罐、钵、碗、杯以及罍、豆等，已开始使用轮制。青铜器有戈、矛、镞和斧、削等。春秋、战国时期，蜀文化进一步发展，青铜器制作技术已相当进步。典型的铜器有柳叶形剑，空首钺等，典型的花纹有手纹、心纹、鸟纹、虎纹等。还有些图案似象形文字。

巴蜀文化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亦很大，从出土器物来看，在显著的“巴蜀式”器物之外，如戈、戟、剑、矛、镜、带钩、剑鞘、漆盘、壶以及铁斧、小铁刀等都带有中原作风。

西南夷是居住在我国贵州西部、云南、四川西部和西藏东部的一些古老的民族，语言、风俗极不相同，按地域分为西夷和南夷两部。西汉时期的史学家司马迁对这些民族作了这样的概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魑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牂榆，名为嵩、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嵩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

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史记·西南夷列传》）

战国中期以前，这些民族都处在原始社会末期，以滇人的文化为例，出土的属于这一时期的生产工具，主要有长条石斧、有肩石斧、石镞、骨铲、骨锥、陶网坠等，陶器主要有钵、罐、皿等，大部分是手制的夹砂红陶和灰陶器，有少数是轮制的，没有发现金属遗物。

前279年左右，楚顷襄王（前296—前263）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沅江而上，经略黔中（今湖南沅陵西）、且兰（今贵州黄平西）、夜郎（今贵州西部），直至滇池。不久秦由巴郡侵楚之黔中，断绝庄蹻的归路，庄蹻及其部属，变其服饰，从滇俗，庄蹻为滇王，建立了奴隶制国家。

滇地方三百里，庄蹻王滇，带来了楚文化，促进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1955—58年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发掘了属于滇贵族的一个古墓群，出土了大量属于战国后期至东汉初年的文物。其中属于战国后期至西汉初的有数十件青铜农具、手工工具，上百件铜、铁兵器，大量的铜鼓、贮贝器和青铜乐器、马具、饰物以及黄金、玛瑙、玉制品等。这些器物独具风格，与内地的同样器物的作风不同。考古学家认为这是滇人奴隶制前期的文化遗存。①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改置巴郡、蜀郡。秦统一六国后，又派常頌征调巴、蜀士卒，在今四川省宜宾县之南

---

①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年。



的高山峻岭上，开五尺道，以通西南夷，在附近的少数民族地区设置行政机构。五尺道的开通，为中原、巴蜀和西南夷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

### 五、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

〔繁重的徭役〕 秦王朝在统一之初，就大量征发人民，仿照六国宫殿的样式，在渭北大造宫殿。后来，又在渭南上林苑修建朝宫，仅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一万人，下可以树立五丈高的大旗。这就是有名的阿房宫。为了修造宫殿，从北山采石料，从蜀、楚取木材，运到关中。关中有宫殿三百余所，关外有四百余所。

秦灭六国后，征调各郡县的刑徒、人奴产子七十万人，同时建造阿房宫和骊山墓。为了不使墓内的秘密泄露，始皇葬时，把在墓内工作的工匠都关在墓中。秦王朝大量征发徭役。还几乎年年用兵，秦时人口约有两千万左右，从各种的情况估计，在秦统治的十几年中，每年都要有二百万以上的丁男被征发，丁男不足，又征发丁女，大量人口流离失所，土地荒芜。

〔残酷的赋税〕 秦统治者为了满足他们的奢侈生活和供应军需，极力搜刮人民。史书记载，从山东运粮到西河（内蒙伊盟），“三十钟（一钟合六石四斗）而致一石”。秦在南北战场上陈兵八十万，骊山刑徒七十万人，再加上咸阳庞大的官僚系统，宫观苑囿大量的戍卒卫士，都需由关东漕转粮餉。田租、口赋剥削，要夺去人民收获物的三分之二以上。官吏用清查户口的办法强征赋税，用簸箕夺走了农

民最后一点粮食。秦王朝又垄断盐铁经营，征收山林川泽之税，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农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始皇死后，二世即位，赵高专政，政治黑暗，对于人民的剥削、压迫极其残酷。他为了镇压人民和保证自己的安全，征调了军队五万人到咸阳，天天练习射杀狗马禽兽，军队和狗马等所需要的粮食饲料都由各郡县供应，漕运的夫役要自带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供饮食，造成人民极大的痛苦。

〔严刑酷法〕 秦的刑罚极其残酷，肉刑有髡（砍去膝盖）、刖（锯脚）、劓（割掉鼻子）、黥（在脸上刺字）、宫（男子割掉生殖器，女子幽闭）、榜掠等，死刑有腰斩、枭首、弃市、戮尸、坑死、凿颠（凿囱门）、抽肋、镬烹、车裂等。还有具五刑、夷三族。具五刑就是犯人先髡、劓、斩左右趾，再笞杀、枭首、菹骨肉于市。夷三族就是一人“犯罪”，父族、母族、妻族一同处死。徒刑的名目繁多，处徒刑的人要长期服苦役。秦法繁密，再加上推行“相收司连坐”法，一人犯法，牵连邻伍，所以陷入刑网的“罪人”特别多。

毛主席教导说：“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

广大农民在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下，再也无法生活下去了，大量的农民“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进行反抗斗争。有许多骊山刑徒，秘密地结合起来，推举首领，准备起义。英布（曾受黥刑，也叫黥布）在骊山时，就

曾经和一些刑徒首领往来，后来他又率领一群刑徒逃到湖北、江西一带，武装反抗秦的统治。鉅野的彭越，南郡的黄极忠，都是领导农民起义的著名的“群盗长”。

### 第三节 陈胜、吴广领导的 第一次农民大起义

#### 一、起义的爆发

〔大泽乡起义 农民革命政权的建立〕 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七月，有九百多贫苦农民由两个县尉押送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戍边。走到蕲县大泽乡（今安徽省宿县西南），阴雨连绵，道路不通，估计赶到渔阳，也要误期。秦法规定，误期处斩。

阳城（今河南省登封县）雇农陈胜和阳夏（今河南省太康县）农民吴广都在征发之中，充当屯长。他们两人商量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他们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陈胜说：“天下苦秦久矣！……为天下唱，宜多应者”。他们制定了起义的计划。在戍卒中造了一些有关起义的舆论，又趁两个县尉酒后行凶之际，杀掉了县尉。他们召集戍卒们说：“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借第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他们慷慨激昂的演说，更激发了戍卒们的革命斗争要求，于是“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烈火，熊熊地燃烧起来。陈胜为将军，吴广为都尉，先后攻占大泽乡、蕲县，又接连攻下五、六个县，队伍迅速扩大，至陈（今河南省淮阳县）时，已有兵车六、七百乘，战马千余匹，战士数万人，

一举而攻占陈县。

陈曾是楚国后期的国都，也是一个战略要地。陈胜攻占陈后，召集各方面的人物，会商反秦大计。与会的起义领袖提出了“伐无道，诛暴秦”的革命口号，以号召人民革命。又推举陈胜为王，号张楚，以陈为都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政权。列宁说：“革命军队革命政府，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这是为了起义取得胜利和巩固起义果实的两个同样必要的机构。”陈县革命政权的建立，更鼓舞了人民的反秦斗争，各地农民“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相率起义，起义军在数千人以上的不可胜数。在短短的时间内，秦在各郡县的统治机构已大部分被打乱或被摧毁。

〔起义农民和旧贵族复辟势力的斗争〕大泽乡起义后，各地纷纷响应。关东六国的旧贵族和旧知识分子也乘机而起，以反秦为幌子，或混入农民起义军中，或篡夺农民起义军的领导权，发展复辟势力。在反秦队伍内部充满了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

在陈胜领导的起义军中，起义农民和旧贵族复辟势力的斗争从攻占陈就开始了。当时起义农民一致拥护陈胜称王，以便“监临天下诸将”以伐秦。与魏旧贵族有密切关系的“名士”张耳、陈余却竭力反对，胡说陈胜称王是“示天下私”，而要陈胜遣人到各地，立六国之后，恢复战国时期的割据局面。这个复辟主张遭到陈胜的拒绝，这一斗争逐渐激化。

陈胜称王后，按照计划分兵略地。以吴广为假王（代理陈胜），率主力军西击荥阳，另派起义军南取九江（今安徽省寿县），东南取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北取魏地。吴

广围荥阳，久攻不能下，陈胜又以周文为将军，率军绕过荥阳西进，打到函谷关时，已有战车千乘，士卒数十万，攻占戏（今陕西临潼县东），直逼咸阳。另派宋留率军取南阳，叩武关。又以武臣为将军，张耳、陈余为左右尉，率卒三千人，渡河北上。张耳、陈余至赵地，用招降并重用秦官吏的办法，占了三十余城。立武臣为赵王，陈余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脱离陈胜而独立。这时，秦王朝以少府章邯为将军，编骊山刑徒为军队，大败周文部起义军，周文退出关中。陈胜派人要张耳、陈余引兵入关，支援周文，他们拒不遵命，却忙于北取燕、代，南收河内，扩大自己的地盘，割据一方，准备与陈胜对抗。

陈胜派周市北略魏地，周市平定魏地后，要立魏公子咎为魏王，这时，魏咎在陈，为陈胜扣留，不得归还。周市五次派人至陈交涉，陈胜迫于形势，放回魏咎，魏咎称王，周市自为魏相，脱离陈胜，成为另一个复辟势力。

此外，齐旧贵族田儼占据齐地，自立为齐王。燕旧贵族拥立韩广为燕王，他们都是割据一方的贵族复辟势力。

关东旧贵族大搞分裂割据，严重削弱了农民起义军，秦王朝一再补充章邯军，大破起义军于涓池，周文自杀。吴广和将军田臧有分歧，田臧杀吴广，率兵迎击秦军，战败而死。秦兵又攻陈，陈胜亲自督战，以兵力薄弱，败退至下城父（今安徽省蒙城县），被他的御者庄贾所杀，庄贾降秦。陈胜的将军吕臣率苍头军（奴隶军）攻下了陈，杀死叛徒庄贾。不久，陈又为秦军攻下，吕臣联合英布起义军，再次大破秦军，收复陈。可是此时秦的兵力一再得到补充，日益强大，农民起义军却由于陈胜、吴广已死，一时没有主要领导

人，又连遭失败，士卒散亡，力量大大削弱。

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反映了当时广大人民的愿望和历史发展的要求。起义六个月就遭到这样大的挫折，主观原因，第一，他们在起义队伍壮大以后，骄傲自满，脱离了农民群众，影响内部团结，以致出现了田臧擅杀主将吴广的严重事件。第二，对于旧贵族复辟势力缺乏认识，斗争不力，起义军一再遭到分裂和削弱。第三，起义军都是贫苦农民，在缺乏必要的军事训练和战斗锻炼，又无后备力量的情况下，进行攻坚战和战略决战，如围攻滎阳和进取关中，造成孤军深入，以致遭到失败。客观方面，秦王朝虽然政治黑暗，可是还拥有相当的军事力量，更主要的是六国旧贵族的分裂复辟活动，严重削弱了农民起义力量，以致陈胜的各路军队在无外援的情况下，被秦各个击破。

陈胜、吴广牺牲了，可是他们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前期，就敢于向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最高政治代表——皇帝挑战的革命首倡精神和坚强意志，却激励着他们的后继者，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中，农民起义军终于全歼秦军主力数十万人，并推翻了秦王朝的反动统治。

## 二、秦的灭亡

〔鉅鹿之战〕 陈胜起义以后，消息传到了江东。九月，项梁、项羽诛杀秦会稽（今江苏省苏州市）守，收编了吏卒和起义农民共八千人，控制了会稽。陈胜死后，陈胜的将军召平渡江，用陈胜的名义拜项梁为楚王上柱国，要他引兵西击秦。项梁率八千精兵渡江，和陈婴、英布等起义军会合，到下邳时，已有六、七万人，吕臣、刘邦等也受项梁节

制，项梁成为楚地农民起义军的主要领导者。项梁立楚怀王之孙心，仍称楚怀王，又率军与齐军联合，大破秦军。项羽、刘邦也分兵连破秦军，斩秦三川郡守李由。起义军节节胜利，项梁骄傲起来，放松了警惕，被秦将章邯突然袭击，起义军大败，项梁战死，起义军第二次遭到巨大挫折。

秦王朝为了屠杀起义人民，除一再加强章邯军外，又命王离放弃对长城的戍守，率数十万军队进攻赵地。章邯率军北渡河，赵王和张耳逃到钜鹿，被王离军包围。章邯率军筑甬道，自黄河至钜鹿，为王离军供应粮食。王离军兵多粮足，猛攻钜鹿，钜鹿食尽兵少，非常危急。此时陈余有数万人，张耳之子张敖有一万多人，都在钜鹿城外，远离秦军防守，不敢救钜鹿。

赵一再向各地反秦势力告急，魏、燕、齐等地的反秦势力都派军前来救应。可是他们军力薄弱，害怕与秦军交锋，都筑垒驻守在陈余军之旁，不敢进攻。

楚怀王派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率兵约七万人救赵。宋义采用“先斗秦赵”的战略，想收渔人之利，四十六天不进兵。项羽杀宋义，夺得兵权，先派英布等率卒二万人渡河，破章邯军，几次切断甬道。项羽又率主力渡河，起义军“破釜沉舟”，每人只带三天的粮食，表示进行决战。过河后，再破章邯军，章邯军撤退；又进攻王离军，九战九捷，秦军大败，王离被虏，苏角被杀，涉间自焚，随解钜鹿之围。《史记·项羽本纪》描述这场激战时说：“当是时楚兵（起义军）冠诸侯。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秦军破后，会于钜鹿的各



路反秦势力组成联军，推项羽为诸侯上将军，统率联军，继续追击章邯军。

鉅鹿之战后，秦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秦二世和赵高对章邯不满，章邯恐惧。起义军又一再追击章邯军，章邯退到殷墟（今河南省安阳市北），率所部共二十万人投降。项羽怕降卒人多，有异心，除留下章邯和他的长史司马欣、都尉董翳等少数人外，把二十万降卒全部坑杀在新安（今河南省浚池县）城南。

鉅鹿之战是秦末农民起义中最激烈的具有决定性的一场大战，这场大战的胜利，扭转了整个战局，为最后推翻秦王朝的反动统治奠定了基础。

〔入关灭秦〕 刘邦原是秦的泗上亭长，秦末，他曾奉命押送刑徒到咸阳。在路上，刑徒多逃亡，他也逃到芒砀山中（今江苏省砀山一带），陈胜起义后，他与县吏萧何亦率农民起义，自称沛公，后属项梁。鉅鹿之战时，秦集中主力于黄河以北，黄河以南兵力较少。宋义、项羽北救鉅鹿时，刘邦率一小部兵力奉命西向击秦。当时，楚怀王和项、刘约定，谁先定关中，为关中王。

刘邦出发时，只有士卒数千人，收编了彭越等部起义军后，仍不足一万人。刘邦由于兵力单薄，采取了避实攻虚的战略，迂回曲折地向西进军。经过一年的战斗，于公元前207年（二世三年）八月，用张良之计，收买了秦的武关守将，破武关，进兵蓝田。

农民起义军的节节胜利，进一步加剧了秦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赵高杀秦二世，取消了皇帝的称号，立二世之侄子婴为秦王。子婴又杀赵高。正当秦统治集团互相残杀之时，

刘邦部起义军大破秦军于蓝田，进驻霸上（今西安市南）。以子婴为首的秦统治集团在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于公元前206年（汉元年）十月，向农民起义军投降了。

刘邦入关灭秦所以比较顺利，钜鹿之战的胜利，为他创造了有利条件。起义军纪律严明，得到沿途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战略指导比较正确，也都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楚汉战争 西汉王朝的建立〕 刘邦一进咸阳，就想住在宫中，后来在霸上召集各县的地主豪绅，宣布他应当为关中王，同时还公布“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约法三章”是地主阶级反对农民革命，恢复封建秩序，保护地主阶级的生命、财产不受侵犯的法令。刘邦又允许秦的官吏依然当官如故，并派人和旧秦官吏一起，到各县乡邑宣谕“约法三章”，受到地主豪绅们的拥护。作为农民起义军首领的刘邦正在蜕变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

项羽听说刘邦想当关中王，并派士卒守卫函谷关，非常愤怒。于是率军攻破函谷关，于同年十二月，进驻戏。这时刘邦有士卒十万，项羽有四十万，刘邦被迫表示服从项羽。项羽杀掉秦王子婴，烧毁秦的宫殿，自立为西楚霸王，又以盟主身份，分立随他入关的主要将领、秦的降将和已自立为王的旧贵族（即故王）为十八个王国。刘邦为汉王，都南郑，关中分给秦降将章邯（雍王）、司马欣（塞王）、董翳（翟王），楚怀王被项羽杀死。

项羽分立各国，妄图恢复战国的政治局面，这是违背历史发展潮流的。他自己占有梁楚地九郡，入关将领封王，多分占故王较好的地区，故王虽保留王号，却都被迁到偏僻地

区，这就引起新、故王之间的互相争夺和残杀。

当年五月，刘邦由汉中出兵，灭雍、塞、翟三国，占据关中。这时关东新王、故王正在混战，项羽为了维护他分封的政治局面，也卷入混战中。十月，刘邦率军出关，展开了刘邦和项羽之间的楚汉战争。这时项强刘弱，刘邦采取“斗智不斗力”的战略方针，以关中为后方，和项羽长期对峙于滎阳、成皋一带。另派大将韩信由关中东渡黄河，经过一年又两个月的战斗，平定了魏、赵、代、燕、齐等国，形成对项羽的三面包围。这时项羽众叛亲离，后方彭城受到严重威胁，兵少粮缺，无力再战，就与刘邦议和，约定以鸿沟为界，东为楚，西为汉。项羽罢兵东归，刘邦又率军追击项羽。公元前202年（汉五年）十二月，刘邦和韩信、彭越、英布等会师，围项羽于垓下（今安徽省灵璧县），项羽大败，逃到乌江（今安徽省和县）自杀。就这样，刘邦爬上皇帝的宝座，重新建立了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统治，国号汉，建都长安（今西安市北）。

楚汉战争，是两个地主阶级政治集团之间的战争。但刘邦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主张统一，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他还注意笼络人心，重用谋臣如萧何、张良、韩信等人，战略指挥比较正确，所以取得胜利。项羽代表旧贵族复辟势力，主张分裂割据，违背历史发展趋势，又残酷地屠杀人民，专断自信，不听取谋臣范增等的意见，没有牢固的后方，战略上处于被动状态，所以失败。

### 三、秦末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

秦末农民战争被地主阶级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

的工具，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但是，这次农民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参加起义的农民有数百万之多。以雷霆万钧之力推翻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地主阶级的王朝，推翻和改造了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这次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是很伟大的。

〔推翻了地主阶级建立的第一个封建王朝〕 毛主席教导说：“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么？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秦王朝是地主阶级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这个封建国家对于人民的防范极其严密。虽然它们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还疯狂地镇压屠杀人民；一旦陈胜振臂一呼，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这个曾盛极一时的封建王朝就在农民的一再打击下垮台了。地主阶级的政权被推翻了，它们精心炮制的主要是为镇压农民的政治、法律制度废除了，极端酷残的徭役、赋税取消了。秦末农民大起义提供了极可宝贵的历史经验，只要人民敢站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的命运，一切反动派都是能够打倒的。

〔打击了地主阶级 滌荡了奴隶制残余〕 毛主席教导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秦代，地主经济虽然还处在上升时期，可是这种经济的社会恶果却已严重地暴露出来。特别是秦王朝推行“以有功劳行田宅”和“尊奖并兼之人”的政策，更助长了土地兼并的现象。“富

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再加上贪官污吏横征暴敛，严刑峻法，人民愁苦不堪，大量逃亡，社会经济严重破坏。农民大起义严厉地惩罚了一批官僚贵族、豪强地主，摧毁了秦王朝政治统治的基础，剷除了地方上的一些恶势力，扫荡了几百年间建立起来的各种宗法制度和封建特权，从封建国家和地主手中夺回大量的田地和财物，解除了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扫除了障碍。

秦代离开奴隶制社会不久，奴隶制残余严重，社会上存在着大量官、私奴婢。大泽乡起义后，“苍头特起”，大量的奴隶参加了起义，长期的农民战争，进一步涤荡了奴隶制残余。

〔开创了**中国农民革命的光荣传统**〕 毛主席教导说：“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

以陈胜、吴广为代表的秦代农民，在封建社会初期，就进行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并建立革命政权，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革命的光荣传统**。他们蔑视封建宗法制度，蔑视专制主义的封建皇权，发出“伐无道，诛暴秦”的伟大革命号召，并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顽强战斗，英勇杀敌，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这样的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崇高的革命气节，为后世几千年的农民起义树立了光辉榜样。

## 第四节 战国、秦的文化

### 一、百家争鸣

战国时期，中国的社会刚刚由奴隶制进入封建制时期，阶级关系仍处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过程中，代表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力量的士人都企图按照本阶级或本集团的利益或需要，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做出解释，并提出各自的政治主张，于是出现了一个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最重要的学派有儒、道、墨、法、名、阴阳、纵横、农、杂等家。其中以儒法之争最为激烈。儒家维护旧的奴隶制度，反对社会变革；法家主张社会变革，维护新的封建制度。儒法之间的斗争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阶级之间的尖锐斗争。

〔儒家 孟子〕 儒家宗孔子的学说，以孟子为代表的“孟氏之儒”是主要的一派。

孟子（公元前390—前305年）名轲，邹（今山东省邹县）人，受业于子思（孔子之孙伋），曾游历宋、滕、魏、齐等国，阐述他的政治主张，还曾在齐为卿。晚年退而著书，著《孟子》七篇。

孟子的政治思想来源于孔子，这个思想的核心是仁义。他对于当时正在急剧变化的社会、政治情况十分反感，他认为这些情况都破坏着殷、周以来的“礼治”，与这些变化有关的人物都是罪人，他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他向往殷、周时的社会状况，主张“法先王”，打着“法尧舜”的旗号，妄想恢复奴隶制度。

为了实现这个政治目的，孟子宣扬仁、义，鼓吹“仁政”学说”。仁就是“亲亲”，义就是“敬长”，他说：只要“人人亲其亲，长其长”，天下就可以太平（《孟子·离娄》）孟子还十分重视井田制的恢复，他以为行“仁政”必须从恢复井田制开始。他对于破坏井田制的土地私有制进行了恶毒的攻击，把“废井田，开阡陌”这一重要改革诬蔑为“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

孟子还倡“性善”说，说人的本性是“善”的，这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是为了复辟奴隶制度，反对奴隶和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斗争的花招。

〔道家 老子 庄子〕 道家以老子为祖师。史书关于老子的记载不很清楚。司马迁说他姓李名耳字聃，楚国人，约与孔子同时。老子《道德经》一书约成于战国时期。

老子认为宇宙起源于“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谓“道”，不是物质，而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就是“无”。他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论。《道德经》也用了许多对立概念来说明自然或社会事物的矛盾、相互依存及其转化关系。例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因素。

老子认为剥削阶级不能仅仅依靠刑罚来统治人民，他

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善为道者，非次明民，将以愚之。”他主张实行愚民政策，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甚至要人民“复结绳而用之”，不用舟车器具，要恢复到“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中去。老子的这种思想就是所谓“无为”而治。他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sup>①</sup>这反映了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消极悲观思想。

庄子是战国中期道家的代表人物，名周，宋人，著有《庄子》一书，十余万言。

庄子也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但“道”不是物质，而是“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庄子·天道》）的宇宙精神。这也是客观唯心主义。庄子的方法论是相对论，他认为一切都是相对的，他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殒子，而彭祖为天。”（《齐物论》）

庄子的思想也是消极悲观的，他认为“百家争鸣”没有意义，人生只是一场梦，不如死了痛快。他反对一切文明，反对一切进步，反对一切新事物。他说：“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擿珠毁玉，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殄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胠篋》）庄子也主张“无为”而治。

〔墨家 墨子〕 墨家的创始人是墨子。墨子名翟，鲁

---

① 以上均引自老子《道德经》。



人，生于春秋、战国之际。《墨子》一书，基本上保存了墨家的学说。

墨子的学说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中的小地主阶层的思想。在政治上，反对世卿世禄制度，主张选贤举能。他认为当时最大的社会问题是“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说这是“三患”。（《墨子·非乐》上）他认为如果“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就可以稳定封建统治，这是一种不能实现的空想。

墨子还主张“兼爱”，反对战争，反对统治集团的腐朽生活，反对厚葬。墨子信天信鬼，认为天和鬼能赏善罚暴。他说夏桀、商纣、周厉王、幽王虽为帝王，但因暴虐百姓而受到鬼神的惩罚。

墨者（墨家的信徒）多半是劳动人民，生活比较艰苦朴素。墨子死后，墨者的领导称为钜子，领导墨者的活动。墨者组织严密，严守家法，实行教义，分财互助，在庶人中影响较大。

〔法家 荀子 韩非〕 法家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一个学派，前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是李悝和商鞅，后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是荀子、韩非和李斯。

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年）名况，战国末年赵国人，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启蒙运动者，时人尊称他为荀卿。他曾在齐国任祭酒，又曾游历过秦、赵、楚等国，还在楚任过兰陵令。后去官著书，著《荀子》三十二篇。

荀子是由儒家转变为法家的。他反对儒家的“法先王”，认为“法先王”是“呼先王以欺愚者”（《荀子·儒效》），

就是欺骗群众。他倡导“法后王”，主张根据当时的情势，制定相应的政策、策略。他对于“礼”也有新的解释，他说：“礼者，法之大分，群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荀子所说的礼，具有法的内容，对于劳动人民，尤强调法治，他说：“法者，治之端也”（《荀子·君道》）。

荀子还大讲“富国强兵”之道，主张实行土地私有制，“农分田而耕”，行什一之税，关市讥而不征，开山林泽梁而不税，促进财物粟米的交流，使“四海之内若一家”。这些政策策略思想都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与要求。

荀子对于代表地主阶级的统治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也有所论述。他主张在对人民实行法治的同时，也要“惠之”，只有这样，才能使“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否则，“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他说：“君者，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复舟。”（《荀子·王制》）这是他对新上台的封建统治者提出的一个警告。

荀子反对“性善”说，他说所谓“性善”是虚伪的，他认为人性是“恶”的，是受那个正处在变革的时代和人们的社会实践决定的。只有加强法治，天下才能太平。这个理论也是符合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的。

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2年）出身于韩国的贵族，和李斯同是荀子的学生。他总结继承了前期法家和荀子的思想，集春秋、战国以来法家思想之大成。他曾以修明法制、富国强兵之策说韩王，未被采用，于是退而著书，作《孤愤》、《五蠹》、《内外储》等共约十余万言，后合成《韩非子》一书。

韩非有着明显的进化论的历史观，认为人类的文明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他对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批判。他说孔、孟大谈“先王之仁义”，无益于当今之世；“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韩非子·显学》）。主张“废先王之教”，“论世之事，因为之备。”还反对贵族把持政治，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新的封建官僚制度，君主以“术”驾驭群臣，“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韩非子·定法》）。实行严格的法治，要“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韩非子·定法》）。

还主张推行“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的政策，鼓励封建制度下的农业经济的发展，鼓励人民为封建国家效劳。

他为了加强封建思想的统治，指斥法家以外的各家都是杂学，他说：“今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安得无乱乎？”（《韩非子·显学》）又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他主张“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就是要罢除百家，独专法家。

韩非的主张在韩国未被采用，可是当秦王政在秦国读到韩非的著作后，十分赞赏，强迫韩王派韩非入秦。不幸在秦为李斯等人谋害了。韩非的一些重要主张在秦统一六国后，为始皇和李斯推行全国。

## 二、史学 文学 绘画

〔史学〕 战国时期最著名的历史著作是《春秋左氏传》，相传是春秋、战国之际的学者左丘明所撰。《左传》

以《春秋》为纲，博采各国史事，编次成书，保存了丰富的历史资料。

《国语》传说也是左丘明所撰，分国记载了春秋各国的史事。《战国策》是各国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论的汇编，也保存了大量的史料。《竹书纪年》是魏国的编年史，直到西晋初年才发现。《世本》一书记载了战国和战国以前许多国君、贵族的世系和都邑等。这两本书在宋代以后失传，现存有后人的辑本。

〔文学〕 战国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是《楚辞》。《楚辞》是用楚国的方言写成的诗歌，屈原的著作是《楚辞》的代表。

屈原名平，生于公元前三三九年，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他想改革楚国腐朽残暴的贵族统治，还想对外联合齐国抵抗秦国，他有由楚国来统一中国的抱负。可是，楚国政治黑暗，他的政治主张得不到采用，又曾被怀王和顷襄王两次放逐江南。著名的《离骚》就是他在放逐中的抒怀之作。传说《九歌》、《天问》、《九章》、《招魂》等也是他的作品。

屈原的作品是采用了楚国民间诗歌的形式，吸收了《诗》三百篇中的某些成果和民间文学的养料，加以发展，运用了丰富而美丽的神话，生动而形象地表达了他对祖国的热爱和对腐朽的贵族的愤怒，使语言艺术达到一个新的阶段。不过这些作品的内容充满了悲哀、忧郁的情绪，也反映了他的封建贵族的思想感情。

〔绘画〕 战国时期，在官府和官僚、地主第宅的墙壁、门户上，多绘有人物、鸟、兽、云、龙等等，有专业画

师。《韩非子·外储》说：有画师为周君画筮，三年而成，君观之，“尽成龙蛇禽兽车马万物之状”，周君大悦。屈原被放逐，也看到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僂僂，及古圣贤怪物行事”。<sup>①</sup>秦统一后，这种情况更有发展。陆贾说不仅秦始皇好作高台榭，广宫室，天下的豪富也做之，“设房闼，备廡库，缮雕琢刻画之好，博玄黄琦玮之色”<sup>②</sup>。

战国时期的漆器上也多饰有彩绘，有人物、鸟兽、神怪等花纹图案，线条刚劲，造型精致。长沙楚墓中出土的一幅帛画，上面画有夔、凤和妇人，是象征善灵战胜了恶灵，生命战胜了死亡，和平战胜了灾难的作品。线条匀称有力，布局工巧古雅。

### 三、科学技术

〔天文 历法〕 春秋时期，各国使用三种不同的历法，以冬至月为正月的叫做“周正”，以冬至后一月为正月的叫做“殷正”，以冬至后二月为正月的叫做“夏正”。“夏正”最符合于四季气候的变化，最便于农业生产。到战国时期，“夏历”被普遍采用，基本上保存了“夏历”的《夏小正》<sup>①</sup>一书也在此时成书。

上述三种历法都是阴阳合历，阴历纪月，阳历纪年，以闰月调和阴阳历间的差距。常年十二月，置闰为十三月。《诗》中记有火、箕、斗、牛、室、昴、毕等星宿名称。

---

① 王逸，《楚辞·天问·序》。

② 陆贾，《新语·无为》。

《周礼·春官·冯相氏》有“掌二十八星之位”的记载。《吕氏春秋》一书中有二十八宿的名称。这说明了至少到战国时期，已定出二十八宿的方位，这样就可以比较准确地推算出一年中的重要季节来。

战国时期，已有许多专门观测星的运行的占星家。齐人甘德著《星占》八卷，魏人石申著《天文》八卷，精密地记录了黄道附近的一百二十个恒星的方位和这些恒星距北极的度数，用来观测木、火、金、水、土五个行星的运行，并发现了这五个行星运行的规律。他们所测定的恒星的记录，是世界上最古的恒星表。后人将他们两个人的著作合编为《甘石星经》。

〔医学〕 战国时期，医学进一步发展。《周礼·天官·冢宰》的属官有医师、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等。民间医生，也有带下医（妇科医生），小儿医、耳目痹医等。这说明了当时的医学分科已相当细了。

扁鹊姓秦名越人，齐人，是当时极有名的医生，兼通内、妇、五官、小儿等病理和方剂、针灸等技术。据说他诊病，“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问病之阳，论得其阴，问病之阴，论得其阳。”他治病兼用汤熨、针石、酒醪等。他曾周游列国，为人诊病。著名的医书《黄帝内经》十八篇，分《素问》九篇和《灵枢》九篇，《素问》论述脉治病证，《灵枢》论述针刺。扁鹊著《难经》

---

③ 《夏小正》是《大戴礼记》的一个篇名。《隋书·经籍志》于《大戴礼记》之外，又别出《夏小正》一卷，从此开始有《夏小正》之别本。

八十一篇，以问难的形式发明《内经》本旨。这些著名的医学著作总结了我国几千年的医学实践的丰富经验，是中医学的重要经典。

## 第四章

# 两汉 地主经济的发展 黄巾大起义

### 第一节 西汉 地主经济的发展 专制 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

#### 一、西汉初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

毛主席教导说：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西汉王朝是以刘邦为首的地主集团篡夺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而建立起来的，是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复辟。早在公元前206年（汉元年）五、六月间，刘邦由汉中还定三秦（雍、塞、翟）后，就在关中重建地主政权，政治、经济制度基本上沿用秦制，从地主分子中选拔年在五十岁以上的人为乡三老和县三老，依靠地主豪绅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汉朝建立后，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消灭农民反抗势力〕 西汉初年，人民仍然大量流亡，有的在继续进行反抗地主的斗争。官府控制的户口，不过占实有人口的十分之二、三。汉五年，刘邦令“聚保山泽，不书名数（没有户口）”的人，一律返回原籍，要地方



官吏对这些人严加管教。这是用所谓“招抚”的办法，继续消灭农民反抗势力。

〔掠夺农民的田地〕 农民战争推翻了秦王朝，打击了地主阶级，大量的田地回到农民手中。汉王朝建立，把苑囿、公田、山林川泽攫为皇帝所有，贵族、官僚直到地方小吏都利用职权侵夺土地，相国萧何一个人就侵夺民田宅值数千万钱。刘邦又推行“有功劳行田宅”的政策，为他争夺天下的大小将吏都成为军功地主。刘邦还下令，逃亡地主回乡，“复故爵田宅”，新、老地主在封建国家的支持下，疯狂掠夺农民的田地，许多农民又陆续破产。

〔恢复赋税剥削〕 刘邦为了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是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很早就恢复了赋税剥削。

人口税：公元前203年（汉四年）八月，还在楚汉战争激烈之时，就开始征收算赋，男女十五至五十六岁，每年每人一百二十钱；刘邦称帝，即开始征收献费，每人每年六十三钱；口赋，每个儿童（七至十四岁）每年二十钱；更赋，男子二十三至五十六岁之间，要服兵役两年，此外，每人每年要在本郡服役一个月，不服役的，每月出钱二千；上述男子每人每年还要戍边三天，不服役的，出钱三百。人口税名目繁多，数量极大，对于贫苦农民是极大的负担。

田租：刘邦时为“十五税一”。

〔恢复残酷的刑罚〕 西汉初年，新上台的地主集团为了加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统治，由萧何主持编制了《汉律》九章，基本上恢复了秦法，其中残酷的刑罚极多。文、景时期，为笼络人心，曾一再声称减轻肉刑，削改为笞三百，斩左趾改为笞五百，斩右趾改为弃市。前两项，“罪

人”往往被笞死，第三项是肉刑变死刑。这种所谓“减轻刑罚”，在当时，就有人说这是“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

从以上的事实来看，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没有什么“让步政策”。

## 二、巩固地主统治和恢复地主经济的措施

西汉初年，在长期战争之后，大城名都人口散亡，农村田园荒芜，府库空虚。《史记·平准书》记载当时的情况说：“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刘邦为了巩固他的地主政权，稳定封建社会秩序，恢复发展地主经济，适应当时的社会状况，制定了“无为而治”的政治方针，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

〔所谓“无为而治”〕 刘邦集团上台后，认为秦尚法治是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陆贾说：“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新语·无为》）陆贾提出了一套“无为而治”的理论，主张不要“极武”，不要“用刑太极”，要使用镇压和欺骗两手政策。刘邦十分赞赏陆贾的建议，把陆贾的建议十二篇合为一书，号曰《新语》，刘邦及其子孙在数十年中一直以《新语》的思想指导政治，集中力量巩固他们的统治，恢复和发展地主经济。地主阶级的无为实是“有为”。

〔实行郡国并行制度〕 刘邦集团认为秦败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分封子弟为藩辅，因有“孤立之败”。刘邦实

行郡国并行制度，距离中央近的地区（主要是旧秦国的全部和魏、韩的大部地区），划分为十五郡，置守、尉，直隶中央。较远地区（主要是旧赵、燕、齐、楚等地区），自北而南分封为燕、代、齐、赵、梁、楚、吴、淮南、长沙九个诸侯王国，八国是“同姓王”，都是刘邦的子弟，只有长沙王吴芮是异姓王。诸侯王掌治其国，除丞相由中央委派外，诸侯王自置御史大夫、内史、中尉、卿大夫，和中央的机构差不多。在诸侯王之外，还封功臣和亲属一百四十多人为列侯，大侯食万家，小侯食五、六百户。侯的封邑分散在郡和王国中。

〔由“重农抑商”到“修卖爵令”〕 西汉初年，社会经济凋弊，商贾乘机囤积居奇，操纵物价，物价腾贵，米至万钱一石，马百金一匹，这就干扰了刘邦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的措施。刘邦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就推行“重农抑商”政策，限制商贾不得穿华丽讲究的丝、毛、葛织品，不得携带兵器，不得乘车、骑马，商贾的子孙不得为官吏，对商贾加倍征收算赋（商贾每人两算，为二百四十钱），刘邦还迁徙旧齐、楚、燕、赵、韩、魏六国贵族和商人到关中等地，削弱地方势力。这些措施的推行，虽曾收到一些效果，可是，商人的投机活动仍不断加剧，人民生活日益贫困。前168年（文帝前十二年），政论家晁错指出，当时的农民“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汉书·食货志》上）“重农抑商”政策至此时，实际已行不通了。

晁错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及抵御匈奴的需要，建议实行

“卖爵令”，就是“入粟拜爵、除罪”。国家富足了，可减免赋税。他认为这一政策实行后，“富人有钱，农民有钱，国家富足。”为了北防匈奴，入粟者先入于边郡，边郡粟足支五年，再入内地郡、县。

文帝推行了这一政策，当年即减田租，三十而税一，第二年，又免收天下田租，直到前156年（景帝元年），才复收田租，仍三十税一。文帝还减算赋为四十钱，减徭役“三年而一事”。又“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任民樵采”。

“修卖爵令”和这些所谓的“轻徭薄赋”措施，使商人地主的政治地位日益提高，土地兼并、开山鼓铸也合法化了。东汉史学家荀悦说：“官收百一之税，民输大半之赋。……文帝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豪强。”<sup>①</sup>所谓“轻徭薄赋”对广大农民没有什么好处，可是对田连阡陌的豪强地主最有利。商人地主把卖爵的钱粟转嫁到农民头上，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

〔对匈奴、两越的政策〕 秦朝末年，匈奴贵族乘中原战争，侵入长城以南的鄂尔多斯和山西北部，劫掠人口财物，威胁黄河流域。刘邦灭项羽后，亲率大兵三十二万北击匈奴，至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被匈奴四十万骑困于白登山，后突围而出，匈奴仍一再骚扰北边各郡。刘邦无力抗击匈奴，就采纳娄敬的“和亲”建议，“取家人子为公主，妻单于”，每年又奉献给匈奴絮、缯、酒、米及其他物品极多。此后，惠帝、吕后、文帝、景帝都对匈奴奉行“和亲”政策，但匈奴的侵扰仍极严重，经常烽火通于甘泉，汉王朝

---

<sup>①</sup> 徐天麟：《西汉会要》卷五十一《食货》二。

时时处于严密戒备状态。

秦末农民大起义时，原秦南海郡尉赵佗起兵，占据了南海、桂林、象三郡，自称南越王。东瓯王摇、闽越王无诸也起兵反秦。西汉建立，无力统一岭南和浙、闽地区，就承认赵佗为南越王，复立无诸为闽越王。惠帝三年，又立摇为东海王（或称东瓯王）。南越、闽越、东瓯在名义上臣属于汉，实际是三个封建割据势力，有时还侵扰内地。

刘邦和他的子孙认为“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革”，国家力量虚弱，采取这样的政策，可以减少一些徭役和物资耗费，对稳定和巩固他们的统治有利。

### 三、社会经济的发展

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的反动统治，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广大农民获得了一些土地，自耕农较多，封建的剥削和奴役有所减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在他们的艰苦劳动下，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发展。

〔农业〕 铁农具的改进和广泛使用，牛耕的普遍推广，是农业生产技术的一大进步。

西汉前期，私营铁冶业发展迅速，铁农具获得改进，品种增加，主要铁农具有犁、锄、耜、镰、矩镰等，还有与农业生产有密切关系的斧、镑、锯、凿等手工工具。西汉中期以后，铁农具的进步更为明显，使用面更广。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不仅中原地区出土的铁农具较多，四川、湖南、甘肃、辽宁等距离中原较远的地区也有很多的铁农具出土，这些农具有地方特点，质量也较好，是根据当地生产的需要制造的。

主要耕畜是牛和马。西汉初年，封建国家鼓励养马，私家养一匹马，可免三个人的徭役，马的数量增加很快。西北边郡和江南地区乃至今广东、广西等地，也用牛、马耕田。

土壤学、作物学的知识已相当丰富。广大农民在辨土、施肥、选种、田间管理等各个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传说武帝时的搜粟都尉赵过曾推广代田法。代田法是西北地区农民适应当地自然条件的需要而创造的一种比较科学的耕作方法。以宽一步（六尺）长百步的一亩田地为例。纵分田地为三刚、三陇，刚、陇各宽一尺，布种于刚中，苗长高，一再用陇土培固根部，作物能耐风旱。第二年，刚、陇互换其位，以调节地力。据说，这样的耕作，用二牛三人，每年可耕种五顷地，亩产量增加一斛以上，多的可增加两斛或更多一些。赵过还推广用耒播种的技术，耒有三个铁制耒足，一牛拽引，一人扶耒播种，日种一顷。

西汉后期，汜胜之总结了当时的农业生产经验，写成《汜胜之书》，其中最突出的生产经验是区田法和溲种法，其次如耕田法、种麦法、种瓜法、种瓠法，都是当时的先进经验。此外如穗选法、控制水流调节稻田水温法、桑苗截干法等，也是先进的农业技术。区田法是适应山岭阪坡地区和城邑附近土地狭窄地区的耕作方法，因地制宜，以窝种和沟种为主，集中使用粪肥，灌溉方便，产量很高，产量比较有保证。区田法对于种禾、黍、麦、大豆、荏（苏子）、胡麻、瓜、瓠、芋等，都很适用。他在“耕田法”中说：“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这是有相当科学价值的农业生产方法。

武帝时，封建国家对于人民的控制加强了，府库充裕起

来，随着漕运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就征调大量的劳动人民兴修水利。

前129年（武帝元光六年），在水工徐伯的主持下，开始凿修漕渠，三年竣工。过去的漕运由黄河经渭水至长安，长九百余里，需时六个月。漕渠凿成，运程只有三百余里，漕运时间也减少了一半，还可灌溉田地一万余顷。前132年，黄河自瓠子（今河南省濮阳县南）决口，氾滥十六郡，为害极大。前109年（元封二年），堵塞决口，消除了水患。在这一时期，朔方、西河、陇西、酒泉等郡都开渠引黄河或川谷的水溉田，汝南、九江等郡引淮水溉田，泰山下引汶水溉田，其他新开水渠、陂池很多，溉田各在数千顷或万顷以上。

关中的新渠有灵轱、成国、沛渠、六辅渠等，其中以前195年（太始二年）开凿的白渠最著名。白渠起谷口，入栎阳，引泾水，注入渭水，与郑国渠平行，长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当时的歌谣说：“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耜为云，决渠为雨；水流灶下，鱼跳入釜；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

也有一些水利工程徒伤民力，劳而无功。如河东之渠，“田者不能偿种”；穿褒斜道五百余里，“水湍石，不可漕”。在洛水附近开的龙首渠，有的段落由于易坍塌，就用凿井的办法代替开沟，井与井间有水流通，叫作井渠，这条渠在开凿技术上有所创造，可是每年用工万余人，费了十余年的时间开成后，“犹未得其饶”。当时的水利虽有发展，但统治阶级滥用民力的情况也是严重的。

农业的单位面积产量各地都有提高。耕地面积迅速扩

大，人口增长也较快。据西汉末年的官方统计，全国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千三百三十六顷，民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户，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口。实际的垦田和户口数字可能更多一些。

〔手工业〕 西汉时期的主要手工业有冶铁、铸钱、煮盐等，主要劳动者是僮和刑徒。文献记载，西汉初年的冶铁家蜀卓氏，“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蜀的程郑有僮八百人；宛的孔氏，“家致富数千金”；曹的邴氏，“富至巨万”。这些人往往兼营商业、高利贷和土地剥削，诸侯王中的吴王、齐王等也设置铁官经营冶铁，获利极厚。

冶铁私营时，商人为了产品行销容易，赚钱多，比较注意产品的质量，注意技术的改进，冶铁业发展较快。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收盐、铁、铸钱归国营，在产铁地置铁官采冶，不出铁的郡、县置小铁官，收集废铁改铸。《盐铁论·水旱》说：“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又说：“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与民。”冶铁业归封建官府经营，弊病很多，阻碍了冶铁业的发展。武帝以后，冶铁业时而官营，时而民营，没有定制。

西汉一代的冶铁技术有很大进步。解放以来，在许多地区发现了一些西汉的冶铁遗址，规模较大的如南阳和巩县两处，都有矿坑、冶炼工场和工人居住的房址，以及从开采矿石到制出成品的全部生产设备。燃料除木柴外，还有原煤和煤饼。巩县铁生沟的冶铁遗址有淬火坑。淬火处理是西汉冶铁工人的一项新的技术成就，进一步提高了锻造铁器的硬



度。

西汉后期，铁器皿和铁兵器已基本上代替了铜器皿和铜兵器，产品除农具外，还有灯、釜、炉、剪、刀、铁镜等生活用具和长剑、长矛、环首大刀、铁戟、铁斧、勾鑕等兵器。

铜器手工业仍在发展，主要是制造生活用具。1968年在河北省满城县发掘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子窦绾两座墓葬，出土的成套青铜生活用具都很精致，其中的鎏金长信宫灯铸一宫女手持罩灯，造型工巧，可以转动照明。

纺织业也是当时的主要手工业。家庭纺织业依附于农业。官纺织业为皇室和官府织造服装，规模最大的有临淄的“三服官”，用精细的丝织品裁制冬、夏、春、（秋）三个季节的服装。元帝时，三服官各有数千织工，一年花费数亿钱。陈留郡襄邑县（今河南睢阳县）也设有服官，专造礼服。京师长安设有东、西织室，为皇室纺制衣物，每年花费各在五千万以上。1972年春，在湖南省发掘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是西汉初长沙国相利仓或其儿子的家属。随葬的丝织品有绢、罗纱、锦、绣、绮，花色有茶褐、绛红、灰、朱、黄棕、棕、浅黄、青、绿、白，制作技术有织、绣、绘，花纹有各种动物、云纹、卷草、变形云纹以及菱形几何纹。纱料质轻而薄，犹如现在的尼龙纱，其中有件素纱单衣身长一二八厘米，袖通长一九〇厘米，重量仅四九克（约合一市两）。

民间纺织业的技术水平也很高。《西京杂记》记载，涿鹿人陈宝光夫妇发明织花机，用一百二十镊，能织出各式各样的花纹。

漆器业有很大的发展。西汉王朝在蜀、广汉都设有工

官，专造皇室、贵族使用的漆器和金银钗器，每年各花费五百万钱。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漆器一百八十多件，中有耳杯、盘、鼎、壶、觚、盒、屏风。器胎有木质、夹紵、竹质，多在漆面上绘有草叶、花瓣、云气、动物等图案，质地轻巧，造形美观，色泽光洁，工艺水平很高。制造漆器工序复杂，《盐铁论·散不足》说：“一杯椽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贵州清镇出土的一件耳杯，上有铭文：“元始三年，广汉郡工官造乘輿髹泪（雕）画木黄耳椽（杯），容一升十六籥。素工昌、休（髹）工立、上工阶、铜耳黄涂工常、画工方、泪（雕）工平、清工匡、造工忠造、护工卒史恽、守长音、丞冯、掾林、守令史谭主。”铭文中刻有制造的时间、规格、工匠和监造官吏的名字，这是为了检验产品质量，督责工匠。当时，不仅皇室、贵族用漆器和钗器，一般官僚、地主、商人也大量使用。贫困的劳动人民仍然使用粗糙的陶器。

〔商业〕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发展也很快。自战国以来，在全国范围已形成了若干个经济区，每个经济区有一、二个经济中心。关中是当时最富庶的经济区，长安是这一地区的中心。漳河区的邯郸，勃碣区的燕，海岱区的临菑，梁宋区的陶、睢阳，西楚区的江陵，东楚区的吴，南楚区的寿春，扬越区的番禺，颍川、南阳区的宛，河南区的洛阳，巴蜀区的成都，都是一个地区的经济中心。在一个区域中，物资从“四方辐凑，并至而会”于中心城市，中心城市有一定的调节、沟通各地经济关系的作用。各区域之间，有经济往来。中原与边疆各民族之间，也有交易关系。商贾有的开设市肆，有的船载车运，周游四方，从事贩

卖。司马迁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又说：“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命曰素封”。这些商人勾结官府，私养打手，兼并土地，奴役人民，称霸地方。这样的商人地主“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 四、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

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郡国并行制和黄老无为的政治思想已不再符合统治集团的要求，从文帝时开始，政治上一再加强中央集权，以强化对农民的统一统治。

〔推行削藩策 平定七国之乱〕 诸侯王和中央的矛盾，也就是分裂割据和中央集权的矛盾，是西汉前期的一个严重矛盾。文帝初年，诸侯王势力强大，中央不能控制。政论家贾谊上《治安策》说：不加强中央的“权势法制”，“必为钢疾”。他建议“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文帝接受了这个建议，分齐为六国，封齐王刘肥的六个儿子为王，分淮南为三国，封淮南王刘长的三个儿子为王。

景帝时，中央和诸侯王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御史大夫晁错上《削藩策》，建议诸侯王犯罪，削减他们的封区。他说：“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共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景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于公元前154年（景帝前三年），削楚王戊东海郡，削赵王遂常山郡，削胶西王卬六县，削吴的会稽、豫章两郡。削吴的诏书刚到，吴王濞就串通楚、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等共七国，举兵反叛，史称“七国之乱”。吴王濞发兵二十万为主力，派人

与匈奴、东越、闽越勾结，以讨晁错为名，举兵西向。这就是历史上的“清君侧”的丑剧。景帝仓惶杀了晁错，乞求刘濞退兵。刘濞有夺帝位的野心，拒不退兵，继续西进。至梁（今河南省商邱县），为景帝弟梁王武所阻。景帝命太尉周亚夫、大将军窦婴将三十六将军，屯于滎阳、昌邑（今山东省金乡县西北）一带，派轻骑绝吴、楚兵的粮道，断其辎重。吴、楚兵缺粮，周亚夫出精兵猛攻，大破吴军。吴王逃到东越，为东越所杀，其余六王皆自杀，王国也被废除。“七国之乱”前后三个月即平定。

七国之乱后，景帝取消了诸侯王治国的权力，大小官吏都由皇帝委派，削减王国官制，改丞相为相，省御史大夫、廷尉等官，王国势力进一步削弱。

前127年（元朔二年），武帝又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下“推恩令”，分诸侯王的户邑以封其子弟为侯，侯归郡统辖，这个办法使王国越分越小，中央的辖区日益扩大。这时，淮南王安、衡山王赐又招结宾客，准备兵器，阴谋反叛。前123年（元狩元年），武帝下令逮捕了二王，二王皆自杀，列侯和大小官吏宾客牵连被杀的有数万人。二国废为郡。武帝制定“左官之律”和“附益之法”，限制诸侯王的活动，诸侯王“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又废除内史，以王国相治民，职掌和郡太守相同。

元鼎五年（前112年），武帝祭宗庙，要列侯献酎金助祭，又以列侯所献酎金分量不足，成色不好为借口，废列侯一百零六人。此后，还以种种罪名废掉一些侯国。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武帝时，由于封建经济的恢复、发展和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也

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当时董仲舒认为先秦的维护奴隶制的儒家思想只要稍稍加以改造，就完全能够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因此，他根据《春秋公羊传》的思想，提出“天人三策”，建议武帝“更化”，以儒家思想指导政治，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还建议兴太学，规定郡国每年推选吏民二人至京宿卫，以供选拔官僚。这些建议得到武帝的赞赏，并被采用。

武帝罢逐治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责斥他们为“乱国政者”。又“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从此，儒家学说成为西汉一代的统治思想，孔子这个偶像被树立起来。

前136年（建元五年），兴太学于长安，置五经博士<sup>①</sup>。前124年（元朔五年），招第一批博士弟子五十人，还有“如弟子”若干人，与博士弟子一同受业。这些人都是官僚、地主的子弟。每年考试一次，优秀的补为郎中、文学、掌故。太学逐年扩大，至西汉末成帝时，有弟子三千人。郡（国）、县也办学校、授五经。

西汉前期，有任子、警选和临时征召（贤良、方正、能言、极谏者）制度，选拔官僚、地主子弟为郎、郎中、中郎，可以补官。武帝于前134年（元光元年）设孝廉一科，

---

<sup>①</sup> 为《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

从郡国选举孝、廉各一人。孝廉一科成为此后的尚书、侍中、侍御史和刺史、守、令的主要来源。此外还设特科选拔所谓茂材、异等、贤良、方正、文学、材力等为官僚。孝廉和特科选士都是以儒家经典及其道德规范为标准。

汉武帝选用儒生的标准是“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汉书·循吏传》）公孙弘所以得到武帝的重用，就因为他“习于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史记·平津侯列传》）这是封建地主阶级用两手政策以统治人民的突出标志。

〔中朝的形成 部刺史的设置〕 西汉前期，丞相都由列侯充任，总领政务，权力极大。武帝即位，削弱丞相的权力。前124年（元朔五年），公孙弘以布衣为丞相，权力更弱。原属少府的尚书的权力加大，大臣的章奏需先上尚书，由尚书进于皇帝。

武帝又选贤良、文学如严助、朱买臣、主父偃、严安等为郎，加以侍中、给侍中、常侍等头衔，出入宫廷，在皇帝左右，与尚书共同参议朝政，成为决策机构，这就是“中朝”，或称“内朝”。丞相和公卿只受成事，成为执行机构，这就是“外朝”。尚书的权力日重，大臣参预中枢，必须加“领尚书事”或“平尚书事”的头衔。

西汉初，省监御史。武帝分全国为十三州部<sup>①</sup>，每个州部设刺史一员，直属御史大夫，“以六条问事”，一条规定监察强宗豪右，五条规定监察郡守、尉和王国相。前89年（征

---

<sup>①</sup> 冀、幽、并、兖、徐、青、扬、荆、豫、益、凉、交趾、朔方十三州部。

和四年），又设司隶校尉，为京官兼地方官，掌纠察京师百官（包括丞相）和三辅（京兆、冯翊、扶风）、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弘农七郡，可以直接弹劾三公。这个监察制度比秦代严密得多，进一步加强了皇帝对于整个官僚机构的控制。

〔设置八校尉和期门羽林军〕 西汉初年，沿用秦的征兵制度，男子二十三岁始服役，一年为卫士，屯戍京师，一年为正卒（分为材官、骑士、楼船），在本郡。服役期满复员后，每年在本郡服役一个月，每年戍边三日，称为更卒或卒更。不服役的，更卒出钱二千，叫做践更，不戍边的，出钱三百，叫做过更。这就是“更有三品”，年五十六才免役。正卒在各郡、县习骑射、战阵，每年八月由守、尉、令、长举行都试，考察训练情况。守、尉、令、长有训练士卒之责，但无权发兵，兵权集中于皇帝，发兵以虎符为验证。

京师有两支军队，南军守卫宫城，由卫尉率领；北军守卫京师长安，由中尉率领，南北军各有两万人，由各郡、县征调，一年更换一次。皇帝另有侍从若干人，称郎或郎中，归郎中令掌管。

汉武帝为了加强对于自己的保卫，在登位不久（建元三年，前138年），即把侍中、常侍、武骑及待诏陇西、北地等六郡的良家子能骑射者，组成一支约千人的侍从军，叫做“期门”。太初元年（前104年），又选六郡良家子组成另一支侍从军，宿卫建章宫，称建章营骑，后更名“羽林骑”。又收战死军士的子弟于羽林官，教习战射，号羽林孤儿。为了加强京师的警卫，增强皇帝的军权，于前111年

(元鼎六年)设置八校尉，每个校尉有士卒七百人，常驻京师，也随时应调<sup>①</sup>。八校尉士卒由招募而来，这是中国古代募兵制的开始。这些侍从军和“禁卫军”后来发展为西汉王朝的军事主力，经常用来镇压各族人民和对外战争。

〔改革财政 垄断盐、铁、铸钱〕武帝改革财政，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封建国家的剥削收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财政基础；还有在政治上削弱地方势力，抑制土地兼并加强中央集权的意义。桑弘羊说：“令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盐铁论·复古》）协助武帝进行改革的有商贾家庭出身的桑弘羊、大盐商出身的东郭咸阳和大铁冶商出身的孔仅。

武帝改革财政的第一项重要内容是改革币制。西汉前期，币制经常改变，刘邦用荚钱，高后用八铢钱，又改用五分钱，文帝用四铢钱，文曰“半两”，武帝初用三铢钱，又改用半两钱。郡、国得自铸货币，商人、地主又可仿铸，以致货币大小、轻重、质量、规格极不统一，对于商业交换和赋税剥削都有极大的妨碍。前115年（元鼎二年），武帝下令，由上林三官<sup>②</sup>铸五铢钱，作为法定货币，严禁郡、国和私人铸钱，非三官钱一律作废。五铢钱有周郭，式样规整，重如共文，流通方便，盗铸不易。这种货币比较稳定，一直沿用到三国时期。

改革的第二项重要内容是收盐、铁、酒归国营。中央和

① 八校尉为中垒校尉、屯骑校尉、步兵校尉、越骑校尉，长水校尉、射声校尉、虎贲校尉。

② 上林三官为钟官令丞、技巧令丞、辨铜令丞。



各郡、县都设有专管经营盐、铁、酒的官吏。见于《汉书·地理志》记载的，在二十七个郡国中，有盐官三十处，在四十个郡国中，有铁官五十处。盐铁丞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改革的第三项重要内容是实行均输、平准法。均输就是由官府贩运货物。起初，均输官只营盐、铁，不营其他物产。后来桑弘羊任治粟都尉（大司农），增设大农部丞数十人，分管各郡、国盐、铁、均输事，扩大了均输官的经营范围。均输官和商贾一样，以郡、国租赋购置货物，转运他方出售牟利，最后转运货物至京师，储于大司农。平准法是大司农利用剥削来的钱和物资，用贵时抛卖，贱时收买的办法，以图稳定京师物价。

财政改革后，国家的剥削收入大大增加了。《汉书·食货志》（下）说：“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汉武帝于前119年（元狩四年）实行算缗法，令商贾、手工业者、高利贷者，都向官府自报资产，每值二千钱，纳一算（一百二十钱），经营盐、铁、铸钱（时尚未归国专营）已向国家纳税的，其财产四千纳一算，商贾輶车一辆纳二算，船五丈以上纳一算。又规定匿财不报，或报而不实的，一经查出，判戍边一年，没入全部资产。有揭发的，得资产之半。还规定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不得占有田地，犯令的没入田僮。

算缗令下，豪富大家隐藏财产，不肯具报。前114年（元鼎二年），武帝重申告缗令，令杨可负责告缗事。《史记·平准书》说：“杨可告缗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

告”，国家没收的“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

告缗事件以后封建国家控制了大量的田地，水衡、少府、大农、太仆都置农官；经管官田，没入的奴婢，分到诸苑养狗马禽兽，或到诸工官从事于手工生产，长安诸官和苑囿有官奴婢十万多人，西、北边郡有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没收的其他财物充满了府库。

武帝的财政改革为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打败匈奴的侵扰提供了相当雄厚的经济基础。

〔严刑峻法 重用酷吏〕 为了镇压劳动人民，从景帝时起，就一再增补律令，并重用酷吏。武帝时，用张汤、赵禹条定律令，律令增至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一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官吏执法，律文冗繁，罪同论异，因缘为奸，“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史记·杜周传》）给人民造成极大的痛苦。

地方上的豪猾、游侠很多，他们宗族强大，宾客众多，为非作歹，杀人越货，称霸地方。这些势力和中央集权制有严重的矛盾。如济南郡聊氏，宗族三百余家，横行地方，郡守、尉不能制裁。景帝以酷吏邳都为济南太守，族灭聊氏首恶，都以功升任中尉。武帝继续任用酷吏，王温舒为河内太守，逮捕豪猾千余家，“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减（脏）。”

酷吏也是封建官僚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维护中央集权，曾经镇压过一些豪猾。但他们与豪猾、游侠在基本利益

方面是一致的。司马迁评论王温舒说：“温舒为人谄，善事有势者，即无势者，视之如奴；有势家虽有奸如山，弗犯，无势者贵戚必侵辱。舞文攻诋下户之猾，以焮大豪，其治中尉如此。”这反映了一般酷吏的真实面貌。任用酷吏，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酷吏“以恶为治”，“好杀伐行威，不爱人”，“重用豪恶吏”、“猾民”为爪牙，疯狂地屠杀、搜刮人民。宁成为济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义纵为定襄太守，一日杀四百余人。酷吏“多以权富”；王温舒为亭长出身，后家财累千金，杜周原为刀笔吏，仅有一匹马，后家财累数巨万。这些说明了酷吏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极大的。官僚（包括酷吏）致仕，往往成为地方上的豪强。如太仆灌夫罢官归乡，“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杰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内史宁成是个有名的酷吏，罢官归乡，有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

## 五、边疆各民族

西汉时期，边疆各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都有很大的发展，和汉族的关系日益密切。

〔匈奴〕匈奴在西汉初年，力量强大，东面臣服东胡，西面赶走月氏和乌孙，北面臣服丁零，南面屡侵汉的燕、代。匈奴全境分三个部分，代和云中郡以北，为单于的直辖区，称为“单于之庭”，以东为左贤王辖区，以西为右贤王辖区，由左、右贤王和左、右谷蠡王辅助单于进行统治。左、右贤王以下，有大小二十四长，大者万骑，小者数千骑。单于族为挛鞮氏，贵族还有呼衍氏、兰氏、须卜氏，世

官世职。劳动人民按家族编制，以射猎、游牧为业，逐水草迁徙，人人习骑射。

文、景时，为防御匈奴，徙民实边，输粟塞下，行“马复令”。武帝时决定反击匈奴，前133年（元光二年），以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同王恢、李广、公孙贺、李息四将军，率三十万士卒，部署于马邑谷中，另使马邑人聂翁壹以交换禁出物资并出卖马邑城以诱引单于，单于果然相信，以十万骑入武州塞（在雁门附近）准备抢劫马邑，后发觉汉有埋伏，急忙撤退。从此，汉匈之间展开了长期的战争。从前128年（元朔元年）到前119年（元狩四年）的十年中，共有大战三次。

第一次大战是在前127年（元朔二年）。匈奴二万骑入侵，杀辽西太守，虏数千人，围汉将军韩安国。汉使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雁门，李息出代，破匈败。第二年，卫青复出云中，至陇西，大破匈奴之楼烦、白羊王，收复河南地，设朔方、五原郡，徙关东贫民十万口实朔方，筑城设塞，解除了匈奴对京师长安的威胁。卫青以功封长平侯，后拜大将军。

第二次大战是在前121年（元狩二年）春，汉以骠骑将军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击匈奴，过焉支山千余里，杀折兰王、卢侯王，俘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等，收休屠王祭天金人。夏，霍去病将数万骑出北地，深入二千余里，踰居延（今甘肃省额济纳旗），至祁连山，俘王、相国、将军、都尉等。匈奴遭到这次打击，内部分裂，昆邪王杀休屠王，以四万人降汉。汉以其地设酒泉、武威，后又增设张掖、敦煌，发徙内地居民充实河西四郡。

匈奴被赶出河西，失掉水草肥美、冬温夏凉的牧区，退居北部沙漠。当时流行着一首怀恋河西的歌曲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四郡的设置，隔断匈奴与羌的联系，开辟了汉通西域的主要通道，在战略上有重大意义。

第三次大战是在前119年（元狩四年）春，匈奴各以数万骑入右北平和定襄郡，杀略惨重。武帝以卫青出定襄，霍去病出代郡，各将骑五万，步兵数十万，另有志愿从征者十四万匹马，粮食辎重还不计在内。卫青大破单于军，北至寅颜山赵信城而还。霍去病出代二千余里，大破左贤王部，至狼居胥山，临翰海而还。从此，匈奴北徙。汉自朔方西至今居（今甘肃永登县），以五、六万吏卒通渠屯田，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可是，汉在战争中损失士卒数万人，马十余万匹，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了。

宣帝时，匈奴又侵扰边郡，汉与乌孙合击匈奴，匈奴大败，分裂为五部，互相攻杀。呼韩邪单于降汉，南徙于长城一带，前33年（竟宁元年），元帝以宫人王嫱嫁与呼韩邪单于，汉、匈友好相处，六十年间没有战争。匈奴其他各部有的居漠北，有的西徙。

西汉前期，汉、匈之间有互市关系。就是在战争激烈的时期，互市也没有完全停顿。呼韩邪单于与汉和亲后，所部生活比较安定，经济、文化发展较快。在今包头市附近出土的“单于和亲”砖，文曰：“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乐未央”，可能是这一时期的遗物。在匈奴地区出土的很多汉制丝织品、汉式铜鼎、铁剑、漆器、陶器等等与匈奴的“鄂尔多斯”式的文化，如蝴蝶展翼状短剑、弧背铜刀、透雕动物

形象的铜饰牌等共存，这也证明了汉、匈民族和睦和文化交流的情况。

〔西域各族〕西域是我国古代对西部疆域的惯用名称。西汉初年，西域的概念是指今天的南疆，即“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阨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汉书·西域传序》）这里沙漠很多，国家多建在河流经过的绿洲上，本来有三十六国，后分为五十余国，大国二、三万人，最大的龟兹有八万人，小国数千人，最小的依附只有六百七十人。从事农业的为城郭国家，随畜牧逐水草而居，没有定处。西汉中后期，西域的概念扩大，包括了北疆和中亚及中亚以西以南的地方。

西汉初年，大月氏和乌孙同居于敦煌、祁连之间，乌孙后为大月氏所破，西徙伊列水（今伊犁河）流域，人口约六十三万人。文、景时期，大月氏又为匈奴所破，西过大宛，臣服大夏，建国于妫水（今阿姆河）流域。月氏的余部留在原地，号小月氏，与羌人杂居。

前138年（建元三年），武帝派张骞出使大月氏，欲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张骞在路上为匈奴所虏，匈奴以女嫁张骞，迫他变节投降。张骞在匈奴十余年，乘机西逃，行数十日到大宛，又经康居到大月氏。大月氏王以新迁地肥饶，生活安定，与汉相距太远，不愿共击匈奴，还归旧地。一年后，张骞沿南山（今昆仑山）东归，又为匈奴扣留。第二年，（前126年，元朔三年）匈奴内乱，张骞同匈奴妻及匈奴侍从堂邑父逃回长安。武帝以骞为大中大夫，后封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共历十三年，历尽千辛万苦，同行一百余人，只有

两人归还。他到过 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又了解到 旁边还有五、六个大国。他把这些国家的地形、物产、风俗介绍到国内，扩大了中国古代人民的世界视野，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是在前 115 年（元鼎二年）。这时匈奴昆邪王已降汉，河西四郡已设置。张骞以中郎将再使西域，想招乌孙回祁连、敦煌间，以断匈奴右臂。同行的有持节副使和随行人员共三百余人，以备遣至其他国家。张骞至乌孙，乌孙王因靠近匈奴，受匈奴的控制，又惧怕与汉相距太远，不知汉的大小、强弱，不敢与汉联合。张骞没有得到成果，乌孙使者数十人陪他回长安，赠给汉武帝良马数十匹。张骞的副使到过 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在张骞回长安的第二年，他们也多由各国的使臣陪同，相继回到长安。

此后，武帝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置使者校尉，驻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并在赤谷（今伊塞克湖南岸）等地置屯田机构，引水耕种。宣帝时，改使者校尉为都护，元帝又增置戊己校尉，屯田于车师前王庭。西域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更加密切。

西汉王朝在西域设置行政机构，促进了中国与中亚、西亚的经济、文化联系。当时，自中原经河西四郡通中亚，有两条通道：一条出阳关，经鄯善（今罗布淖尔附近）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过莎车（今新疆莎车），西踰葱岭，出大月氏，至安息（今伊朗及以西地区），西通犁靺（罗马共和国），或由大月氏南入身毒（今巴基斯坦和印度）；另一条出玉门，经车师前国（今新疆吐鲁番附近）沿天山南麓西

行，出疏勒（今新疆疏勒），西踰葱岭，过大宛，至康居、奄蔡。这就是著名世界的“丝绸之路”。汉王朝遣使者至安息、奄蔡、犁靺、条支、身毒等国，一年中，多时十余批，少时也有五、六批，一批多则数百人，少则百余人，携带金币帛等，近的数年返回，远的需八、九年才返回。当时输入中亚和欧洲的，除蚕丝和丝织品外，还有铁器、漆器等，铸铁、凿井技术也在这时西传。西方经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物产有良马、橐驼、香料以及葡萄、石榴、苜蓿、胡麻、胡瓜、胡豆、胡桃等。史书记载犁靺的眩目人（魔术师）、印度的佛教也在此时传入中国。

〔羌族〕 羌是我国西部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分布在今甘肃和青海的东部，四川的西北部。早在商代，羌族已和中原地区各族发生了经济、政治联系，春秋以前，仍以狩猎为主。春秋后期，逐渐转向农业和畜牧业。西汉初年，分为若干部，不相统属。匈奴南侵，臣服于匈奴。前121年（元狩二年），汉败匈奴右地，匈奴北徙，汉置酒泉、武威等郡，在湟水沿岸筑令居塞，隔断羌与匈奴的联系。前112年（元鼎五年），羌与匈奴又合兵十余万攻令居、安故，围枹罕（今甘肃临夏），第二年，汉以将军李息等率十万人击破羌、匈奴，匈奴北撤，羌人徙居青海湖一带。汉在湟中置护羌校尉，后又设置郡县，迁来内地汉人与羌族杂处。西汉末，汉在今青海境设西海郡。

〔乌桓鲜卑和东北各族〕 乌桓、鲜卑都是东胡的一部，传说在秦、汉之际，他们为匈奴所破，乌桓聚保于西喇木伦河北的乌桓山，鲜卑聚保在鲜卑山，都因地而得名。两个民族的言语、习俗和文化状况相近，以狩猎、畜牧为主，



逐水草而居，也种植一些作物，有稌和东墙等。手工业很少，妇女能刺韦，作文绣，织毼毼，男子能作弓矢、鞍勒。已有锻铁的手工业，主要作兵器。他们推举“勇健能理决斗讼者”为“大人”，各部落自营生产，阶级分化不很明显。每年向匈奴贡纳牛马羊皮若干。

武帝破匈奴左地，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置护乌桓校尉，联合抵御匈奴。昭帝时，乌桓渐强，汉以度辽将军范明友进击乌桓，从此乌桓常常侵扰幽州，战争较多。鲜卑在乌桓以北，与汉亦有来往。

在乌桓、鲜卑的东面和北面，还居住着朝鲜、高句骊、夫余、挹娄等民族。朝鲜族居住在鸭绿江流域和朝鲜半岛北部，以农业为主，传说在商代后期即与中原有往来。秦汉之际，中原地区长期战争，旧燕、齐、赵地区人民逃入朝鲜的达数万口。

高句骊在辽东之东，朝鲜之北，传为夫余别种，言语、文化多与夫余相同，居山谷间，以农业为主，有简单的手工业，能作金、银饰物和锦绣。武帝时，以高句骊地区为县。

夫余在高句骊之北，鲜卑之东，北有弱水，地方平敞，有二千余里，以农业为主，出名马、赤玉、貂貉、大珠等。能制弓、矢、刀、矛。西汉时，已建立奴隶制国家，官名有马加、牛加、狗加等。贵族死，杀人殉葬，有的殉人多达数百。国王葬时用玉衣，玉衣是汉朝赏赐的。官僚食饮用俎豆，也是受汉文化的影响。

挹娄在夫余东北千余里，跨今乌苏里江两岸，东滨大海，言语和夫余不同，有五谷、麻布和猪等，出赤玉、貂鼠。矢用楛，以青石为镞，没有金属器具。地处严寒，多穴居，阶

级分化不明显，部落各有大人，不相统属。自西汉以来，臣属于夫余。

〔两越〕 西汉前期，越人分为两大部分，即闽越（包括东瓯、闽越）和南越（包括南越、西瓯）。前138年（建元三年），闽越围攻东瓯，东瓯向长安告急，武帝以严助发会稽郡兵，浮海救东瓯，闽越退兵，东瓯请求内迁，以避闽越的侵袭。武帝迁东瓯于江、淮之间。

前135年闽越王又击南越。南越也向长安告急，武帝出兵击闽越，闽越王郢为其弟余善所杀，武帝立无诸孙丑为越繇王，另立余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前111年（元鼎六年），余善叛，杀汉三校尉，自立为武帝。汉遣兵陆海四路并进，余善败死，汉武帝又迁闽越人于江、淮之间。

南越在汉武帝时，其太子婴齐在长安宿卫，娶邯郸女子嫪氏。婴齐归南越继王位，立嫪氏为后。婴齐死，嫪氏子兴立，母子上书，“请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丞相吕嘉反对，杀嫪氏、兴和汉使，另立婴齐的越妻之子建德为王。前112年（元鼎五年）秋，武帝遣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以楼船（水兵）十万人分四路进攻南越，第二年，破番禺（今广东广州市），俘吕嘉、建德等，以南越地置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等九郡。

秦统一中国，在越人地区设置郡、县，越、汉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加多。铁器、大牲畜和先进文化技术由中原地区传进南越，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从在这一地区出土的属于西汉时期的文化遗物来看，贵族使用的文字、器物以及生活方式和埋葬制度，都和中原地区的相同。蟠螭纹、四山纹、四叶纹铜镜和盖上带三环钮的战国式铜

鼎，可能是从中原地区传入的。带索状双耳盘口鼎、鸟首铉壶、带盖釜、双耳镂空圈足铜壶，则都有浓厚的地方色彩。陶器多是轮制，其中瓮、罐、钵等实用陶器很坚硬，胎质灰白色，明器鼎、壶、甑、盒等是红或黄色，质较软。陶器的制作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几何形印纹软、硬陶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其中的匏壶、三足盒、双联、四联、五联罐等有浓厚的地方特点。

〔西南夷〕 西汉初年，西南夷和巴、蜀地区的民间往来很多。西南夷民春夏间至巴蜀充当佣工，秋冬归去。巴蜀人至西南夷营商的也很多，贩卖巴蜀的缙、帛、枸酱至西南夷，又贩卖笮马、髦牛等物产至巴蜀。

前135年（武帝建元六年），汉官唐蒙在南越吃到蜀产枸酱，唐蒙打听到是经牂牁江运来的。他回长安，询问蜀商人，证实蜀商人多运枸酱至夜郎出售。唐蒙也了解到夜郎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可以行船直出南越之番禺城下。武帝以唐蒙为郎中将经略南夷，唐蒙将千人入夜郎，夜郎侯请求设置郡县，汉以夜郎置犍为郡，封夜郎侯为王，赐王印。唐蒙发巴、蜀卒治道，自犍道（今四川宜宾），直通牂牁江。又在西夷邛、笮地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郡。

张骞从西域归来，说在大夏见到蜀布、邛竹杖，得知是从在身毒（今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蜀商买来的。又得知身毒在大夏东南数千里，身毒在邛西二千里。他认为汉欲通大宛、大夏、安息等国，经河西，易为匈奴、羌人隔绝，最好开通蜀和身毒间的道路，既便近，又无害。武帝派出十余批人，寻求至身毒的通道。过滇而西，为昆明（今洱海附近）所阻。汉以且兰为牂牁郡，邛都为越巂郡，笮都为沈黎郡，

冉駝为汶山郡，白马为武都郡。滇王请置郡县，汉以其地置益州郡，赐滇王金印。五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云南晋宁石寨山的滇人贵族墓葬中发现了一颗汉式金印，文曰“滇王之印”，充分证明了这一事实。

汉在西南夷设置七郡后，这里的经济、文化发展迅速，与汉人的往来更加频繁。在石寨山出土的属于这一时期的滇文化遗物：金属工具以青铜器为主，有犁、锄、铲、斧、凿等，反映了滇人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状况。在出土的许多铸有贝壳的铜鼓面上，铸有奴隶纺织和杀人祭祀的场面，在其他铜器上有奴隶劳动和放粮等图案，这些材料反映了滇人处在发展的奴隶制阶段。有些铜鼓面上铸有战争场面，还有悬裸体俘虏的铸象，可能战俘是奴隶的一个重要来源。墓葬中出土的生活用品，有青铜釜、壶、洗、煮炉、熏炉、镜、带钩等，还有压花金剑鞘、金臂甲、金夹子、金发簪、银错金带钩、银错金片等。这些器物的制作工巧精致。其中一部分为滇人特有的风格，另一部分兼有滇式和汉式，还有一些为汉式。

## 第二节 西汉阶级矛盾的尖锐 绿林、赤眉大起义

### 一、土地兼并的加剧 劳动人民反对西汉王朝的斗争

西汉时，封建的生产方式还处在上升时期的初期阶段，

它还是正常的、在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生产方式。但是就在那时它已经产生了惊人的社会恶果：土地兼并加剧，广大农民破产、流亡或沦为奴婢，社会生产破坏，经济凋弊。随着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不断发生。

〔土地兼并加剧 流民相继起义〕 文景时期，土地兼并已很严重。武帝时，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更加速了土地兼并的过程，大量的农民贫困破产，有的沦为奴婢，有的到处流亡。田地、奴婢问题已成为当时的两个主要社会问题。

武帝长期对匈奴用兵，又经略西域、两越、西南夷和东北各族，人力、物力的耗费很大。他为了满足生活私慾，征调大量的农民修建上林苑，挖昆明池，池周数十里。又在长安大造宫殿，在上林苑造的建章宫（所谓千门万户宫），东有凤阙，高二十余丈；西有唐中，数十里虎圈，北开太液池，中筑渐台，高二十余丈，还有蓬莱、方丈、瀛州、壶梁，象海中的神仙、龟鱼等等；南有玉堂、璧门、大鸟。立神明台、井干楼，高约五十丈。宫殿楼台，犖道相通连。其他宫、馆，不可胜数。又设酒池肉林，接待少数民族和外国使者，作巴俞、鱼龙、角抵之戏，恣意享乐。武帝每次封泰山，巡狩海上，都使少数民族和外国使者陪同，对他们的赠送很厚，用帛达百余万匹，钱金以钜万计，以夸耀汉王朝的富厚。

武帝为支撑他的庞大的军事开支和无限的生活挥霍，除由国家专营铸钱、盐、铁、酒和均输、平准，又大卖武功爵，爵分十七级，共值三十余万金，还增口赋三钱，又增设算缗钱，马口钱等，加强赋税剥削。武帝又强迫关东人民迁

徙到朔方或河西，被迁人口因饥寒疾病死于道路的极多，阶级矛盾更加尖锐。

公元前107年，关东流民已有二百万之多，各地起义相继发生。南阳一带，以梅免、百政为首，楚以段中、杜少为首，齐以徐勃为首，燕、赵以坚卢、范主为首，都有部众数千人，他们英勇地攻打官府，捕杀守、尉，夺取武库，释放“罪犯”，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各地数百成群而和地主豪绅展开斗争的，更不计其数。

武帝派九卿持节和虎符，征发郡国兵，屠杀起义农民。这个办法失败后，又制定“沉命法”，下令郡太守以下大小官吏，对辖区内农民起义，不及时发觉镇压的，处死。可是农民起义已有燎原之势，郡守县令无力镇压，就上下互相欺瞒，起义更加发展。武帝的暴力政策失败，已感到“功费愈甚，天下虚耗”，自己的统治岌岌可危，不得不稍稍改变政策，减少对外用兵，集中力量巩固他的统治。

武帝取消了轮台（今新疆轮台县）屯田的计划，下诏说：“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汉书·西域传·渠犂传》）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又用搜粟都尉赵过推行代田法，改良农具，希图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这些措施推行后，阶级矛盾稍稍缓和，封建秩序比较稳定一些。

〔阶级矛盾再度尖锐化 农民、铁官徒起义〕 昭、宣时期，土地兼并继续发展，统治者仍奉行武帝后期的政策，减少一些赋税徭役，改酒归民营，在京师、郡、县广置常平仓，控制物价，削减盐价，假民公田，这些办法多少收到一些效果，流民有所减少，大部分地区的生产略有好转，有些

地区，情况仍很严重。如胶东、勃海等地，因连年灾害，农民常常起义，规模大的就“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汉书·张敞传》）宣帝说：“方今天下少事，徭役省减，兵革不动，而民多贫，盗贼（农民起义）不止，其咎安在？”（《汉书·宣帝纪》）这个自供状说明了当时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这个“咎”就是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有增无已，土地兼并日益加剧。

元帝（前48—前33年）以后，皇室、贵族的生活更加奢侈，官府剥削也在增加。大司农年入四十余万万钱，少府年入十三万万钱，每年化于三服官的，达“数钜万”，东、西织室费各五千万钱。《汉书·成帝纪》说成帝“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池，多畜奴婢，”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置私田的皇帝。他为自己前后造了两座坟墓，化了十五年，耗费民工以万万计。外戚王氏大造宅第，妻妾数百人，僮奴以千数。红阳侯王立在南郡强占垦草田数百顷，中有民田，又卖给国家，得钱一亿多。官僚张禹有田地四百顷，都是泾、渭间灌溉方便的膏腴上田。

在官府、贵族、官僚、地主的剥削、压迫下，农民的生活越来越悲惨。贡禹说：“农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捩山杷土，手足胼胝，已奉谷租，又出囊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故民弃本逐末。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穷则起为盗贼。”前29年（成帝建始四年），长安南终南山地区的农民起义。同年，东郡茌平（今山东茌平县）的农民起义。前22年（阳朔三年），颍川（治今河南省禹县）铁官徒申屠圣率一百八十人起义，捕杀地方官吏，夺取兵库武器，自称将军，转战九个郡。前18年（鸿嘉三年），广汉郑躬领导起

义，不久发展到一万余人。前14年（永始三年），尉氏（今河南尉氏县）樊并等起义，捕杀陈留太守和官僚、地主。同年，山阳（治今山东省金乡县）铁官徒苏令率领二百二十八人起义，杀东郡太守及汝南都尉，转战十九个郡国。农民和铁官徒起义军发展极快，对反动统治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一次起义被镇压下去，更多的起义相继爆发。

哀帝即位（前7年），官僚师丹、孔光、何武等建议限田，办法是“诸王、列侯得名田园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岁以下不在数中；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诸名田畜奴婢过品，皆没入县官”（《汉书·哀帝纪》）。这个办法遭到外戚丁氏、傅氏和权臣董贤的反对，“限田”之议成为废纸。以后哀帝一次就赏给董贤田地二千顷，限田之议更无人再提了。鲍宣说当时的人民有七亡、七死，其中主要的是“县官重责更赋租税”，“贪吏并公，受取不已”，“豪强大姓蚕食亡厌”，“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以及“酷吏殴杀”，“治狱深刻”等。他说这都是“公卿守相贪残成化”（《汉书·鲍宣传》）所造成的。这反映了当时的阶级矛盾已十分尖锐。

西汉王朝的统治迫近末日，在方士和儒生中，有人根据“五德终始”的理论编出一套汉运将终，应更受命（更换朝代）的说法。刘邦的子孙起初非常仇视这种说法，把传布这种说法的人关起来，或加以杀害。可是到了哀帝时，刘家的江山已岌岌可危，哀帝及其统治集团不得不改变过去的态度，而把希望寄托在这个“邪说”上。公元前5年（建平二



年），哀帝扮演了一出“更受命”的丑剧，下令改元（为太初元年），自号“陈圣刘太平皇帝”。可是社会问题日益严重，这套鬼把戏不见效验，不久，改元的丑剧又自动取消了。

〔王莽改制及其失败〕 王莽是元帝王皇后之姪，平帝（公元——五年）即位，以大司马大将军辅政。他竭力拉拢汉宗室、功臣的后裔和官吏，网罗通晓经学和天文、历算、兵法及文字训诂、医药方术的儒生，扩大太学，筑舍万区，容纳一万八百太学生。这样，他便换得了大部分官僚、地主和儒生的拥护和支持。王莽始称“安汉公”，公元5年（元始五年），毒杀平帝，称“假皇帝”，改元“居摄”，公元8年（始初元年），王莽正式篡位，改国号“新”，改元“始建国”。

王莽上台后，为了挽救地主阶级的统治，针对当时的土地兼并和农民沦为奴婢的严重情况，提出了一套改革办法，主要的就是宣布“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不准买卖。王田制是废除土地私有制，代之以“井田制”，以制止土地兼并。其办法是土地重行分配，一夫一妇按百亩受田。田多者分其余于邻里乡党，违者治罪。诏令下了，贵族、官僚、地主的土地一点也不曾分出，可是广大贫苦农民却因被迫卖田地卖儿女而沦为罪犯。

王莽还有其他一些改革。如币制改革，他在公元7年到14年五次改变币制，废除了行用已久的五铢钱，改铸大小复杂品种繁多的新币。有错刀（一值五千）、契刀（一值五百）、大钱（一值五十）、小钱（重一铢）等等。第三次改革货币，作黄金一品、银货二品、龟货四品、贝货五品、钱

货六品、布货十品，这就是所谓“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不久又废。又规定私用五铢钱的与买卖田地、奴婢同罪。

王莽推行“五均、六筦”法也属于改革的范围。五均是改长安东、西市令和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为五均司市师，师下置交易丞、钱府丞，交易丞于每季之中月，议定物价，名为“市平”，以本值征取囤积商的货物，贱时听之，贵时售之。钱府丞掌收工商农桑之税，并主赊贷，贫民为谋生活而赊贷的，月利三分。各郡、县也设司市，职掌和司市师相同。

六筦就是官府专营盐、铁、酒、铸钱，征收渔猎樵采之税及五均、赊贷。王莽设六筦本来指望由国家垄断某些重要经济部门，制止囤积居奇和土地兼并，缓和阶级矛盾，增加国库收入。王莽任用的督办五均六筦的官员，多是富商大贾，他们乘公车，往来郡、县，与官僚勾结，设置假帐，官府无所得，利润尽入私囊。

这些所谓“改革”不仅不会给人民带来半点好处，相反地却增添了更多的痛苦。许多农民为了活命而出卖仅有的一点田宅或亲生骨肉，却全家被没入官（为奴婢）或被处刑戍边。每一次改变货币，带来的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因私铸和遭“五家连坐”的无辜人民被槛车铁锁传送长安钟官（官铸钱处）的达十万人，路上饥寒愁苦致死的占十之六、七，阶级矛盾更加尖锐。

王莽附会《周礼》等儒家的旧典，改变官制。在中央设四辅（太师、太傅、国师、国将，位上公）、三公（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四将（更始将军、卫将军、立国将军、前将军），凡十一公，是为辅臣，职位至尊。三公下置

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组成中央机构，掌兵、刑、钱、谷等事。又置六监（位上卿），分掌京师宫殿的戍卫、皇帝的舆服御物。改郡太守为大尹，都尉为大尉，县令、长为宰。改郡、县名称，有的地名连改五次，最后又用原名，连主管官吏都弄不清他的辖区应叫什么名称。

政治制度和官名、地名的改动，表面上是使之合于礼法和天命，更重要的是乘机排斥异己，任用亲信，以加强王莽集团的统治。

王莽还贬少数民族的王为侯，改王玺为章，如改钩町王为侯，改“匈奴单于玺”为“新匈奴单于章”，改“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等，致使民族关系紧张。公元11年，匈奴杀雁门、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产，不可胜数。王莽遣立国将军孙建等率十二将军、一百八十偏裨，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准备分六路同时出击匈奴、濊貉各族，各地人民因抗拒征发、骚扰而相继起义，并州、平州的起义更普遍。王莽遣公、卿、将军率兵在各地镇压人民，这些官僚乘机勾结地方官吏，搜刮人民，流民四处逃亡，仅逃到关中的有数十万人，因饥饿而死的达十之七八。

公元九年五月，东郡太守翟义起兵反王莽，农民起义响应的有十余万人。与此同时，京师附近二十三县农民起义，首领赵朋、霍鸿，自称将军，攻烧官府，杀死都尉、县令，不久发展到十余万人。王莽征集各郡兵力，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将这两支起义军镇压下去。由于王莽倒行逆施，残酷屠杀，农民革命风起云涌。公元17年，瓜田邑起兵会稽郡长洲县（今江苏省苏州境），琅琊郡海曲县（今山东省日照县）吕母率卒数千人起义，杀县宰（县令），不久发展到一

万多人。全国各郡县起义的极多，大者数万人，小者数千、数百人，在和统治阶级的斗争中，互相支援，互相联合，逐渐形成三股主力，在江汉一带的有绿林军，在山东的有赤眉军，在河北的还有许多支农民起义军，起义农民总数约有数百万人。

## 二、绿林、赤眉大起义

〔绿林起义军推翻王莽的反动统治〕

1. 绿林军起义及其对旧贵族复辟势力的斗争 王莽统治时期，荆州一带的广大农民在封建国家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饥寒交迫，成群地逃到野泽中，掘食凫茳（野荸荠）为生。公元17年，在绿林山（今湖北省当阳县东北）的贫苦农民共数百人推新市（今湖北省京山县）人王匡、王凤为首领，举行起义。不久，在附近起义的马武和王常、成丹等也来参加。起义军攻略乡聚，打击地主，九个月间，发展到七、八千人。公元21年，王莽的荆州牧发兵二万人进剿起义军，被起义军打得大败。起义军攻占竟陵（今湖北省天门县西北），横扫云杜、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县一带），又打回绿林山，已有众数万人。第二年，瘟疫流行，死人极多，起义军分为两支，一支由王常、成丹率领，西入南郡，称为“下江兵”；主力由王匡、王凤率领，北入南阳，称为“新市兵”。

这时陈牧、廖湛起兵于平林（今湖北省随县），聚众千余人，号“平林兵”。在新市兵进攻随县时，平林兵与新市兵联合。

西汉的宗室痛恨王莽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就利用农民起

义的时机，起兵反对王莽。刘縯率宗族、宾客七、八千人，起兵舂陵（今湖北省枣阳县东北），他的弟弟刘秀率宾客起于宛，刘秀的姐夫邓晨率宾客起于新野（今河南省新野县），与刘縯军会合。刘縯兄弟为了利用农民起义军，就与新市兵联合作战。在小长安（今河南省南阳境），被王莽军十万人打败。幸得下江兵的支援，两军以钳形攻势，大破莽军，杀莽军统帅甄阜、梁丘赐和士卒二万余人，乘胜北上，大破莽将严尤、陈茂，斩首三千余级。这时起义已发展到十余万人，主力围攻宛，准备西入武关。另派别部北取昆阳（今河南省叶县），准备夺取洛阳。

随着革命形势的顺利发展，起义军不断壮大，起义军内部的矛盾也围绕争夺领导权问题而尖锐起来。野心勃勃的刘縯自称柱天大将军，阴谋夺取农民起义军的领导权，妄图“复高祖之业”，最后夺取皇帝的宝座。王匡、王凤等农民军领袖对于刘縯等贵族、地主很有戒心，但也受到“立刘氏，以从人望”的落后思想的影响，于公元23年立刘玄为皇帝，国号“汉”，年号“更始”。刘玄是汉的远支宗室，在平林兵中充当安集掾，没有自己的势力。刘縯极力反对立刘玄为皇帝，他勾结部分旧贵族和地主分子，大搞分裂活动，发展自己的势力。

起义军节节胜利，王莽十分恐慌，急派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征调各州郡精兵四十二万，迎击起义军，首先以十万人围攻昆阳。起义军将领王凤自率八、九千人坚守昆阳，派刘秀率一小部突围，收集各县起义军救援昆阳。刘秀收集了数千人，集中兵力，先击莽军的一支，战士人人奋勇杀敌，取得胜利，士气受到极大鼓舞。又全军突入莽军指挥中

心，莽军大乱，城内守军乘势杀出，内外夹击，呼声震天，起义战士无不一以当百，莽军大败，死伤以万数，王寻被杀，王邑狼狈逃窜。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新汉昆阳之战”。毛主席对这次战争的评价很高，说这样的战争，“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先以自己的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

起义军主力攻下宛，昆阳之战又获全胜，刘缤的野心日益暴露，他的旧部公开抗拒刘玄和农民军将领的指挥，分裂的趋势已极明显。刘玄和王匡等把刘缤及其重要部属旧贵族刘稷杀掉。刘秀的兵力薄弱，不敢公开对抗，就向刘玄请罪，表示忠顺。刘玄以他为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派他持节北渡黄河，略取河北各州郡。刘秀乘机脱离了刘玄、王匡的控制，渡黄河后，打着“汉”的旗号，大力发展自己的势力。

2. 绿林军攻破关中，直捣长安 绿林军的胜利发展，推动了全国各地农民的反抗斗争。各地起义军到处捕杀王莽的州郡牧守，与绿林军取得联系，接受他们的节制。这时王匡亲率大军取洛阳，申屠建等率另一支大军西攻武关。王莽使太师王匡、国将哀章固守洛阳，另以将军九人，号称九虎，率兵数万守华阴，妄图保卫京师。起义军王匡部攻占洛阳，俘虏莽将王匡、哀章，申屠建部攻武关时，析县（属南阳郡）人邓晔、于匡率众起兵响应，攻破武关，大破九虎军。公元24年十月，攻破长安。此时长安城里也爆发了人民起义，起义群众攻入皇宫，王莽逃到渐台，被商人杜吴杀死，王莽的反动统治结束。

起义军入关，三辅各县的大地主纷纷起兵，各有宗族、宾客数千人，自称将军，他们为了欺骗人民，也用汉的名号，实际拥兵自保，坐观风向，对于入境起义军采取对抗态度。

刘縯被杀，旧贵族复辟势力一度受到削弱，可是刘玄当皇帝后，重用旧贵族，他的族父刘良为国三老，刘赐为丞相。入长安后，又封旧贵族六人为王，掌握大权，形成新的复辟势力。刘玄在生活上日益腐朽，住在长乐宫，“宫女数千，备列后庭，自钟鼓帷帐，舆辇器服，太仓武库，官府市里，不改于旧。”旧贵族集团攻击王匡等起义将领是“戎阵庸伍”出身，才能低下，只可当个亭长，不能占据“公卿大位”，更严重的是他们借口绿林军不可靠，阴谋陷害农民军将领。农民起义军和贵族、地主复辟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益激烈起来。

〔赤眉起义军的革命斗争〕 公元十八年，琅琊人樊崇率数百人起兵于莒（今山东省莒县），转入泰山地区，一年之间，发展到一万余人。樊崇的同乡逢安、东海人徐宣、谢祿、杨音也先后起兵，共数万人，和樊崇会合。樊崇部起义军都是贫苦农民，没有文书旌旗，只能口头传达命令。他们之中地位最高的称三老，其次称从事，再次称卒史，战士之间，互称巨人。这些官职都是汉代小吏或乡官的名称。他们的纪律：“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在和莽军作战时，为了识别敌我，就染红了自己的眉毛，从此称为“赤眉”。

王莽派更始将军廉丹、太师王匡率十余万人进攻赤眉军。莽军到处抢劫，人民不满，流传着这样的话：“宁逢赤眉，不逢太师（王匡），太师尚可，更始（廉丹）杀我。”

赤眉军在群众的支持下，大破莽军，杀敌万余人，廉丹被杀，王匡逃走。赤眉军发展到十余万人，转战于今鲁西、苏北、河南一带。王莽极为恐慌，派王寻将十余万人守洛阳，又派王匡、哀章率三十万人，严尤、陈茂率十万人，合力进击赤眉军。这时绿林军已攻下昆阳，围攻宛，进逼关中。王莽不得不改调王寻等南下围昆阳救宛。赤眉军在东方的战斗更加猛烈。

刘玄至洛阳，樊崇等曾到洛阳和刘玄联系，愿意联合作战，接受刘玄的节制。可是刘玄仅仅给了他们一些空头封号，并不重用。他们又脱离刘玄，回到赤眉军中，分兵两路，一路由樊崇率领，战斗在今河南省南部，一路由徐宣率领，战斗在今河南中部。这时刘玄已迁都长安，派军和赤眉对抗。公元25年冬，徐宣部在弘农击杀刘玄的守将和士卒三万余人，由陆浑关进入关中，樊崇部也由武关进入关中。两路军连破刘玄军，至华阴附近会师，整编士卒，以万人为一营，共有三十营，营置三老、从事各一人。立汉远支宗室刘盆子为帝，徐宣为丞相，樊崇为御史大夫，建立了赤眉军的政权。这时，刘玄等复辟势力杀害了绿林军重要将领申屠建，逮捕了其他一些农民将领，王匡举兵攻入长安，反对刘玄的反革命阴谋，被刘玄军击败，王匡投入赤眉军。九月，赤眉军攻入长安，刘玄投降。

关中的地主仍然据地自保，和赤眉对抗。赤眉军在长安日久，缺乏粮食，就离长安至安定、北地一带，遇到大雪，士卒因饥寒而死的极多，又回到长安，一再遭到地主势力和刘秀派来的邓禹复辟势力的进攻，士卒死伤惨重，势力削弱。

〔铜马等部起义军的革命斗争〕 在幽、冀、兖三州



（今河北省和河南北部、山东西部）有大小数十部农民起义军，大部数十万人，小部数万人，“或以山川土地为名”，“或以军容强盛为号”，其中最著名的有铜马部，战斗在今河北、山东交界地区，有众数十万人；城头子路部，有众二十余万，战斗在今鲁北一带。各部时而联合战斗，时而分头发展，给予当地的封建官僚和地主阶级以沉重打击。

在农民起义时，有些地主也乘机起兵，如鉅鹿（今河北省平乡县）大地主刘植“率宗族宾客，聚兵数千人，据昌城”。和农民起义军相对抗。上谷、渔阳、信都、和戎等郡的太守都拥兵自保，坐观风向，勾结地主武装，和农民起义军相对抗。没落贵族刘林为了篡夺农民起义军的领导权，恢复地主阶级的统治，勾结地主豪强，拥立卜者王郎为帝，并诈称王郎是汉成帝之子子舆，欺骗群众。所以这一地区的阶级斗争异常复杂。刘秀渡河后，打着“汉”的旗号，以西汉贵族身份，每到一处，极力笼络官僚、地主，组织复辟势力，史书上说他“辄见二千石长吏三老官属，下至佐吏，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辄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人喜悦，争持牛酒迎劳。”充分暴露了刘秀的复辟势力的真面目。铜马等部农民起义军对刘秀进行的长期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起义军屡败刘秀，抑制了这支复辟势力的发展，推动了本地区的农民起义，也有有力地支援了绿林、赤眉等起义军的革命斗争。

〔刘秀扑灭农民革命，重建封建地主统治〕 刘秀在河北虽仍打着“汉”的旗号，这个汉已不再是王匡等树立的革命旗帜，而是旧贵族复辟的“旗帜”。刘秀的矛头不是指向王莽的反动统治和地主阶级，而是勾结王莽的官僚和地主，

镇压起义农民。

公元25年（更始二年）夏，刘秀纠集了官僚、地主武装共数万人，攻破邯郸，杀王郎，也屠杀了大量的农民起义军。这次战役后，刘秀对这些官僚地主们得意洋洋地说：

“当与渔阳、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并封王莽的上谷太守耿况为大将军、兴义侯，其他官僚地主为偏将军。这时刘秀实际已以帝王自居。

刘玄、王匡知道刘秀怀有野心，而且势力已很大，就派人封他为萧王，让他速回长安。刘秀拒不应命，却乘刘玄部和赤眉军发生战斗之时，派邓禹率大军西向，进攻关中，另派冯异守孟津，与刘玄派驻洛阳的守军对峙。他亲自征发幽州十郡兵，进攻铜马军和其他农民起义军，妄图击平这一带的农民军，建立根据地，以实现他争夺天下的野心。刘秀在元氏（今河北省元氏县）被起义军打败，全军溃散，他只身逃走。后来又集结反动武装数十万人，对农民军各个击破，逐步控制了今河北省的中部。就在这年（公元25年）六月，刘秀踏着千千万万起义农民的尸骨，爬上了皇帝的宝座，国号仍称汉，史称东汉，年号建武。七月，刘秀派吴汉攻下洛阳，以洛阳为国都，大封宗室功臣，恢复了地主阶级的统治。

这时，绿林军已瓦解，赤眉军在关中的尚有二十万人，缺乏粮饷，又一再受到地主武装和邓禹的复辟武装的攻击，决定离开关中东归。刘秀得信后，进行截击，被赤眉军打的大败。刘秀又派了一支军队化装为赤眉军，埋伏于崤底（今河南省洛宁县西北），自率另一支军队埋伏于宜阳（洛宁县东北），阴谋全歼赤眉军。赤眉军行到崤底中计，士卒大

乱，奋战到宜阳，又中埋伏，士卒死伤极多。樊崇投降，被刘秀杀害。刘秀又连续剿灭了五校、富平、获索等部起义军，公元33年（建武九年）以后，相继平定了割据陇西的隗嚣和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在中国建立起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东汉王朝的统治。

### 第三节 东汉的政治和经济 黄巾大起义

#### 一、东汉初年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

东汉政权是以南阳刘氏贵族为核心的封建贵族、官僚、地主政权，是地主阶级对革命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的支柱。东汉初年地主的反攻倒算主要表现在继续镇压农民军队和废田两个方面：

〔继续镇压农民起义军〕 刘秀消灭了赤眉军以后，在兖、豫、青、冀各州，还有五校、富平、获索等部起义军，大者数万人，小者数千人，继续打击各地的官僚、地主，也反对以刘秀为首的新建地主政权。颍川、东郡、济阳、庐江、河南等郡的农民在刘秀即位七、八年后，还不断起义，公元32年（建武八年），颍川的起义农民攻破了若干县城，“京师骚动”。有些农民起义军利用宗教为掩护进行革命斗争。

刘秀为了保住他的宝座，对起义农民进行血腥屠杀。还利用“遣归附农”（附于农籍）的办法诱骗起义农民放下武器。

〔強制度田〕 西汉末年的农民大起义推翻了新莽政权，一度废除了封建国家的赋役剥削。东汉建立，虽然又恢复了各项赋役制度，可是各地的农民都不以实际占有的田地数量和户口向官府登记。大、小地主也乘机隐瞒土地，妄图把赋役转嫁到农民头上。这影响了封建国家的收入，封建秩序也稳定不下来。公元39年（建武十三年），刘秀下诏给各州、郡，清查已垦田地的数量和户口、年纪。多数刺史、守、令畏于地主豪强的势力，贪于贿赂，与地主勾结，任凭地主隐瞒虚报，但对农民，不仅丈量他们的小块田地，还把他们的庐舍，里落作为田地丈量，“百姓嗟怨，遮道号呼”（《后汉书·刘隆传》）。如汝南太守欧阳歙就包庇地主，贪脏千余万。太子对刘秀说：“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踰制，不可为准。”其实各郡国的地主田宅踰制是普遍现象。

刘秀强行度田，农民纷纷起而反抗，有些豪强地主号称大姓、兵长，也利用形势，反对度田。刘秀以“度田不实”罪逮捕诛杀了河南尹张伋和郡守十余人，欧阳歙已为大司徒，也因度田时贪脏，下狱而死。官僚们加紧度田，反度田斗争更加激烈，许多地方官僚被捕杀。刘秀派军镇压，起义军坚决抵抗。“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后来刘秀采用军事镇压和政治分化相结合的手段，一面责令郡守县令疯狂捕杀起义农民，另一面对起义军，进行挑拨离间，声言起义军“自相纠擿，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对捕获的大姓、兵长，迁徙他郡、县，给予优厚的田宅，不予处罚。这样，度田不了了之，反度田斗争也逐渐平息下来。

度田事件的妥协，东汉王朝和豪强地主都获得了利益。官府控制的田地、户口和府库收入逐年增加；豪强地主也隐瞒了大量的田地和依附农民，专供他们私家剥削和奴役；东汉时期官方掌握的最高垦田数字，和帝永兴元年<sup>①</sup>为7,320,170顷；最高户口数字，桓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为16,070,906户，50,067,856口，比西汉后期的官府数字都有减少，所以这样，是和农民不断进行反封建斗争分不开，也和豪强地主隐瞒田地和依附农民分不开。

## 二、封建统治机构的加强

东汉统治集团为了加强对广大农民的统一，不断调整其政治、军事机构，以图把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中，进一步发展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削弱三公权力 加强尚书台〕三公就是司徒、司空和太尉，司徒“掌人民事”，司空“掌水土事”，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课。”三公没有实权，三公之下有九卿，分掌庶政。仲长统说：“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彊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sup>②</sup> 这说明了三公职权在削弱，尚书职权在加强。

尚书职权的加强是从西汉武帝时开始的。东汉初，扩大尚书台组织，尚书令秩由六百石提升为千石，另设尚书仆射一人为副，秩六百石；下设六曹：吏曹主公卿事，二千石曹

<sup>①</sup> 和帝有永元、元兴二年号，无永兴年号，永兴元年可能是元兴元年（公元105年）之讹。

<sup>②</sup> 《后汉书·仲长统传》引《昌言·法诫篇》。

主郡国二千石事，民曹主官吏上书事，三公曹主断狱事，南、北客曹主外国和少数民族事。曹有尚书一人，丞、侍郎、令史数十人。章帝以后，“尚书出纳王命，赋政四海，权尊执重，责之所归。”（《后汉书·李固传》）成为决策和发号施令的中枢机关。东汉时期，三公或大将军要直接参予中枢决策，必须加“录尚书事”的头衔。加强尚书台的权力，是加强皇帝权力的一项重要措施。

〔加强监察制度〕 东汉初年，一再加强监察制度，主要监察机构有三套：

1. 御史台 东汉初年，改御史大夫为司空，原属御史大夫的御史中丞主管御史台，掌监察，秩千石。御史中丞下有侍御史二人，掌对法律条文的解释；侍御史十五人，掌察举官吏非法，接受公卿群吏奏事。御史中丞的职权仅次于尚书令。

2. 司隶校尉 西汉武帝时曾置司隶校尉，成帝时废除。东汉复置，为京官，兼领一州事<sup>①</sup>。设从事史十二人，主管察举中央百官犯法者和本部各郡事务。权限很大。在公卿朝见皇帝时，尚书令、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会同并专席而坐，号曰“三独坐”

3. 州刺史 东汉初年，在司隶校尉辖区之外，分全国为十二州，每州设刺史一人，秩六百石。刺史于每年八月巡行所属郡国，阅录刑狱情况，考察长吏政绩，奏于皇帝。属官略与司隶同。

---

<sup>①</sup> 东汉分全国为十三州部，京师附近为司隶校尉部，设司隶校尉。其他十二部设部刺史。应劭《汉官仪》曰：司隶校尉部河南、河内、右扶风、左冯翊、京兆、河东、宏农七郡。

官僚朱浮说：东汉皇帝“疾往者上威不行，下专国命，即位以来，不用旧典，信刺举之官，黜鼎辅之任，至于有所劾奏，便加退免，复案不关三府，罪谴不蒙澄察。”（《后汉书·朱浮传》）监察机构的加强，是加强皇帝权力的另一项重要措施。

〔废除郡国都尉 集军权于中央〕 早在刘秀统一中国之初，就下诏撤销了郡国都尉的建制，兵权并归守、相。后又取消郡、国的轻车、材官、楼船士和都试制度，守相的兵权大削，兵员很少。

中央仍置南、北军。南军以光禄勋领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羽林左监、羽林右监七署，宿卫宫殿门户，以卫尉掌宫门卫士。北军置中候一人，掌监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五营兵，每营设校尉一人，宿卫京师。又以幽、冀、并州兵骑置黎阳营，以谒者监军，在关中雍县置雍营，护卫三辅。中央掌握了庞大的军队，用来镇压农民起义和对少数民族进行战争。

〔限制贵族权力 重用地主官行〕 东汉初年，刘秀为了报酬协助他镇压农民起义军、争夺天下的将吏，封百余人为列侯，明帝时，又画功劳最大的二十八人的象于云台，以彰其“勋业”。可是这些人多戎马出身，不熟悉封建典章制度，又自恃有功，不听控制。刘秀虽给予他们以崇高的荣誉，但不给予实权。刘秀对于熟悉封建的制度和律令的地主士人却十分重视，征用隐居山林，不仕王莽的士人卓茂（平帝时为高密令）为太傅，征用名儒伏湛为尚书。功臣得与公卿参议国事的只有邓禹、李通、贾复等少数人。

刘秀限制外戚干予政事，明帝还令外戚互相纠察。梁

松、窦穆都娶公主为妻，但都以请託郡县、干乱政事罪，遭到杀戮。刘秀还重申“阿附藩王之法”，公元52年（建武二十八年），收捕诸王宾客，牵连而死的以千数。明帝时，楚王英以交结方士、作符瑞图书罪，被迫自杀。被株连而死和被系狱、迁徙的诸侯、外戚、官吏、豪强数千人。

限制贵族的权力，重用地主士人，也是加强中央集权的一项重要措施。

### 三、社会经济的发展 豪强地主的大田庄

西汉末年的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土地集中和奴婢问题的状况，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东汉初年，刘秀合并了四百多个县，减少吏员数万人，大力复员士卒，恢复三十税一之制，又六次下诏免除被卖或被略的庶人为奴婢者，三次下诏禁止残害奴婢。这些措施都适应了地主经济发展的要求。

〔农业〕 东汉时期，农业生产有相当的发展，铁农具和耕牛的使用更加广泛。牛耕在黄河流域或长江流域的许多地区已很普遍，犁铧的铁刃加宽，头部的角度缩小，便于深耕，且坚固耐用。中原地区大多一牛挽犁，犁辕较短，也有“耦犁”，就是二牛抬扛。在中原和江南地区有大量的新式铁农具出现，云南、贵州、广西、甘肃等边远地区也广泛地使用铁农具，重要的新式农具有全铁曲柄锄和钁镰等，曲柄锄是方便的中耕农具，钁镰两面有刃，是割草的重要工具。

西汉后期以来，水利长期失修，河水“侵毁济渠，所漂数十许县；”“汴渠东侵，日月弥广，而水门故处皆在河中，兖、豫百姓怨叹”。（后《汉书·王景传》）公元69年



（永平十二年），明帝令王景、王吳主持修治黄河，参加这项工程的有农民和士卒数十万人。王景等自滎阳东至千乘海口（今山东省博兴县）千余里，“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碛，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后汉书·明帝纪》）化了一年多的时间，费钱以百亿计。王景、王吳还在今开封西北主持修浚仪渠，用堰流法，消除水害。有些地方官吏也比较重视水利的兴修，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封建国家和地主阶级能否剥削更多的东西。杜诗为南阳太守，主持修治了很多陂池，邓晨和何敞先后为汝南太守，修复了鸿郤陂、颍阳旧渠，马臻为会稽太守，开镜湖，筑塘周回三十里，灌田九十余顷。此外，下邳、广陵、三河、三辅、陇西、武威等郡国，也修复或新开了许多湖陂沟渠，溉田多者三万余顷，少的数百顷，对于交通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水利兴修的技术上也有很多新的创造。王景、王吳用的堰流法和水门控流法，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先进技术。民间水利工程专家许杨为修复鸿郤陂花了数年时间，“因高下形势，起塘四百余里。”（《后汉书·许杨传》）。为周围的农业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汝南修陂池，用方梁石洫，不易决坏。

利用水力的新技术有水碓和水排。用水碓舂米的效率，比用足蹬提高了约十倍；用水排鼓风铸铁，也大大提高了生产力。东汉末年，还发明了“设机车以引水”的翻车和“为曲筒以气引水”的渴乌，都是先进的汲水工具。

农业的产量，仲长统说：“通肥境之率，计稼穡之入，令亩收三斛。”这与西汉初期晁错所说的“百亩之入，不过百

石”相比，有所增加。

〔豪强地主的大田庄〕 东汉中期以后，地主兼并土地的情况更加严重，大地主世代相袭，称霸一方，成为所谓世姓、郡姓、名门、世族、豪族、强宗、大家，统称之为“阀阅”。东汉时期大小官更多出身于“阀阅”，他们利用政治特权，疯狂进行土地兼并，把大量的农民转变成为佃客、部曲、家兵，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奴役。

东汉时期的豪强地主都以大田庄形式剥削农民。如刘秀的外公樊家自西汉后期，就是豪强大地主兼营工、商业和高利贷。在樊家的大田庄里，有田三百余顷，“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牲畜，有求必给”。东汉崔寔著的《四民月令》一书，按照时令记录了一年中地主大田庄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佃客根据地主的需要，种植各种粮食、蔬菜、瓜果和各种经济作物以及药材等等。有些农民或手工业工人为地主制作农具和各种用具，还要造酒，酿醋，制酱，作饴糖，养蚕，缫丝，织缣帛麻布，以及染色，制衣服鞋袜等。地主以劳役或实物地租剥削农民，超经济的强制是十分严重的。地主把青壮农民强制编为部曲、家兵，每年在二、三月间青黄不接或八、九月间寒冻将临之时，地主就驱使部曲、家兵在大田庄里“缮五兵，习战射”，以防御农民对地主的攻袭。地主大田庄都有坞壁，是地主藏身之处。坞壁四周有高墙、深沟围绕，还有二层三层四层的警楼，有部曲、家兵守卫着。在大田庄里，地主还趁农民之急，买贱卖贵，盘剥农民，对于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

崔寔在《政论》一书中有如下的描述：“上家累钜亿之贲，户地侔封君之土。行苞苴以乱执政，养剑客以威黔首，

专杀不辜，号无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拟人主。故下户踣跣，无所跣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帅妻孥，为之服役。故富者席余而日织，贫者蹶短而岁馷，历代为虏，犹不贖于衣食。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

地主为了掩盖它们残酷剥削的罪恶本质，也偶尔打着宗族、姻亲的幌子，以“振贖贫乏”，“存问九族”为名，对农民施一点小恩小惠，其目的是为了以伪善的面貌骗惑农民甘心接受它们的剥削。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在封建社会中，族权“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之一，东汉时期的豪强地主利用族权作为统治农民的手段之一是非常突出的。

〔手工业的发展〕 东汉时期，手工业生产技术比较进步，主要手工业有冶铁、铸铜、纺织等。

东汉初年，南阳地区已使用水排鼓风，铸造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许多边郡有官营冶铁业，东汉初年，桂阳郡（今湖南郴县）的铁官每年收入五百余万钱。崔寔的《政论》一书中说：有些边郡的官造“刀牟悉钝，故边民敢斗健士，皆自作私兵，不肯用官器。”这说明了边郡也有私营冶铁业。考古工作者在云南、贵州、广西、浙江、内蒙等地发现了许多东汉时期的铁农具和兵器。

东汉时期的冶铜业遍布全国各地，其中最著名的有广汉、蜀郡、朱提（今四川宜宾）丹阳（今安徽宣城）等地。常见的铜器有洗、釜、甑、壶、斗、奩、博山鑪、铜镜等生活用具和工艺品。有些洗上带有“朱提造”、“堂狼造”、“青蛉”等铭文，有的铸有双鱼、羊、鼎等图案，有的铜器制

作精细，花纹工巧，或饰以鍍金、错金银等。

漆器业也有进步。在长沙出土的一些漆彩奩上，以歌舞、狩猎或车马人物等题材，画成精美生动的画面。乐浪汉墓出土的漆彩奩，外缘四周画有古代宫廷生活和孝子邢渠、魏汤的故事。乐浪王盱墓出土的漆盘，上有“永平十二年”<sup>①</sup>铭文，画有男女神象和龙虎图象等。画法生动，颜色鲜艳雅致，人物各具情态。在乐浪和洛阳等地出土的钗器铜饰上，还镶嵌有水晶或琉璃珠等，光彩华丽。

纺织业也有发展，纺织技术有很大进步。东汉初年在洛阳、广汉、蜀郡等地设有服官、工官，制作皇室用的衣物。在新疆古楼兰（今罗布淖尔地区）地区发现的属于东汉魏晋时期的丝织品有锦、缎、绫、绮、罗、纱、黻、绸、绢等，图案有流云、鸟兽、吉祥语，秀丽古雅，还有刺绣。在玉门关附近发现了一整匹缣，上面写有“任城国亢父（今山东济宁）缣一匹，幅广二尺二寸，长四丈，重二十五两，直钱六百一十八。”这个发现不仅使我们知道了东汉一匹缣的幅宽质重等规格，还知道它的价格。对研究当时的纺织技术和商业关系有极重要的价值。

〔商业的发展〕 东汉时期，每一个地主庄园基本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因此，社会的商品货币关系没有西汉活跃。东汉初年，仍行用五铢钱，又制定标准度量衡，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商业也有一定的发展。

商品除一般的农业和手工业品以外，还有各种丝织品，皮毛制品，金、玉、象牙、琥珀、玳瑁、犀角等精制的装饰品。

---

<sup>①</sup> 永平为东汉明帝年号，永平十二年为公元69年。

富商大贾多是大地主，往往兼营高利贷，勾结官府，垄断地方。士孙奋有钱一亿七千余万，折国有钱二亿，奴婢八百人。东汉末年的仲长统说：有些大商人，“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

（《昌言·损益篇》）

汉族与边疆各族人民之间的商业交换关系也有发展。汉与匈奴定期“合市”，每次合市汉商以巨量的铁器、丝织品和其他手工业品交换匈奴的牛马成万头，可见交易数额之大。汉与羌、鲜卑、乌桓以及西南各族之间，也定期合市。汉族小商还载负货物，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以有易无。中原与西域以及中亚的商业关系也有发展。我国名贵的丝织品仍沿着“丝绸之路”经西域，行销中亚和欧洲。西域和中亚的特产也运来中原。贵族、官僚凭借权势，从西域或中亚购买奢侈品。如外戚窦宪以八十万钱从西域购得杂罽十余张。又使人载杂綵七百匹，白素三百匹，以换取月氏马、苏合香和氍毹。权臣梁冀也“遣使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

（《后汉书·梁冀传》）

#### 四、边疆各民族

〔匈奴〕 东汉初年，刘秀全力巩固他的统治，对匈奴“赂遗金币”，以修和好。可是匈奴贵族勾结刘秀的叛将彭宠和割据势力卢芳，一再侵袭汉的北部边境。刘秀徙幽、并两州的沿边居民至常山关（在今河北正定）、居庸关（在今北京市昌平区）以东，以避匈奴。公元46年，（建武二十二

年），匈奴内部争夺单于继承权，连年内战，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立比为呼韩邪单于<sup>①</sup>，居五原（今内蒙古包头市）一带。北匈奴立蒲奴为单于，战败，远走漠北。

南匈奴接受汉的封号，遣单于子“入侍”，东汉王朝对南匈奴贵族的赏赐极厚。公元50年（建武二十六年），一次就赐有冠带、衣裳、黄金玺、安车羽盖、华藻驾驷、宝剑、乐器、鼓车、锦绣、缯布万匹、絮万斤，还给予米糒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余头。此后单于每年送侍子入朝。东汉王朝都赐大量的綵缯、锦绣、黄金，还有江南特产橙、橘、龙眼、荔枝等。后来，南匈奴迁单于庭于西河美稷（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东胜附近），其部属也随同内迁，汉派将卒数千人卫护单于。

北匈奴惧怕汉与南匈奴联合，就送“还所略汉人，以示善意”。又一再遣使至汉，奉送马和裘等，还“远驱牛马，与汉合市。”汉以礼相待，奉还物品“略与所献相当”。

明帝（公元58—75年）时，北匈奴又一再扰掠边郡，汉联合南匈奴及乌桓兵连续北击北匈奴。北匈奴“党众离畔，南部（南匈奴）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公元87年（章帝章和元年），北匈奴为鲜卑所破，北单于被杀，屈兰等五十八部共二十万口南来云中、五原、朔方、北地降汉。公元89年（和帝永元元年），汉又以车骑将军窦宪、征西将军耿种发汉和南匈奴共四万余骑，分三路击北匈奴于稽落山，北匈奴败，温犊须等八十一部二十余万口降汉。第二年，汉与南匈奴遣

<sup>①</sup> 《后汉书·南匈奴传》曰：“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单于，以其大父尝依汉得安，故欲袭其号。”

骑西北出千余里，会于天山以南，大败北匈奴，北匈奴向西北远徙。

南匈奴连连获胜，北匈奴来降者很多，共有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势力渐强，有时劫掠边郡。

〔西域各族 班超经略西域〕 东汉初年，西域分为五十五国，莎车最强大。西汉和东汉之际，北匈奴侵入西域，莎车王康联合其他国家抵抗匈奴，保护了西域都护、吏、卒及其家属一千余人。东汉建国，封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节制其他西域国家。莎车贵族对其他国家侵暴勒索，这些国家遣使至洛阳，请派都护。刘秀忙于巩固他的统治和应付匈奴的侵扰，不曾派遣都护。西域多数国家被迫依附于匈奴。

公元73年（明帝永平十六年），汉遣将军窦固、耿忠率军出酒泉塞，逐走匈奴，进驻伊吾庐（今新疆哈密）。“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葡萄，其北又有柳中（今吐鲁番附近），皆膏腴之地”（《后汉书·西域传》），汉在这里置宜禾都尉，开渠屯田，通乌孙诸国，断匈奴右臂。明年，汉军又进驻车师（今新疆吐鲁番、吉木萨尔一带），置西域都护，驻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为统辖西域的最高官员。置戊、己校尉，分驻车师前后部，掌屯田事务并防卫匈奴。

汉军进驻伊吾庐后，西域各国多数向汉，少数追从匈奴。窦固派假司马班超率吏、士三十六人与南道各国联系。班超先到鄯善（今新疆哈密东北），乘夜击杀匈奴使者并烧其营幕，控制了鄯善，又西至于阗，于阗杀匈奴使者以迎汉使。再西到疏勒（今新疆疏勒），废黜了亲匈奴的疏勒王，

另立亲汉的贵族为王。至此，南道各国基本上清除了匈奴势力，再次统一在汉王朝的统辖之下。

在班超经略南道时，北道的焉耆、龟兹贵族在匈奴唆使下，攻杀都护陈睦，匈奴攻杀己校尉关宠，车师与匈奴合攻戊校尉耿恭。公元76年（章帝建初元年），汉派耿秉率军败车师，击退匈奴，接回耿恭和吏士二十余人，第二年，撤回伊吾庐的屯田兵，匈奴又占据伊吾庐，控制了北道。

此时，东汉王朝也决定召回班超，放弃南道。可是南道诸国惧怕匈奴报复和蹂躏，苦留班超。班超决心留驻西域，联合南道诸国，反击匈奴。从公元78年至84年间，班超用疏勒兵击败隶属于匈奴的姑墨（今新疆阿克苏）和莎车，击退南下增援莎车的龟兹兵，保卫了南道。公元90年（和帝永元二年），大月氏贵霜王国发兵七万，逾葱岭入侵，妄图并吞西域。班超发西域南道各国兵，击退了大月氏的入侵。第二年，北道龟兹等国也降于班超，汉以班超为西域都护，驻龟兹，以戊、己校尉驻车师前部，置戍部侯，驻车师后部。公元94年，班超控制了焉耆（今新疆焉耆）。至此，西域五十余国又摆脱了匈奴的奴役，统一于东汉王朝。

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西经条支（今伊拉克）、安息诸国，至安息西界（波斯湾），未过海而还。这是我国最早到达西亚的使节。

班超是扶风（今陕西兴平）平陵人，历史学家班彪的少子，班固的弟弟。他从公元73年到西域，至102年，奉召回洛阳，在西域三十年，对巩固我国的西部边疆，促进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班超八月回到洛阳，九月



病故，年七十一岁。

班超回洛阳后，北匈奴又侵入西域。公元123年（安帝延光二年），汉又以班超之子勇为西域长史，将弛刑士五百人屯柳中，驱逐匈奴势力，恢复了汉在西域的统治。

东汉时期，西域的经济、文化有很大的发展。考古工作者在罗布淖尔附近的鄯善国、尼雅河流域的精绝国及其他地区发现了许多东汉精美的丝织物和铜镜、钱币等，还有一些冶铁遗址、铁工具，麦粒、青稞等遗物，说明了当时中原与西域的经济联系相当密切。在这里发现的简牍中，有月氏人的名籍，大批的古宰利文、佉卢文、婆罗谜文文书，说明了这里又是中亚、西亚、南亚商人会集的地方。“丝绸之路”上，西去的丝织品和中原其他物产，东来的皮、毛、香料、珠玑和其他奢侈品，不绝于道。

〔乌桓 鲜卑〕 东汉初年，乌桓、鲜卑受匈奴胁迫，不断侵扰北边。公元45年（建武二十一年），汉将军马援击败乌桓，马援部损失也很大。后乌桓大人郝旦与汉通好，到京师洛阳朝见皇帝，“献奴婢、牛、马及弓、虎豹貉皮。”汉封乌桓八十一人为侯、王、君长，允许乌桓迁居沿边诸郡，助击匈奴、鲜卑。汉在上谷宁城（今河北宣化附近）置护乌桓校尉，兼领与乌桓、鲜卑互市以及其他联络事宜。

汉与乌桓和平相处五十余年。公元109年（安帝永初三年），乌桓又与鲜卑、匈奴联合侵汉，扰掠代、上谷等郡。东汉末，乌桓各部都自称王，与汉叛将前中山太守张纯勾结，扰掠青、徐、幽、冀四州。幽州牧刘虞悬赏斩张纯，乌桓扰掠的情况大大减少。

鲜卑在东汉初，曾侵辽东，为辽东太守祭彤所败，死三

千余人，损失马数千匹，势力大大削弱，鲜卑大人相率归附于汉，汉为了笼络他们，每年由青、徐二州拨钱二亿七千万给鲜卑。和帝时，北单于率部西徙，鲜卑占据匈奴原驻地，匈奴尚有十余万落，也自号鲜卑，鲜卑势日盛，不断侵扰汉的北部边郡。

桓帝时，鲜卑大人檀石槐统一鲜卑各部，立庭（首府）于今张家口以北，兵马甚盛，分其地为三部，自右北平以东至夫余、濊貊为东部；右北平以西至上谷，为中部；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为西部，各置大人，有兵十万，不断扰掠边郡。公元177年（灵帝熹平六年），汉遣夏育等将分别自北地、云中、雁门，各率万骑，三路出击鲜卑，大败而归，死者占十之七、八。不久，檀石槐死，鲜卑发生内争，诸部又分裂。

〔羌族〕 东汉初年，羌族主要分布在青海和甘肃南部、四川北部一带，社会经济已有相当的发展。东汉王朝为了便于对羌人的控制，强迫部分羌人迁徙到关中和河东，与汉人杂处。官僚、豪强依仗权势，残酷的剥削、奴役他们，甚至掳掠他们的妇女为妻妾奴婢，引起羌人的激烈反抗。

东汉中后期，羌人大规模的反对东汉王朝统治的斗争共有三次。第一次是从公元107年（永初元年）夏开始的。当时东汉征发甘肃一带的羌人到西域打仗，引起羌人反抗。羌人连破车骑将军邓鹭，征西校尉任尙的军队，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东入三辅和三河地区，威胁京师洛阳。东汉统治者大为震惊，赶忙调兵防卫京师，并疯狂进行镇压。这场战争一直进行了十多年，至公元118年（元初五年），才把羌人的反抗斗争暂时压下去。在这次战争中，东汉王朝共花军费二

百四十亿。第二年，陇西、张掖、上郡的羌人又爆发起义，打到关中，焚烧园陵，捕杀长吏。这次起义直到公元144年（建康元年），才镇压下去，东汉王朝又花军费八十亿。公元159年（延熹二年），羌人在陇西一带举行第三次大起义，东汉反动统治者用“绝其本根，不使能殖”的残酷屠杀手段，疯狂残杀羌人，这场战争进行了几十年，终东汉的统治，一直没有停止。

东汉统治者在对羌人进行残酷镇压的过程中，官僚将军贪污中饱，焚烧劫掠，士卒和汉、羌人民死伤的不可胜数。内地汉族人民也由于惨重的徭役和赋税负担，纷纷破产，到处逃亡，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当时的童谣说：“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卖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这首歌谣反映了东汉统治者为镇压羌人而征发徭役，给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汉族劳动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后果。

〔南蛮〕 南蛮分布在长江中上游，因地区和血缘、习俗的不同，分为武陵蛮、廌君蛮、板楯蛮三大支系。

武陵蛮分布在洞庭湖以西的山岭中，以狗为图腾，狗名槃瓠。传说在远古时期，即从事农业生产，用木皮纤维纺织，以草实染色。西周时期，已进入阶级社会，渠帅名曰“精夫”。春秋、战国时，属楚，西汉时归武陵郡，汉统治者向他们征收裘布，每年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

东汉时期，武陵蛮势力较强大，一再反抗东汉的剥削和压迫。东汉统治者对武陵蛮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东汉中期。封建官府又增加这一地区的租赋，蛮夷抗租抗赋的斗争更加激烈，捕杀乡吏，焚烧官府，斗争延续到东汉末年。

廩君蛮分布在巴郡、南郡一带，也叫做巴郡南郡蛮，以虎为图腾。廩君蛮有五个种姓，即巴氏、樊氏、暉氏、相氏、郑氏，巴氏为君长。战国时期，秦并巴，仍以巴氏为君长，世代与秦贵族通婚，接受秦的封号。君长每年向秦纳赋二千一十六钱，每三年另纳义赋一千八百钱。人民每户每年纳帛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铤。两汉时，仍用秦制。

东汉初年，南郡蛮首先反叛，汉以将军刘尚率军万余人进行镇压，迁蛮民六千余口至江夏（今湖北省麻城县）。此后，东汉对蛮民的剥削更加重，蛮民的反抗也更加激烈。灵帝时，蛮民再次起兵，联合汉民，共十余万人，攻没四县，给予东汉在这一地区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

板楯蛮分布在嘉陵江流域，秦并蜀，昭王曾与板楯蛮君长盟誓：“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sup>①</sup>西汉时，贵族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民户每年每口纳钱资四十钱。

东汉时，各级官僚对板楯蛮的剥削极重，征发频繁，“仆役箠楚，过于奴虏”<sup>②</sup>，板楯蛮一再反抗，沉重打击了东汉王朝的统治。

〔西南夷〕 西汉在南夷地区设置郡、县后，汉族的先进文化、技术相继传入。东汉时，夜郎和滇等地已兴办了学校，经济、文化都有很大的进步。生活在今云南澜沧江流域的哀牢夷也和内地发生了联系。哀牢夷以龙为图腾，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经济以农业为主，又善于织毛罽、帛叠、兰干细布和文绣、绫锦等，以梧桐木花纺绩织布，幅广五

---

①②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尺，洁白不易污损。还懂得染色的技术。这里还出铜、铁、铅、锡、金、银等，已有冶炼金属的技术。公元51年（建武二十七年）至69年（明帝永平十二年）间，哀牢王贤栗和柳貌相继率其族人五万余户、五十余万口归汉朝，东汉在这里设置哀牢、博南二县，又合并益州郡西部六县<sup>①</sup>，置永昌郡，并以西部都尉郑纯为永昌太守，常赋为“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赋税徭役较轻。

永昌郡的西南面是掸族聚居区。自永昌设郡，掸与中原的关系也进一步密切起来。公元97年（和帝永元九年），掸国王雍由调和附近各族遣使到京师洛阳，接受汉的封号和印绶。公元120年，雍由调又遣使来京，“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sup>②</sup>汉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

东汉初，汶山以西的西夷白狼、槃木、唐菟等百余部，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归附于汉。并作歌三章，叙述向慕中原文化之意。这就是著名的《白狼歌》，歌词经当时的犍为郡掾田恭译出，译文和原文（用汉字对音写出）都保存在《后汉书》中，原文中保存了大量的古代羌语的音、义和语汇，是研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语言、历史的宝贵资料。

## 五、东汉中后期的腐朽统治 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东汉从中期开始，政权控制在外戚和宦官两大集团手中，这两大集团各谋私利，互相斗争，政治日趋腐朽。

---

① 六县为不韦、嵩唐、比苏、牂榆、邪龙、云南，原属益州郡西部都尉。

②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外戚与宦官的争权斗争〕 东汉和帝十岁即位，窦太后临朝，其兄窦宪以侍中掌权，宪弟数人并居要职，这是东汉一代外戚专权的开始。窦氏兄弟及其党羽杀人越货，抢劫妇女，官吏畏于权势，不敢过问。窦太后死，和帝与中常侍、宦官郑众密谋，捕杀窦氏兄弟，这是宦官对外戚集团的第一次打击。郑众封侯，宦官的政治权力大增。和帝死，安帝即位，邓太后临朝，重用外戚邓氏和宦官。邓太后死，安帝乳母王圣与中黄门李闰、小黄门江京等在安帝的支持下，诛杀外戚邓氏。这是宦官对外戚集团的第二次打击。李闰、江京升为中常侍，与安帝阎皇后的兄弟阎显等共掌朝政。安帝死，中黄门孙程等又杀江京、阎显等，立顺帝。这是宦官对外戚集团（包括另一部分宦官）的第三次打击。

顺帝时，后兄梁冀为大将军录尚书事，专权近二十年，先后立过三个皇帝，亲属党羽布满朝廷、州郡，大小官僚升迁，先向他谢恩，送大量的贿赂，这些官僚到任后，疯狂搜刮人民。梁冀在洛阳周围强占民田，调发农民，建造了一个私人苑囿，周围千里，许多人家被赶走、破产。梁冀不许人触动苑中的一草一木。有人误杀了苑中一兔，竟有十多个人遭牵连杀害，梁冀还劫略几千口良人为奴婢。公元159年（延熹二年），梁太后死，桓帝与宦官合谋，消灭梁氏及其党羽。梁冀被抄的家财达三十多万万钱，都是搜刮人民得来的。这是宦官对外戚集团的第四次打击。

梁冀死，宦官专政，情况更加严重。参与诛杀梁冀的宦官单超等五人同日封侯，所谓“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中常侍侯览侵夺宅舍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起立第宅十六区，虏略良人为奴婢。他的哥哥侯参任益州刺史，为了

侵吞民财，诬人以“大逆”之罪，捕杀后，霸占财物，前后侵吞民产以亿计。《后汉书·侯览传》说：“五侯宗族宾客虐徧天下，民不堪命，起为寇贼。”腐朽反动的政治统治加速了土地的恶性兼并，加速了农民的破产过程，广大农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

〔清议与党锢——宦官与官行、士大夫集团的争权斗争〕 东汉后期，宦官集团长期专权，排斥打击官僚士大夫，官僚士大夫拼命反对宦官集团，于是宦官与外戚的斗争演变为宦官与官僚士大夫集团之间的斗争。宦官的“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选举、征辟都要按照他们的爱憎进行，这就严重地侵夺了地主士人升官发财的道路。这一时期，太学生已发展到三万多人，各郡县的儒生也很多，他们上进无门，也与官僚士大夫结合，在朝野形成一个庞大的官僚士大夫反宦官专权的势力。他们拼命攻击当权的宦官，咒骂在宦官把持下的选举、征辟是“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清白寒素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他们自鸣清高，互相吹捧，“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这就是所谓的“清议。”

桓帝时，冀州刺史朱穆曾打击过宦官党羽，桓帝把朱穆撤职，关进左校服劳役。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上书桓帝，为朱穆申理，朱穆得到赦免。后十年，宦官陷害官吏皇甫规，也关进左校服劳役，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又上书，得赦免归家。以后，宦官与官僚士大夫（包括太学生）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公元166年（延熹九年），宦官诬告河南尹李膺勾结太学生，“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大怒，逮捕了李膺等二百余人，后虽赦免，但却禁锢终身。这是第一次

党锢。第二年，桓帝死，灵帝即位，太后之父窦武以大将军与太傅陈蕃辅政，起用李膺等所谓党人，共谋诛除宦官。事泄，宦官曹节发兵捕杀窦武、李膺一百余人，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远及五属，有官位的，都免官禁锢。这是第二次党锢。

官僚士大夫集团是地主阶级的一个政治集团，但是这个集团的人物也有一些差别。如李膺、陈蕃、王畅、朱穆等少数官僚和一些太学生，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反对宦官及其党羽爪牙为非作歹，试图打击、剷除这个恶势力。但大部分官僚士大夫为了功名利祿而趋炎赴势，他们“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名与实反，心与迹违”，在台上就疯狂压迫、剷削人民；在台下仍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宦官和官僚士大夫之间的斗争，是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两个主要集团之间的斗争，主要是为了争夺对广大人民的统治权。它们在剷削压迫农民方面是一致的。因此，它们都仇视农民的斗争，仇视农民起义。公元184年（中平元年）黄巾大起义时，宦官、官僚和汉灵帝都认为有必要解除禁锢，起用“党人”，弥合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以镇压农民。于是以灵帝下诏的形式，解除了“党锢”，宦官与官僚之间的斗争暂时中止，他们联合起来对黄巾军进行了血腥的镇压。

〔黑暗腐朽的统治〕 灵帝时，后宫采女数千人，一天挥霍数百金。灵帝疯狂地搜刮民财，开西邸卖官，自公、卿下至郎、吏，都有定价。公价千万，卿五百万。地方官剷削方便，定价也高，二千石价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县令、长当面议价，按该县肥、瘠，定价高低。富的先纳钱，贫的



到官后加倍纳钱。灵帝在西园造万金堂，把司农所储金钱缿帛都积满万金堂中，又寄存钱于小黄门和常侍家，每人寄存数千万，还在河间（今河北献县）“买田宅，起第观”，作为一旦统治垮台后继续剥削人民的手段。刺史、守令，多由宦官的子弟亲属充当。他们搜刮民财，劫略妇女，无恶不作。灵帝说：“张常侍（让）是我父，赵常侍（忠）是我母”。郎中张钧上书说：“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宜斩十常侍，悬头南郊，以谢百姓。”灵帝把他逮捕毒打，死于狱中。为修治南宫，从太原、河东、狄道运木材、文石，至京师，宦官以材料不合格为借口，拒不接收，却又以十分之一的低价强制收买，再以高价卖给原州郡上交，有的木料经过反复卖买，以至腐烂，宦官和地方官吏乘机大发横财。

〔农民斗争的蓬勃发展〕 广大农民在皇帝、贵族、宦官、官僚、地主的重重压迫和剥削下，常年辛劳，胼手胝足，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破产、逃亡的现象日益严重，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早在安帝时，以张伯路为首的农民起义军转战于沿海九郡，又与勃海、平原起义军联合，攻入厌次（今山东惠民县），杀县令。顺帝时，农民起义的更多，长江下游和沿海一带的斗争蓬勃发展，连破郡县，杀伤长吏。公元153年，三十二个郡国发生蝗灾和黄河泛滥，受灾者有数十万户之多，官僚、地主乘机侵刻农民。广大农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冀州的情况更加严重。灵帝时，政治更加黑暗腐朽，北从幽、燕南到岭南，西从凉州东到海滨，到处都有农民起义军。当时在农村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

轻”。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军都推举自己的领袖，称为将军、天子、皇帝、太上皇、黄帝、黑帝、真人等，以反对封建统治和剥削相号召，革命斗争蓬勃发展。

## 六、黄巾大起义

### 〔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

1. 太平道教和黄巾大起义 东汉中期，太平道教开始传播。顺帝(公元126—144年)时，于吉于今江苏、山东一带传道，其经典是《太平清领书》，传道主要在乡间进行，信徒多是贫苦农民。东汉末年，太平道首领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在各地传教，手执九节杖，教病人叩头思过，饮符水治病。这一时期，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封建国家和豪强地主对于农民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空前残酷。说教和符水这些形式不可能解除农民的痛苦，广大农民希望以革命的手段推翻黑暗的统治。张角和他的弟子在农民的革命思想和革命行动的影响下，走向革命的道路。他们传教十余年，仅在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就有信徒数十万人。

为了发动起义，张角等做了长期而周密的准备。他们划分各郡县为三十六方，方的首领也称方(相当于将军)，大方部属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作为起义的基本力量。他们又传布“苍天(东汉)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sup>①</sup>，天下大吉”的口号，鼓舞广大农民起来革命；还派人在京师洛阳和各州郡官府的门上用白土书写“甲子”二字，以扩大宣传

---

<sup>①</sup>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为“甲子”年。

鼓动。

张角等原定 184 年（中平元年）三月五日起义，在此之前，大方马元义收调荆、扬数万人至鄴（今河北临漳），准备起义时首先攻打洛阳。马元义还利用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到洛阳争取中常侍封諝、徐奉等为内应。在二月间，叛徒唐周告密，马元义被捕牺牲，洛阳城内与起义有联系的人民群众及吏卒被杀的一千多人。

张角得知事泄，星夜通知各方，提前起义。起义军以黄巾包头，张角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领导钜鹿的黄巾军，波才在颍川（今河南禹县）、彭脱在汝南、陈国（今河南上蔡、淮阳）、张曼成在南阳、卜巳在东郡、戴凤在扬州几乎同时领导黄巾起义。此外，幽州、益州等地都爆发了黄巾起义。《后汉书·皇甫嵩传》说：黄巾大起义后，“所在燔烧官府，劫掠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黄巾大起义声势浩大，发展迅猛异常。

2. 黄巾军的革命斗争 黄巾军起，东汉统治集团张惶失措。汉灵帝一面解除党锢，一面下诏各州郡镇压黄巾军。还在京师周围的函谷、广成、伊阙、轘辕、孟津诸关设置都尉，增兵防守。汉灵帝派与“党人”关系密切的皇甫嵩、朱儁、卢植等人为中郎将，率兵进攻黄巾军。各地的豪强地主把宗族、部曲家兵组织成地主武装，多的万人，少的数千人，修筑壁垒坞堡，与黄巾军对抗。皇甫嵩、朱儁等的军队大部分是由地主武装组成的。

皇甫嵩、朱儁各率四万余人，首先进攻颍川黄巾，才一接战，朱儁部就被击败，皇甫嵩被围困在长社城中。后来他

们得到曹操地主武装的支援，打败了颍川黄巾，数万起义农民惨遭杀害。波才率颍川黄巾余部退到汝南、陈国一带，与彭脱部黄巾联合作战，后被皇甫嵩、朱儁打败。接着，东郡黄巾也被皇甫嵩等打败，农民军被杀的有七千余人。

东汉王朝派卢植率北军进攻张角，被张角打得大败，卢植被撤职，改派董卓进攻张角部，又大败。东汉王朝再调皇甫嵩进攻张角部。此时，张角病死。张梁率领黄巾军迎击皇甫嵩于广宗（今河北威县），黄巾军勇敢善战，给予皇甫嵩军以迎头痛击。后来皇甫嵩用偷袭的办法打败黄巾军，张梁战死，黄巾军英勇牺牲的有八万多人。皇甫嵩又进攻下曲阳（今河北省晋县）张宝部，张宝战死，所部死伤被俘的十余万人。皇甫嵩在下曲阳城南把起义农民的尸体一千多具，集中起来，筑成一个大土堆，叫做“京观”，以恐吓农民，这充分暴露了反动统治阶级对于劳动人民的刻骨仇恨。

南阳黄巾在张曼成的率领下，杀南阳郡守，围攻宛。张曼成战死，赵弘又统帅所部攻下宛，众至十余万人，以宛为根据地，连破东汉官军。东汉王朝调朱儁和荆州刺史、南阳郡守联兵进攻黄巾军，不能取胜。黄巾军连续打击官军，长期鏖战于宛城，黄巾军首领赵弘、孙夏相继战死，起义军牺牲数万人。至十一月，终于失败。

这次黄巾大起义从中平元年（184年）二月开始，到十一月失败，共战斗了九个月，组织在黄巾旗号下的起义军约有百余万人，起义风暴席卷全国。由于这次起义有计划有纲领有组织有准备，起义地区广大，战士斗争英勇，给东汉王朝和豪强地主以沉重的打击，摧毁了许多地主庄园，从根本上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这次起义虽被镇压下去，可是革命

的烈火已燃烧起来，各地的斗争前赴后继。

〔黑山黄巾和青徐黄巾的革命斗争〕 张角领导的黄巾军失败才三个月（中平二年二月），各地又相继爆发了新的农民起义，战斗在中山、常山、赵郡、上党、河内等郡国山区的起义军有上百万人，号称“黑山军”或“黑山黄巾”，部属很多，其首领嗓音大的号雷公，骑白马的号张白骑，轻便的号飞燕，多髯的号于氏根，大眼的号大目。大部二、三万人，小部六、七千人，各部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他们共同推举张牛角为帅，张牛角战死，又推张飞燕（原姓褚）为帅。这支起义军转战河北诸郡，和军阀袁绍、曹操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战斗，处死了许多郡守、县令和地主，给地主阶级以沉重打击。经过十余年的战斗，各部时有胜败。后来，张飞燕为地主军阀公孙瓒所利用，进攻袁绍，被袁绍击败，张飞燕率部投降了曹操。

在黑山黄巾正激烈地战斗在黄河以北之时，黄河以南的青州、徐州一带，于188年（中平五年）再次爆发了农民大起义，称做青徐黄巾军，连破州、郡，诛杀长吏，许多官僚地主被迫逃亡他郡或渡海逃到辽东，青徐黄巾人数发展到一百余万。公元191年（初平三年），青徐黄巾三十万人进攻泰山郡，被太守应劭击败，又转攻渤海，欲与黑山黄巾联合作战，为公孙瓒所截击，又大败，牺牲三万余人。黄巾南渡河，又为公孙瓒所乘，死数万人，被俘七万余人。黄巾军虽在河北失利，可是在河南的战斗还很强。192年夏，黄巾以百万众攻入兖州，连破官军，杀任城（今山东省济宁市）相郑遂、刺史刘岱和济北（今山东省平阴北）相鲍信。后为曹操击败，退至济北，尚有战士三十万人，可是由于随

军眷属太多，妇孺老弱达百余万口，粮食不继，最后都被曹操收编了。

〔汉中、巴郡的农民政权〕 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爆发不久，天师道首领张修也于同年七月领导巴郡和汉中农民起义。天师道的传教方式和太平道基本相同。因使受治的病人出米五斗，所以也称做“五斗米道。”

天师道的另一个首领张鲁，三代传教，自号师君，下属有祭酒，各领部众，部众多者称治头大祭酒，信徒很多，是一个很大的政治势力。在这一时期，益州黄巾起义，攻杀刺史、郡守，在一个月中，连破三郡，众至十余万。191年，益州牧刘焉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瓦解农民起义军，在益州搞独立王国，以张鲁为督义司马，张修为别部司马，要他们进攻汉中。张鲁、张修率军打败了东汉在汉中的军队，杀太守苏固，消灭了南郑的豪族赵嵩等地主武装，攻占了汉中。张鲁又杀了张修，脱离刘焉的节制，攻占巴郡，成为以汉中为主包括巴郡部分地区的农民起义军的首领。

张鲁在汉中巴郡镇压了一批豪强地主，建立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民政权，这个政权是政教合一、劳武结合的。他的经济政治纲领，主要是诸祭酒各在大路上置义舍，内储米肉，来往行人吃饭不要钱，目的是为了招来关中地区的流民，犯轻微错误的人罚修道路，犯法的人以说服教育为主，“三原而后刑”，不置官吏，祭酒兼管政、教。史书说张鲁在汉中实行这些政策的结果，“民夷便乐”，流民来归的前后数万家。

在汉中、巴郡，汉族夷族地主仍然很多，如阎圃、杜濩、朴胡等都很有势力，在张鲁统治的二十多年中，阶级分化、

土地兼并在发展，张鲁及其统治集团也越来越贵族化，曾一度反映农民利益的政权逐渐变质为封建地主政权。

公元215年，曹操率十万人进攻汉中，张鲁军曾进行过有力的抵抗，曹军死伤极多，一度想退走。张鲁为了本集团的私利，害怕曹操继续进攻，在小挫之后，就向曹操投降了。张鲁被封为列侯，阎圃、杜夔、朴胡等官僚、地主一千余人，都封官进爵。

### 〔黄巾大起义的特点和历史作用〕

1. 黄巾大起义的特点 黄巾大起义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三次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这次起义有三个主要特点：

(1) 起义有计划、有纲领、有组织、有准备。“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一口号就是他们的政治纲领和行动纲领，这个纲领反映了他们的推翻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建立农民政权，谋求广大人民的安乐生活的思想要求。分天下三十六方，组织起义，集中主力军于鄴，准备攻打京师洛阳，又联合某些同情起义的中常侍和吏民以为内应，也说明了他们为起义而进行的布置是相当周密的，所制造的革命舆论也是相当广泛的。

(2) 黄巾军内部比较统一，斗争坚决，领导骨干具有革命牺牲精神。虽然各地起义军一开始就被地主武装包围、分割，没能迅速集中以开展大的运动战，可是他们各自为战，坚决斗争，给予地主阶级和封建官府的打击仍然是极其沉重的。

(3) 利用宗教组织发动农民起义，黄巾军利用太平道这种宗教形式以组织群众，利用某种信念以加强革命思想，发动革命，反对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但不受宗教教义的

束缚。这在当时也有某些作用。

2. 黄巾大起义的历史作用 黄巾大起义的主要历史作用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 推翻和改造了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东汉后期，宦官专权，政治极端腐朽反动，徭役、赋税不断增加，其他的搜刮也是十分严重的。这样的黑暗统治加速了土地兼并和农民破产的过程，严重地阻碍、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黄巾大起义在广大地区内镇压了一些官僚、地主，焚毁了一些官府、坞壁，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东汉王朝的政治统治的基础，破坏了封建的统治秩序，使东汉王朝分崩离析，名存实亡，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扫除了许多障碍。

(2) 黄巾大起义后土地兼并缓和下来，许多为贵族、官僚、豪强地主占有的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这些农民后来不论以自耕农的身份或以屯田农民的身份向封建国家纳租，在受剥削和奴役方面，较农民战争之前都有所减轻，生活比较稳定，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3) 黄巾起义虽然失败了；可是他们的斗争经验，他们的临危不惧，敢于牺牲的精神，都作为中国人民的光荣的革命传统而留传下来，在此后一千七、八百年的历史中，一直在鼓舞着广大农民进行革命斗争。

## 第五节 两汉时期的文化

### 一、哲学

〔董仲舒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董仲舒是西汉前期



的今文学家，治公羊《春秋》。他的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一书中。

董仲舒的宇宙观是唯心主义的。他反对天道自然观，进一步发展了先秦的“天人同一”思想，这个思想的核心是“天人感应”说。他说天是“百神之大君”（《春秋繁露·郊祭》），执政的人必须“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玉杯》）。他认为人间的政事由天主宰，执政的人要按照天的昭示从政，否则就遭失败。他说：“谨按《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迺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迺至”。因此，“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汉书·董仲舒传》）。这是用“君权神授”的反动理论来为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

董仲舒的方法论是形而上学的。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道是“法则”、“规律”，这里说的是统治人民的道即封建制度是不变的。董仲舒还鼓吹三纲五常这些封建伦理教条，说“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汉书·董仲舒传》）系统的宣扬孔孟之道。从此，儒家学说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镇压人民的反动理论根据。

〔讖緯〕 西汉末年，讖纬开始盛行。讖是巫师和方士伪托神灵编造的谜语式的预言，有的附图，亦称图讖。纬是伪託神意解经的书籍，与经相对而称纬。成帝时，有六经六纬。王莽提倡讖纬，利用讖纬为他篡夺皇位制造根据。西汉末年农民战争期间，刘秀在河北提倡讖纬，也是为了夺取皇位。在他当了皇帝后，又“宣布图讖于天下”，从此讖纬成

为封建国家法定的经典。东汉时，讖纬共有八十一篇，包括《七纬》<sup>①</sup>和《河图》、《洛书》，总名曰《河洛七纬》，被称为内学，“五经”为外学，讖纬的政治地位比经学还高。

讖纬的内容主要是用阴阳五行之说宣扬神灵怪异，为封建统治服务。其中有少量解经、述史和天文、历数知识。

古文经学家多反对讖纬，东汉初年的桓谭极言讖纬妖妄，刘秀怒责桓谭为“非圣无法”，要把他处死。此后，尹敏、王充、张衡、荀爽、荀悦等人都反对讖纬。

〔王充的唯物主义思想〕 王充（公元27—96年），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出身于“细族孤门”，做过几年州郡小吏，大部分时间居家教授，著有《论衡》一书，计八十五篇（今存八十四篇），二十余万言。

王充的宇宙观是唯物主义的。他认为万物由元气构成，“元气未分，混沌为一，及其分离，轻者为天，浊者为地”（《论衡·谈天篇》）。人和禽兽也是由元气演化而来。他认为元气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

他反对天人感应说，反对有神论，发展了古代的天道自然观。他说：“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人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论死篇》），他认为鬼只不过是人们的一种幻觉。

---

① 《七纬》是与《易》、《诗》、《书》、《礼》、《乐》、《春秋》、《孝经》七经相对而得名的。

王充对于孔、孟和儒家经典也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他还反对儒者对孔子的片言只语进行无穷无尽的推衍。他责问说：“夫贤圣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他对孔子的言论反复提出问难。

王充的论证方法是“引物事以验其言行”，是比较科学的。但由于当时自然科学不甚发展，引作论据的事物往往不真实，因之论断也难免错误。如在批判有关“天神取龙（雷电击树破屋）”时，却说龙和牛相似，可畜可食；又和鱼相似，能乘雷电飞行。王充受时代和阶级立场的限制，在说明一些社会现象时，往往归之于天命。

## 二、宗教

〔佛教〕 佛教的创始人是迦毘罗卫城（今尼泊尔王国境内）净饭王太子悉达多（约公元前565—前485年），释迦牟尼是佛教徒对悉达多的尊称。公元前2年（西汉哀帝元寿元年），佛教国大月氏使臣伊存来长安，博士弟子景庐从伊存口授浮屠（佛）经。东汉明帝永平（公元58—75年）中，蔡愔至印度研究佛学归来，在京师洛阳建寺译经，中国开始有汉译本佛经。东汉末，西域僧人安世高、支谶等相继来到洛阳，翻译佛经。汉人严浮调从安世高学经，并参预翻译。安世高译经三十余部，百余万言，支谶译经十四部。从此，佛教教义也在中国流传。

最早信奉佛教的是封建贵族，他们把佛教和中国的黄老学看成是同样讲究“清静无为”、“息心去欲”的说教，用来作为他们的骄奢淫逸的生活的一种精神补充。东汉初年，刘秀的儿子楚王英“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后汉

书·楚王英传》)。桓帝时，“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

(《后汉书·襄楷传》)。东汉中期、后期，政治黑暗，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统治阶级宣扬佛教的灵魂不灭，因果报应以及善、恶轮回说，以欺骗人民。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sup>①</sup>佛教正是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适应了统治阶级麻痹人民的需要，逐渐传播开来。

〔道教〕道教是在东汉中期由黄老学说与巫术结合而产生的。顺帝(公元126—144年)时，琅琊(今山东临沂)人宫崇到洛阳，献其师于吉所得《太平清领书》一百七十卷，“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覡杂语。”(《后汉书·襄楷传》)这是我国最早的道家经典。今存的《太平经》残本基本上保存了这部经典的面貌。《太平经》的大部分篇幅是宣扬有神论、唯心论和封建思想，但其中的一些篇章里也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比较进步的观点。例如说：“夫人各自衣食其力”，“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还反对豪强地主兼并财富，反对高利贷剥削，主张“见人穷厄，假贷与人，不责费息”，“人有财相通”，以天地之财“以共养人”<sup>②</sup>。这是仇视剥削阶级，主张互助的原始共产主义思想。

东汉末年，道教分为两大支派，一支为太平道，以张角为教主，在黄河南北传教；另一支为五斗米道，以张鲁为教主，在汉中、巴郡一带传教。两派的信徒多为贫苦农民，这

---

①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3页。

② 以上所引见《太平经》卷三五《分别贫富法》、卷六七《六举十三诀》、卷一一四《为父母不易诀》、《太平经钞》戊部第十二页。

些信徒后来成为农民大起义的主力。

### 三、经学

〔今文经学〕 西汉初年，新上台的封建地主集团为了使文化为他们的统治服务，一面废除挟书令，发掘古代典籍；另一面又派官僚从老儒学经。当时书籍缺乏，老儒依靠记忆，背诵传授经书，弟子用通行文字（隶书）记录下来，这样的经书就是所谓的今文经。文帝时即置经学博士（经师），武帝设太学，置五经博士，教授弟子。老儒对经文的记忆不完全相同，解说也有很大差异，一经有几家说法。宣帝时，立于学官的，《易》有施、孟、梁丘三家，《书》有欧阳、大小夏侯（夏侯胜、夏侯建）三家，《诗》有齐、鲁、韩三家，《礼》有后氏一家，《春秋》有公羊、谷梁二家，共十二博士<sup>①</sup>。东汉初增置十四博士。

博士及其弟子多以治经为猎取功名利禄的重要途径，他们拘守一经一说，标榜门户，经师“各以家法教授”，弟子恪守师传，不敢踰规范，形成许多封建学术宗派。他们用烦琐的文字附会经义，用经义附会政治。如《书》的经师秦延君用十万多字解释“尧典”二字，用三万字解释“曰若稽古”四字。解说繁乱，望文生义。班固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寔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汉书·儒林传序》）为了统一今文经的解说，使经学更有效地为封建统治服务，东汉章帝

<sup>①</sup> 参看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观堂集林》卷四。

召集大批今文经师于白虎观，讨论经义，由班固整理，写成《白虎通义》一书。大宣扬神秘的“天人同一”说和阴阳五行等迷信学说，大肆宣扬唯心主义。东汉末年，今文经学家何休仿效古文经学的注解方法，撰成《春秋公羊解诂》，使公羊《春秋》的经义更适合地主阶级巩固统治的需要，得到今、古文学家的重视。

〔古文学〕 西汉前期，在孔子旧宅和各地相继有古书发现。武帝时，下令献书，许多古书集中到京师。成帝时，以陈农负责收集古书，由刘向负责整理。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任宏校兵书，尹咸校数术，李柱国校方技。每校完一书，由刘向条定篇目，写出提要。刘向死，其子歆继续这一工作，总括群书，分类编次，写成《七略》<sup>①</sup>，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目录学著作。班固著《汉书·艺文志》就是根据《七略》一书稍加删削而成的。

刘歆校书时，发现了许多用篆文书写的经籍，不仅经文与今文经互异，如《礼》多三十九篇，《尚书》多十六篇，还有《毛诗》、《春秋左氏传》等，都为今文经所未载，这就是所谓的古文经。刘歆认为古文经更能为封建统治服务，建议为古文经立学官，遭到今文经博士的激烈反对。刘歆批评今文经博士，“专已守残，党同门，妬道真。”（《汉书·刘歆传》）可是由于执政大臣也反对，刘歆的建议没有成功。平帝时，王莽专权，为了利用古文经“改制”篡位，就立《古文尚书》、《毛诗》、《逸礼》、《左氏春秋》四

---

<sup>①</sup> 《汉书·艺文志》说：“（七略）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

个博士。东汉初，又被取消。

古文经虽不得立学官，但在地主知识分子中流传很广。古文经学家按字义解经，极力恢复先秦儒家学说，并加以发挥，以为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东汉前期，古文经学家贾逵兼通今文经，著有《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为古文经学奠定了基础。班固的学生马融著《三传异同说》，又注《孝经》、《论语》、《毛诗》、《易》、《三礼》、《尚书》等书，使古文经学进一步发展。马融郑学生玄精于经学，所注《易》、《诗》、《书》、《礼》、《仪礼》、《论语》、《孝经》、《尚书大传》等，兼采古、今文经说，得到两派经学家的拥护，号称“郑学”。从此，以郑学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成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一个重要思想工具。贾逵的学生许慎为了反对今文经派根据隶书穿凿附会，曲解经文的情况，用了二十二年的时间，写成《说文解字》一书，收小篆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古文（战国文字）、籀文（西周、春秋文字）一千一百六十三文为重文；字分六书<sup>①</sup>，逐字标明字形，注出音读，推究字义，全书分为五百四十部，全部解说不过十三万三千多字，极为简要。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编辑完善、内容丰富的字典，不仅是研究我国古代经史的重要典籍，也是研究古文字的必读之书。

#### 四、史学

两汉时期，封建统治阶级继承了前代官修史书的传统，

---

<sup>①</sup> 许慎《说文解字·叙》说六书是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

在中央设史官，纂修历史。其中最有名的史书是《史记》和《汉书》。

〔司马迁和史记〕 司马迁（公元前135—前93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其父司马谈，武帝时为太史公，拟根据《春秋左氏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书，撰写一部史书，未及撰述就病死。司马迁十岁开始诵习古文，二十岁时，周游今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安徽、山东、河南的大部分地区，游览了许多名山大川和名胜古迹，了解了各地的一些风尚习俗和民间传说，接触过社会的各个方面，访问过一些著名的人物。后为郎中，奉使到今四川、云南等地，访问过许多少数民族。继父任太史公后，又得尽读史官所藏图书。他的学术根基深厚，经历丰富，是撰写《史记》的重要条件。

《史记》的撰述开始于公元前104年（武帝太初元年），约用了近十年的时间撰成。上迄黄帝，下迄“当代”（武帝时），以人物传记为主，辅之以编年和纪事，体例严整，内容丰富，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为此后两千年间正史编纂的规范。全书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官，其写作目的是为了载述“明圣盛德”，“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史记·太史公自序》），为西汉王朝的统治服务。可是前99年（天汉二年），他为李陵降匈奴一事辩护，触怒了武帝，被处腐刑（宫刑），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思想上起了某些变化。他说：“诟莫大于宫刑”，他用孙子臧脚、屈原放逐等古人古事来自勉，借撰述以抒发郁结，申述己志。他对西汉皇帝（从高祖刘邦



到武帝)在政治方面的残暴黑暗,生活方面的奢侈腐朽,有所揭露,对于陈胜、吴广、项羽、英布等农民起义领袖,极力歌颂。他把项羽列入本纪,载入刘邦的本纪之前,把陈胜、吴广列入“世家”与孔子、萧何、曹参同列,对于这些革命领袖的起义业绩的记述比较忠实具体,评价也很高。除此之外,还为古代、当代的著名学者、医者、商贾以及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名人立传,又对天文、历法、礼乐、水利、经济、少数民族以专章论述,比较具体生动的反映了我国正在形成的多民族国家的面貌。

〔《汉书》和其它史学著作〕 《汉书》的作者班固(公元32—92年)字孟坚,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其父班彪作《史记后传》六十五篇,欲接续《史记》。彪死,固为郎,典校秘书。用了二十余年的时间,修成《汉书》一百卷(后分为一百二十卷),分十二纪、十志、八表、七十列传,始于刘邦,终于王莽复灭,记二百三十余年间的史事。属于西汉前期的内容,多采自《史记》,全书体例也仿照《史记》,惟改书为志,废世家入列传。《汉书》十志比《史记》八书的内容详备,《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和《百官公卿表》等全属新创。《汉书》是我国第一部体例严整、内容丰富的断代史。各传多载录有关学术、政事文章,因之又兼有一代文章总集的性质。班固死时,八表、《天文志》还没有写好,后分别由其妹班昭和史学家马续续成。

《汉书》强调帝王正统,改项羽、陈涉入列传。晋人傅玄评论说:“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书。”思想性不如《史记》。

两汉时期的其他史学著作，有班固等人撰的《东观汉记》，荀悦撰的《汉记》，赵晔撰的《吴越春秋》，袁康撰的《越绝书》，后两部书是兼采史书记载和民间传说写成的有关吴、越两国兴亡的史书，是我国最早的民族史。

## 五、文学艺术

〔散文 赋 诗歌〕 两汉时期，散文文学很发展。《史记》就是一部很好的散文集，很多篇本纪、列传具体生动地记述或刻划了社会各个方面的事件和人物，形象曲折地表达了作者的爱、憎。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sup>①</sup>。

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论贵粟疏》、《徙民实边疏》，仲长统的《昌言》，王符的《潜夫论》等，都是有名的政论文章。经桓宽整理写定的《盐铁论》，是一部以讨论西汉经济政策为题材的文字生动、语言流畅的对话体文学作品。

赋是两汉时期的一种新的流行的文学体裁。这种体裁承袭汇合了《诗经》的歌功颂德，《楚辞》的抒情，荀赋的咏物说理而形成的，散韵并用，形式活泼。

西汉初年，赋的内容比较实际，贾谊的作品是这一时期的代表。西汉中期，社会经济、文化相当发展，思想统治严格，许多文人学者多以其较丰富的文化知识，用赋这一文学形式来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司马相如的作品就是典型的代表。他的《子虚赋》、《上林赋》、《长门赋》，把汉武帝

---

<sup>①</sup> 《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08页。

的穷奢极欲的宫廷生活用华丽的词藻、迷离的景物、恢廓的气势，进一步升华夸张，来作为最高统治集团生活的一种补充和享受。

东汉时期，赋改变了形式主义的状况，向反映现实的方向发展，篇幅短小，这就是小赋。张衡的《思玄赋》、《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等，都表达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的不满，揭露了官场的黑暗腐朽，对于人民的贫困生活也有一定的同情。

两汉的诗歌以《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为代表。《乐府》也叫《乐府诗》，是汉武帝时期由乐府采集民间诗歌选编配乐而成的诗集，内容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战城南》、《十五从军征》、《平陵东》、《思悲翁》、《东门行》、《上山采芜藟》、《有所思》、《陌上桑》等，分别反映了人民的悲惨遭遇，对繁重徭役、横征暴敛的不满，反映了妇女不幸的命运及其坚强不屈的性格等。

《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时期的中下层知识分子的作品。这些知识分子在当时的黑暗社会中，为求功名利禄，背井离乡，四处奔走，把对于社会的感触，倾注到作品中。如《冉冉孤竹生》、《孟冬寒气至》、《明月何皎皎》、《迢迢牵牛星》等，就是倾述生离死别、情感追求、仕途坎坷的诗篇。《生年不满百》、《青青河畔草》等则充满了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消极颓废思想，反映了作者走头无路内心苦闷的境况。

两汉的诗歌，形式自然朴素，用语通俗深刻，与赋体很不相同，它发展了周代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对于后代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绘画 雕塑 舞蹈 杂技〕 两汉时期，绘画很发展。宫廷府寺的墙壁上，贵族、官僚、地主的宅第、墓壁上，盛行以绘画装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景帝时鲁恭王修建的灵光殿。据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记载，壁画先是太古裸体粗犷奇怪的神话人物，其次是穿戴冠冕的黄帝、尧、舜，再其次是夏、商、周三代兴亡。凡历史上著名的所谓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的事迹，国君的贤愚、政事的成败，莫不绘载。主题之外，饰以天文、万物、神怪、异事，是一组色彩鲜明，情态生动的巨幅图画。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一幅彩绘帛画，全长二〇五厘米，上部宽九二厘米，下部宽四七·七厘米。帛画内容由三个部分组成，上部左右各绘扶桑九日和嫦娥奔月两个神话故事，中部绘贵妇出行图，下部绘宴饮图。主题之外，饰以飞龙、异兽、特钟、巨磬等等，以朱砂、石青、石绿绘制，线条流畅，着色鲜艳精细，人物情态自若，鸟兽栩栩欲生。这是我国古代绘画的珍品。

这时的雕塑艺术也很发展，保留到今天的有若干件巨型石刻。霍去病墓前的石刻是最早的一批，都是用巨大完整的石料顺势加工而成的。有石虎、卧马、卧牛、猩猩、人熊相搏等，其中以战马匈奴石刻最著名。此外，在今山西、河南、四川等省还有一些石虎、石狮等，古朴雄伟，神态生动。1969年，在甘肃武威雷台地方的一座东汉墓葬中，发现了一百七十多件青铜器，其中有铜马四十四匹，铜奴婢俑二十八件。有一匹天马，凌空飞驰，形态矫健，头微左扬，三足高举，长尾飘风，右后足踏一飞燕，燕展翅疾飞，作惊悸回首状。这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的一件极为优秀的代表作品。

贵族、官僚、地主的墓葬多用画象石、画象砖砌成，画象多用单线阴刻或阳刻技法，有官僚出行图、狩猎图、战争图，还有农业生产、煮盐、锻铁、木工、纺织、宴饮、百戏、烹调等场面，内容十分丰富。这是我国保留到今天的最早的一批浮雕艺术，也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

音乐、舞蹈、杂技也很发展。在原有的汉族音乐舞蹈的基础上，兼收了边疆各族和外国的一些内容，如乐器有箜篌、箜篌、羯鼓、琵琶、羌笛等，舞蹈有巴渝舞等，都在中原地区传播。杂技叫做百戏，有些是从外国和少数民族地区传到中原的。武帝时，安息国赠给了黎轩（罗马帝国）眩人，东汉安帝时，掸国王雍由调赠给了乐器和幻人，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身体、换牛马头，又善跳丸，据说能跳上千个。长安和各地经常演出杂技，有角抵、眩变、假面等等。

## 六、科学技术

〔天文 历算〕 我国古代有六历，即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历，一岁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以四分之一为余日，称为四分历。秦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闰月放在九月之后，称为后九月。武帝时，颛顼历已行用百余年，出现了“朔晦月见，弦望满亏”（《汉书·律历志》）的现象。武帝以司马迁、星官射姓、历官邓平和民间历算家唐都、落下闳等二十余人改进历法，于前104年（太初元年）编成新历，这就是有名的太初历。太初历一岁、一月的日数比四分历多了一些，比较科学，行用一百八十九年才出现重大差误。太初历根据气象实测和多少年来史官的记录，制定

了一百三十五个月的日食周期（称为“朔望之会”，约在十一年中有二十三次日食）。自有了这个周期，历家可以校正朔望，预知日食。

关于天体结构，古代有三种说法，就是宣夜说、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已失传，盖天说认为“天象盖笠，地法复槃。”这个说法违失太多，史官多不采用。浑天说认为天地之象如卵之裹黄，“天转如车毂之运也，周旋无端，其形浑浑，故曰浑天”。这种说法对于天体结构的设想比较近于实际，多被史官采用。

东汉安帝时，太史令张衡掌天文，撰《灵宪》一书，比较正确地阐述了许多天文现象。如说“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也。”他在西汉浑天仪的基础上，设计了一种新的浑天仪，以漏水转动，星宿出没，与灵台观象所见相符合。张衡还作候风仪和地动仪。候风仪制法失传，地动仪是用精铜制造，园径八尺，形似酒樽，内置机关，在八个方向各按一个龙头，哪一个方向发生地震，同方向的龙头就口吐铜丸，发出警报。

天文学的发展，特别是浑天仪、地动仪的制造，不仅是科学技术上的一大成就，还促进了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发展，有力地打击了喧嚣一时的图讖、迷信之说。崔瑗在张衡的碑铭上盛赞他“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汉书·张衡传·论》）

〔医学〕 两汉时期，医学很发展，官府设有医官，民间医师也很多，多数方士兼通医道。

西汉初年，临菑人淳于意是著名的医学家，曾为齐的太仓长，因号仓公。少时受业于同郡老医家阳庆，学“黄帝扁

鹄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生，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甚精。”（《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后专以行医为业，极负盛名，教授弟子很多，都为一时的名医。两汉后期，楼护是造诣很深的医学家，他读过医经、本草、方术书数十万言，在长安行医也很有名。

西汉时期的医学成就在《汉书·艺文志》中得到反映。《艺文志》著录方技三十六家，医学著作八百六十八卷，其中有《妇人婴儿方》、《金创瘕瘦方》、《风寒热十六病方》、《五脏六府痹十二病方》等科别著作，有关于医治风湿、疝气、黄疸、狂颠等病的著作，还有方剂、药物、按摩、养生等著作。药理学很发展，《神农本草经》一书约在此时编成，共著录药物三百六十五种，其中计有植物药二百五十二种，动物药六十七种，矿物药四十六种。如桂枝、麻黄、杏仁、石膏、附子、黄芩、黄连、知母、柴胡、地黄、当归、芍药等，在临床上有卓越的疗效。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较完善的药理学著作。

东汉时期，医药学更发展，有许多著名医家，见于著录的常用药物有四百多种。

〔纸的发明〕 周秦时期，以竹木简和缣帛作为书写绘画材料，简重帛贵，不便使用。西汉中期，宫廷中已使用一种丝质的纸，薄而小，叫做赫蹏。1957年，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市灞桥附近的一个西汉早期墓葬中，发现了一片用麻类纤维制成的纸张，此后在其他地区还发现有属于西汉后期、东汉初年的用植物纤维制造的纸张。

东汉和帝时，宦官蔡伦改进了造纸方法，将树皮、麻头、敝布、鱼网等植物纤维捣成浆液，制造出了质量较好的

纸张，于公元105年（元兴元年）献给和帝。从此，这样的造纸方法得到推广，被称为蔡侯纸。造纸术又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和改进，到了晋朝，有很大进步，纸张成本低廉，平滑合用，完全代替了简帛，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

我国的造纸术约在公元三、四世纪传入朝鲜，后又传到日本，唐中期，传到中亚，后经阿拉伯诸国传到北非和欧洲。造纸术的发明，对于世界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 第五章

# 三国、两晋、南北朝。阶级斗争、 民族斗争的发展和南方经济的上升

### 第一节 魏、蜀、吴三国分立 和西晋的短期统一

#### 一、黄巾起义失败后地主阶级重建封建统治

〔三国分立局面的形成〕 轰轰烈烈的黄巾运动虽然被东汉政府军队和豪强地主的私兵镇压下去了，但是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统治秩序已被打乱，要想恢复东汉政权对全国的统治，是不可能的事了。

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北方各地豪强地主扩大了原有的私兵队伍，形成武装割据。东汉各州郡的官吏也纷纷扩充势力，与地主武装相勾结，各霸一方。这些封建割据者明争暗斗，都想窃取农民战争的胜利果实，争夺统治权力。

公元189年，洛阳宫廷中爆发了以外戚何进和世家大族的代表袁绍为一方，以宦官为另一方的激烈斗争。何进打击盘根错节的宦官势力，并密令在河东驻军的并州牧董卓入京。宦官先发制人，杀了何进，袁绍又勒兵杀宦官二千多人。接着，董卓带兵开进洛阳，另立刘协为帝（汉献帝），逼

走袁绍、曹操等人，独揽朝政。董卓的专横，洛阳的混乱，使各地的分裂割据活动迅速加剧，州郡牧守各树一帜，以袁绍为盟主，联兵讨伐董卓，进屯洛阳周围。公元190年，董卓挟持汉献帝西走长安，并把洛阳周围二百里内破坏得一无所剩。不久，董卓在关中被部将杀死，北方混战继续发展。

参加混战的一个重要人物是曹操。曹操是以镇压黄巾运动起家的。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刚刚兴起的时候，曹操带兵镇压了正在乘胜前进的颍川黄巾。公元192年，曹操镇压了后起黄巾中最大的一支，即青州黄巾，并且强制改编青州黄巾三十万人作为自己的封建军队，称为青州兵。公元196年，曹操又一次镇压了汝南、颍川黄巾何仪、刘辟部，夺得了大批耕牛农具。在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长期激烈的武装搏斗中，曹操始终是农民阶级的一个最凶恶最顽固的阶级敌人。但是，在大大小小的地主阶级割据者中，曹操又是一个比较有远见、有能力的人物。

公元196年，曹操把东汉傀儡皇帝汉献帝刘协，挟持到许县（今河南许昌），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地位。从公元196年开始，曹操陆续在许昌等地强制军士和农民屯田，以榨取军民血汗，积聚军粮。因此他在北方各地割据者中，又取得了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优势。这样，曹操就践踏着起义农民的尸骨，凭借优势力量，在以后十余年中逐步削平北方州郡各霸一方的封建割据势力，成了农民起义失败后地主阶级重建封建统治的“英雄”。

二世纪末年，曹操占有兖、豫二州（今山东西南部、河南省大部分）之地，而袁绍则占有幽、冀、青、并四州（今山西、河北以及山东北部、河南北部），是北方最强大的势力。公元

200年,袁、曹两军在今河南中牟境内进行了官渡之战。当时袁军十万,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但政治黑暗,军心涣散,曹军不满万人,军粮又缺,后方不稳,居于劣势,但是作战指挥却比较正确。曹军采取各个击破和偷袭粮屯的战术,击溃袁军,全歼袁军主力,取得了全局的胜利。以后数年,曹操占领了袁绍全部据地,并打败了在辽西一带与袁氏残余势力勾结的乌桓单于,保障了北方的统一。

公元208年,曹操率军南下,企图夺取刘表割据的荆州,然后东下攻占江东。正在这时,刘表病死,刘表之子刘琮向曹操投降。依托于荆州的刘备为曹军所追逐,向南奔逃。他派遣诸葛亮到柴桑(今江西九江),与割据江东的孙权结盟,共抗曹军于赤壁(今湖北嘉鱼境)。这次战役,曹军近三十万,号称八十万,而孙刘联军只有五万左右。但是曹军远道疲劳,又有疾疫,战斗力逐渐减弱。孙吴主帅周瑜乘东南风纵火焚烧曹军水师,与刘备军水陆并进,迫使曹操退回北方。这就是以少胜多、决定南北相持局面的赤壁之战。

赤壁之战以后,孙权稳定地统治了长江下游的扬州(今苏、浙、皖、赣、闽等省地区)。原来,孙权的父亲孙坚在江南镇压过农民起义,以后又参加了镇压北方黄巾军以及今湖南、江西境内农民起义的战争,壮大了自己的势力。所以孙权的统治,也是镇压农民起义的产物。

长江上游的益州(今四川以及云、贵地区),成了刘备的割据区域。益州在公元188年,发生了马相、赵祗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以黄巾为号,众万余人,四川的少数民族也起兵响应。他们杀县令、刺史,称天子,控制了今四川大部分地区。这次起义被镇压下去后,益州的统治权落入东汉宗

室刘焉之手。刘备入益州后，于公元214年从刘焉之子刘璋手里夺得益州的统治权，但是刘备原来在荆州的地盘，却逐步为孙权所夺。

公元220年，曹操的儿子曹丕，废掉东汉傀儡皇帝汉献帝，在洛阳正式建立魏国。第二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后代称它为蜀。公元222年，蜀大军出长江三峡，与吴陆逊军相持于夷陵（今湖北宜都境），被处于劣势的吴军火攻击溃，败退回蜀，放弃了从孙权手里夺取荆州的企图。这就是有名的夷陵之战（也称猇亭之战）。公元229年，孙权也在建鄴（今南京）称帝，正式建立吴国。中国历史上魏、蜀、吴三国分立局面，就这样形成了。

〔三国人民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 魏国是在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和豪强兼并战争所造成的废墟上建立的封建国家。勤劳勇敢的北方农民把荒地一块又一块地开辟出来，精耕细作，获得了较高的收成。他们恢复和新修许多水利工程，凿通一些运河，保证了农田灌溉和交通运输的需要。洛阳附近垦田特多，其它各地的荒残面貌也逐步改观，流散四方的人民，陆续回乡生产。淮河流域五万人的屯田区，垦殖规模很大，每年生产所得除屯田费用外，还有积谷五百万斛，被封建国家榨取。冶铁、纺织等手工业生产陆续恢复起来。破烂不堪的道路也得到修整，商品交换关系逐步正常化。洛阳、鄴城成为当时北方比较繁华的商业都市。

北方农业生产的恢复，屯田制起了重大作用。曹操于196年在许昌屯田收到成效后，立刻把屯田制广泛推行。屯田区一般都设在肥沃易垦之处或其它重要处所，不归郡县而归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和屯田都尉管理，统辖于中央的大司

农。屯田区土地所有权属于封建国家，屯田民（亦称屯田客）就是国家的佃客。他们分种国家土地，按四六分（用官牛的）或对分（不用官牛的），向国家缴纳封建地租。屯田民不负担另外的徭役，农时较有保障；而且在技术上讲究精耕细作，不强求扩大耕种面积，有利于提高产量，保证封建国家的需要。但是在封建剥削制度下，屯田农民享受不到自己创造的劳动果实，他们在提供地租以外，自己往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有时甚至不得不种植本来是野生的稗当口粮。有许多屯田农民，在农民起义中本来已摆脱了官府和地主的控制，曹操推行屯田制，又给他们套上了沉重的封建枷锁。

至于自耕农民，受官府剥削也很沉重。他们耕种的每亩土地要向官府交纳四升粮食，叫做田租；每户人家要交纳两匹绢，两斤绵，叫做户调。租调以外，当兵服役的负担更是沉重不堪，有的时候，家内全部男丁都要被迫当兵。

有压迫必有反抗。公元211年，田银起义于河间；215年，屯田客吕并起义于陈仓；218年，南阳人民反抗徭役而起义；219年，孙狼起义于陆浑；225年，利城郡兵蔡方起义，农民响应。至于屯田客的大量逃亡，为数就更多了。

在南方，蜀国辅政的诸葛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225年，他领兵压平了今川西、云、贵地区夷人的反抗。吴国孙权也进行了征服境内山越人的战争。各族统治者挑起民族不和，但是汉族人民同夷人、山越人以及其它少数民族人民，却维持并发展了正常的交往。他们共同努力，进一步开发了我国南方的辽阔土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发展了手工业生产。蜀、吴地区除了冶炼业有所发展以外，蜀国的织锦、火井煮盐，吴国的造船、制瓷，都比较发达。大船能载二三千

人。海船经常北航辽东，南通南海。公元230年，吴国船队到达夷州，即今台湾省。这是大陆与台湾交通的最早记载。

〔世家大族势力的发展 司马氏代魏〕 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养肥了地主阶级，蜀吴境内都形成了一些各霸一方的大族地主。吴国的大族在政治上世袭领兵，高官厚禄，在经济上则是“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抱朴子·吴失》）。大族地主的发展给农民带来了灾难，贫困的农民时常举行暴动，以反抗大族地主的统治。

北方地主阶级的发展情况比较复杂。在战争过程中，曹操把北方大批的豪强地主和士大夫收揽在自己的周围，让他们帮助自己进行统治。但是也有一部分豪强地主和士大夫不愿亲附曹操，有的还操纵地主阶级的舆论，反对曹操。曹操先后杀掉不少反对自己的士人，又命州郡官吏督察豪强，“重豪强兼并之法”。曹操还屡次颁布“唯才是举”的法令，责成所属把那些由于“德行”不好（不符合儒家的道德标准）、出身不显贵而受到地主阶级舆论非议但有治国用兵才能的人，选拔出来作官。这种政治措施，起了抑制世家大族独揽政权，扩大地主阶级政权基础的作用。

曹丕统治的时候，建立了“九品中正”制，选择善于鉴别人材的中央官员，兼任其本郡的“中正”官，由“中正”负责察访与他们同籍贯的散在各地的士人，评为九个品级，作为中央吏部委派官吏的依据。九品中正制初行时，其目的是把评定士人的权柄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以避免世家大族煽动舆论，操纵用官。但是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的势力，仍然在迅速发展。

以后，世家大族的代表司马懿逐渐掌握了朝政。在他的

庇护下，大族地主和官吏极力兼并农民，侵夺封建国家的土地，侵夺叫做“租牛客户”的国家佃客，以扩充自己的经济力量，屯田制度逐渐破坏了。在司马氏统治下，九品中正制也成为世家大族垄断政权，培植势力的重要工具。司马氏得到世家大族的拥护，势力越来越大。公元263年，魏灭蜀。265年，司马懿之孙司马炎终于正式夺取魏国政权，建立晋朝。280年，晋灭吴，形成了短期的南北统一局面。

## 二、西晋的腐朽统治和各族人民的起义斗争

〔残酷的剥削和腐朽的统治〕 司马氏早在建立晋朝之前，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新贵族集团。晋武帝司马炎依靠这个集团取得政权，自然要满足新贵族对财富和权势的贪得无厌的欲望，让他们任意宰割农民。公元280年西晋颁行的户调式，就是保障地主经济特权的一种制度。

户调式包括占田制、户调制和品官占田荫客制三部分。

占田制规定男子可以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此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二十五亩。所谓占田，是指农民保有土地数量的一个假定的指标，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所谓课田，则是农民应负担田租的土地数量，无论农民中的男丁有没有五十亩地都按五十亩征收田租。根据《初学记》的记载，西晋田租实际上是按照一户课田五十亩计算，每亩纳田租八升，合计四斛。这比起曹操时田租每亩四升的制度来，剥削增加了一倍。

户调制规定，丁男之户每年调绢三匹，绵三斤，丁女或次丁男为户者折半。丁男户调比起曹操时每户绢二匹，绵二斤来，也增加了二分之一。

田租戶调实际征收时，官吏预先把各戶资产多少划为九等，按等决定实征租调数，而以上述制度规定的数字为平均指标，叫做“九品混通”。这种办法看起来似乎照顾到实际的贫富差别，但是地主官吏任意划分戶等以转嫁负担，吃亏的还是贫苦农民。

品官占田荫客制度规定，官僚地主可以按照官品高低，占有十顷以上至五十顷土地，占有一戶以上至十戶佃客和若干衣食客（类似奴隶的仆役）。这样就在法律上保障了官僚地主占有土地和佃客的封建特权。至于占有土地、佃客数量上的限制，只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何况制度还规定了，他们“庇荫”亲属（以贫穷的族人作自己的荫戶，即依附农民），在数量上实际是沒有限制的。所以西晋时当权的官僚地主，许多都是奴隶佃客成百成千，园田水碓遍于各地。

以司马氏为首的贵族集团，非常贪鄙、奢侈、腐败、残暴。何曾、何劭父子日食之需达一两万钱，石崇居官靠抢劫发财。官僚贵族竞相斗富，以显示自己的豪华阔绰。王恺拿出晋武帝所赐高三尺的珊瑚向石崇夸耀，石崇顺手击碎，拿出自己的珊瑚树来，高三四尺者竟有六七株之多。所以当时有人说“奢侈之费，甚于天灾”，也有人作《钱神论》以讽刺当政者嗜财如命，货赂公行的黑暗统治。

〔八王之乱〕 西晋统治集团的腐朽，引起了激烈的党爭，朝廷长期处在爭权夺利的倾轧中。晋武帝为了统治人民，为了监督异姓功臣和吳蜀地主，曾大封宗室为王，并且允许王国置军，取消州郡武备。他还陆续用诸王统率中央兵马镇守要害，特别是镇守荆、扬和关中，逐渐替换异姓方镇。强大的诸王回到中央，就成了朝政的掌握者。这就是



《晋书·八王列传序》所说的“出拥旄节，蒞岳牧之荣；入践台阶，居端揆之重”。

公元290年晋武帝死，继立的晋惠帝是个白痴。惠帝皇后贾氏为了使自己的家族垄断政权，于291年诏征都督荆州军事的楚王玮入京，利用禁军力量，杀掉当政的惠帝外祖杨骏，“八王之乱”从此开始。贾后又命楚王玮杀掉继杨骏之后当政的汝南王亮和卫瓘，然后又把楚王玮杀掉。赵王伦掌握了禁军势力，杀贾后，并于公元301年废惠帝自立。同年齐王冏（镇许昌）、成都王颖（镇鄴）、河间王颙（镇关中）等起兵声讨赵王伦，其他诸王也纷纷率军卷入内战。内战的战场从洛阳扩大到黄河南北广大地区，又扩大到关中，破坏性十分巨大。赵王伦被杀后，惠帝复位，各王之间的冲突仍然反复进行。幽州刺史王浚和范阳王虓甚至引乌桓、鲜卑兵参战，乌桓、鲜卑兵先后进入鄴和长安，暴掠妇女财货，屠杀人民，其它诸王军队，也无不到处烧杀洗劫，使北方生产受到极大的摧残，人民受到极大的痛苦。由于八王之乱而加重了的天灾和瘟疫，又夺走了无数人民的生命，逼得无数人破产流亡。公元306年，西晋政权落入东海王越手中，他毒死惠帝，拥立怀帝，结束了延续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但是灾难深重的各族人民已经被逼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武装起义的形势早已完全成熟了。

〔西、北边境各族人民的痛苦生活〕 公元二世纪以来，西、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陆续向内地迁移，在今辽西、河北、山西和陕西、甘肃一带，同汉人交错居住。这些民族的社会经济都在向上发展，在不同程度上走着封建化的道路，向定居的农业生活或半农半牧生活过渡，部落的血缘

联系显著地减少了。魏晋统治者为了控制他们和补充内地劳动人手之不足，有时也招引或强迫他们进入内地。进入内地的民族，主要有匈奴、羯、鲜卑、氐、羌等五种，历史上称为“五胡”。其中，匈奴人从内蒙南部进入陕、晋，羯人随匈奴人进入山西，主要聚居在上党武乡（今榆社县）；鲜卑族的慕容部从辽西向南发展；鲜卑族的拓跋部从内蒙古进入晋北；氐人和羌人则从甘、青进入陕西。

各少数民族由游牧转向定居农耕，由封建社会以前的社会制度向封建制过渡，是民族进步的表现。但是这一历史转变却充满了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因而也充满了激烈的反压迫斗争。

内迁各族的贵族分子，力图保持自己传统的部落特权，尽量利用部落血缘关系，束缚和压迫剥削本族人民。汉族地主阶级也对他们百般欺凌，驱使他们当兵服役。山西的官僚地主，掠夺匈奴等族人民为佃客，多的一家达数千人。捕捉少数民族人民转卖为奴，是常见的事。匈奴人、羯人、鲜卑人沦为汉族地主的奴婢的，为数不少。出身部落小帅的羯人石勒当过佃客，还曾为人佣耕，后来又被掠卖为耕奴。他备受汉族地主的虐待和摧残，九死一生，从他的经历中，可以看到少数民族人民共同的悲惨命运。所以西晋建国以来，少数民族的反晋斗争就不断出现。公元294年，匈奴在上党起兵。两年后，匈奴人再次起兵，关中的氐人、羌人都起来响应，并推举氐帅齐万年为帝，大败西晋官军。

〔汉族流民和各族人民起义〕 三世纪末到四世纪初年，南北各地，由于统治者的剥削压迫造成的离乡背井的流民，估计总数超过一百万人，他们饱受饥寒之苦，蕴藏着反

晋起义的火种。

由于关中官军的烧杀而被迫流亡的氐人（氐人是原住四川境内的一种少数民族，后来进入陕、甘地区，与当地的氏人有一定程度的融合）、汉人、氏人数万家，进入益州，分散各地，替地主佣工。西晋统治者害怕他们造反，强令归还本土。益州官吏对他们更是严加催逼，限令立即上道离境。流民要求挨过雨季，等秋后积攒一点路费再走，也没有得到许可。有些官吏甚至谋杀流民首领，并在流民归途中设立关卡，掠夺流民财物。流民在统治者逼迫下，两三万人集中绵竹一带，以求自卫。西晋统治者又发兵包围绵竹，进攻流民。公元301年冬，流民推举氐人豪强李特为首，起义反晋。益州人民苦于官府摧残，同情和支持流民的斗争。李特与他们约法三章，救济穷人，整肃法纪，在他们的支持下，取得了许多次战斗的胜利。益州地主则自设坞堡工事，虎视眈眈地窥测着起义军的行动。李特对他们没有保持足够的警惕，反而把流民分散到各个坞堡就食。西晋官军与地主武装里应外合，击败了起义军，李特英勇战死。李特弟李流、子李雄率领流民继续斗争，终于在公元304年攻克成都，占领了益州全境。

当李流、李雄起义军攻占益州的时候，西晋统治者强征荆州人民前往镇压，沿途郡县又催逼被征发的人民，不准在路上停留休息。他们不愿为统治者卖命，纷纷屯聚反抗。303年，义阳蛮（蛮是当时荆州境内的一种少数民族）张昌招集避役的人和进入当地的流民共数千人，起义反晋。长江、汉水一带的汉族和蛮族人民群起响应，起义军很快发展到三万人，并且陆续占领了襄阳、武昌。由石冰率领的一支义军，

沿长江东下，一直打到建鄴。长江中游以下南北两岸的广大地区，一时都为起义军所控制。

关中流民散在南阳一带，西晋统治者派军队押逼他们还乡，激起了他们的反抗。王如领导一部分流民袭击押送的官军，其它流民首领也率众起义，起义队伍扩大到四五万人，转战汉水流域。

流亡在荆、湘的益州流民，生活无着，又受当地地主迫害，痛苦很深，群起反抗。残暴的统治者把参加反抗斗争的流民八千沉入江中，把他们的妻子没为奴婢，随便赏赐给官僚地主，并且阴谋把流民统统杀害。流民走投无路，四五万家同时起义，以杜弢为首领，攻克长沙和今湖南大部分地区，向北打到武昌附近。起义群众在优势敌人围攻中，前后数十战，历时五六年，宁死不屈。

当长江流域的起义军英勇奋战，使西晋统治陷于分崩离析的时候，北方人民也向西晋统治者展开了殊死斗争。公元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利用这种形势，乘机率领匈奴人在并州（今山西境）起兵反晋，水深火热中的北方人民，纷纷投奔刘渊。有些豪强地主为了保全和扩大势力，也率众投靠刘渊。刘渊建立了以匈奴贵族为主体的政权，很快占领了并州全境。

接着，羯人石勒和马牧场的牧师汲桑起义于山东、河北。他们率领农民、牧民，攻打郡县，杀戮官吏和土族地主，队伍日益扩大。后来起义形势不利，石勒带兵投奔刘渊。

与此同时，刘伯根在山东，利用宗教组织起义，聚集了上万群众。刘伯根牺牲后，王弥带领群众继续斗争，一直打

到洛阳城下。豫州（今河南境）境内几万家流民，受到当地地主迫害，烧城邑，杀官吏，响应王弥。后来王弥也投奔了刘渊。

刘渊得到石勒、王弥支持，势力伸展到中原地区。311年，匈奴人攻下洛阳，316年又攻下长安，西晋灭亡。

十几年的阶级大搏斗震荡着长江和黄河，腐败已极的西晋统治，终于被摧毁了！历史总是在反复证明着：“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

西晋末年的汉族流民和各族人民起义，情况非常复杂。参加起义斗争的，有我国境内汉、氐、蛮、氏、羌、匈奴、羯等许多民族的群众。他们都受到官府和地主的压榨和欺凌，都有革命的要求。衣食无着的流民，更是起义的巨大动力。他们突破了民族界线，互相联系，彼此声援，共同进行了反晋的正义斗争。同时，西晋反动统治所造成的灾难，使一些不当权的地主和失意官吏，也不得不流亡异乡；一部分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也受到某些损害。这些人进入人民起义行列，往往成为各支起义军的首脑。例如李特是氐豪，张昌是县吏，王如州武吏，杜弢和刘伯根都是县令，王弥的父祖都是郡太守。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划清两个阶级的界线，而往往与西晋官府发生各种联系，待机取利。有些起义首脑更是另有企图，斗争不坚决，遇到挫折或引诱，就变节投敌。因此，群众斗争虽然很英勇，西晋政权又不是强大的对手，而起义仍然难于持久，分散的斗争终于没有汇合成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各少数民族人民参加起义，虽然也包含了一定的民族因

素，但是总的说来，其主要性质仍然是阶级斗争。可是一些少数民族的首脑，如匈奴贵族刘渊等人，情况就另是一样。他们原来就抱有扩大民族矛盾以树立自己的势力的野心，当西晋瓦解后，他们更公开地把人民起义引向民族对立，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汉人，把民族压迫强加在汉人头上。这样，北方的社会矛盾状况就发生了变化。北方人民的阶级斗争，在一个时间内也就以反对民族压迫斗争的形式出现了。

## 第二节 东晋、南朝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 南方的农民起义

### 一、北方胡族统治者的南侵和南方人民的自卫战争

〔北方汉人的南迁〕 西晋灭亡以后，原来驻守江南的西晋宗室司马睿，于公元 317 年在建康（今南京市）建立东晋政权，逐步统治了南方的广大地区。

这个时候的北方，进入了中国历史上的所谓“五胡十六国”时期，各胡族贵族相继建立政权，民族征服战争连年不断，汉族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生命朝不保夕。他们除了寻找机会举行起义以外，还随着北方政治局势的变化，一批又一批地向南方迁移。这时候，南迁是北方汉人反对民族压迫的一种形式。

南迁的北方人民，多数是按籍贯聚集若干家，形成一个个流民群，节节迁徙。在南行的道路上，他们常常遭到胡族骑兵的蹂躏，地主武装的抢劫，饥寒和疾疫的折磨，颠沛流离，死亡相枕。侥幸活着的人，也不得不卖妻弃子，痛苦不

堪。可是，带着大批宗族、部曲南逃的晋朝官僚地主，却在沿途想方设法并吞流民，把他们变成自己的私兵队伍。

备受千辛万苦，经历各种艰险，幸而达到南方的北方汉人，当时被称为侨人。编入南方政府户籍的侨人，至少有七十万。无户籍的侨人还有很多，叫做浮浪人。侨人虽然摆脱了民族压迫的苦难，但是又重新陷入阶级压迫的罗网之中。他们或者被迫沦为官僚地主的奴隶、部曲、佃客，或者占荒耕垦，或者逐食流移，处境十分悲惨。

为了控制侨人，东晋时在侨人比较集中的地方陆续建立许多与侨人旧土同名的侨州、侨郡、侨县。这些侨立的州、郡、县时合时分，境界不太确定。侨立州、郡、县内并不全是侨人，例如侨立的南徐州内，侨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十二，这算是比例最大的。旧有郡县内也有一部分侨人。由于侨属状况复杂，东晋政权控制力量很弱，所以东晋、南朝政府户籍非常紊乱。

侨人在南方历久年深，同南方土著农民在习俗上和经济生活上的差别越来越小。封建国家为了榨取侨人的租赋力役和驱使他们当兵，一再用“土断”的办法来加强对侨人的管理。土断有的是把散居侨人断入所在籍贯，有的是并省没有实土的或民户太少的侨郡县，有的是整顿户籍，把侨人和旧人分别立为白籍和黄籍。土断的繁苛，更加重了侨人的痛苦。

〔祖逖和桓温的北伐〕 南来的北方汉族人民，仇恨北方的胡族统治者，希望东晋政权能够实现他们的北伐中原的要求。但是东晋统治者纠缠在争权夺利的复杂的矛盾中，很少以北伐为念。从洛阳南来寄居京口（今江苏镇江）的祖逖，慨然“以中原为己任”（《世说新语·赏誉》注引），

首先要求向北进军。他上书司马睿，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陈述了北方人民反对民族压迫的强烈愿望，也估计到北方汉族地主可以合作抗胡。公元313年，祖逖率领百余家部曲渡江北上，他在长江中击楫发誓说：“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晋书·祖逖传》）他的豪迈誓言，表达了汉人反对民族压迫的壮志。

祖逖在江北招集流散人民，扩充队伍，冶炼兵器，屯田积谷。他进军河南一带，控制了一些地主武装，加以利用。不到几年，祖逖军收复了黄河以南大部分土地，迫使羯人石勒不敢过黄河。正在这时，晋元帝司马睿派戴渊指挥江北军事，扼制祖逖。同时东晋统治者内部明争暗斗非常激烈，内战迫在眉睫。这种种情况使祖逖忧愤成疾，321年病死军中，北伐停顿。

祖逖以后，镇守荆州的庾亮、庾翼，相继请求北伐，由于朝臣的反对而未成功。后来，桓温出镇荆州，于公元347年灭襄人李氏在蜀中建立的汉国（即原来的成国），声势很大。桓温请求北伐，东晋朝廷对桓温有疑虑，所以另派外戚褚裒于349年北伐。褚裒进军彭城时，北方人民来归的日以千计，鲁郡民五百多家附晋，河北民二十多万远道来奔，由于褚裒一触即溃，使他们在半道上陷于困境。以后殷浩北伐，也于353年失败。

公元354年，桓温北伐前秦，进入关中，受到关中人民的热烈欢迎。但是桓温不愿损耗实力，坐失时机，无功而返。356年桓温第二次北伐，收复洛阳，徙民而归。369年桓温第三次北伐，从扬州进抵枋头（今河南浚县）。前燕在前秦援助下截断了晋军粮道，桓温败回南方。



东晋统治者口头上关于北伐的喧嚣，多于实际的北伐行动。少数几个实行北伐的人，除了祖逖以外，又陷入东晋统治者内部争权夺利的矛盾之中，把北伐斗争同个人集中权力的活动纠缠在一起，不能全力以赴。更多的官僚则由于在南方产业已丰，不愿“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晋书·孙楚传附孙绰传》），不但无心北伐，而且还极力阻止别人北伐。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对南北统一的渴望，始终无法实现。

〔胡族统治者的南侵和淝水之战〕 在东晋统治者不愿主动出击，北伐毫无希望的时候，北方的胡族统治者屡次陈兵长江，矛头指向建康，形成十分尖锐的南北民族矛盾。由于南方人民不屈的斗争，由于北方内部形势极不稳定，胡族统治者的南侵都没有得逞。

公元四世纪下半叶，前秦的氏族统治者苻坚暂时统一了中国北方。公元383年，苻坚以数十万兵力向南进攻，前锋二十五万攻陷寿阳（今安徽寿县）。在强敌压境，民族危急之际，南方兵士和广大的人民群众都盼望克敌致胜，保卫南方。与前秦对阵的东晋北府兵，是刚刚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一带由北方南迁人民或其子孙组成的一支劲旅。他们人数不满十万，与前秦军相比，数量上居绝对劣势。但是他们饱尝民族压迫之苦，士气高昂，都准备奋勇应战，务歼入侵之敌。

前秦军打算在寿阳一带运用优势兵力，一举消灭北府兵，灭亡东晋，以奴役南方人民。北府兵将帅谢石、谢玄、谢琰等了解到秦军虚实，准备乘秦军还未完全集结的时机，一鼓击破秦军前锋，瓦解秦军。北府兵主动出击，取得了首

战的胜利，然后与逼淝水立阵的秦军相约，到淝水西岸决战。秦军企图乘晋军半渡淝水时加以袭击，所以引兵稍退。但是秦军内部不稳，一退不可复止，顿时自相践踏，溃散奔逃。晋军抓住时机渡过淝水，展开猛攻，打乱了秦军的部署，获得了巨大胜利。前秦溃兵在路上听到风声鹤唳，都以为是东晋追兵来了。他们昼夜奔跑，不敢停留，死亡惨重。这样，前秦的大规模入侵，就被北府兵彻底粉碎了。

前秦内部本来是民族矛盾重重，在这次不义的南侵战争中，民族矛盾更加尖锐。秦军是由临时强征来的各族人民组成的，他们同前秦统治者离心离德，意气消沉。秦军中占多数的被强迫服役的汉人，更是心向南方，临战溃散。原来极力怂恿苻坚南侵的鲜卑人和羌人贵族，这时又趁势起兵，反对前秦。这种种内外因素，不但决定了淝水之战中秦军的失败，而且还导致了前秦政权的瓦解。

淝水之战是南方汉族人民的自卫战争，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论证的战争中弱的一方后发制人，因而战胜强敌的一次著名的战役。淝水之战中东晋的胜利，主要是南方人民英勇作战的结果。这一胜利使南方的经济文化免受氏族统治者的摧残，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 二、东晋末年的南方农民起义

〔东晋统治者对农民的残酷压榨〕 东晋政权，是北方南迁的所谓侨姓士族地主和南方本土的所谓吴姓士族地主（以侨姓士族为主）的联合专政。所谓士族，是一二百年来历史上形成的大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殊集团。士族地主在政治方面和文化方面，在社会上都居于垄断地位。十几个、几

十个这样的大家族，长期统治着南方成千万人民，而在这些大家族之间，却又不断地进行着争权夺利的倾轧。由他们实现的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其腐朽性是非常突出的。他们依靠自己独占的政权，为自己谋取独占的利益。他们的利益越发展，人民的灾难越深重。

东晋历史上，大地主掠夺土地和人口，是十分惊人的。他们的佃客、奴婢，动辄成千。山遐做会稽郡的余姚（今浙江余姚）县令，上任八十天，就初步查明了豪强地主私藏户口达二千家，共万余口，而当时全余姚县有户籍的居民，最多不过三五千家。象山遐这样敢于触动大地主利益的人，在当时是少见的。大地主的田庄别墅，布满建康附近和东南诸郡（今苏南、浙江一带）以及其它地区。他们连山带水，一并圈进自己的田庄，侵占居民的生业。豪强地主仗势欺凌，各级官吏贪赃枉法，都无人敢于追究。

东晋政权把原来规定的按地亩多少征收田租即所谓“度田收租”的办法，改为不问有无土地，每口一律税米三斛，以后又激增至五斛。按口税米之制使无地少地的农民困苦不堪，但是却适合田连阡陌的大地主的需要。

东晋徭役十分繁重，役名多得惊人，人民负担徭役，一年里几乎没有几天休息时间。有些人为了徭役所苦，自残肢体，或者剪发为僧，以求免役。甚至有人生了男孩不敢抚养，鳏夫寡妇不敢嫁娶。当然，这些消极办法并不能解脱农民的困苦处境。

南方农民常常进行小规模的武装暴动，以反抗东晋士族的统治，只是由于那时南方北方之间民族矛盾时常激化，对阶级矛盾起着制约的作用，所以分散的农民暴动还没有发展

成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淝水之战以后，南北民族矛盾暂时缓和了。东晋统治者千方百计地窃取南方人民抗敌斗争的胜利果实，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因而使阶级矛盾迅速激化起来。同时，统治者内部各个势力集团的利益之争，发展成大规模的连年不断的内战。统率北府兵镇守京口的王恭，与荆州刺史殷仲堪、广州刺史桓玄联络，于397年、398年两次起兵，反对朝廷中主张削弱方镇势力的人物。不久王恭败死，桓玄等从荆州进攻建康也未成功。但是长江中游地区和长江下游的江北地区事实上都脱离了东晋的控制，东晋政权的全部耗费，都得靠东南八郡承担。东南八郡本来是侨姓士族和吴姓士族地主田产集中，农民受苦最甚的地方，这时成为南方阶级矛盾的焦点所在。所以，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首先从这里爆发了。

〔南方农民起义的战斗历程〕 公元399年，掌握东晋朝廷大权的司马元显，为了建立一支属于他自己的军队，征调东南诸郡“免奴为客”者，即从奴隶身份解放出来的佃客，称之为“乐属”，强迫他们到京师当兵。按照东晋制度，农民一入军籍，不但终身当兵，而且世代当兵。兵士还要服各种各样的劳役，身份低下，生活比佃客还要悲惨。所以农民都反对这种征发。不但如此，东晋在征发乐属的时候，还大量侵扰不是乐属的其它农民。被征发的人在官吏驱逼之下辗转流徙，非死即逃。在这样一场横祸面前，本来就困苦不堪的东南诸郡农民，除了拿起武器进行战斗之外，再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在农民起义形势完全成熟，反晋的波澜已经掀起的情况下，东南诸郡某些地主，有的由于东晋征发乐属触犯了他们

的利益而心怀不满，附和反晋；有的则由于统治者内部的其它矛盾，也打出了反晋的旗号。孙恩就是后者中的一员。孙恩的叔父孙泰是道教首领。孙泰先是勾结东晋朝廷，做过高官，还组织过几千人的私兵，参加东晋统治者的内战。后来朝廷对孙泰发生疑忌，把他杀了。孙恩逃亡海岛，策划复仇。东南诸郡农民暴动发生后，孙恩率领百余道教徒登陆，投入农民起义军，并成为农民军的首领。这样，刚刚兴起的农民起义，就呈现出复杂的局面。

农民起义军很快攻克了会稽郡（治今浙江绍兴），杀会稽太守。东南八郡都有人聚义兵，杀官吏，响应起义，不到十天，起义军就发展到几十万人。建康附近各县，也到处有人聚众响应。起义军扫荡所至，东晋郡县官吏望风奔逃，士族地主在这一带做官的以及做京官而停留在家的，大量被起义军杀戮驱逐，尤其是门第最高的侨姓氏族王氏、谢氏以及吴姓士族孔氏等，所受打击最大。这些士族分子有不少人是信奉道教的，但是在阶级斗争中照样受到起义群众的正义惩罚，并没有因与孙恩信仰相同而得到人民群众的宽容。

东晋政权在起义军威胁下，调谢琰率领北府兵前往镇压。起义军沿途抵抗，几乎把北府兵的重要将领刘裕杀死。但是孙恩新建立的郡县政权，有许多掌握在地方大族手中，这伙人既不能坚决向东晋进攻，又不好好组织守土御敌的战斗，在北府兵的压力下，力量很快就瓦解了。北府兵逼近钱塘江，攻击会稽，起义群众二十余万人，不得已随着孙恩退入海岛。

在抵御苻坚入侵的淝水之战中表现了民族义愤的北府军，在镇压农民起义的反革命战争中成了一伙不折不扣的武

装匪徒。他们在主将的带领下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东晋官吏和地方大族也配合北府军的镇压，对群众展开血腥的报复，东晋吴兴太守庾桓，一次就屠杀了男女群众好几千人。他们的骚扰破坏和屠杀，使东南各地一片荒凉，人烟稀少。

公元400年，起义军多次登陆进攻，在邢浦（今浙江绍兴以北）杀死东晋镇守东南沿海地带的北府兵统帅谢琰。不久，镇守沪渎（在今上海）的东晋官吏袁山松，也被起义军杀了。公元401年，起义军战士十万，战船千余艘，入长达京口（今江苏镇江），准备直捣建康，不幸在建康附近遇到大风雨，不能前进。他们出海北上，又在郁州（今连云港外海岛）被刘裕击败，只好沿海南还。经过这次挫折，起义军势力逐渐衰落。402年，孙恩在临海（今浙江临海）战败，投海而死。起义军战士及其家属面临地主阶级疯狂的反攻倒算，有的英勇战死，有的不屈投海，有的被迫流散。不幸被俘的人，或者惨遭杀害，或被转卖为奴。剩下的几千人，由卢循、徐道复率领。在今浙江、福建沿海地区继续战斗。404年，起义军在北府将刘裕的优势兵力的逼迫下，浮海南走，攻下番禺（今广州市）。

公元410年，起义军十多万人，分兵两路北上。徐道复一路从始兴（今广东韶关）出发，过大庾岭，沿赣江直攻豫章（今江西南昌）；卢循一路从广州出发，沿湘江下长沙，攻击江陵。北上大军有许多是身经百战的东南诸郡战士，有许多是新增加的广州地区的农民，包括始兴一带的少数民族溪人在内。他们对东晋统治者无不同仇敌忾，斗志昂扬，作战非常英勇。徐道复一路大军杀北府兵大将何无忌于豫章，败另一北府兵大将刘毅于桑落洲（今江西九江境），使敌军

主力大受损失。然后顺流而下，直捣建康。但是作为统帅的卢循，在战局紧张的时刻迟疑不决，丧失了与刘裕决战的机会，使起义军在进行了反复消耗战以后逐渐转入被动地位。于是，卢循下令南走。在长江中游地区，起义军数战不利，又沿赣江向广州撤退。这时广州的番禺已被刘裕派军从海上占领。411年，卢循反攻番禺不下，西走交州，在那里战败身死。徐道复也在始兴牺牲。

前后有数十万群众参加的、转战东南历时十二年之久的农民起义，终于失败了。但是，不少起义群众仍然在南方坚持战斗，宁死不屈。更多的群众流亡在今福建、广东的海滨和海岛上，世代捕鱼为业，在以后的两个世纪中，保持着勇敢战斗传统，拒绝接受封建官府的控制。

〔南方农民起义的历史教训〕 东晋末年的南方农民起义，是东晋士族统治将近一个世纪以来阶级矛盾的总爆发。这次起义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规模很大，来势很猛，斗争也很英勇。但是，这次起义斗争在一定程度上被地主阶级野心家所利用，给后代人民留下了严重的教训。

当东南八郡农民的武装暴动刚刚爆发，斗争还没有展开，革命群众还没有来得及从斗争中找到自己队伍的领导人的时候，地主阶级野心家孙恩就带领一部分道教徒进入起义行列，取得了领导权。过去，孙恩入海一年，用道教的旗帜号召，只聚合了一百多人，掀不起反晋的风浪。可是农民起义爆发后，孙恩登陆仅仅十来天，起义队伍就扩大到几十万人。这说明起义的基本群众是与道教组织没有关系的革命农民，他们的起义同孙恩的反晋具有不同的目的。

孙恩在革命农民的推动下，走了一段革命的路程。但是

孙恩以一批盲目的道教徒作为自己的核心力量，甚至鼓动他们滥杀群众。他依靠各地聚集的地主武装，来扩大自己的势力，甚至逼迫地主绅士做他的官属。他在整个斗争过程中，没有提出与东晋政权彻底决裂的口号，也没有树立取代东晋的旗帜。孙恩第一次登陆后，听说诸郡响应起义，得意忘形，对部属说：天下没事了，我带你们到建康做官去。后来听说北府兵到了钱塘江，他说：我割据浙江（即钱塘江）以东，还可以做个越王勾践。等到北府兵过了钱塘江，他又说：我是不以逃走为耻的。这几句话，充分暴露了孙恩的野心家面目。

卢循的阶级本性，比孙恩表现得更加明显，他自从参加起义队伍以来，就是官僚地主的庇护人，使许多官僚地主逃脱了革命农民的正义惩罚。卢循成为起义军首领之后，并没有推翻东晋的愿望，因此活动地点南移，逐渐远离东晋统治中心，先是在今浙南，后来到今福建，最后到今广东。卢循在广州五六年，接受了东晋广州刺史等官号，同刘裕以及一些东晋地方官吏保持联系，更加丧失了反晋性质，实际上正在蜕化为广州地区的封建割据势力。但是许多从东南诸郡来的战士不愿意长期背井离乡，苟安岭外，他们要求打回老家，同刘裕决一死战。驻守始兴的徐道复体察到这些“思归死士”的要求，秘密在大庾岭伐木，准备制造船舰，乘刘裕用兵山东，建康空虚的机会，向东晋展开进攻。卢循本来不愿北上作战，只是在徐道复反复劝说和进行要挟的情况下，才勉强同意北进，而北进战斗，又主要是由徐道复一军担当。卢循的这种消极态度，同北进失败有密切的关系。

在军事作战上，孙恩、卢循一开始就不力求在大陆上建



立巩固的立足点，他们顺利时东奔西窜，不利时一哄而退，敌军压力稍大，则群起入海，以海岛为避难所。他们的错误指挥，使起义军越来越脱离群众，越来越丧失战斗力。401年进攻建康之战，本来是敌弱我强，但临阵稍有不利，孙恩就放弃时机，撤军远走，使自己的优势变成了劣势。卢循远走广州，实际上是孙恩逃跑主义的继续。410年卢循的北上战争，也是倾巢而出，后方无援，再一次使自己的优势化为劣势，一退寻阳（今江西九江），再退广州，最终葬送了农民起义斗争。

〔南方农民起义的伟大功绩〕 南方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几十万群众英勇斗争的伟大功绩，是不可磨灭的。首先，农民起义瓦解了东晋封建政权。东晋政权是腐朽的西晋政权在南方的继续，由于南北民族矛盾尖锐，它才得以建立和延续下来。东晋政权的黑暗、腐朽、残暴，早已暴露无遗。淝水之战以后，这个政权除了屠杀人民之外，再没有别的方法实现统治；除了破坏生产之外，再没有别的作用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东晋政权也是这样。南方农民起义摧毁了东晋的统治秩序，扫荡了东晋政权赖以生存的东南八郡的地主势力，这样，东晋政权就名存实亡了。

其次，南方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作为东晋政权支柱的士族势力，剥夺了他们一百多年以来独占的统治权，起了荡涤污泥浊水的革命作用。北府兵是士族手中的一支唯一能够作战的军队，北府兵统帅谢琰被农民军杀死后，这支军队落入庶族地主（也叫寒族地主）刘牢之、刘裕等人之手，士族掌握军权的时期也就随之结束了。在农民起义失败后出现的

南朝，虽然还有不少士族人物居于高官厚禄的地位，但是他们失掉了保护自己政治地位的武装力量，因而不得不听命于真正掌权的庶族地主，所以南方农民起义，是对南方腐朽不堪的士族集团的决定性的一击。

最后，南方农民起义，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东南诸郡起义是由反对当兵的“免奴为客”者首先发动的，他们的英勇战斗自然会影响到佃客身份的某些改善，影响到兵士身份的某些解放。特别是兵士（当时称为军户），经过起义的激荡，大量成为平民。农民起义失败以后新出现的某些郡县，就是以被“放免”的军户建立起来的。身份同军户相近的吏家和百工，有许多也挣脱了官府的束缚。这一些军户、吏家、百工以及大地主的佃客，经过斗争，成为小自耕农和小手工业者，有可能在生产领域中创造更多的财富，这就是农民起义“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具体表现。

### 三、士族地主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 南朝政权的更替

〔宋、齐、梁、陈的更替〕 东晋末年农民起义失败后，真正得利的是出身北府兵的庶族地主代表刘裕。刘裕在农民军作战的过程中，于公元404年削平了士族桓玄的叛乱<sup>①</sup>，410年灭建都于广固（今山东益都）的鲜卑慕容部的南燕，411年最后镇压了农民起义斗争，413年灭在益州割据

---

<sup>①</sup> 公元402年，桓玄带兵从荆州入建康，以后又废晋称帝，改国号为楚。404年刘裕杀桓玄，复立东晋皇帝作为傀儡，自己掌握朝廷实权。

称王的谯纵，417年又灭建都长安的羌人的后秦。公元420年，刘裕正式废掉东晋的傀儡皇帝，建立宋朝。刘裕的宋朝，与以后在建康相继出现的萧道成的齐朝、萧衍的梁朝和陈霸先的陈朝，历史上统称为南朝（公元420—589年）。这个时期，北方十六国局面结束。鲜卑拓跋部于公元439年统一了北方，建立北魏，以后分裂为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历史上统称为北朝，与南朝相对立。

刘裕当权的时候，从北方夺回了青州、兖州（今山东境）和关中，大致拥有今黄河以南的土地，疆域在东晋南朝时是最大的。

刘裕先后杀了一些在政治上不驯服的士族如王愉、谢混和一些大将如刘毅、诸葛长民，又杀了隐匿户口、影响统治的会稽士族虞亮。他还提拔许多庶族地主作为自己的辅佐，巩固了统治。在他和他的儿子刘义隆当权时期，南方社会经济发展比较显著，国力比较强盛。

公元450年，宋军北伐。庞法起、柳元景等率军攻下潼关，得到北方各族人民的拥戴。但因王玄谟主力军在滑台（今河南滑县）失败，柳元景等军也退回襄阳。这年冬天，北魏太武帝率军南下，越过彭城、盱眙，到达江边的瓜步（今江苏六合），扬言渡江进攻建康。建康处在危急状态，附近丁壮全部参加战斗，沿江严加戒备。江北人民坚壁清野以困魏军，魏军无援，给养困难，只好不战而退，转攻盱眙，又遭失败。但是宋朝经过这一战役，江淮间赤地千里，江南也邑里萧条。此后宋朝不断发生内战，政治越来越腐败，淮西、淮北之地又被北魏夺走，南强北弱的局面就大为改观了。

公元479年，早已掌握了宋朝军政大权的萧道成正式废掉宋朝，建立齐朝。齐朝政治同宋朝后期一样腐败，统治者之间争权夺利的内战层出不穷。户籍非常混乱，地主大量隐瞒户口，还假冒士族以获得免役特权。为了保证赋役征发，齐朝设立校籍官，企图校正户籍。校籍进行中弊端百出，穷苦人民被指为户籍诈伪而受重罚，富有者任意篡改户籍而逍遥法外，更加剧了阶级矛盾。

公元502年，齐朝的雍州刺史萧衍代齐，建立梁朝。萧衍就是梁武帝。梁武帝力图使宗室重臣在剝削人民的基础上协调利益，避免宋齐以来一再出现的统治者之间的内战。他优待士族地主，给他们续家谱以保障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并且继续提拔庶族地主，让他们掌握机要政务。官吏贪污聚斂，只要不是存心造反，他都不追究。他极力提倡佛教和儒学，用以统治和麻醉人民，自己还三次舍身于佛寺，让朝臣用大量钱财来赎取。但对人民却非常残暴苛刻，以致于“民尽流离，邑皆荒毁”（《文苑英华》卷七五四），人民的反抗斗争也很激烈。

公元548年，北方东魏的降将侯景渡江进攻建康，第二年攻陷台城（宫城），建康被焚掠一空，人民受到残酷的杀戮。集中在建康的腐朽不堪的士族，也不能幸免。侯景军队还流窜三吴和江北地区，西攻江陵，到处骚扰破坏，江南局势非常混乱。

梁朝的西江督护、高要太守陈霸先，在扫平侯景之乱中积累了力量，于557年废梁自立，建立陈朝。陈朝实际控制的地区，只有江陵以东、长江以南的狭小地带，长江以北尽为北朝所有，江南内地则多为当地汉族或少数民族的土豪所割

据。陈朝的经济也是凋蔽不堪。公元589年，统一了北方的隋朝大举南进，攻入建康，陈亡，南北统一。

〔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势力的消长〕 东晋时期垄断政治的士族，到南朝虽然丧失了实权，但仍然是尊官厚禄，高踞劳动人民之上作威作福，拥有很大的社会影响。

在南北民族矛盾尖锐的东晋时期，士族中曾出现过王导与谢安、祖逖与桓温这样一些人物，他们的某些活动，体现了汉族人民的民族利益，得到人民不同程度的支持。但是民族矛盾趋于缓和，苟安局面一经稳定，士族奋励的意气也就消失殆尽。他们习于逸乐，沉湎酒色，“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晋书·刘谈传》），完全成为寄生虫。以善读玄学著名的司马昱（即后来的简文帝），连稻也不认识，问别人“是何草”（《世说新语·尤悔》）。蓬头散带的士族子弟王徽之作桓冲的骑兵参军，“冲问：卿署何曹？对曰：似是马曹。又问：管几马？曰：不知马，何由知数？又问：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晋书·王羲之传附徽之传》）士族名士精神腐朽，躯体脆弱，由他们组成的统治集团经过农民战争的沉重打击后，只好无可奈何地把统治权力拱手让给了以刘裕为代表的庶族地主。

南朝时期，实际上丧失了统治权的士族，还力图凭借父祖余荫，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尽可能地把士族原有的政治经济势力保存下来。他们通过婚姻和仕宦两个途径，把自己同庶族地主严格区别，并宣扬“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宋书·王弘传》）。他们越是感到没落和危殆，越是要用自矜婚宦来挽救自己。南朝士族以门第凌辱庶族的事例特别多，实际上是士族地位脆弱的表现。

士族把自己的婚姻关系严格限制在士族的范围内，并且极力排斥非士族混入士族的可能性。士族如果不严守这种限制，便被士族社会看作婚姻失类，受到排抑和诋斥。齐代王源嫁女给富阳满璋之之子，御史中丞沈约上章弹劾说：“璋之姓族，士庶莫辨”，“王满连姻，实骇物听”（《文选》沈约《奏弹王源》），请求对王源免官禁锢。除了士庶之隔以外，士族之间还有门第高下的差别。王、谢、袁、萧是最高士族，王、谢更是士族的冠冕。士族一族之内的不同支脉，由于历史的和其它的原因，有时还有高下之别。江南士族以朱、张、顾、陆为高，但一般说来，他们的社会地位又低于北来的王、谢，所以当侯景请求与王、谢为婚时，梁武帝答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南史·侯景传》）。

士族虽然力求在婚姻上表现自己特殊的社会地位，但是他们的婚姻关系实际上已很紊乱。公元461年，宋孝武帝下诏，把杂婚的士族补为身分低下的将吏，士族因此逃亡，朝廷乃改用军法，抓到就杀。沈约在弹劾王源时，也说到宋代以来，“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娅沦杂，罔论厮庶”。士族向大权在握的庶族地主攀援姻娅，是士族保全自己的一种重要手段。

在做官方面，士族独占了所谓清流美职，视庶族和他们所居之官为浊流浊职，把清浊两途严格区分开来。清流美职主要是那些职闲虞重，可以无所用心的职位。宰辅中的文职，品秩既高，又可以不勤庶务，自然是他们独占的对象。其余官职的清浊虽然大致有定，但是可依居其位者的身分高下而发生变化。南朝官吏从浊职转为清职，胜过品秩的升迁，

反之则胜于降黜。秘书郎、秘书丞、著作佐郎等职虽然品秩俱低，但却为士族独占，作为入仕阶梯。其中秘书郎一职，照例居职数十日或百日便得升迁。

但是南朝士族不能胜任武职，因此他们的地位得不到如同东晋士族那样的武力保护，事实上不得不听命于掌权的庶族地主。

齐梁以来，士族仍然重视族谱的撰叙编修，企图用家世源流和婚宦记录作为自己应享特权的证据。庶族地主常常伪造谱牒，篡改户籍，冒充士族。士族为了装饰实际上不存在的所谓“礼法门风”，还把礼学发展到极其烦琐的地步。但是这也不能挽救他们衰颓的命运。齐明帝说：“学士（按指沈约、王融等士族名士）不堪治国，唯大读书耳”（《南齐书·佖臣刘傖宗传》）。实际上士族子弟终日“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颜氏家训·勉学》），连有志读书的人也很稀少。侯景之乱时，他们“骨脆肤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其死仓猝者往往而然”（《颜氏家训·涉务》）。从此以后，作为南方的一种社会政治势力的士族，就更为衰落了。

在南方士族衰落的过程中，庶族地主的权势越来越上升。他们之中有的官居将帅，任专一方；有的作为皇帝的爪牙，出任宗室诸王镇将的“典签”，实际上掌握了州郡和军府的权柄。在中央政权中，庶族地主充当中书省的通事舍人，参预机密，出纳王命，权势更为显赫。梁代朱异由中书通事舍人历任显职，居权要三十多年，举凡“方镇改换，朝仪国典，诏诰敕书，并兼掌之”（《梁书·朱异传》），权势最盛。

在士族势力更为衰落的梁陈之际，一些所谓“郡邑岩穴之长，村屯坞壁之豪”，纷纷割据州郡，这表明南方内地庶族地主的势力进一步发展起来了。史载熊曇朗据豫章，周迪据临川，留异据东阳，陈宝应据晋安，其余庶族地主立砦自保的，遍及今闽、赣、粤、湘、川等省境。陈朝南方州郡刺史多为本地地主，他们不但不受陈朝的制约，而且还力图扩大各自的统治范围，经常进行火併。

庶族地主的统治，不论在中央还是在州郡，仍旧是贪诈勒索，与士族并无二致，因而南朝遍及内地的农民暴动同样也是打击他们的。但是他们的兴起，说明南方封建经济的发展已不限于三吴一隅而是遍及南方各地，这在南方开发的历史上又是不容忽视的。

#### 四、南方的社会经济和阶级状况

〔农业的发展〕 东晋南朝时期，南方农业生产有了显著提高。山居的少数民族人民纷纷出山，不断扩大了耕地。北方农民不断南来，带来了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也补充了南方劳动力。南北农民的结合，北方生产技术同南方水田种植经验的结合，是南方农业发展的重要条件，而南方农民的阶级斗争不断打击封建统治，则是南方生产发展的动力。由于农民阶级的辛勤劳动和英勇斗争，中国历代以来南方经济落后于北方的情形，到这时出现了逐步变化的趋势。

南方河渠湖泊很多，人民群众利用这个便利条件，到处兴建水利工程，蓄水灌田，许多工程都能灌溉土地几百顷至几千顷。河流湍急的地方，人民群众堵水筑埭（土堤），修建堰闸，调剂水位，既能灌溉，也便于船舶运输。决湖泄



水，开辟良田，也是常见的事，例如山阴县人民迁移到余姚等三县境内，开垦湖田，成为肥沃土地。沿海某些地区修建了海塘，保护农田生产免受潮水破坏。这种种措施，保证了南方垦田增加，产量上升。当时历史记载东南地方“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宋书·孔季恭等传》后语）。自然，在封建制度下，农业发展主要是大地主获利，贫苦的农民群众是永远不可能“忘饥”的。

南方农业最发达的地方，是东南诸郡。此外，波阳湖地区、洞庭湖地区和成都平原，都是南方重要的粮产地，广州地区也日益发展起来。

不过，南方的不发达地区同发达地区相比，差别还是很大。发达地区精耕细作，连北方旱地高产的区种法，也在这里出现了；而不发达地区则仍然是火耕水耨，粗放耕作。

〔大地主的田庄和奴客〕 东晋以来，大地主疯狂占夺土地和劳动人手，数量越来越大，历史上说是“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宋书·武帝纪》中）。到了南朝，这种情形更是有加无已。宋代诏令，允许官僚地主使用国家的吏（一种国家依附户）耕种地主自己的私田。梁武帝允许豪家富室利用所占公田，“给贫民种粮共营作”（《梁书·武帝纪》下）；以攫取地租。甚至吏种公田，其地租也归官僚吞没。

大地主侵占土地，起先主要集中在建康附近和太湖区域，以后逐步向其它地区扩展。会稽郡和邻近诸郡的沃壤，吸引了许多南北地主，他们纷纷在那里“封锢山泽”，建立别墅、屯封，并占有其中的农户。他们还用重税来剥削进入封锢区域打柴捕鱼的人，这又剥夺了附近农民的生计，迫使他

们逐步沦落为大地主的奴客。东晋时期本来禁止“占山护泽”，但是没有效果。宋代孝武帝企图改禁为限，规定地主原占山泽经过火耕、种树或设置渔场的，一律归地主所有；此后占山护泽以官品为准，数量由一顷至三顷；原占已足此额的不得再占；在规定以外擅占水土的以强盗律治罪。从此以后，占山护泽有了合法根据，而数量的限制只是一纸具文。所以官府私家，竞相占夺，立屯设邸，遍及江南。齐竟陵王萧子良“于宣城、临城、定陵三县界（在今安徽南陵、青阳之间）立屯，封山泽数百里，禁民樵采”（《梁书·顾宪之传》），可见封锢山泽范围之广了。

大地主经营的田庄，规模很大。吴姓士族孔灵符，除拥有本乡山阴（今浙江绍兴）的大田庄以外，还在永兴（今浙江萧山）立墅，周围三十三里，其中有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山两座，果园九处。侨姓士族谢玄在始宁（今浙江上虞）的田庄，传到其孙谢灵运时，已是“田连阡而盈畴，岭枕水而通阡”（《宋书·谢灵运传》），里面进行多种经营，山居生活所需，几乎应有尽有。大地主的屯邸从事采伐竹木，制造器物，或者设立冶所，采炼钢铁，甚至经营高利贷，盘剥农民。除了士族以外，南朝新起的庶族地主人物，所谓“幸臣近习”，“王公妃主”，也象潮水一样涌到这里，立墅设邸，压榨农民群众。

大地主在农业生产中役使的主要对象，是佃客和部曲。东晋在公元321年，颁布过占客令，规定一、二品官可占佃客四十户，每低一品减少五户；佃客不能自立户籍，而是注在主人的户籍中，按一定比例向主人交纳实物地租。这个法令限制不了官僚地主占有佃客的数量，反而起了保障地主尽

量吞并流民为佃客的作用。部曲是大地主的私家武装，平时种田，战时打仗，身份同佃客并无严格界限。梁代退職官僚张孝秀驱使部曲几百人，耕种土地几十顷，即是一例。

南方地主在农业中也使用相当数量的奴隶。奴隶的主要来源是战俘、南北流民和南方内地少数民族人民。这是长期战乱带来的结果，也是封建经济在南方落后的社会条件下发展的结果。地主阶级乐于使用奴隶，这正是地主阶级残酷性的表现。

〔寺院经济〕 东晋南朝以来，江南佛教发展，王公贵族竞造寺院浮图，建康一地，佛寺达五百余所。僧尼“一县数千，猥成屯落”（《弘明集》卷十二）。梁武帝时建康僧尼十余万，郡县不可胜言，据说“天下户口，几亡其半”（《南史·郭祖深传》）。寺院拥有大量资产和众多的劳动人手，是南方封建经济的重要部分。

寺院地主，包括僧官和上层僧尼，剥削着众多的一般僧尼和实际上是寺院奴婢的“白徒”、“养女”。寺院地主还直接“侵渔百姓，取财为惠”（《晋书·简文三子传》），甚至大放高利贷，盘剥人民。寺院高利贷受纳质物（抵押品），黄金、皮褥、服饰以至于一头牛、一束麻，都可作为质物。这是后代典当业的雏形。

寺院地主凭借政治势力，享受特殊的薪给，甚至衣食租税。东晋名僧道安的薪给，同王公相等。齐益州刺史傅琰尊崇释玄畅，奉“勅蠲百户以充俸给”（《高僧传·释玄畅传》）；陈宣帝尊崇释智顓，勅“割始丰县调以充众费，蠲两户民用供薪水”（《续高僧传·释智顓传》）。寺院地主还凭借政治势力以扩充土地，如梁武帝一次施舍给敬爱寺

八十餘頃土地。東晉支遁買剡（今浙江嵊縣）嶗山側沃洲小嶺卜居，曇濟道人據有始寧（今浙江上虞）山水極佳的五輿之一，與士族地主占山護澤無異。梁武帝在公元 541 年禁公私人等越界封錮山澤的詔令，把僧尼包括在內，正說明僧尼也是一種大規模兼併土地的封建勢力。

〔手工業的發展〕 東晉南朝時期，絲織業在南方逐漸普遍。有些地方養蠶技術很高，如永嘉郡（治今浙江永嘉）有“八輩蠶”，每年三月至八月出絲。絲織物和麻布，同是賦稅征收的重要實物。晉宋時絹價很高，每匹二三千錢，貧苦農民為了買絹輸稅，甚至不得不賣妻鬻子。齊以後絹價大減，這雖然同錢賤有關，但也反映絲織品產量的增長。劉裕滅後秦，曾南遷長安百工，于建康立錦署，生產織錦，從此南方織錦手工業，就不限于成都一處了。江南織工、縫工隨日本使者東渡，對日本的絲織和縫紉技術的提高起了促進作用。但是一般說來，南方的絲織物仍比較昂貴，養蠶織絲的勞動人民，衣着還是以麻布為主。

南方產鐵地方，設有冶令管理采冶，規模一般不大。有些鎮將自行設冶，隨置隨廢。有些大地主的屯邸，也有冶鑄。冶鐵中已使用了水力鼓風的水排。著名工匠能造出百煉的“橫法鋼”。鋼朴工謝平、苗鏤工黃文慶技術高超，被稱為“中國絕手”。煉鋼工匠們創造的一種煉鋼法，由梁代陶弘景總結為“灌鋼”，即在爐中雜置生鐵和熟鐵，火力到時生鐵熔化，包裹和摻入熟鐵，使熟鐵的含炭量增加，再經鍛煉，成為質地優良的鋼，可作刀鏃和武器。廣州的銀礦，開采較盛。

造船業在吳國原有的基礎上，有了較大發展。東海、南

海和內河，船只往来频繁，有的并远航海外。战争中使用  
的战舰，一次可达成百成千艘。大船载重可达二万斛。造船地  
点，有南康、晋安、建安（分别在今江西南康、福建建瓯、  
闽侯）等多处。民间造船业也很发达。

三吳的青瓷业继续发展，出土的越窑青瓷用具，不论在  
数量上或质量上，都超过孙吳时的水平。

由于文化发展的需要，南方出现了发达的造纸业。造纸  
原料，多用三吳盛产的藤，剡溪和由拳的藤纸，是纸的上  
品。纸的质量和数量提高，因而政府的简牍文书，也就最终  
地为纸书所代替了。

创造了丰富多采的手工业品的劳动人民，在政治经济上  
却处于极端困苦的地位。南方重要手工业多为官府经营，为  
官府服务。官府手工业劳动者除刑徒、奴隶以外，主要是被  
强迫编为官户的百工。他们身份低下，受着极残酷的剥削压  
迫，常常是“死亡绝没，家戶空尽”（《晋书·王羲之  
传》）。由于他们的逃亡起义斗争，才迫使统治者放松对他  
们的束缚。南朝后期的一些雇佣工匠，身份高于官户。雇佣  
工匠的出现是阶级斗争的结果，也是民间手工业逐渐发达的  
表现。

〔商业的发展〕 长江沿岸和三吳地区，商业比较活  
跃。大城市与农业区之间，大城市与大城市之间，一般都有  
河道相连。建康是南方最大的商业城市，秦淮河岸市集很  
多。江陵北抵襄阳，南通湘广，是长江中游商品运转的枢  
纽。成都不仅是与西南少数民族交换的重要市场，而且还吸  
引了不少资货数百万的远方商贾，西域商人也经由凉州前来  
贸易，被称为贾胡。南朝后期，沔水（汉水）和淮水沿岸，

南北贸易也日益增多，官吏和商人以襄阳和寿春为中心，交换各自需要的货物。番禺（今广州市）是南海的区域市场和海外贸易口岸。梁代外国海舶一年数至，运来奢侈物品，带走丝绵等物。据说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二千万钱，这虽是夸张的说法，也可见商税之多和官吏勒索的严重。

南朝商税是封建国家重要收入之一。凡买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者叫做输估，其余无文券者叫做散估，都是值百抽四。此外还有市税和“道中杂税”。封建国家有时把商税交给官吏承包，承包人额外勒索，是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

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始终在流通着，但流通地域不广，流通量也不大。东晋南朝以来古钱、新钱并用，还有盗铸的钱充斥市场。宋代前废帝时货币质量更劣，鹅眼钱一千长不及三寸，铤环钱入水不沉。梁武帝一度改用铁钱，物价猛升，交易者以车载钱，无法计数。至于南方内地除广州地区杂用金银外，一般是物物交易。

〔南朝农民反对剥削压迫的斗争〕 伴随着南方地主经济发展而来的，是农民的贫困。宋代以来，农民丁男每年要被迫缴纳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祿绢八尺，祿绵三兩二分，作为户调；租米五石，祿米二石，作为田租。丁女也要折半缴纳。宋孝武帝统治时，又把调布增为四匹，即十六丈。除了租调以外，还有更为繁苛的各种杂税。南朝允许以杂物折租，实际折算时，官吏在钱币、布帛、粮米以及其它实物之间上下其手，任意折换，造成农民更大的痛苦。征调之时计贖分等，又是官吏勒索的机会，桑长一尺，田进一亩，都算在贖产之内，甚至连屋上加瓦也要计税。至于把富者的

稅額轉嫁給貧者，更是常有的事。

南朝役名非常之多，兵役、徭役的征發完全視統治者的需要而定，沒有什麼限制。軍情緊急時，統治者強迫人民“率戶從軍”。兵士逃亡，全家連坐。至於長充兵役的營戶、軍戶，更是父兄死，子弟代，沒有脫身之日。宋時豫州軍戶，甚至“年八十而猶伏隸，或年始七歲而已從役”（《宋書·序傳》）。

官吏貪污十分驚人。益州官吏有的貪賍達萬金，有的壟斷鐵冶，貴賣鐵器，以牟高利。在他們的統治下，益州一個百戶的村落，有糧吃的只有幾戶，窮迫無以為生的農民十居八九，而如此窮苦的農民，每十天還要替官府服無償勞役兩三天。

苦難的農民大量逃入私門為奴為客，或者托身寺院做白徒養女。但是僧俗地主同樣是吃人的豺狼。走投無路的農民，到了非造反不可的地步了。

在南朝的一百七十年中，見於文獻記載的農民起義，不下三四十次。最大的一次是益州趙廣在公元432年發動的起義。這次起義人數十餘萬，圍攻成都，與官軍交戰達五年之久，使西南地區為之震動。遠在今雲南曲靖地區的寧州人民，也起而響應，進行了激烈的戰鬥。公元485年，富陽人唐寓之因反對“校籍”而起義，在錢塘（今浙江杭州）稱帝，江南“却籍”戶（被官府任意指為戶籍偽冒而受到懲罰的民戶）前來投奔的達三萬餘人，聲勢非常浩大。他們同齊朝派來鎮壓的禁軍進行了激戰，但終於被鎮壓下去。公元469年，臨海人田流，在鄞縣（今浙江鄞縣）發動起義，震動東方諸郡。公元510年宣城（今安徽宣城）郡吏吳承伯發

动起义，破郡县，杀太守，转攻旁郡。南朝统治者残酷地镇压了各地人民起义。参加起义的人及其家属或被斩首，或被割断脚筋，或被流徙远方，或被罚充苦役。但是英勇的劳动人民并没有被血腥的镇压吓倒，他们此伏彼起，前后相继，不停息地进行着反封建的战斗。

### 第三节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 六镇、关陇、河北人民起义

#### 一、北方各族统治者的封建割据和北魏统一北方

〔十六国割据混战和北方各族人民的反压迫斗争〕匈奴贵族刘渊灭西晋后，西晋的琅琊王司马睿，在建康建立东晋政权。同一个时期，中国北方被许多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分割占领，它们之间斗争复杂，兴亡相继，历史上称之为“五胡十六国”（公元317年—439年）。十六国时期，在北方政治舞台上出现的民族实际不止五个，它们建立的国家也不止十六个。

十六国历史，按照各国兴亡状况，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公元317年—352年是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北方出现的主要国家，是匈奴族的汉和前赵，羯族的后赵。刘渊灭晋以前，于308年在平阳（今山西临汾）称帝，国号汉。318年，匈奴刘曜灭汉，在长安建立赵国，史称前赵。与此同



时，羯人石勒在襄国（今河北邢台）称赵王。329年石勒灭前赵，称皇帝，史称后赵。335年，后赵迁都于鄴（今河北临漳境）。那时，除凉州（治今甘肃武威）有汉人张氏的前凉政权，平城（今山西大同）地区有鲜卑拓跋部的代国政权，辽西地区有鲜卑慕容氏称燕王以外，整个北方几乎全为后赵所统治。

公元350年，后赵大将汉人冉闵乘后赵皇帝死后局势混乱的机会，夺得政权，建国曰魏，352年，被从辽西地区南下的鲜卑慕容部消灭了。

这个阶段，北方统治者对于被征服各族的民族压迫，十分严重。他们采取胡、汉分治的办法，实际上是以本族贵族为核心，控制和利用其它胡人贵族，组成一支以胡人特别是以本族人为主的强大的军队，压迫汉族人民和其它胡族人民。他们还把其它胡族人民强制迁徙到都城附近，就近控制，便于随时征发他们当兵。对于汉族地主武装，或者攻灭，或者逼降。石勒还把一些毫无民族气节的汉族士大夫编为所谓“君子营”，以张宾为谋主，替他出谋划策，蹂躏中原。

胡族统治者在攻城掠地的时候，往往成千成万地屠杀汉族百姓。对其它胡族进行征服战争，也往往采取屠杀和逼迁的手段。334年上台的后赵皇帝石虎，是一个非常野蛮、非常残酷的统治者。他行军作战时到处进行大屠杀。他在鄴城、洛阳、长安大修宫殿苑囿，夜以继日，风雨不停，使多少万农民死于苦役。他在中原大规模圈地为猎场，严重地摧残了农业生产。为了侵犯东晋，他调发几十万农民当兵，规定每五人自备车一辆，牛两头，每丁还要自带米粮十五斛，

绢十匹，办不到的一律处死。许多穷苦农民被逼卖儿鬻女，甚至被逼自杀，道路上到处有自杀者的尸体。石虎的残暴统治，激起了各族人民无比的义愤，他们一有机会就进行武装反抗。山东人民以道教为纽带，托言李弘出世，策划大规模起义，被石虎镇压，连坐而死的达数千家。刘光于终南山假借佛教，聚众千人起义反赵，也不幸被杀。

公元348年，后赵原来的东宫卫士十多万人，由于宫廷矛盾的原故被解除武装，谪罚凉州戍边。他们多是久住中原的胡人，不愿远戍。其中一万多人行达雍州（治今陕西凤翔），又被官吏夺走马匹。他们积怨爆发，由梁犊率领，起兵东归。梁犊自称晋征东大将军，这显然符合关中汉族人民反抗羯族统治者的要求，因而大大增长了起义的声势。他们用民间大斧缚上长柄，“攻战若神，所向崩溃”（《晋书·石季龙载记》下），攻达长安时，已是十万之众了。他们继续东进，一直打倒洛阳、滎阳。石虎损兵折将，连吃败仗，最后用氐、羌兵力，才把他们镇压下去。始平（今陕西兴平）马勛聚兵反赵，自称将军，也被镇压。

连续发生的汉族和其它各族人民的起义斗争虽然都失败了，但是被压迫群众仇视羯族统治者的义愤却是与日俱增。350年夺得政权的冉闵，利用汉族人民的这种义愤，下令滥杀羯人和其它胡人，不分贵贱、男女、老少，被杀的达二十多万。冉闵为了树立自己的统治而采取的民族报复行为，同胡族统治者屠杀汉人和其它各族人民的罪行，本质上完全一样。

公元352年—383年，是十六国历史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北方出现的主要国家，是前燕和前秦。前燕是鲜卑慕

慕容部灭冉闵以后，在鄴城建立的国家。慕容部进入中原以前，已在辽西地区建立过政权，发展了封建经济关系，农业生产已有相当水平。前秦则是过去被后赵强迫迁到中原地区的氐族，乘后赵崩溃的机会，西归关中，在长安建立的国家。氐族建国以前，也长期在关中和中原活动，与汉人交往较多。所以前燕和前秦政权，比起前赵、后赵来，汉化比较显著，民族压迫比较缓和。前秦于公元370年灭前燕，376年灭前凉和代，并且进入西域，占领了整个北方。383年，前秦统治者苻坚发动南侵战争，在淝水之战中被东晋击败，前秦土崩瓦解，过去被前秦所征服的各少数民族的首领，乘机角逐，争夺统治权，整个北方陷于混乱，民族斗争又激烈起来。

公元383年—439年，是十六国历史的第三阶段，也就是北魏在混乱局面中逐步发展和统一北方的阶段。前秦崩溃后，在关东地区，包括东北，先后建立过后燕、西燕、南燕、北燕等国。除了北燕统治者先是受鲜卑影响的高丽人，后是受鲜卑影响的汉人以外，其余各国都是鲜卑慕容部贵族建立的。关中地区，羌人贵族建立了后秦。后秦被东晋的刘裕灭后，关中为以匈奴族为主体、融合有鲜卑族的铁弗部占领。铁弗部贵族的统治十分残暴，人民受害很深。在西北地区，并立着西秦（鲜卑乞伏部）、后凉（氐）、南凉（鲜卑秃发部）、北凉（匈奴沮渠部）、西凉（汉）等小国，彼此进行征战，混乱持续很久，生产破坏很大。

除上述关东、关中和西北三个地区以外，还有平城地区鲜卑拓跋部的活动。拓跋贵族过去建立的代国，是在376年被前秦苻坚灭掉的。淝水之战以后，拓跋贵族乘机于386年

重建国家，改国号为魏，历史上称作北魏。北魏陆续征服了一些游牧部落，推广了农业生产，力量强大起来。396年，北魏军队开始向中原进攻，逐步占领了关东大部分地区。拓跋珪于398年称帝，定都平城。以后又经过几十年的征服战争，到439年，完成了北方的统一。

〔北魏时期的阶级斗争和鲜卑拓跋部的封建化〕 北魏进行的统一战争，也是野蛮的民族征服战争。在战争过程中，拓跋部贵族大量屠杀人民，掠人为奴，抢劫财物，破坏生产，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他们在占领区实行军事统治，建立了许多直接统治人民的军镇。保留州郡机构的地方，州郡长官也多是鲜卑武将，他们为了镇压反抗和掠夺财富，成千上万地杀戮人民。汉族豪强大地主势力特别强大的地方，他们就假手于豪强进行残酷统治。人民租调定额空前的高，达到每户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调外之费还不在此内。至于临时征发租粟，有时每户竟达三十石、五十石。租调征收虽然有所谓“九品混通”，即以上述数字为平均定额，按户等高低通融摊派的办法，但实际执行时却又“纵富督贫，避强侵弱”，把大地主规避的租调，转嫁给贫苦农民。徭役征发更是层出不穷，没有定限。官吏没有固定俸禄，他们都凭借政治权势，任意搜刮民财，杀鸡取卵，竭泽而渔。象这样野蛮的军事征服和黑暗统治，不能不激起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各民族的反抗斗争到处发生，边境地区尤其激烈。鲜卑慕容部民为了反抗北魏把他们从中原强徙代北，曾经举行暴动。幽州的乌桓，并州的胡人，受北魏侵扰迫害很深，反抗频繁，坚持斗争很久。沿边地区各民族，反魏的规模最大，

其中的高车族，反抗失败后往往被强编为营户，强徙中原，在拓跋贵族的驱使下四出作战。

公元445年，盖吴领导杏城（今陕西黄陵）的卢水胡起兵反魏，很多羌人、氐人和汉人响应，很快发展到十万人。起义军一支向西进攻，一支先向东南发展，然后又转攻长安。河东（治今山西永济）的蜀人由薛永宗率领，也起兵反魏，与盖吴联合。起义军辗转斗争，打击北魏统治，直到北魏皇帝亲领重兵镇压，才归于失败。

北魏时期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原来带有比较多的民族斗争色彩，但是越到后来，各族人民联合起兵越多，阶级斗争的性质也越显著。北魏孝文帝即位（公元471年）后，中原地区以汉族农民为主而进行的暴动，几乎年年都有。公元473年，北魏下令，规定县令能镇压一县“劫盗”者兼治两县，能镇压两县“劫盗”者兼治三县，三年升为郡太守，郡太守能镇压“劫盗”者，也同县令一样兼职升官。残暴的镇压措施不但没有消灭农民暴动，而且激起农民群众更多的反抗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北魏统治者已经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他们不得不进行改革，另求维持统治的办法。

从另一方面看来，北魏统治者在进行民族征服的同时，他们自身封建化的程度也在日益加深。

拓跋部进入中原以后，千方百计地搜罗汉族士大夫帮他们建立封建统治制度，传播汉族文化。汉人士族崔宏、崔浩父子，在北魏早期的政治中起了重要作用。公元431年，太武帝为了“偃武修文”，诏征中原士族子弟，各州郡发送来的共达几百人，都依次给以官职。太武帝还命令鲜卑官员把子弟送到太学，学习汉族文化。拓跋部贵族这一系列的汉化

措施，对拓跋部走上封建化的道路，起着促进作用。

跟随拓跋部进入中原的一部分从属部落，其部落组织已被强制解散，部落成员分土定居，列为国家编户，不得任意迁徙，并被迫向北魏统治者提供封建义务。北魏还把山东六州民吏和鲜卑慕容部、高丽、“杂夷”共三十六万，强迫迁到平城附近，配给耕牛，计口授田，进行封建剥削。平城附近的拓跋部民，也逐渐同其它各族人民一样分土定居，同受剥削，他们之中的贫富分化现象，不久就严重起来。一部分战俘和被征服的各族人民，被北魏统治者当作封建依附户控制起来，替封建国家从事不同种类的劳役。封建依附户名目很多，有隶户、杂户、屯田户、牧户等等，还有主要是服兵役的军户、营户、府户。北魏统治者还把汉人工匠十万余人强徙平城，从事手工业生产。各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辛勤劳动，逐步改变着平城地区凋残落后的经济面貌，对于拓跋部的封建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拓跋部以及一些从属民族的封建化程度既然日益加深，北魏国家的许多统治制度就须要作相应的改变，才能适合需要。因此，北魏统治者在以后进行的各项改革，都是拓跋部在封建化道路上进一步发展的表现。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 在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的不断打击下，在拓跋部进一步封建化的迫切要求下，北魏孝文帝（公元471—499年）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经过长期战乱和不断的饥荒，北方人户流移，土地占有状况非常混乱。豪强大族兼并的土地，有时得不到足够的劳动力来耕种，只有让土地荒废掉；而流亡农民返回乡里，又难于获得小块耕地，因而也不能负担封建租赋。这到孝文帝时已成为十分严重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北魏于公元485年颁

行了均田制度。均田制度主要内容有：

一、十五岁以上男子，每人受露田（未种树的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妇人受露田二十亩。露田加倍或加两倍授给，以备休耕，年满七十还官。桑田作为世业，不须还官，但要种上一定数量的桑、榆、枣树。家内原有的桑田，不论多少，一律不动，但要用来抵消应受桑田及倍田的数额。

二、露田不得买卖。原有桑田超过二十亩的，超过部分可以出卖，不足二十亩的可以买至二十亩为止。

三、地主可以按其拥有奴婢和耕牛的数目，另外获得土地。奴婢受田办法同普通农民一样，耕牛每头受田三十亩。

四、居民可向空荒地区迁移，随力所及，借用官府土地。犯罪流徙或户绝无主土地，归官府作均田授受之用。

五、地方官吏按官职高低授给土地，刺史十五顷，下至县令六顷。

均田制不触动地主原有的桑田（也就是地主的私田），又可以用奴婢耕牛受田的名义保证地主对土地的合法占有。所以它是以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支配地位为前提的。在这个前提下，封建国家力图增加由政府控制的自耕农民，以保证租调收入和兵役徭役征发的来源。至于无地农民能否根据均田令而得到一块耕地，那就要看当地无主荒田的有无和多少的情况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均田制又是封建国家企图向小自耕农分摊租调负担的制度。

公元486年，北魏建立了三长制。北方从十六国以来，原有的农村封建政权组织已经破坏，聚族而居的豪强大地主，往往占有三十家、五十家甚至于几百家、几千家“苞荫户”，独霸一方，并且构筑坞壁工事，保障和发展自己的势

力。苞荫户同地主有程度不等的封建依附关系，多数就是地主的佃客、部曲。他们平时种田提供剥削，有事时则被地主驱使作战。大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同政治、军事权力以及同族权结合，紧紧地束缚农民。北魏统治者为了取得大地主的支持，勾结他们镇压农民，因而承认大地主的这种封建割据为合法的地方权力机构，叫做“宗主督护”。在北魏统治者看来，宗主督护制并不是一种得心应手的统治工具。所以当北魏政权逐步巩固，对中原地区的军事占领方式逐渐向正常的统治方式改变的时候，北魏就着手用三长制的基层封建政权，代替沿袭了一百多年的宗主督护制。三长制规定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三长的职责是检查户口，控制农民，征收租调，征发兵役徭役。在当时的条件下，三长制的实行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苞荫现象。而且充任三长的仍然是豪门多丁的地主，他们自然是力求维护大地主的利益的。但是三长制既是农村中正式的封建政权组织，它作为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比起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宗主督护制来，当然要有效得多。

北魏对于赋税剥削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原来北魏实行的九品混通的租调制，与宗主督护制是相适应的，但难于保证封建国家剥削的需要。随着均田制和三长制的推行，北魏国家控制的小农户口增多，因此规定新的办法：一夫一妇的小农家庭，户调帛一匹，田租粟二石；未婚男子四人、从事耕织劳动的奴婢八人、耕牛二十头，其租调都分别相当于一夫一妇的数量。废除征收租调时九品混通的办法。

改变某些制度，必然会触犯一些拥有传统势力的鲜卑贵族的利益，引起他们激烈的抗拒，酿成统治者内部的许多纠



纷。事实上，这种纠纷早已是层出不穷了。为了摆脱这种局面，孝文帝决计离开平城，把都城迁往中原。迁都中原，可以使北魏统治者更方便地获得粮食和财富，还可以使北魏统治者及时地镇压中原地区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斗争。这些都是北魏统治者决定迁都的原因。

公元494年，北魏把都城迁到洛阳。接着又实行了一系列改革鲜卑旧俗的措施。这些措施是：以汉族服装代替鲜卑旧服；朝廷上用汉语，禁用鲜卑语，三十岁以下官员仍说鲜卑语的一律降爵黜官；规定迁洛的鲜卑贵族以洛阳为籍贯，死后不得归葬平城；沟通鲜卑贵族和汉人士族的婚姻关系；改鲜卑旧姓为音近的汉姓；规定鲜卑人和汉人贵族姓氏的等第，等等。拓跋贵族把自己的姓氏改称元氏，定为最高的门第。以下，丘穆陵氏改为穆氏，步六孤氏改为陆氏，贺赖氏改为贺氏，独孤氏改为刘氏，贺楼氏改为楼氏，勿忸于氏改为于氏，纥奚氏改为嵇氏，尉迟氏改为尉氏，合称八姓，其门第与北方汉人士族崔、卢、李、郑相当，不充杂官，只任清职。

一部分守旧的鲜卑贵族不愿放弃传统的部落特权和在代北地区的产业，对迁都和改革进行了激烈的反抗。但是，迁都和改革是大势所趋，符合拓跋部本身发展的需要，因而他们的反抗陆续被击败了。

北魏的改革是拓跋部社会封建化的结果，也是长期的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的产物。北魏统治者企图用迁都和改革来缓和阶级矛盾，延续它的统治，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但是经过改革，拓跋部贵族陆续成为中原的大地主，同汉人士族进一步结合起来，而迁洛的鲜卑劳动者则陆续成为中原的农民，最终地脱离了游牧生活和残存的部落联系，完成了封

建化的历史过程。从这一方面看来，迁都和改革的意义又是很重要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指出：“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十六国以来北方各民族发展的历史，特别是拓跋部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了恩格斯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 二、北魏迁洛以后北方的社会经济

〔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五世纪下半叶以来，北方衰败的经济开始回升。以后，在阶级斗争的推动下，经过孝文帝的改革，到六世纪初年，北方社会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

北魏迁都以后，洛阳重新成为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迁洛的鲜卑劳动者筑起简陋的房舍，经营小块土地，“尽力伊、灋，人急其务”。他们同当地汉族农民一起，开辟了黄河中游许多长年荒废的土地，增加了粮食的生产。六世纪初年，北魏全国人口比西晋太康年间南北合计，还要多出一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三长制、均田制的成效和农业恢复发展的规模。劳动人民创造的农业生产工具，特别是整地碎土工具，比过去复杂得多，这些工具都是精耕细作所需要的。西晋时各地的水碾、水磨、水碓，在十六国时期受到严重的破坏后几乎绝迹，到这时又先后在洛阳和其它地方恢复起来。洛阳城南人民用水力进行碾、磨、舂、簸。洛阳城西的千金堰，有水碾磨几十具，“计其水利，日益千金”（《洛

阳伽兰记》)。农业经验更丰富了，农作技术也有了提高。农民特别注意耕作的功力，“宁可少好，不可多恶”，所以有“顷不比亩善”（《齐民要术》）的谚语。气候条件的掌握，土壤的区分，防旱保墒知识的积累，也都有新的成就。各种作物的栽培，积肥、施肥、选种、育种的细致方法，都受到农民的重视。

为了适应趋于繁荣的城市生活的需要，城郊蔬菜、果木以及其它经济作物的种植也发达起来。城郊农民所种瓜菜，种类繁多，有车牛的农户自运市场出卖，无车牛的转卖与人，收入比种植谷物要大得多。

畜牧业生产也有进步。牲畜的品种，牲畜饲养、繁殖和兽医的经验，都比过去丰富，这显然是吸收了鲜卑族畜牧经验和塞外畜群内移的结果。

〔手工业、商业的恢复和发展〕 五世纪末叶以来，北魏手工业生产日益活跃。绢布的产量大为增加，绢价从北魏初年每匹千钱降落到二三百钱，府库绢帛之多，达到魏晋以来最高的水平。供城市消费的手工业的种类多起来了，手工业者数量大增。洛阳城郊内外聚居了许多手工业户，按行业分居，例如退酤、治筋二里，就是酿酒业集中的地方。官府手工业也有所发展。管理官府手工业的机构太府，组织庞大，部门非常多。政府对于伎作户的控制，到孝文帝时期比过去放松多了。农村也出现了多种手工业，如榨油、造纸等，都是就地取料，就地加工。

在今河北、河南等地的北魏后期墓葬中，有许多青瓷器出土，它们的器形和制胎上釉，都与南方青瓷有很大的区别，显然是北方新近发展出来的制瓷业的产品。北方青瓷虽

比南方粗糙，但是它对唐宋时期北方制瓷业的繁盛，具有直接影响。

东魏綦母怀文集中了北方人民长期的冶炼经验，以灌钢炼宿铁刀，隋朝襄国（今河北邢台）冶家铸器，还用其遗法。有些地方用煤炼铁，这虽然同汉代一样只是个别地区的情况，但是煤的继续使用，必将促进冶铸业的发展。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也使交换关系活跃起来。长期以来的实物交易，在城市里已被货币交易代替。洛阳富商大贾很多，富商刘宝在各州郡都会立宅养马，以通行情，“至于盐粟贵贱，市价高下，所在一例”（《洛阳伽兰记》）。官僚贵族普遍营商，宗室诸王和邢峦、李崇等汉族官僚以及宦官刘腾等，都远近营运，贩肆聚斂。官吏易地调职也成了营贩的好机会，郑云贿买到安州刺史的位置，立即向熟悉安州情况的封回打听行情。

洛阳是当时北方交换的中心，城内外共有二百多里（坊），大市场很多，居民达十万九千多户。鄴和长安也逐渐恢复为重要的商业城市。北方与南方的贸易增多了，“南货”成为北方畅销的商品。今青海、新疆、蒙古等地的各族商人，也多带着牲畜毛皮和其它商品来洛阳进行买卖。国外方面，朝鲜半岛、日本、中亚以及更远的许多国家，都同北魏有商业往来，外国人长住洛阳的也不少。《洛阳伽兰记》说：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商胡贩客，日奔塞下”。今库车、吐鲁番、西宁、太原、陕县、定州等地先后发现过北朝遗留的四世纪以来的拜占庭金币和波斯银币，也证明北魏同西方存在着发达的贸易关系。

〔寺院经济〕 北魏时期，佛教寺院遍布各地。迁洛后

二十余年中，北魏全国寺院增至一万三千七百余所，洛阳一地即达五百所。北魏末年，全国更激增至三万余所，洛阳一千三百多所。私人建寺之风盛行，冯熙一人在各地建寺即达七十二所。寺院有丰厚的产业，是北朝封建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洛阳的寺院“侵夺细民，广占田宅”（《魏书·释老志》）。北齐寺产扩充特别严重，据说“凡厥良沃，悉为僧有，倾竭府藏，充佛福田”（《广弘明集》卷七》）。有些寺院甚至还拥有武装，用来保护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

北朝僧尼最多的时候达到二三百万人。僧尼立为僧籍，由僧官管理，不列入国家户籍，完全脱离封建国家的控制。僧官和上层僧尼是寺院地主，他们凭借寺产，勾结官府，剝削僧俗群众；而一般僧侣则被寺院地主“驱役田舍”（《高僧传·释道安传》），从事耕作。

寺院地主还可以享有封户，衣食租税。十六国末年释僧朗的封地多达泰山郡的两个县。北魏献文帝允许政府的僧官占有僧祇户和佛图户。僧祇户实际上就是僧官的依附农民，每年向僧官缴纳六十斛谷。后来僧祇户直接被寺院占有。佛图户以民犯重罪者和官奴充当，供寺院役使，并为寺院种田纳粟，身份和经济地位比僧祇户还低。寺院地主还凭借官府势力，大放高利贷，盘剥人民，同世俗地主一样凶狠。

### 三、六镇、关陇、河北各族人民的起义斗争

〔北魏统治的腐朽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北魏迁都洛阳和推行改革措施，满足了拓跋部封建化的要求，但是北魏统治者以此扑灭阶级斗争火焰的企图，却根本实现不了。在新的条件下，阶级斗争不是走向缓和，而是更加激烈。

随着中原地区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地主阶级可以从农民手里剥削到更多的东西。北魏统治者迁都洛阳，接近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比起在平城，剥削更为方便。因此，他们的贪慾也就更大了。他们凭借政治权力，霸占良田奴婢，垄断商业，放高利贷，无孔不入地积累财富，侵害人民。官场的腐败也超过了在平城的情形，营私舞弊，贿赂公行，甚至买官卖官都有定价，人们把掌管全国官吏任免调动之权的吏部称作市曹。花钱买官的人，无不在任职的地方千方百计地扩大剥削。有的人征收户调绢时，不按规定每匹长四丈征收，而要求每匹七八丈长才肯接受。大官僚贵族生活非常奢侈。他们除了争着修建重楼高阁的园宅以外，还在洛阳和其它地方竞造佛寺。大寺院建筑金碧辉煌，园林曲折，塔越修越高，铜佛越造越大。耗费的民脂民膏，简直无法估计。

在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的统治下，人民群众苦难重重。兵役徭役毫无止境，租调不断加重，天灾饥馑经常出现，农民大量死亡流散。僧俗地主乘农民之急，扩充自己的佃客僮奴。甚至被迫当兵的人，也在主将的剥削和压迫之下大量死亡。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农民和下层僧侣常常举行暴动，以反抗北魏的反动统治。公元六世纪的前二十年中，农民和下层僧侣的暴动就有十几次之多，有的暴动达十万人的规模，坚持的时间也比较久。沿边少数民族的反魏斗争，也有风起云涌之势。这些情况，充分证明北魏统治在政治上已走上穷途末路了。

〔六镇、关陇、河北各族人民起义〕 在中原阶级矛盾激化的时候，北边的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等六镇地区（今内蒙五原到河北张北一线），也在酝酿着

起义斗争。

北边的六个军镇，原来是北魏抵御境北的柔然族入侵、捍卫首都平城的重要军事地带。这里不设州郡，由军镇直接统治边境的鲜卑族、汉族和其它各族居民。镇将和定居六镇的各族酋帅、豪强，是这里的统治阶级，对六镇军民实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他们独占了这里少有的一些肥沃土地，而各族兵民只有靠着一点点贫瘠土地过活，本来就不得温饱，又碰上大旱连年和柔然骚扰，更是无以为生。他们反对剥削和奴役，反对土地兼并，随时可能爆发起义斗争。

公元523年，柔然入侵怀荒镇（今河北张北县以北），镇民几经骚扰，处于饥饿状态，要求镇将开仓发粮，镇将横加拒绝。愤怒的镇民杀死镇将，举起了反魏的义旗。接着，沃野镇（今内蒙五原西北）匈奴人破六韩拔陵，也聚集群众，杀镇将起义，沿边各镇汉族和其它各族人民群众起响应，声势浩大。破六韩拔陵率领起义军向南进攻，并派军包围武川镇（今内蒙武川东北）和怀朔镇（今内蒙固阳西北）。

六镇起义的大风暴，迅速席卷各地。524年，高平镇（今宁夏固原）人民起义，推举勅勒族酋长胡琛为首，响应破六韩拔陵。高平镇以南的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城民起义，推羌人莫折大提为首，南秦州（治今甘肃成县境）城民起义响应。莫折大提死，子莫折念生率领起义群众继续战斗。这几支起义军主要向东发展，在关陇地区形成了一个新的起义战场。此外，今陕北地区和汾河流域以匈奴人为主的各族人民，也陆续起兵反魏，同六镇、关陇起义彼此呼应。

腐朽不堪的北魏朝廷，面临人民起义的打击，不遗余力地调兵遣将，进行挣扎，力图把破六韩拔陵起义军镇压下

去。但是起义军锐不可当，白道（今呼和浩特市北）一战，北魏军队几乎全军复没。六镇地区各族的一些酋帅、豪强，为了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纠集反动的私人武装，同北魏官军勾结，镇压起义军。例如武川镇的豪强贺拔度拔，带着三个儿子和“乡中豪勇”，支援被起义军包围的怀朔镇，还杀死了起义军重要将领卫可孤。这些反动的豪强武装虽然陆续被起义军击破，但是他们阻滞了起义军的活动，使之不能迅速向南进军，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525年6月，北魏又勾结塞外柔然，以镇压起义军。柔然十万之众从武川镇西向沃野镇，进攻破六韩拔陵，破六韩拔陵被迫率众过黄河南移，在北魏军的截击下陷于失败，破六韩拔陵牺牲。

六镇起义失败后，起义群众除牺牲和流散的以外，还有二十万人，被北魏强制迁移到河北的冀州（治冀县）、定州（治定县）、瀛州（治河间）。河北地区是豪强大族集中的地方，土地兼并激烈，加上水旱连年，人民四出流亡，阶级矛盾本来十分尖锐。六镇群众远道前来，备受北魏统治者和当地地主的压榨欺凌，生活毫无着落。这样，河北的汉族农民同新来的六镇鲜卑、匈奴等移民，彼此影响，逐渐形成了联合起义的形势。

公元525年8月，流落在上谷（治今河北怀来）的柔玄镇兵杜洛周，聚众造反，攻下附近郡县，进围燕州（治今北京昌平），北魏安州（治今河北丰宁境）戍兵二万多人响应。526年十一月，杜洛周起义军进攻范阳（今河北涿县），范阳人民逮捕北魏官吏，开城门欢迎起义军。

公元526年正月，怀朔镇兵勅勒人鲜于修礼，率领六镇群众，在定州左人城（今河北唐县）举行起义。不久，叛徒元



洪业杀死鲜于修礼，修礼部将葛荣又杀元洪业，率领群众继续战斗。同年九月，葛荣在博野白牛逻击杀北魏大将元融以后，称天子，国号齐。接着，又在博陵（今河北安平）俘斩北魏军统帅元渊。527年，葛荣军扫荡河北各州，北魏重要官吏被杀、被俘、被逐和投降的，为数不少。这时，杜洛周起义军也向南发展，攻克许多州郡。在大好形势之下，葛荣竟击杀杜洛周，并吞了他的部众，造成起义军内部的裂痕，严重地损伤了战斗力量。

公元528年七月，葛荣起义军数十万人围攻鄴城（今河北临漳），准备进攻洛阳。这时，北魏朝廷的军政大权，由于宫廷斗争的原因，已经落入与北魏皇室有密切联系的契胡（羯族，在今山西北部）酋长尔朱荣之手。尔朱荣从晋阳（今山西太原）东出太行山，侧面攻击起义军。葛荣自以为人多势众，骄傲轻敌，叫人准备好长绳，只等着捉拿尔朱荣。他自鄴城以北列阵数十里，齐头并进，把自己的军事力量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尔朱荣利用葛荣兵力分散的弱点，分兵于山谷间，在葛荣的军前军后合击，打败了起义军，葛荣被俘身死。起义军一部分在韩楼率领下，回到幽州（治今北京市），继续斗争，529年九月始告失败。流入今山西境内的二十余万起义群众，也进行了持久的斗争。

当杜洛周、鲜于修礼起义军，同北魏军反复搏斗时，河北地区二十多万人民流亡青州（治今山东益都）。他们受到当地地主欺凌，生活无着，靠吃榆叶度日。528年六月，他们举行起义，人数很快就超过十万。十个月以后，这支流民起义也被镇压下去了。

在河北、山东起义军英勇斗争的时候，关陇战场战斗也

很激烈。莫折念生的起义军在今甘肃、陕西一带四出作战，其中莫折天生率领的一支，越过陇山，向渭水流域发展，占领过北魏许多州郡，杀死了北魏不少官吏。公元527年，起义军还一度向东挺进，攻克潼关，震动洛阳。同年九月，莫折念生为叛徒所杀，起义队伍在胡琛部将万俟丑奴率领下，继续战斗。530年，尔朱荣派军入关镇压，万俟丑奴不幸被俘牺牲。万俟道洛和宿勤明达坚持抵抗，第二年终于失败。

象其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一样，历时七八年的北魏各族人民起义，也“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起义失败以后，地主和贵族争相夺取统治权力，重建封建统治，造成了纷繁的改朝换代局面。

〔各族人民起义的历史作用〕 北魏末年各族人民斗争的基本性质，不是民族斗争而是阶级斗争。斗争的对象，是以北魏政权为代表的鲜卑贵族和汉族高门大地主阶级。参加起义的基本群众，是被统治的鲜卑、匈奴、高车、氐、羌等各族兵民和汉族农民。北魏南边的蛮族人民，也举行过很多次的起义，但是同北方人民的斗争没有发生直接的联系。

北魏的一些身为镇将的人和居住在边镇地区的各族上层分子，原来同北魏朝廷里的鲜卑贵族有紧密的联系，享受当政的鲜卑贵族和汉族高门地主同样的特权。可是北魏迁都洛阳和推行汉化政策以后，他们同朝廷的关系比过去疏远了，政治地位有所降低，出路受到一定限制，因此对北魏政权产生了不满。各族人民起义爆发后，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直接充当了镇压人民起义的剑子手，受到起义群众的惩罚和打击。可是也有一部分进入起义队伍，取得了起义的领导权。这些人总是企图扭转起义方向，千方百计地利用起义斗争来

达到自己的阶级目的。他们之间往往勾心斗角，互相冲突，彼此并吞。他们对汉族人民，带有阶级偏见和民族偏见，肆行压迫，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汉人。怀朔镇镇将出身的葛荣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河北并吞杜洛周的力量，造成起义军内部的不和；行军作战中又屠杀和虐待汉族人民，拉拢汉族士族。这些情况，给起义斗争带来了损失。但是，人民起义的基本性质，是少数人改变不了的。各民族几十万群众的殊死斗争，涤荡了十六国、北朝以来社会上的污泥浊水，开拓了历史继续前进的道路，起了伟大的革命作用。

第一，在各民族人民起义的打击下，北魏反动军事力量消耗殆尽，北魏政权分崩离析，洛阳的腐朽朝廷完全陷于孤立和瘫痪状态，再也无法维持封建秩序，无法继续统治人民。公元528年契胡贵族尔朱荣进军洛阳，在洛阳附近的河阴把当政的胡太后和傀儡皇帝投入黄河，又把北魏王公百官二千余人统统杀死，这就是所谓“河阴之变”。经过这次事变，北魏皇族元氏和其它一些鲜卑贵族，以及在洛阳当官的汉族高门，几乎被消灭干净。尔朱荣的屠杀虽然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所致，但是足以说明北魏统治集团在人民起义的反复打击下，虚弱到只有束手待毙的程度了。以后出现的东魏、西魏皇帝，只不过是北魏统治集团的残渣余孽，到一定的时候，他们就分别被篡夺了各族人民起义果实的高欢、宇文泰所废弃了。

第二，各地人民起义打击了当地的封建地主势力，特别是打击了士族大地主。河北人民起义爆发在士族高门集中的地区，对于大地主的打击和扫荡更为显著。士族大地主李元忠，役使宗族数千家，占有股州（治今河北隆尧）西山李鱼

川方五六十里的土地，还大放高利贷剥削农民。起义军打到殷州时，李元忠逼迫他所控制的宗族乡党，死力抗拒，甚至还杀戮了不愿与农民军作战的宗族乡党三百人。在起义军的猛烈攻击下，这个作恶多端的李元忠终于被擒获，家道也随之衰落。至于被起义军驱逐的高门大地主，为数更多。如渤海（治今河北东光）高翼被赶到齐州（治今山东济南），河间邢杲被赶到青州（治今山东益重），博陵（治今河北安平）崔暹被赶到渤海，右北平（治今河北遵化）阳休之被赶到青州，等等。这类高门大地主被起义军逐离乡土以后，虽然还可以凭借原有的社会地位继续做官，但是他们割据一方的政治、经济势力，就从此丧失了。

第三，北魏末年在北边、西边爆发的起义，逐渐向北魏中心地区发展，参加起义的几十万各族人民群众，形成一股一股的洪流涌入中原。起义斗争虽然被血腥地镇压下去了，但是进入今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地的各族人民群众，从此脱离了原来在边境地区的比较落后的社会状态，摆脱了或者削弱了残余的部落束缚。他们在同汉族农民的共同斗争中，彼此增进了了解，减少以至于消灭了民族隔阂，并且经过种种途径，逐渐成为他们所在地区的农业居民，在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同汉族人民融合。各族人民起义所推动的民族大融合的新浪潮，为隋唐时期国家统一和民族兴旺的局面奠定了基础。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论述中国历史时指出：“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十六国以来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的历史，特别是北魏末年各族人

民联合在一起，反抗共同的阶级敌人的历史，充分证明了毛主席的指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的短期对峙。隋统一南北〕 公元530年 尔朱荣死，他所统的六镇鲜卑的主要部分，由他的部将高欢率领，从并州转移到关东地区。高欢世居六镇之一的怀朔镇，是鲜卑化的汉人。他先后在杜洛周、葛荣军中，后来投靠尔朱荣。高欢东来后，消灭了尔朱荣在东方各地的势力。534年，高欢在洛阳所立北魏傀儡皇帝西奔长安，高欢另立傀儡，并迁都于鄴城，史称东魏。

关东地区土族豪强在人民起义打击之下，逐渐衰落，但是仍有许多人拥有部曲，自立州郡，称霸一方。高欢力图协调他们同新来的鲜卑贵族的政治经济利益，让双方都得到满足。他对鲜卑人说，汉人是鲜卑的耕织奴婢，又对汉人说，鲜卑人是汉人雇来当兵的人，叫他们不要互相歧视，互相欺凌。这实际上是要汉族和鲜卑族人民安于被剥削被驱使的地位，以便鲜卑武将和汉人士族豪强进行统治。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东魏，建立北齐。

北齐政治中，充满了鲜卑贵族同汉族高门的争权夺利的斗争，汉族高门有许多人被逐被杀。但在民族融合潮流中，鲜卑贵族本身也不得不日益汉化。在经济上，北齐通过颁行均田制，使鲜卑贵族获得大量土地，成为关东的大地主，而使鲜卑人民同汉族人民一样，成为封建国家的均田农民。在残酷的剥削压迫下，北齐均田农民经济地位很不稳定，他们往往不得不帖卖土地，逃亡他乡，托身寺院，或者群起暴动，打击北齐的腐朽统治。

当高欢转移到关东活动的时候，关陇地区逐步被宇文泰

控制。宇文泰是源出南匈奴的所谓“鲜卑别部”宇文部人，原居武川镇。六镇起义后，宇文泰进入鲜于修礼、葛荣军中，后来投靠尔朱荣，率领一部分六镇鲜卑到了关中。公元535年，宇文泰另立傀儡皇帝，自己掌握政权，史称西魏，建都长安。

宇文泰势力比高欢弱，他力图转弱为强。他整顿户籍，调整赋税制度，推行均田，以求缓和阶级矛盾。他又极力调和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的利益，消弭民族矛盾，使他们在剝削关陇人民的基础上维持一致。

宇文泰把十二军鲜卑禁旅改为六军，六军分由六柱国率领，每一个柱国督两个大将军，每一个大将军督两个开府，共为二十四部，由宇文泰统领，这样就貌似中国古代典籍《周礼》所说的天子六军之制。宇文泰本人和西魏宗室元欣名义上也是柱国，加上实际统兵的六柱国共为八柱国，这样又符合鲜卑早期由八部大人统兵的部落兵制。这就是府兵制度。府兵兵士轮番宿卫京师，不当番的则练习武艺。他们不列于国家户籍，因而没有其它赋役。为了符合鲜卑八部传统，府兵主将改为鲜卑姓，例如柱国李虎（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改姓大野氏，大将军杨忠（隋文帝杨坚的父亲）改姓普六茹氏，府兵兵士则改从主将的鲜卑姓氏。宇文泰又把关陇汉族豪强的私家武装乡兵，陆续归并到府兵中，使汉族地主与鲜卑贵族进一步结合起来。在官制上，宇文泰也仿照《周礼》制度，用六官代替魏晋以来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并立的中央政权组织。宇文泰为了表示汉化而在军制、官制上附会《周礼》，同他为了尊重鲜卑族而附会早期鲜卑的八部大人制度一样，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和民族融合潮流都不相

符，因而是不能长久维持的。

西魏势力逐渐强盛起来。公元553年，西魏取得蜀地，554年又取得江陵，并驱掠江陵官民到关中作奴婢。557年，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废西魏，建立北周。577年北周武帝宇文邕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

周武帝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他放免一部分官私奴婢为民，有一部分私奴婢则免为相当于佃客身份的部曲、客女。他宣布放免杂户，取消抑配杂户的办法。他禁断佛教和道教，尊崇儒学。他严禁乡官隐匿户口土地。他还大量召募普通汉人充当府兵，削弱府兵兵士对主将的身分上的从属关系，使府兵直接从属于皇帝。

公元578年，北周的军政大权落到外戚杨坚手中。杨坚的父亲杨忠出自六镇之一的武川镇，后来成为府兵十二大将军之一。杨坚掌权后，恢复了改从鲜卑姓氏的汉姓，按魏晋制度改变了北周的官制。公元581年，杨坚废北周，建立隋朝。

隋文帝杨坚压平了反对自己的兵变，铲除了朝廷中的异己势力，并积极准备向江南进军。在经济上，他统一北方钱币，开通漕运道路，储积粮食，检核户口，力量远远超过当时南方的陈朝。从十六国以来经过长期反复的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北方的民族关系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南北对立所具有的民族矛盾的性质，到这时已经完全消失了。北方的隋朝同南方的陈朝的战争不再是民族战争，而是争取封建统一的战争了。南北经济上的交流增多，南北人民正常往来代替了过去北人大规模单向南流。这一切现象，说明南北统一的时机业已成熟。

公元588年冬，隋朝的晋王杨广统率五十万大军，五路临江，完成了向陈朝发动总攻的准备。长江上游的水师也顺流而下，直趋建康。589年隋军渡江，灭掉陈朝，接着又摧毁了南方各地的反抗，平定了南方全部州郡。这样，历时二百七十余年的南北分裂局面宣告结束，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新阶段就逐步展开了。

#### 第四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 的各民族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非常多，分布也很广泛。这许多民族的人民和汉族人民在一起，共同创造着这个时期中国的历史。

这个时期，北方各民族自身的发展变化很大，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很复杂。有些民族，例如匈奴、鲜卑、羯、氐、羌（当时所谓“五胡”），都或先或后或暂或久地统治过北方，彼此之间以及它们与汉族之间出现了显著的融合。还有一些主要在北方边境地区活动的民族，没有进入中原，它们的社会也在进步，但是民族融合不如“五胡”显著。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就同汉族有接触，在这个时期也进一步同汉族发生了融合。

##### 一、北方边境各民族

〔柔然〕 柔然族在当时的史籍上又称芮芮、茹茹或蠕



蠕，是东胡的后裔。柔然从西晋以来，就在大漠以北逐水草而居，冬天到阴山一带，与鲜卑拓跋部为邻，并用马畜毛皮同拓跋部进行交换。直到十六国时期，柔然社会中还没有明显的阶级分化。

北魏初年，拓跋部逐步向南发展，柔然势力也向南向西扩张，统治中心转移到今甘肃省的敦煌、张掖的北面。这时柔然人进入了阶级社会，在他们的第一个可汗（最高统治者）社崙的统治下，建立了奴隶制国家。从此以后，柔然经常侵犯北魏阴山一带的边境地区。公元429年，北魏军大败柔然，柔然和被柔然所征服的各部共三十多万落（户）向魏投降。五世纪下半叶，柔然同北魏常有和亲往来，甚至还派使者经由今青海、四川而东达建康，与南朝通好，并索求医生，织工以及指南车、漏刻（计时器）等物。南朝使者也曾远至柔然。

公元520年，柔然内乱，被征服诸部的反抗又很激烈，柔然可汗阿那瓌率领一部分柔然人归魏，被安置在怀朔镇（今内蒙固阳西北）以北。六镇起义爆发后，阿那瓌曾帮助北魏统治者进行镇压，并杀死起义领袖破六韩拔陵。

北魏分裂后，柔然屡为北面崛起的突厥所败，公元555年，突厥灭柔然。柔然人一部分陆续入塞，逐渐与北方各族融合，大部分人则转移到西方去了。

〔高车〕 高车、勅勒和丁零，是同一个民族的不同称呼。北朝的史籍往往把这一族居住在中原的称为丁零，居住在今中蒙边境沙漠南北的称为高车或勅勒。

十六国时期，中原地区的丁零，多聚居在定州（治今河北定县）、相州（治今河南安阳）等处，密云也有一部分。

丁零著姓有翟氏、鲜于氏等。丁零翟斌被前秦苻坚强迫迁到今河南新安，淝水战后，翟斌率领丁零人反对苻坚。一直到北魏时期，丁零还长期与统治他们的鲜卑人进行斗争。北魏军队中，有许多被强迫服役的丁零人。

大漠南北的高车人，随水草迁徙，勇猛善战，各部自有君长，不相统属，语言与匈奴人大同小异。高车与柔然地境交错，常有战争。北魏道武帝统一北方，离散诸部落时，高车“以类粗犷，不任使役”（《北史·高车传》），因而得以保持自己的部落组织。以后北魏把在战争中所征服的大量高车人安置在滦河上游至阴山地区放牧，强迫他们向北魏统治者贡纳牲畜皮毛。有些高车人被徙至沿边各军镇以至于内地各州为营户，世代当兵。六镇、关陇各族人民起义时，高车人是起义主力之一。东魏、北齐的统治者中，有很多是高车部人。高车的副伏罗部于公元487年向西转移，在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以西建立高车王国，同𐱃𐰽<sup>①</sup>和柔然进行了几十年的斗争。

〔西域诸国〕 魏晋以来，今新疆天山以北的游牧地区，屡被鲜卑、柔然、高车、𐱃𐰽、突厥等族控制；天山以南的西域诸国，也常常受到北方强族的侵犯。

天山以南各国，经济生活比汉代有了提高。高昌谷麦一年两熟，产蚕丝和漆。“赋税则计田输银钱，无者输麻布”（《北史·西域高昌传》）。于闐（今新疆和田）宜于种植五谷桑麻，焉耆（今新疆焉耆）、龟兹（今新疆库车）都出

---

① 𐱃𐰽是今新疆和田以西的一个国家，跨有今新疆内外之地，南朝称之为柁国，东罗马、印度等外国史书中称之为白匈奴。

产稻、菽、粟、麦和蚕丝。葡萄和畜产，各国都很丰富。龟兹人用煤冶铁，所出铁供西域诸国之需。今新疆拜城的魏晋石窟寺壁画中，有二牛引犁和持宽头耧的农夫耕作图，反映了西域农业和冶铸业的进步。西域和中亚商人，经常从天山以南进入内地或进入北方其它民族地区贸易。

高昌（今吐鲁番）地区有不少汉人居住。高昌统治者立有学官，教授儒家经典。文字用汉文，兼用“胡书”，语言则为“胡语”。刑法风俗和婚丧制度，都与中原大同小异。西域各国佛教盛行，于阗、龟兹是西域佛教中心。著名的龟兹乐，北魏以后在北方广泛流行。

天山以南诸国，与内地经常有政治联系。高昌设郡，始于前秦。前秦吕光曾经进军西域，淝水战后，吕光退回姑臧（今甘肃武威），继续控制西域。北魏和高昌之间也常有使者往还。

〔吐谷浑〕 吐谷浑本是鲜卑慕容部的一支，四世纪时经阴山、陇西而至今青海地区，与氐、羌杂居。吐谷浑人主要从事畜牧，也经营农业生产。吐谷浑社会贫富分化显著，婚姻厚纳聘礼，杀人者及盗马者罪至死，其它犯人则以物赎罪。

阿豺统治时，吐谷浑成为西边的强大力量。此后，吐谷浑南通蜀地，北通凉州，还屡次同北魏和刘宋往来。五世纪中叶，吐谷浑开始使用文字，修筑城池宫殿，信奉佛教。六世纪中叶，吐谷浑统治者定都于青海湖西岸的伏俟城。但是吐谷浑人民仍然随水草畜牧，很少住在城郭里。

〔高句丽〕 鸭绿江以西的高句丽人，于公元209年，把政治中心从国内城迁于丸都（均在今吉林集安境内）。公

元246年和342年，丸都先后受到曹魏毋丘俭和前燕慕容皝的袭击。北魏初年，当高句丽的广开土王时期和长寿王的早期，高句丽势力强大，在辽东地区发展。公元427年，长寿王把政治中心迁移到平壤，但留居辽东的高句丽人民，继续同鲜卑人民和汉族人民一起，共同创造着这个地区的经济和文化。高句丽同十六国、北朝和东晋、南朝，始终有密切的联系。

高句丽人随山谷而居，俗喜歌舞，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以布、谷缴纳赋税。他们如果负债偿还不起，就得以子女为债主奴婢。高句丽社会中已经出现了封建剥削关系，今存的历史文献和辽东地区高句丽碑文中，都有奴客的称谓。

〔库莫奚·契丹〕 库莫奚原来是被鲜卑别部宇文部所征服的一个民族，居于滦河上游，主要从事畜牧，随逐水草，迁徙无常。五世纪下半叶，库莫奚人常入塞以马匹、毛皮与北魏互市。

契丹是鲜卑的一支，住地在库莫奚以东，辽水以西，以畜牧射猎为事。五世纪中叶以来，他们在今朝阳、密云之间，以马匹、毛皮与北魏互市，有时还入塞购买粮食。

〔突厥〕 突厥统治者姓阿史那，起先住在今苏联叶尼塞河上游，过游牧狩猎生活，后来迁到高昌北山（今新疆博格多山），以锻铁著名。五世纪中叶，突厥被柔然征服，成为柔然的锻奴，被迫迁居金山（阿尔泰山）南麓。六世纪中叶，突厥人逐步摆脱了柔然奴隶主的束缚，与西魏边地及西域各国互市，力量壮大起来。公元552年突厥建立汗国，并陆续占领柔然全部疆土，逐步扩展成为东西万里、南北五六千里的奴隶主国家。

突厥汗国有世袭的大小官二十八等。法律规定犯反叛、

杀人罪者处死刑，犯伤人罪者用妇女、财物或马匹赔偿。偷盗马匹财物者十倍偿还。本族人犯法者或被征服的异族人进行反抗者，降为奴隶。突厥在各地区分立许多可汗以统治辽阔的国土，各可汗间经常发生争权夺利的冲突。

北齐、北周对峙时期，齐周双方都力求取得突厥的助力，突厥也在齐周双方之间进行活动，乘机取利。公元563年，突厥与周联合攻齐失败，突厥兵大肆抢掠，自晋阳（今山西太原）以北七百多里之间，人畜无遗。从此以后，突厥的骚扰日益严重。

## 二、南方各民族

〔蛮〕 蛮族是这个时期南方最大的少数民族。蛮族人民以种植谷物为业。晋朝以来，蛮人从长江中、上游地区向东向北发展，到了南朝时期，他们活动的范围已经达到今川、湘、鄂、豫、皖、赣等省的许多地区。蛮族各部按所居地域区分，有豫州蛮、荆雍州蛮等，名称很多。各部蛮人分别由蛮王统率，多者万户、几千户，少者几百户，在地域上不相联接，语言也不尽一致。

南朝时期，重要交通线附近的蛮人大致已封建化了。南朝先后在蛮人地区设立很多郡县，强迫蛮人纳租服役。汉族人民为官府所迫，有许多逃入附近的蛮人地区，种田为生。汉族商人有时也入蛮中贸易。但是汉、蛮两族的统治者为了攫取政治经济利益，有时却挑起民族战争，造成了两族人民的损失。尽管这样，蛮族社会仍然沿着封建制的轨道前进，蛮、汉人民之间的融合也在不断发展。

〔僚〕 在今川西一带的山谷中，居住着处于奴隶制阶

段的僚族。僚族分支很多，各部首领彼此不相统属。奴隶买卖在僚人中很盛行。东晋时僚人开始向东发展，南北朝时，今四川的僚人达到二十万户之多。今陕南鄂西地区、广西南南地区，也有僚人。有些僚人与汉人杂居，成为输租纳赋的编户。汉族官吏常常大规模地掠夺僚人为奴隶，甚至出现了贩卖僚奴的商旅。汉族统治者的这种残暴行为，不断激起僚人的反抗斗争。

〔俚、山越、爨〕 俚族散在湘、广等地山区，有的自成村落，有的与汉人杂居。为徭役赋税所迫的汉人，常常逃亡到附近俚人村落中去。有些地方，规定俚人以白银交纳赋税，他们为了买银输税，又要受商贾的沉重剥削。南朝以来湘、广地区的农民暴动，常有俚人参加。

今江、浙、皖、赣境内的山越人，在孙吴统治时期活动很多，以后就逐渐与汉人融合，山越的名称也很少见于历史记载了。

分布在今云南境内的许多民族，从西晋以来大多数处在爨氏的统治下，被笼统地称为爨人。爨人除了农耕以外，还有畜牧经济以及狩猎、采集经济。东晋南朝政权遥授爨人首领以官位名号，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能把爨人如同其它州郡民一样控制起来。爨人同西南的汉人关系密切，公元432年今四川地区发生了赵广领导的农民起义，云南境内人民响应，爨人首领爨龙颜率领军队，参加了镇压人民起义的活动。

〔南方的民族融合〕 上述蛮、僚、俚、越、爨等族，都是我国南方历史悠久的民族。这些民族所在的地区，秦汉以来陆续设立了郡县，进行统治，但是这些民族除越族以外，同外界接触仍然较少，多少还处于孤立发展状态。东

晋南朝政权对待少数民族人民，凡是统治力量所能及的，就尽量征收乡土所产物品，加紧剥削；对待少数民族贵族，则给以空头官号，利用他们进行统治。

南朝以来，南方各民族的社会状况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各族人民更多地从山岭川洞中出居平地，扩大了同相邻民族（包括汉族）的联系，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加速了本民族的阶级分化，同时出现了比较显著的封建化和与汉族融合的倾向。

梁朝末年，南方内地出现了许多割据一方的人，被称为“洞主”、“酋豪”，他们应当是各地少数民族的首领。梁朝末年，陈霸先在今两广地区任督护、太守之职，结交了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后来他回建康作相，写信邀请这些首领和他们的子弟到建康作官。他作皇帝（陈武帝）后，所委署的南方内地州镇大吏也多是这些人物，其中有的还把自己的亲属送到建康居住。高凉（今广东恩平）冼氏“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更是陈朝在岭南的重要支柱。这些情况，反映了南方各民族经济、政治的发展和它们与汉族融合的进程。到了隋朝，这些民族地区更多地列为郡县，各族人民更多地成为隋朝的编户齐民，民族融合进一步发展了。

## 第五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文化

### 一、哲学和宗教

〔魏晋玄学〕 农民起义瓦解了东汉统治，原来与东汉

政权密切结合的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也大大动摇了。魏晋时期，地主阶级中的一些思想家，力图用道家的思想材料重新解释儒家经典，以之为封建政权服务，这样就逐步形成了魏晋玄学。

曹魏正始年间（公元240—248年），何晏、王弼等人用老子思想来解释儒家的《周易》、《论语》，构成了所谓“贵无”的思想体系。他们认为天地万物的本体是“无”，“无”是神秘的不具有物质属性的，而“有”却是从“无”产生出来的。所以圣人立言行事都以“无”为本，任乎自然。他们在政治上崇尚无为，就是说君主应当无为而治，听任世家大族发展。

正始以后，世家大族的代表司马氏逐渐兴起，形成与曹魏争夺政权的复杂斗争。司马氏标榜儒家的名教（即现存的封建制度和封建伦常），大杀异己，引起一些名士的疑惧和反感。名士阮籍、嵇康崇尚自然，反对名教，同司马氏消极对抗。他们使酒任性，玩世不恭，走上了颓废的道路。嵇康指斥儒家所崇拜的圣人汤武、周公、孔子，指斥儒家的经典。阮籍主张无君无臣，讽刺那些称道名教礼法的伪君子为裤中的虱子。

西晋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交错发展，地主阶级中的腐化倾向和颓废思想更加严重。这时的玄学家以向秀、郭象为代表，提出“生物者无物而物自生”的所谓“独化”观点，否定客观规律，否定万物变化中物质条件的作用。他们主张儒家称道的名教即是道家崇尚的自然，认为各人在名教中的地位是天理使然，所以要各安其分。他们理想中的圣人，一方面在当时肮脏的社会政治中贪图权实，尽情享乐，一方面又把自己打扮得淡然自若，貌似



清高。显然，这种思想是非常适合那时当权的官僚贵族的需要的。

在魏晋玄学泛滥之时，另有一些思想家反对玄学唯心主义，反对玄学家替统治者巧为辩护的政治观点。两晋之际的鲍敬言，好老、庄之学，认为天地万物自然形成，无所谓尊卑之分，他说，古时社会无君无臣，没有聚敛，也没有严刑，后来出现了君臣之制，才随之出现了以强凌弱的事，出现了“役彼黎烝（百姓），养此在官”的现象。百姓在赋敛和苦役之下，且冻且饥，于是甘冒法纪，犯上作“乱”，要加制止也不可能。鲍敬言说，在君臣制度下，“人主忧慄于庙堂之上，百姓煎扰乎困苦之中，闲之以礼度，整之以刑罚，是犹辟滔天之源，激不测之流，塞之以撮壤，障之以指掌”（《抱朴子·诘鲍》）。鲍敬言的无君论思想，是对当时黑暗的封建政治的一种抗议，但是他把希望寄托在一去不返的“曩古之世”，却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观点，对于当时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斗争并没有什么积极作用。

东晋以后，玄学中心从北方的洛阳转移到南方的建康，玄学内容同佛教的唯心主义哲学结合，因此，佛教也就得以依托于士族和玄学而广泛发展。

〔佛教的发展〕 东汉末年农民战争的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长期的封建割据战争和稍后的民族征服战争，给佛教的传播提供了社会条件。统治者把宗教（主要是佛教和道教）作为欺骗劳动人民的重要的精神武器，极力加以提倡。西域僧侣陆续东来，中国人也有不少西行求法。东晋末年，沙门法显西行，经历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等国，带回大量经典。他把亲身见闻写成

《佛国记》（又名《法显传》）一书，至今还是研究上述国家历史的极重要的文献。佛教经典大量被翻译出来。有些僧侣迎合士大夫对玄学的爱好，用玄学解释佛理，创立新义。佛学中渗入玄学最多的般若学，在两晋南朝时就有所谓“六家七宗”。

这个时期，出现了不少为剥削制度说教，替统治者麻痹人民的所谓“高僧”。如西域人佛图澄用佛教帮助后赵石勒巩固政权。佛图澄的弟子释道安，是六家七宗中影响最大的“本无宗”的创立者。他于东晋时从北方南来，整理经典，厘定戒规。他的弟子慧远“博综六经，尤善庄老”，在庐山讲学，与朝中士大夫往来密切。

后秦时，鸠摩罗什从龟兹（今新疆库车）到长安讲学译经。他译经主张意译，对后代翻译事业影响很大。罗什弟子僧肇，对佛教的唯心主义哲学研究较深。罗什另一弟子道生宣扬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可以顿悟成佛的教义，对人民群众起着很大的麻痹作用。

地主阶级的统治者一般都懂得佛教能起“化民成俗”，支持封建统治的道理，所以大力提倡佛教。南朝梁武帝笃信佛教，亲自讲演佛理。但是封建的专制君权和儒家的人伦纲常，终究同佛教教义有着某种矛盾；佛教寺院侵占人口，兼并城乡土地，放高利贷，又造成封建统治者在经济上的损失；道教徒为了抬高道教的地位，也极力攻击佛教。由于这些原因，佛教虽然有很大的发展，但是终于不能长期地取得国教的地位，而且还发生过公元446年北魏太武帝和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先后两次毁佛事件，使佛教和寺院一时受到很大的打击。

〔唯物主义哲学家范缜及其光辉著作《神灭论》〕 在玄学、佛学合流的南朝，思想界进行了长期的形神、因果之争。一些先进的思想家如戴逵、何承天、刘峻等，继承了中国哲学史中无神论的优秀传统，驳斥了“神不灭”论（有神论）和所谓因果报应之说，打击了佛教的理论基础，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唯物主义哲学家范缜，齐、梁时人，立志反对佛教，不畏权威，受到门阀士族的排斥。齐竟陵王萧子良曾问他，你不信因果报应，怎样看待富贵贫贱的差别呢？他说：人生好比随风而起的落花，有的落到富贵人家，象你一样；有的落到贫贱人家，象我一样。贵贱虽有不同，因果是没有的。萧子良集合许多僧侣和文士来驳他，他都不屈服。萧子良又使人用儒家名教来胁迫他，并用中书郎的官位来引诱他，他回答说：我范缜决不“卖论取官”。

公元507年，范缜面对梁武帝的威胁，发表了光辉的唯物主义哲学著作《神灭论》。他认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即”是不分离的意思），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又认为“形者神之质（本体），神者形之用（作用）…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梁书·范缜传》）范缜唯物地论证了形和神（物质和精神）的统一，判明了神是形的产物，没有形的实体，就不会有神的作用。这种用刃和利的关系比喻形和神的关系的犀利而又严密的论证，克服了汉代桓谭、王充等先进思想家用薪和火比喻形和神的某些论证的缺陷，更有力地打击了神不灭论思想，使中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又前进了一大步。范缜坚持真理，英勇抗拒梁武帝及其臣

属六十余人的反扑，毫不动摇。

由于当时生产力和自然科学水平低下，范缜只能用偶然论来反对因果报应论，还把器官的差异当作区分凡人、“圣人”的根据，这显然是错误的。在社会政治观点上，他受封建思想的束缚，主张“小人甘其垄亩，君子保其恬素”。这是阶级的限制和时代的限制所造成的。

〔道教的发展〕 黄巾起义失败后，道教仍在南北各地流传。地主阶级的一些人物，力图发展和增加道教中有利于统治人民的内容，清除其中可能被人民用来反对统治者的内容，使道教成为统治者的长生之术和奴役人民的更为可靠的工具。

东晋葛洪著《抱朴子》一书，内篇属道家，外篇属儒家，认为道是儒之本，儒是道之末。他主张炼丹养神，延年益寿。他反对用符水治病的农民起义领袖张角等人，说他们“招集奸党，称合逆乱”，主张对这种起义者“犯无轻重，致之大辟（死刑）”。南朝著名道士陶弘景通天文、地理、医药之学，他按照人间的封建等级制度，把道教崇奉的神仙分为不同等级，反过来用以为人间等级制度辩护。北魏道士寇谦之在道教内容中除去“三张（东汉末年农民起义领袖）伪法，租米钱税”等事，用地主阶级的礼法来办道教，同葛洪的目的基本一样。东晋南北朝时期，不少帝王将相信奉道教，在他们的庇护下，道教寺观遍于各地，费财害民同佛教差不多。

道教产生于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它一方面吸取佛教的一些教理和戒规，模仿佛教组织来发展自己的势力；一方面又借助儒家的某些思想武器，把佛教当作外来宗教加以攻击。

不过道教教理杂乱，哲学思想较为贫乏，在麻醉人民的作用上不如佛教那样巨大。

## 二、史学、文学和艺术

〔**史学和地理学**〕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比较发达，私家修史的风气很盛。所修东汉以下各朝的断代史书，每代多的达二三十种，其中绝大部分已陆续失传了。现存的重要史书，以范曄《后汉书》、陈寿《三国志》最著名。

刘宋时范曄著《后汉书》，整理各家关于东汉的史书，删繁补略，言简意赅。《后汉书》的志没有写成，后人取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志补入，成为今天《后汉书》的一部分。西晋时陈寿所著《三国志》，只有纪传，没有表志。它取材较精，文字简练，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四史，是我国的史学名著。刘宋时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补充了大量史料。

魏晋以来，由于封建割据的加剧和依地域区划而设的九品中正制的推行，出现了许多关于一个地区的人物的传记集和一个地区的风物、史地书籍的地方志。地方志存留至今的，如记载今陕西、四川、云南、贵州一带历史的《华阳国志》，记载北魏洛阳佛寺及其它情况的《洛阳伽兰记》等，史料价值较大。在土族制度下，编修族谱成为一种专门学问，当时的族谱后来陆续失传了。由于佛教的发展，出现了僧侣传记集，今存梁僧慧皎《高僧传》，包括东汉至梁初二百五十七人的传记，附见的又有二百多人，是研究佛教史、社会史的重要资料。

酈道元《水经注》以汉代著作《水经》为底本，详记全

国和邻国河流水道一千多条，于水道流经之处，记叙山陵、城市、遗迹和地理变迁，以及风俗、物产、人物等等，有较高的史学、地理学价值。

西晋裴秀绘制《禹贡地理图》及《地形方丈图》。他论述“制图六体”，为地图绘制提供了当时所能提供的科学基础，在以后的一千二百年内，我国的地图绘制技术都没有超过它的规格。

〔文学〕 三国西晋南北朝时期，诗、文、小说和文学理论、文学批评都有重大发展。

这一时期的文学，以“建安文学”为开端。建安文学以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曹植为中心，在他们的周围聚集了一批有才华的诗人，其中著名的是所谓“建安七子”，即孔融、王粲、刘楨、陈琳、阮瑀、徐干、应瑒。建安诗人身经长期战乱，感受较深，他们的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和人民的痛苦生活。如曹操的《蒿里行》，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都是代表作。蔡琰（蔡文姬）是建安时的一个重要的女诗人，她曾为匈奴掳去，后被曹操赎回。她在《悲愤诗》中有力地控诉了割据者的凶残，细致地叙述了流离的惨痛。

魏晋之际，阮籍、嵇康的诗文带有浓厚的庄、老思想色彩和愤世疾俗的感情。此后百余年中，诗歌受玄学思想影响，出现了“玄言”诗，没有什么成就。

东晋末年，诗人陶渊明归隐田园，参加一些生产劳动，比较接近农民，创作了许多优秀的田园诗。他的《桃花源诗》和诗序《桃花源记》，虚构一个不纳王租的社会，与现实世界的剥削压迫制度相对立。但是陶诗中贯串的地主阶

级的乐天知命思想和自我陶醉的人生态度，对后人传播了消极影响。

南朝的齐、梁以后，诗歌讲求声律，是中国诗歌走向格律化的开端。

民歌是这一时期文学的重要部分。建安时民间创作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描写青年夫妇焦仲卿、刘兰芝为反抗封建宗法势力宁死不屈的动人故事，社会内容深刻，艺术表现鲜明。北朝的民歌中，《木兰词》刻画一个代父从军、淳朴勇敢的妇女形象；少数民族歌手创作的《敕勒歌》描写草原风光，在古典文学中很有名。

这一时期的散文作品很多。《三国志》、《后汉书》、《水经注》等，从文学角度说来，都是著名的散文作品。有许多散文用骈体形式写成，对仗工整，声律协和，但堆砌华丽的词藻和深奥的典故，妨碍思想的自由发挥。

在文学创作的基础上，出现了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著作，最早的是曹丕的《典论·论文》。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广泛评论了历代的作家和作品，探讨了历代的文体和文风，提出了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统一的观点。钟嵘的《诗品》则广泛评论了历代诗歌。

文学作品的丰富，文学批评的发展，促成了作品选集的出现。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是一部重要的文学选集，对后世文学发展影响很大。

〔艺术〕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绘画、雕塑、书法、乐舞和戏剧，都有不少成就，艺术遗产非常丰富。但是艺术遗产多数渗入了宗教迷信和地主阶级思想意识，同其他门类的文化遗产一样，须要批判继承。

这个时期的绘画，以人物画为多。吴、东晋时的曹不兴、王廙、卫协，都以善画人物象特别是佛象著名。东晋顾恺之作人物画，最重传神，他认为传神的关键在眼上，据说他给别人画阮籍、嵇康象，都不点睛，因为他认为“点睛便语”。顾恺之的画，现存有摹本《女史箴》，是古画珍品。宋代画家陆探微，梁代画家张僧繇都有一些成就。神话故事说张僧繇画安乐寺白龙壁画，其中二龙点睛后即飞走了，这就是“画龙点睛”典故的由来。这个时期北方的山水画，常常是“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比例不相称，据说这是画家为了突出画面的某些部分而不拘泥于实物比例的缘故。南齐谢赫著有绘画理论著作《画品录》，提出作画“六法”，是当时对绘画技术的总结。

解放后各地陆续发现的这个时期的一些墓葬中，保存了不少精致的壁画，如南京晋宋墓中的砖刻画竹林七贤图，河南邓县南朝墓中的出行图，特别是1965年出土的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中的列女图，都是这一时期可贵的艺术遗产。

这个时期雕塑艺术的成就，集中表现在无名工匠创作的石窟寺艺术中。甘肃敦煌的莫高窟，今存有以佛经故事为题材的塑象、壁画的石窟，有四百八十六个，敦煌的千佛洞，还有十六窟。山西大同的云岗石窟，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则是古代雕刻艺术的两大宝库，石雕佛象数量极多，大的佛象高达十几公尺。此外在今新疆、甘肃、山西、河北、河南、辽宁以及四川、浙江等处，也保存了数量不等的当时的石窟或造象。

汉族文化所独有的书法艺术，到这时已经成熟。书法字体有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等。东晋的王羲之、王献之父



子，书法最有名。这一时期北方盛行的字体接近汉朝隶书，今存魏碑多属这种字体。

十六国北朝时期，所谓“胡乐”，包括西域（今新疆）乐如龟兹乐，外国乐如天竺乐等，陆续传入北方。北齐时胡乐更盛，甚至有些胡人以擅长胡乐而封王。1971年河南安阳出土的北齐范粹墓中瓷扁壶上，印有五人一组的乐舞活动场面，这五人从面貌和衣着看来都是胡人，反映出少数民族乐舞和外国乐舞的影响。

戏剧表演艺术在这时开始形成。后赵石勒命人演出参军某的故事，以为笑乐，这就是唐代参军戏的由来。北齐的《兰陵王》（唐代称为“代面”或“大面”）歌舞，《踏摇娘》歌舞，故事情节完整，更接近后代的戏剧。

### 三、科学技术

随着生产的恢复、发展和科学实践经验的积累，这个时期科学技术的某些部门，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

〔数学和天文历法〕 魏晋之际，刘徽作《九章算术》注解，指出利用《九章算术》中圆周率等于三的数值来计算圆面积，所得出的不是真正的圆面积，而是圆内接正六边形的面积。他把圆内接正六边形依次分割至圆内接正一百九十二边形，计算出圆周率为3.14。他还认为圆内接正多边形的边数越多，其面积就越与圆面积接近。这就是近代数学中的极限概念。

南朝的祖冲之（429—500年），是世界历史上杰出的数学家。他求出的圆周率，在3.1415927和3.1415926这两个数值之间，其精确度直到十五世纪才被一个阿剌伯数学家

超过。祖冲之还用两个分数值表现圆周率，一个是密率，为 $\frac{355}{113}$ ，另一个是约率，为 $\frac{22}{7}$ 。这个密率数值在欧洲要到十六世纪才由一个德国数学家得出。

祖冲之把东晋虞喜在天文学上的发现运用于历法，制定大明历，大明历规定一年为365.2428天，与当时地球绕太阳一转的实际周期相差不到五十秒。

〔医学和药理学〕建安时南阳一带疾疫流行，南阳人张机（字仲景）的宗族病死了三分之二，其中死于伤寒的又十居其七。于是张机“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伤寒杂病论》。西晋太医令王叔和整理这部著作，分为《伤寒论》和《金匱要略》二书。前者对伤寒诸症分析病理，提出疗法，确定药方，后者则是杂病的病症、医方的汇集。这两部书是中医的重要经典，张机因此被后世称为医圣。建安时的名医沛人华佗，精于方药和针灸，对于针、药所不能治的外科疾病，则用外科手术治疗。施手术时先令病人服“麻沸散”使失知觉，然后“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腸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三国志·魏志·华佗传》）。华佗还提倡模仿虎、鹿、熊、猿、鸟的活动姿态以锻炼身体，称为“五禽之戏”。

王叔和除了编辑张仲景的医学著作以外，还集中了秦汉以来医家切脉的经验，写成一部《脉经》，分脉象为二十四种，据以判断疾病的种类。

东晋葛洪、南朝陶弘景，都有医学著作。陶弘景还有《本草集注》，著录本草药物七百多种，比汉代的《神农本

草》多出一倍。

〔农学〕 北魏末年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完整的农书。这部农书内容广泛，包括谷物种植、蔬菜瓜果种植、种树、养家畜家禽及养鱼、酿造以及作菜等等，还集中了当时北方许多有用的农谚，记载了中原以外和外国的一些植物品种。《齐民要术》不但集西汉《汜胜之书》以来北方农业生产经验之大成，而且反映了当时农村生活状况和社会经济状况。贾思勰书中征引古代文献很多，有名可考的达百余种，西汉的《汜胜之书》和东汉的《四民月令》等，主要就是由于他的征引才得以部分留传下来。他在写书过程中还“询之老成，验之行事”，把丰富的书本知识同农民的生产经验以及同自己的实践密切结合在一起，这样就增加了这本书的科学价值。